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六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六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毛泽东 (1)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5)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八路军部队暂缓去华中
 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7)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 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 王稼祥 (8)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采取比较
 静观态度给陈绍禹等的电报 (21)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 朱德等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磨擦情况及我之布置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22)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
-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及意见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25)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
 对策的指示 (27)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 中共中央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五中全会电 (29)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 (31)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周恩来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给蒋介石的复信 (34)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
工作原则的决定 (38)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第三届参政会提案问题
给南方局的指示 (39)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 毛泽东 (41)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两年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保卫边区和全中国
的抗战中所做的工作 林伯渠 (48)
（一九三九年一月）
- 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其内部磨擦问题 王稼祥 (77)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
- 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等关于发展生产
运动的紧急通知 (88)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
给南方局的指示 (91)
（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
- 朱德等关于整军计划给各兵团的电报 (92)
（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北各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95)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 周恩来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 (97)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 朱德、彭德怀关于克服困难坚持华北持久抗战
给贺龙等的电报 (113)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训令 (115)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 (117)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
- 朱德、左权关于抗击日军“扫荡”晋东南的部署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119)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121)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 毛泽东 (123)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工作和青年工作
的指示 (125)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鹿钟麟政策的指示 (127)
(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
- 毛泽东等关于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
给朱德等的电报 (129)
(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
- 关于新四军进入江南第一年抗战的报告 叶挺 项英 (131)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 朱德关于日军“扫荡”冀中、冀南情况及八路军
之部署致蒋介石等电 (138)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

-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 …………… (141)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
- 朱德关于鹿钟麟部袭击八路军制造磨擦事
致蒋介石等电 …………… (143)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 …………… (145)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
- 袁国平、邓子恢关于新四军政治工作情况
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 (147)
(一九三九年三月)
-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 …………… 周恩来 (150)
(一九三九年三月)
-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 (158)
(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边区政府公布)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 …………… (161)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 …………… (163)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
- 朱德等关于克服财政经济困难
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 (165)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
- 我们目前战役的纲要 …………… 刘伯承 (166)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 (175)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 (177)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朱德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给陈光、

- 罗荣桓的电报 (179)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告全党同志书 (180)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
第二次指示 (187)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 朱德关于要求制止张荫梧制造磨擦
致蒋介石等电 (189)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五四运动 毛泽东 (191)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刘少奇 (194)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节选) 聂荣臻 (208)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 项 英 (265)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 (274)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青年运动的方向 毛泽东 (281)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林伯渠为揭露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事件
致蒋介石等的公开电 (289)
(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 朱德等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给各兵团的电报 (291)
(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 项英关于成立江北指挥部等问题给毛泽东、
张闻天的电报 (294)
(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解决河北问题方针的
指示 (296)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宜川会议后山西
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 (298)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
- 王稼祥、谭政关于加强瓦解伪军工作
给晋冀察军区等的电报 (301)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敌占区中党与非党的组织
及工作方式的指示 (303)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305)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
- 关于在铜南繁地区如何与敌人进行
政治经济斗争 邓子恢 (308)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
-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316)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
- 军委关于收集抗战英雄事迹的指示 (325)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陈 云 (326)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存
党员干部的指示 (331)

-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陈 云 (333)
-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 论日军的跳跃作战 叶剑英 (347)
-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
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 (352)
- (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
-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 周恩来 (354)
- (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360)
- (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
- 反投降提纲 毛泽东 (362)
-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 (一九三九年六月)
- 彭雪枫关于游击支队一年战斗情况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397)
-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
- 项英转报陈毅关于坚持江南地区的意见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399)
-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
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 (401)
-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 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
新干部问题的训令 (403)
-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 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 王稼祥 (405)
-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 反对投降活动 毛泽东 (409)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 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 张闻天 (413)
——中共十八周年纪念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 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友军孤立反共投降分子
策略的指示 (420)
(一九三九年六月)
- 周恩来关于平江惨案致陈诚的抗议电 (422)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
- 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节选） 彭德怀 (424)
(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
- 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 朱 德 (433)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436)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 (441)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 (466)
(一九三九年七月)
- 朱德等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
给贺龙等的电报 (529)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 (531)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游击战线上目前的军事问题 叶剑英 (533)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 (539)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
指示 (541)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 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 张闻天 (543)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 贺龙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会议上的讲话 (553)
(一九三九年七月)
- 中共中央给新四军党代表大会的贺电 (557)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 必须制裁反动派 毛泽东 (559)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提纲) 周恩来 (562)
(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 (提纲) 周恩来 (564)
(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的指示 (567)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
- 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 张闻天 (568)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 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 王稼祥 (574)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579)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毛泽东 (583)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 朱德、彭德怀关于注意开荒生产
给刘伯承等的电报 (589)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 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

- 意见 毛泽东等 (590)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
-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毛泽东 (599)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
- 论游击战争 陈 毅 (612)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
谈话 毛泽东 (624)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鄂东斗争的指示 (629)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
- 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王稼祥 (631)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工作的指示 (643)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毛泽东 (645)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 王稼祥 (653)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 研究沦陷区 毛泽东 (669)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 总政治部关于日伪军工作的训令 (672)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
- 《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 (674)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 团结与民主 林伯渠 (686)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毛泽东 (689)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 (692)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刘少奇 (696)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
- 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 彭德怀 (716)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罗荣桓 (725)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 (732)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735)
(一九三九年十月)
-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736)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
- 在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邓小平 (740)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 秦邦宪等关于江南新四军主力宜向江北发展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746)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 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 张闻天 (748)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 刘少奇关于彭雪枫部情况给中共中央
书记处等的电报 (754)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西反投降斗争的指示 (756)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向东发展

- 给刘少奇等的指示 (759)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电悼白求恩大夫 (761)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毛泽东 (762)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
指示 (765)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 项英关于叶飞、张道庸部过江等情况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769)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
方针的指示 (771)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 军委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方针
给朱德等的指示 (776)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 毛泽东等关于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给徐向前等的电报 (778)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 朱德、彭德怀关于击毙阿部规秀的战斗经过
给秦邦宪、叶剑英转蒋介石的电报 (780)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
补充指示 (782)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 (785)

-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地区形势和工作部署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的电报 (793)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毛泽东 (796)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 (798)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时局的指示 (800)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
进攻边区 (802)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
工作的指示 (805)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陈 云 (807)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
工作 徐向前 (810)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节选) 毛泽东 (821)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国民党的防共办法与我们的对策 (840)
(一九三九年)
论军事思想的原理 左 权 (860)
(一九三九年)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毛 泽 东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1]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2]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

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

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朱德、彭德怀。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 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甲、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我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已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我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这特征已经表现在西南西北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也将继续表现在即将召集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虽是党务与政务上的进步一般还落后于军事上的进步。

乙、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磨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表现。

丙、我们的任务：

(子) 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丑) 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

（寅）在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

丁、到处提出下列口号：

（子）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丑）打倒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

（寅）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

（卯）打倒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汉奸汪精卫（这条应依照各地情况来写，不一定全部写）。

（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

中央书记处

一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八路军部队 暂缓去华中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

周博凯并告朱彭^{〔1〕}：

关于八路军不去华中的电悉。我们意见，八路军今后开展主要方向不应是东三省、察哈尔、热河、冀东，因为大部队不能去，也无法去上述地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毛 王
一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秦邦宪、何克全，朱德、彭德怀。

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王 稼 祥

—

中国人民最近的两个历史重要文献——蒋^[1]委员长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告全国国民书和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之全部正确性，已经在一個多月的抗战形势发展中得到完全的证明。

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其一贯的侵略性的速决战的战略，企图在夺取武汉、广州的战斗中，消灭中国军队的力量，摧毁我人民的抵抗，来实现其先打塌中央政权而后再“扫荡”其占领区域的中国军队，以求吞灭全中国的计划。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错算了！中国军队安全的从武汉等地撤退，不但未受到大的损失，并且这次撤退比之上海、南京、徐州之撤退更有秩序和计划。中国军队更增加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和战斗力，转移到对于中国军队有利的山岳地带，而进行蒋委员长所指示的持久战争等全面战争与争取主动。此后日本军队的动作，显然地比以前困难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并未因武汉、广州之放弃而降低，英勇抗战的精神与决心，并未因中心城市之丧失而受挫，相反的，中国人民本其固有的历史传统而发扬其百折不回见难愈坚的素质，准备与民族死敌作持久奋斗。全国各地对蒋委员长告国民书的拥护，第二届参政会议的决议与提案，全国人民

对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之赞同与同情等等，都是中国人民抗战决心之不可动摇的明证。

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在夺取武汉、广州的战斗中及战斗后，来瓦解中国的抗日阵线，一方面企图把各地的伪政权合流成为伪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又勾引抗日营垒中的亲日分子与妥协分子来进行和平投降的活动，同时又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以求实现其“以华制华”屈服中国的惯技。可是日寇之“同污合流”（各汉奸政府之合组伪中央政府）的计划很少成就，而抗日阵线亦更加巩固，虽然少数无耻无节气的妥协分子曾企图利用武汉、广州之失守和抗战的当前困难，进行和平妥协的活动，借外国通讯社发表讲和投降的言论，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一些似是而非有利于敌的文章，以求动摇已定的抗战到底的基本国策。然而蒋委员长告国民书昭示坚定的抗战方针，全国将领之拥护抗战到底，全国军民之对日仇恨与对妥协活动之愤怒，使这些无耻之徒也不能不稍形敛迹，不敢公开其活动。

日本帝国主义者乘欧洲时局紧张的时候进攻广州以切断中国与海外之交通，逼迫英美对日妥协断绝中国之外援，这样来孤立和屈服中国政府。可是日本独霸中国之雄心及其在华南之行动，引起英美很大的不安，中国继续抗战之决心引起世界人士的更进一步的同情。最近英国对华贷款四十五万英镑，美对华贷款二千五百万美金，都会给日本以很深厚的滋味。欧美各国人民援华运动的增进，更给了日寇孤立中国之企图的有力回答。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武汉、广州及其以后的军事计划、政治阴谋及国际活动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应当也不能够丝毫忽视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战形势中的困难，中共六中全会指出：

“武汉、广州相继不保，大工商业的丧失，主要铁路的被占领，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的被割分，主要海道被割断与外援的暂时减少，以及财政经济交通的困难，军火供给的不易，这些都是目前抗战形势及将来相持阶段中的困难现象。同时，日寇正在计划成立全国的伪政权，并加强其挑拨中国内部的阴谋，而汉奸亲日分子也正在利用这些困难加紧其投降妥协的活动。由于这些困难可能在一部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这些困难，抗战营垒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部分叛变。这些都是目前及今后抗战中的严重问题。”

仅仅指出困难看见困难而觉束手无策，那是不对的，我们必须看到克服困难的客观条件与应努力的方向。六中全会决议上又说：

“我们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中国的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与日本困难的同时增多，蒋委员长与全国人民的不动摇的坚决抗战，国共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对日仇恨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中国还保有广大的完整地区（西北、西南）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而在敌后方则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正在强大着，英勇的中国军队积蓄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并正在巩固其战斗力，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广大民众正在发动与组织起来。同时，日本因战线延长将更感兵力不足与分散，离开海岸铁路大河的山地战斗将给日寇以更大的困难，敌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将陷敌军于到处受击，忙于应付，消耗疲惫的境地。日本在华南的行动，势将引起美日、英日、法日关系的更加尖锐化，日本坚持侵略与中国坚持抗战的结果，将使日本人民处在长期战争的威胁中，而益增长其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

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客观有利条件。”

日寇是不会停止其对中国的侵略的。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我们估计和预测日寇在目前及以后继续侵略中国的计划大体如下：

在军事计划方面，日寇大概还是预备还是企图继续深入中国内地，同时以少数兵力进行所谓“扫荡”游击队的战斗。据军事家判断：在西北方面，敌正在调集兵力准备沿陇海路及由晋南渡河向西安前进，由绥远向宁夏前进，由晋西向陕甘宁边区进击，并企图围攻兰州，以实现其隔断中苏交通，隔断西北与西南之连系。在西南方面，敌有进攻北海、南宁和贯通粤汉路的消息。在华北、华中，敌也正在进攻山东、河北、皖南、河南等地的游击队，敌人军事计划的目的是企图给我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打击，来阻碍中国方面力量之增长，困难之克服，逼敌进攻之停止与对敌反攻之准备。

在政治方面，日寇是一方面开始强化与巩固其占领地的统治，他方面继续其挑拨离间勾结亲日分子妥协分子以求从内部瓦解抗战营垒的阴谋。日寇在其占据地企图强化伪军与伪政权，在南京、北平等地正在开办军官学校，抽集壮丁，收集民间枪支，开始在某些地方改变其烧杀政策，而对居民实行欺骗利诱，并组织新民党，集合我民族的败类。在日寇之挑拨离间阴谋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挑起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各党各军间的内争，以求从内部来瓦解这些根据地。

在经济方面，敌人正在加紧榨取与开发占领地的资源与财富，另方面用各种方法破坏捣乱中国的经济财政，以求摧毁中国抗战的物质基础。日本政府已成立对华院，对华问题委员会，与中国经济协会，并成立两个半官公司，一为华北开发公司，资本三万万五千万；一为华中开发有限公司，资本一万万元。敌正在努力恢复在华纺织业，并在华北设立水泥公司。同

时又加紧对东北之榨取。日寇握取海关及交通要道后，尽力排挤英美商业，倾销日货。在财政方面，敌则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货币，强迫使用，收刮及掠夺法币，伪造法币，私换外汇，并强制订定伪币之外汇价格等等，以求动摇法币之基础，捣乱中国之金融。

上述都是日寇继续对华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计划之大概。显然易见的，日寇目前进攻中国的各种计划是遇到了比之过去侵华战争任何阶段的更多更大的困难。日本军队虽然想继续前进，然而兵力不足和分散以及深入中国内地的困难与危险是摆在日寇的面前。同时政治阴谋与经济捣乱也因中国之团结与英美之援助、我在敌后抗战之坚持而日益减少其成就的希望，因为这些困难，日寇内部的意见冲突日甚，传闻日寇内阁与军部正在争论着今后对华侵略的计划。

二

中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早已成为既定的国策，自不能因大城市之失守、铁路海口之丧失与抗战困难之增多而有所变动。蒋委员长告国民书已经指出：

“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称霸之战争，以我之抗战，在倭寇为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在我国，则绝不容许我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故我之抗战在主义上，实为民族战争；在其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革命战争无前方后方区域之限制，整个国境，随处皆得为我军之战场；革命战争不计较有形兵力之优势，亦不畏牺牲、挫折与伤亡之严重，更不因

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而我三民主义之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不断焕发，必可奋斗到底以迄于成功。盖民族的国民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

共产党的六中全会明确的指出：

“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

兹根据抗战形势的分析与当前任务来提出关于在敌后方，坚持抗战几个问题，以供国人参考。

首先指出：就抗战形势言，中国已分为两种区域，一为我后方区域，即中国西北西南的整块地区，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抗战的整个总后方；一为敌后方区域，即敌人在中国所占的点线之后面的区域，或称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游击区域。在目前当武汉、广州失守之后，坚持在敌后方抗战的作用与意义比从前更加重大了。

因为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富庶的重要的地区已经陷落成为敌人占领点线之后面的地区了，假若万一敌人能够占领与打通平汉路与粤汉路，那末这个事实会更加明显，在敌后坚持抗战也更增加其重要性。在敌后坚持抗战已遇到，将来也更会遇到很多困难与许多急待解决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财政的组织的问题；我政府与人民应重视敌后之抗战。在目前形势下适当的配合我后方与敌后方之抗战建国的工作是停止敌之进攻，增长我方力量，准备对敌反攻，争取整个抗战胜利的必要前提。这是关于坚持在敌后抗战应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在敌后进行抗战的主要方针是游击战争而不是正规战，这应当是无疑义的。然而关于敌后游击战争能否支持，能否胜利

发展，抗日根据地能否生存与巩固等等问题，国内人士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了。有的人说：敌人所占领的大城市与铁路线好比人的头颅和血脉，中国抗战即被割断头颅和血脉，当然无法生存，日本将由先占点线而后占全面，敌后方游击战争显然是要失败的。又有人说：游击队游来游去，来的时候对民力之榨取唯恐稍有不及，去的时候对民力之搜刮唯恐稍有子遗，民力为抗战之本，民力消耗完净，游击战争一定失败。又有人说：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游击战在国内战争中可以颠覆统治政权，但在对外战争中就不同了。兹就这几意见而评论之。

关于敌占城市与铁路，我据乡村以抗敌能否支持能否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内已经给了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抗日游击战争以乡村反对城市能够坚持能够胜利。这是因为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之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的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

至于民力之消耗问题不是游击战争本身的问题，而是游击战争领导正确与否的问题。革命战争不仅不消耗民力，而且是

发扬民力，问题的本质在于合理的有长期计划的有正确政策的使用民力，则民力不仅不会很快的消耗，并且民力会有不断的生长。在敌后组织民众，减轻民众担负，实行正确的税收与财政政策，安定抗日秩序，一切为着长期抗战等等，对于合理使用民力发扬民力坚持敌后抗战是有严重的意义。

再，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时代比之在国内战争时代具有更优良的条件。日寇是异族敌人，在侵入我国国土在其所占领的点与线之人民，是仇视日寇同情游击队，日寇是孤立的，这是一。中国各阶层各政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抗日游击战争比之国内游击战争，具有更广大的社会基础，这是二。现在敌后的游击战争不是孤立的，既不同于国内战争时的游击战争，也不同于“九一八”以后的东北游击战争，现在一地的抗日游击战有他地的配合，并且有我总后方之正规战的配合。这是三。

因此确立敌后抗战的胜利信心，批驳与排斥上述的各种错误的、只能代敌人宣传而动摇抗战决心的言论。这是关于坚持在敌后抗战应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当然不应忽视敌后游击战争之特点、弱点与困难。相反的，我们应当充分的认识这特点、弱点与困难，以便正确的领导游击战争，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敌后游击战争的弱点与困难是在：（一）在敌后的我正规军与游击队在军事技术上装备上都比敌人相差很远，而且又据乡村，没有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军需，如枪支弹药、服装等，加之某些区域与中国总后方可能隔断，即不隔断，交通亦不便，很难得到总后方之充分接济，因之这些部队，不易消灭敌人，而在敌人用重兵压迫时不得不暂时的放弃某些地区。（二）游击战争要求各部队机动的独立的分散的动作，而且在敌后方时常有政治质量很差的游击队，如原来的民团乃至土匪部队等等，因此游击队之统率集中领导与纪律时常不易维持。组织性

之缺乏常常是游击队及游击战争的弱点，这便给敌人以机会，来打击游击队，挑拨各游击队间的关系，甚至来瓦解某些政治质量差的游击队。（三）在敌后方之正规军及游击队给养常常不易解决，加以某些游击队各自为政自筹给养，时常破坏军民关系与团结，损失民力，给敌人及汉奸以机会来欺骗群众，成立伪政权和伪军。

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游击战争的特点与优点：（一）游击战争是最能动员全体居民直接参加抗日武装，而其本身便是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方式，所以游击战争能够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众的潜势力充分的发扬出来。（二）游击战争能避免敌人的长处——即其最新的军事技术——而打击其弱点，疲惫敌人，消耗敌人。游击战争固然很难大股的消灭敌人，但敌人要消灭游击队亦颇不易，游击战争是长期抗战的重要方式之一。（三）游击战争最能扫荡敌人所树立的伪政权，争取伪军，瓦解日军。在正规战争中，常因阵地对垒而使上述工作受到限制。游击战争行动自由，东飘西伏，使日寇汉奸忙于应付，一方面给沦陷地方中国居民抗日斗争以很大推动力，他方面又给日军士兵政治情绪以很大压迫。

认识敌后抗战之特点、弱点与困难，而规定正确的政策与必要的设施，这是坚持敌后抗战应注意的第三个问题。

三

重视敌后方之抗战，坚定敌后抗战之胜利信心，采取必要的设施，来克服敌后抗战之弱点与困难，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迅速的解决下列具体问题。

一、依游击战争战略形势重新划分军事的行政的区域，以便领导与指挥敌后的游击战争。区域之划分应当根据敌情、地

形、我方游击战略之形势等等，而不应束缚于过去的省界。过去的省界（行政专员区界与县界亦然）都是根据历史上交通上经济上的便利，一省之省界会常有河流、铁路、大路而通达于全省。现在游击战争区域是敌人所占领的几条点线之间的区域，常常是几省之间的结合地区，它不能依河流、铁路、公路来贯达全省区，因为河流、铁路、公路大部已经被敌人所占据，而常常是由山脉之绵延而通达全区。每个敌人点线之间的区域要变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有正规主力军作为该区域武装力量的骨干，而在主力军的周围应有许多的游击队，每个区域应有该区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如军区司令部等统率与指挥该区域的一切武装部队。在敌后方指挥机关之区分应以地区为单位，较之以部队为单位为好，切忌在一个抗日根据地中，有两个或更多的并行指挥机关。每个区域不仅应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并且应当有统一的该区域的最高政权行政机关如边区政委会等，以统一该区的行政工作，以配合游击战争，敌后的各省政府在地域上应有新的改组。不仅如此，各抗日党派，各群众抗日团体应在每个抗日根据地中，成立其该区最高的领导机关，以统一领导党务与群众抗日运动。敌后抗战的形势与利益已经早已要求我们这样的重新划分区域与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又要求在几个根据地指挥机关行政机关之上，应成立总的指挥机关行政机关（如华北、华中、东南），直属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这些设施会给敌后抗战与游击战争以更多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抗日根据地也会更加巩固，敌后抗战也更能坚持与胜利。当然这种区域的重新划分是暂时的，在抗战胜利收复点线后，就须立即废除。只有代日寇效劳的汉奸托派才会胡说这是恢复“封建割据”。

二、抗日根据地中的军、政、党、民各种工作应当很好的配合。执行“一切为着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原则，军、政、

党、民的机关必须有很好的协调动作，而不应彼此妨碍，互相磨擦。规定军、政、党、民各机关间的关系与工作范围，是有很重大的作用。在我后方许多地方已实行的军事指挥官兼地方行政长官的办法，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有实行的必要。譬如又委任某根据地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兼任该部队所在区域的行政长官或参加政府机关，如政务委员会等。这种办法对于统一军事政治集中领导，而支持长期抗战是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办法并不与政权之民主化相违背，显然的，为动员民众，为使用民力，敌后中国政治制度之民主化是绝对必要的。但民主化之实现在于改善政治机构，成立民意机关，实行官吏之选举，和开放民众运动，并不因为军事指挥或政治工作人员兼任行政长官或参加政府而有所限制与妨碍。

三、整理与强化我们在敌后的队伍与游击队。在正规军方面应该改造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质量，严格军队的纪律，加强游击战争的训练，提高各级指挥官的机动与各部队独立行动分散行动之能力，开办训练班及学校培养军政干部。人员与物质之补充，应有正当的解决，整个军队制度，应大大改变以适合在敌后的抗战。在游击队方面应当严密组织与纪律，服从集中之指挥，禁止零乱、自由、各自为政与破坏民力等等行动。过去土匪部队与各地方民团之改造训练与统率，亦应受军区或主力军之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人民抗日自卫军与民军应该成为民众的自卫武装，民间枪支，应当保证其握在可靠的人民手中，不使其落入日寇与汉奸手中。但随便的强迫的收集民间枪支，引起民众不满与减弱民众自卫能力，同样是不应当的。在敌后部队有高度政治觉悟坚持到底的决心，严肃的纪律，与民众打成一片，同时又有灵活的军事动作，——这是保证敌后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四、高度的发扬民力与合理的使用民力。在敌后抗战之胜

利，不仅依靠于军力，并且依靠于民力的真理是最明显没有了。为着高度发扬民力，必须开放抗日民众运动，改善民众生活，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吸收民众到军队游击队中去，组织民众武装，吸收民众参加政权，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但敌后抗战是长期的，民力的使用必须合理化，这首先要有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如实行统一累进税，减租减息，增进农业生产，恢复与建立手工业，成立必要的军事工业，征兵要有计划的合理的实施，实行必要的货币政策，如发行纸币，抵制仇币，贮藏与保护法币，不使落入敌手等等。在敌后，我军队之给养，我政府之财政，应该有独立自给应付长期抗战的准备与计划，而不应只依靠中央政府之供给。一切搜刮民资民力、游击队的胡作乱为等等不顾长期作战之准备而浪费民力的行动，只会引导抗战到失败的道路，是应该严格禁止的。

五、巩固敌后各党各派各军各阶层的团结一致。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心关键，是在于巩固各党各派各军各阶层之团结一致，以孤立日寇，瓦解伪军伪政府，以便长期支持和争取胜利。然而很痛心的，最近在华北华中某些地方，我中国军队间政党间政府与军队间，政府与民众团体间发生很多磨擦，甚至自相残杀的武装冲突，枪杀共产党员，解散群众团体等等的事件。我们要求中央政府与发生事件的当地的党政军民迅速的解决这些问题，处罚那些不以军队去进攻日寇而以军队来攻打中国自己的抗日军队的制造武装冲突的祸首。敌后抗战不会失败于日军之近代军事技术，也不会失败于财政经济与供给之困难，但各军各党各阶层如被日寇之挑拨所利用，而同室操戈，那的确有把敌后某些地方的抗战，引向失败之危险。然而我们相信在敌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敢于制造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事件的败类，究竟是少数。我们希望：我全国军民，特别是敌后方的军民，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在军民一致团结抗日的条件

之下，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而适当的处置这些败类。

总之，抗战的目前形势要求我全民族团结一致，在我后方，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提高军事技术，举行必要的经济的军事的建设，创立机械化兵团，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在敌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我主力军作战，诚能如此，我全国军民之持久抗战将陷日寇于到处受击和犬牙交错的混战中而不能自拔，一直到驱逐日寇出中国而达到完全战胜日寇的最后胜利。

根据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六十、六十一期合刊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 给陈绍禹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陈、周、博^{〔1〕}：

蒋对以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对我党六中全会决议对策，似还在考虑中，我们方面暂时应采取比较静观的态度，不必求之过急，对于其将要召集之五中全会，我们再度考虑结果，亦认为不必写单独给他的文件。

中央书记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秦邦宪。

朱德等关于国民党在华北磨擦情况及 我之布置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并报胡服、周、博、凯^①：

(一) 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积极采取限制政策，华北各地如冀中、冀南、津南、山东的磨擦日渐增加。

(二) 最近蒋^②下令各战区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部队开往它区，否则，即行解散缴械，其主要目的在制止我军进入华中地区，以及将来插足西北。

(三) 最近鹿^③在冀与我磨擦更甚，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蒋之命令更增强了鹿之借口，最近致朱、彭^④电，要求我基干部队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序列游击部队，归其指挥。估计河北问题鹿虽有蒋命，由德怀同志协助程、卫^⑤派员调解，但一时实难获得基本解决，但我们应准备某些无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

(四) 蒋及国民党一般说来，最近确有些进步，如驳斥近卫声明、开除汪兆铭^⑥等，但政治落后于军事，估计在敌阁改组与汪兆铭被逐后，敌人进攻西北，打通粤汉路的军事行动将加速进行。在今后紧张的战局中，蒋及国民党将更进步，但对我党我军的限制政策仍然不会放松。

(五) 在华北我们应作下列的布置：

(1) 我正规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敌人活动，在冀中、冀南

应努力粉碎敌之进攻。

(2) 调整各新编部队，使之精干，增强战斗力，减少庞大现象，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

(3) 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拟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六中全会决议及帮助整理张黎^{〔7〕}部队。六八五团仍留现地区与彭雪枫部配合工作，在豫鲁境内各部队除积极对敌外，一切不宜铺张，以缩小注意，盼胡服转告雪枫、理治^{〔8〕}。

(4) 各部队加强对各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广大同情，孤立少数顽固分子。

(5) 深入与巩固各地群众工作。

(6) 严格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以减少外人之借口，深入六中全会决议的讨论。

(7) 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加强党的教育，号召党员克己奉公，做刻苦耐劳的模范，以事实去说服和感动同盟者。

(8) 新华报多载战况及胜利消息，指出敌之“扫荡”华北与进攻西北，积极号召团结。以上意见请考虑电示。

(请延安转发重庆)

朱德、尚昆^{〔9〕}、左权、傅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刘少奇、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

〔2〕指蒋介石。

〔3〕指鹿钟麟。

〔4〕指彭德怀。

〔5〕指程潜、卫立煌。

〔6〕即汪精卫。

〔7〕指张经武、黎玉。

〔8〕即朱理治。

〔9〕即杨尚昆。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及 意见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央书记处：

(甲) 国民党全会明日开，蒋李白黄黄熊^{〔1〕}等均到。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回电，我告以各地反共捉人事要他解决，他反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即下级也常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在这次会有人提此类事，他并说汪^{〔2〕}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暂不赞成统一也要有新办法，我问他有何具体办法，他说未想得。其意盖欲我党对国民党全会有一具体让步，以塞众口，以利防共。

(乙) 汪在河内未赴港，曾两电蒋承认通电手续不妥，表明不做汉奸，决留河内，推通电为林伯生、梅思平所发表。蒋复电称汪之心虽可谅，但祸及国家须俟全会解决，吴稚晖主通缉。

(丙) 蒋前次谈汪如留渝，反共从者将较多，这次又以汪去能团结，形式虽留，中心在迫我。

(丁) 我意：(一) 我党对国民党全会应有一表示，但公开贺电不必说具体意见；(二) 具体提议改为密电，最好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

信，救急办法，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三）如何请考虑立复，不好置诸不管。

周 恩 来

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熊式辉。

〔2〕指汪精卫。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我党对国民党 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 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最近蒋^[1]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行政，坚持取消冀南甚至冀中行政公署，石高^[2]之开入冀南，东北军一部开入山东，某部之移驻长治消息，战地政治委员会之设立，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密令等等，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

(二) 因此，各方顽固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日寇奸细，便乘机加紧对八路军的磨擦排挤与破坏，某些过去比较同情分子亦与我为防区及政权等问题发生磨擦。

(三) 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八路军是应当发展的，因其发展对抗战有利，而目前发展方面主要的是华中、华北，而不是东三省与察、热，因该地日寇统治较巩固，如无重大变化，八路军去必受严重损失。

(四)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雪枫^[3]支队可暂缓去皖北，六八五团暂缓过陇海路，陈^[4]旅亦暂缓去山东，候五中全会后，再作

行动的布置。在此短时间内，着重部队质量上的整理，以备将来之发展。

（五）限制八路军重要方法之一部，为不准干政与筹款筹粮，我应公开表示，抗战部队与游击队不能不吃饭，如能加饷，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

（六）向各方广泛解释和证明日寇汪^{〔5〕}逆阴谋以反共行动来转移国人反日反汪视线。目前反共自觉的不自觉的均会为日寇汪逆所利用。

（七）对各友军之工作具体方针，中央正讨论中，俟后电告。

中央书记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石友三、高树勋。
- 〔3〕即彭雪枫。
- 〔4〕指陈光。
- 〔5〕指汪精卫。

中共中央致蒋介石 暨国民党五中全会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重庆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大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致民族革命之敬礼。盖自一年半以来，由于坚持抗战国策与全国英勇奋斗，已使日寇之进攻大受打击，国际之同情日益增长，中国之胜利奠定始基，牺牲虽大，效果已彰，循此奋进，定能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日寇乃于军事进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国内部之阴谋。吾人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实行新的战时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党务、民运、文化诸政策，以便增加力量，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救国之道，端在于此。伏读蒋委员长十月三十日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驳斥近卫演说，名言至论，举国同钦。乃汪逆精卫自绝国人，逃奔就敌，高张亲日反共之旗，实行背党叛国之计，贵党中央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职务，辞严义正，千古不磨。适于此时贵党五中全会开会于重庆，同人深信，必能总结过去之经验，昭示今后之方针，严整抗战阵容，密切军民联系，刷新政治，发皇民运，以慰全国国民如饥如渴之望，以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战高于

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团结则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利器。同心断金之义，同舟风雨之思，知诸先生必有同情也。肃电致贺，敬颂勋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叩 敬

根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
《解放》第六十二期刊印。

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 致蒋介石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恩来^{〔1〕}同志转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惠鉴：

顷得恩来同志来电，谓先生在贵党五中全会前，切望敝党提出今后国共两党合作之意见，不胜欣慰。兹特向先生坦白披沥陈之：

(一) 卢沟桥事变以来，举国在先生领导之下，进行对日的民族革命抗战，显示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民族团结，为世界上任何暴力不能征服之力量。胜利之基始奠，前途之希望无穷。此皆先生领导之勋勋与前线将士、全国党派、全体同胞积极努力之业绩，千载而下，与有荣施。然而抗战过程，实一艰难斗争过程，日寇汉奸深知我民族团结之基础和骨干，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因此，敌人计划遂特别努力于破坏国共两党，及两党之合作事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之际，日寇对策，厥为于军事进攻之外，加紧进行“以华制华”之毒计；其中尤特别着眼于强调反共口号，不特借以欺蔽世界之舆论，尤其企图借此以破坏国共两党之合作，并破坏与分化国民党。汪精卫在强调反共口号之下，实行逃走而叛党卖国之活动，实为日寇此种阴谋之具体表露。先生在驳斥近卫声明之演讲中，曾公开指明反共即灭华，实为一针见血之论，名言至理，中外同钦。盖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

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反共实即反对国民党抗战建国之友军，反共实即反对并分裂国民党。凡此，皆当前历史之具体真理，谅先生必有同感也。

（二）抗战以来基本事实，表现两党合作日趋进步，两党同志日趋团结，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因此，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及毛泽东同志代表敝党致先生信，均诚挚具体的提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用意所在，无非欲与先生及国民党同志，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积极的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团结全国，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此物此志，凡在国人，已昭然共见。

（三）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

（四）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磨擦现象，最近尤甚。许多地方不仅原有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未曾释放，而且常有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之事。陕甘宁边区问题，虽经先生一再承认，但政府机关延不解决，少数不明大义分子，遂借以作无谓之磨擦。查禁敝党书报，侮蔑敝党言论之事，尤层出不穷。甚至八路军伤

病员兵在三原附近者，亦被地方当局武装包围威胁，几至酿成流血惨剧。其他歧视共产党员与八路军员兵之事，不一而足。特别在冀鲁等地敌后游击区域中，各种排挤、污蔑八路军与共产党之行为，几乎每日皆有。此等情形、殊为严重。至于磨擦增加之原因，一部分固由于日寇汉奸挑拨离间之阴谋，得逞其计，另一部分不能不归咎于少数不明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存亡者之固执成见，一意孤行。此种不幸事件积累之结果，定将不利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之事业；日寇汉奸正注视此等事件之增加，而发出得意之狞笑。因此，必须停止此种现象，断不应任其发展，致陷民族国家于不利。

（五）但敝党中央深信：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之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敝党六中全会已将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及敝党所能让步之点及其一定限度，恳切提供先生及国民党全党同志之前；深信贵党五中全会在先生贤明远见的领导及各中委公忠谋国的精神之下，定能对敝党中央建议加以慎重考虑，而得到有利两党长期合作之恰当的结论，以慰全国人民殷殷之望，以固抗战建国胜利之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专此，敬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上）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周恩来关于一个大党问题 给蒋介石的复信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委座钧鉴：

上次承面囑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得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国民党全会开会期间，各省同志，定多对中共不满之言论，然综其所据之事实不外（一）畏惧中共发展；（二）指摘中共下级有反对国民党口号或文件；（三）陕甘宁边区不开放。若较之中共党员在各地所受之苛刻待遇，直不可同日而语。盖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如国民党容许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兼为党员团员，则中共党员名单可公开交出，以保证相互信任。且中国之大，无组织群众之多，中共更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之领导，则对中共部分之发展又何足惧。中共下级诚然有某些幼稚行动，然充其量不外袭用过去某些口号，且其中亦须有所区别，有些文件确为抗战以前之文件，有些下级党部对中共中央之政策路线尚未彻底了解，有些更一望而知其为伪造或更为陷害者所捏造。至言

边区，则凡进入参观访问视察或调查者，无不备受欢迎招待，学校更公开讲授，人人得聆其内容，国民党部在延安有组织，陕西民政厅派去之县长仍在各县城行使其职权。凡此，何能谓边区不开放！？然返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轨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所亲批亲示者，亦复迁延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浸至最近《新华日报》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钧座批准之报纸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部封闭，并波及其他代印报馆，而《抗战与文化》则漫骂中共及其领导人如故，仍得在西安出版。中宣部犹以此为未足，更行文内政部勒令已在广西省政府登记之《新华日报》分馆不许在桂林翻印，而《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之被禁，许多公共机关阅读该报之被罚，更属常事。西安一向磨擦事多，对青年学生转往陕北学习，不从积极方面争取，动辄施以压迫，扣留拘禁常至数十人，最近且拘捕八路军副官及抗日大学职员不放，并以武装包围在三原附近之八路军伤病兵，几至酿成流血惨剧。更可异者，庆阳早经划为八路军留守防地，而鲁大昌部得令自西峰镇强欲开入，报告行营，亦未得复。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便莫由得释。□阳合作指导员为政府所派，只因其为共产党员，便撤职被押，迄今未审，实亦无事可审。浙江周饮冰案，其所被搜出之文件，非为旧稿即系捏造。因其与中共现行之政策，完全不符。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去秋所呈名册，迄无消息。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会，意即

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不曰护照难办，即曰该会为中共派遣大批干部分往各省，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来之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类此事件，不一而足。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并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竟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勱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作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今全会既开，依据年余经验，当能对中共六中全会之建议，作深刻之讨论，成立具体决议，即使彼此了解尚嫌不够，互信未立，犹难产生进一步办法，亦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道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和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一步办法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愿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专呈敬请

崇安！

周恩来 呈
一月二十五日于重庆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以我们之知识、力量、干部及经验来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

二、但他们想利用我们知识、经验、干部，造成对付我们的条件，制造磨擦，而不利于整个抗战者，我们应拒绝帮助。

三、因此，帮助必须有条件的，有限度性的，有进展程度的，否则所谓大公无私披诚相见，实际只自己搬石头打自己脚，不但于我无利，且于整个抗战有害。

因此，凡我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各项工作之建议、计划、贡献经验及供给干部等，均应遵守上述原则。望加注意。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第三届参政会 提案问题给南方局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南方局：

对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我们以为对下列各问题，可提出提案：

- A. 要求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等卖国汉奸。
- B. 拥护蒋^[1]委员长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驳斥近卫的演讲所阐明的国策。我们尤须注意说明，反共即灭华这一种真理。
- C. 实行民权主义，以利抗战，在此案中说明仅有国民参政会及省县参议会之召集还不够，必须使各抗日党派完全取得合法地位，人民真正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民主自由，同时根据国民党和蒋最近对我党的态度估计，有可能有人在参政会中提出类似张君勱致毛泽东公开信所提的主张，我们在政治上对这些原则问题不仅不能再作让步，而且必须积极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等抗战对中华民族全部解放事业的意义和作用，以击退顽固分子的造谣侮蔑，在参政会开会前《新华日报》必须对此等问题即作系统的解释工作。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详细意见和材料，将由伯渠^[2]同志带去，绍禹^[3]是否出席，俟得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及本届参政会预备讨论各问题之

基本材料后再决定。请你们速将五中全会及本届参政会材料电告。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即林伯渠。
- 〔3〕即陈绍禹。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我来讲一讲目前的时局。因为同志们分散在各地，对整个情形不十分清楚，趁此机会，就和同志们谈谈。

我们根据六中全会的报告与决议来看问题。六中全会说：“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在去年十月上半月讲的，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个月，事情怎样呢？去年十月三十日，蒋^{〔1〕}委员长发表了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驳近卫的文章，驳得很好，又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些都说明了是要坚持抗战这一条，证明了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在过去，第一个问题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在友党里曾有妥协倾向，酝酿着和平，这就很困难。固然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是要打的，不妥协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全国算来还是少数，统一战线里是小股东，我们单独打日本，是困难更甚的。现在国民党有了这些行动，确定了坚持抗战的方针，在这个“打”的条件下，什么文章都容易做了，这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进步的东西。

现在讲战争形势。

去年十月我们估计到，武汉、广州失守后我们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对于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的，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人

^{*} 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的一部分。

分割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增加了；至于进步，主要的表现在坚持抗战，在两次参政会里克服了主和派。那末进步能不能克服困难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只有我们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克服困难，才能使战争转到新阶段。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现在已经证明它的正确，以后也将证实这一点。

我们讲敌人进攻还未停止，武汉、广州失守后这三月来，在正面敌人没有大举动，但在侧后敌人是打得很凶的。有人说我们估计不对，敌人进攻已经停止了。我们不这样说，也不这样想，因为敌人还会进攻西安、兰州、长沙、南昌、梧州、衡州等地的，我们一定要准备着。虽然到我讲话这时止，我的话还未证实，不过我们还是准备的好，没有准备就会损失更大。为什么敌人还会进攻呢？第一，他不进攻，法西斯军阀就会马上垮台，而它的野心很大，不但要进攻全中国，还要去打南洋，缅甸、安南、印度也要去打。在中国，它反对蒋委员长，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它的计划，它是想要达到目的的，但是否可能达到，就要靠我们的努力程度来决定。

我们说敌人进攻会停止，但是否能够停止呢？我们说，一定要停止。日本要灭亡我们，我们要它停止，但究属如何是要根据敌我两方面的情形来说明的。由于敌人国小，人少，兵少，现在战线又是这么长，南至广州，北至包头，它本来就有兵力不足的弱点，再加上这个兵力分散，强兵也便变弱了。它这个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是个不治之症，它的力量不能允许更多出兵中国，因它另外要防强大的苏联，又有英、美、法与它为敌，还要防范国内人民与殖民地人民，至多能拿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到中国。现在听说已来了一百万，将来至多再来一百

万，而不能再多了。这样，我们天天在正面打，在敌后打，主力军打，游击队打，杀伤它的兵员，疲惫它，使它的兵力更减少，更分散，弹药给养消耗更多，力量削弱了，它就不得不停止进攻；另一方面，我们中国更强了，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加上其他各方面的进步，现在虽未能停止日本的进攻，但是一定能够使之停止的，我们要用一切方面的努力去停止它。

至于我们估计，在敌后能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并能建立根据地，现在已证明了，以后更将证明。同时，我们又指出，游击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看到敌人是要回头进攻的，在那时，游击战争更会困难的，我们要准备着这个困难的到来，以战斗的姿势还击它。一定要准备到这一着，才可避免“措手不及”的遭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说会发展的，但是有困难。国民党是在进步，但在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三月来证明了什么呢？顽固分子的汪精卫已变成了汉奸的汪精卫，当然他此后还会掀风作浪的。国民党已永远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是好的；现在各地前线将领，陈诚、李宗仁、白崇禧，我们的朱、彭^[2]总副司令等，都打电报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但现在尚未颁布明令。我们认为这个通缉令是必要的，因为他已做了汉奸，和敌人搞在一块了，虽然说现在不一定能捉得到，但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时候，怕他逃到哪里去？有人说，他会到德国、意大利去，然而这些世界法西斯都入黄土垄中的时候，他还有何处可逃？总之，只要他在地球上，最后一定捉得到的。

我们说，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因这退步，所以有磨擦，不仅有而且比前更厉害些。这退步的力量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亲日反蒋反共，以汪精卫为头子的，现在已经走了

一些，但还有党羽存在；另一派是顽固分子，主张所谓抗日拥蒋反共，这种人边区周围很多。他们说：现在，先反共后抗日；敌人来时，先抗日后反共。在前方，听说还有所谓抗日与反共两条并进的。这亲日反蒋反共的一派，下述几个大的具体事实是“贯彻”他们的“主张”的：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曾提出有反蒋内容的提案；说长沙大火与蒋委员长有关系，借此以骂蒋委员长；他们又侮蔑游击战争为流寇，他骂共产党同时也骂了蒋委员长，因为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同样主张在长期抗战中须要发展游击战争的；还有汪精卫的应声虫张君勱等，写文章说共产党怎样不好啊！八路军、新四军怎样要不得啊！陕甘宁边区又是如何如何！总之，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军、政、人民施行其最卑鄙的侮蔑。至于亲日，在他未有开小差前，不明显地讲，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隐隐约约地总有些不愿抗日、与日言和的意思。另一派，在西安以及邻近边区等地，更甚于前地进行他们的为敌所欢的工作，这就是不顾大局靠磨擦吃饭的一批家伙。

这股逆流是退步，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有进步也有退步，但进步和退步两个人打架哪个人打得赢呢？我们的回答是进步的趋势能够压服退步。

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

有人硬要磨擦一下，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呢？在六中全会里我们曾说过，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

后一条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伪政府，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到沙漠地带去，等等，如此这般花样多得很，对这一切，我们都是反对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搞其磨擦，占村子，他占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把一个还我们，我们也就原数奉还；他要捉人，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把我们关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释放。为什么我们要加倍地对付他呢？就是因为他先犯了我，他理屈，要惩罚惩罚他，这就是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现在磨擦增加了，以后统一战线会是怎样呢？我们是一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可以坚持的，这在六中全会报告里已经指出了的。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现在国民党正在开五中全会，我们估计它的结果不会坏的，但同样不应忽视磨擦还是可能有的。

上面讲的是中国方面的时局，现在讲日本方面的。

日本换了内阁总理，为的是现在要用新办法，就是全国总动员。这事证明了现在它的老办法不足用了，表示着它的困难的显著化；另一方面，又证明着它对中国将会更疯狂地进攻，并准备着进攻世界。它在“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过来一个全国总动员。

日本的困难：在军事上，表现在它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经济上更形枯竭，现在出口货少了，因为军事工业增加；相反的，进口货比前更多了，因为要大批地制造军需品。过去

日本货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剥削工农大众是最凶的），可以去换些外国货，现在少了这一条件，向外国买原料就要用现金，而日本的存金不多，况且在一年多的侵华战争中又用去了将近九十万万万的战费。在外交上，更表现着孤立，英、美、法曾向日本提出照会，问它为什么破坏九国公约，这件事也是武汉、广州失守后发生的。现在英、美正在商量，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一下。过去美国有中立法，这中立法对中国不利，反而对日本有利。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因为日本要独吞，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同时，因为英、美与中国重洋相隔，加了很多运费，货价高于日本，就不能与之竞争；而且现在日本借口军事关系，不准英、美商船在长江等地航行，英、美在华的商务利益几被尽夺了。现在日本花言巧语地说退回租界，实际上要把英、法的租界变为自己的占领地；它还企图打南洋、安南、澳洲等地。日本帝国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它的朋友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它，苏联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去年十月说，日本现在尚未停止进攻，但是一定会停止的，并指出使之停止有三个条件，上述日本的困难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国际上对我们怎样呢？在去年我们指出，欧洲问题与亚洲问题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过去英、法在欧洲向希特勒步步退让，而对中国有些不同，现在已经证明了。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了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应该把主要点放在中国。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现在西班牙政府军更危险了，德国要求收回旧殖民地，意大利企图夺法国的突

尼斯等地，更接近于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强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希望早打呢，还是如何？现在打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譬如打击了西方法西斯，就是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是间接的，所以能晚打那更好，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地直接帮助我们。苏联现在也不愿意打，如果再隔几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那末，这对中国，对世界是更有利的。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

关于目前的战争局面与政治形势就是如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朱德、彭德怀。

两年来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保卫边区和全中国的抗战中 所做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

林 伯 渠

现在我开始讲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我分成下列八节来讲。不过我首先应当申明这里所报告的实际工作，还只是在十八个县和不上百万人口的范围内的情形。

第一，抗战动员，巩固后方，帮助前线。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一个落后的处在劣势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和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处在优势的帝国主义日本进行战争，非动员整个民族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力、财力、物力、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底是不能成功的。两年以来边区政府根据这一方针，进行了如下的工作，并且得到了如下的成绩：

一、武装民众及参战动员工作。边区原来就有民众武装的组织，抗战发生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曾于前年颁布了一个自卫军的组织条例，在那条例里规定凡是成年青年，不分男女，都有分别加入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实行武装保卫国

* 这是林伯渠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报告的第二部分。

家，保卫边区的义务和权利。从那个时候起，整理、扩大与训练自卫军便成为全边区的重要工作。两年以来，在这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成绩。这不仅表现在参加自卫军的人数已达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参加少先队的已达一万八千零八十七人，这不仅表现在自下而上建立起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统归保安司令部指挥），这不仅表现在每人至少都有一件旧式武器（有的还有步枪短炮）以及经常备有担架、运输工具，准备参加抗战工作，而且还更表现在经常能受政治军事训练，帮助军队清剿土匪。前年边区形势紧张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自卫军少先队组成交通队、侦探队、看护队、担架队等，准备直接到战地服务，以便正规军能集中全力对付敌人；尤其是这种参战完全出于群众的抗战热情，没有丝毫外力的勉强，关于这点，我们可举出下面两个实例来证明：

第一件，前年十一月，因敌人进攻晋南非常紧急，在七天之内，原来预定在沿河各县一次动员一万牲口到山西去帮助运输，结果超出了原定计划三百多匹。

第二件，去年十月到十二月，为了进行军事建筑，曾经整团整营的动员了自卫军前来参加工作，每个人在寒冷的冬天，参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夜工。

这种热烈的参战的动员，如果不是一般民众自己有高度的民族觉悟，革命的热情，是不会成功的。

二、兵役动员。由于抗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动员群众扩大与补充抗战的部队，成为政府动员工作的重要任务。边区各级政府两年以来曾经先后动员自卫军少先队八千余名加入抗战部队，抗战前后总共动员了三万壮丁，开赴前线，他们并非由强迫征兵而来。

此外自从抗战发生以来，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抗日军人的归

队运动。这个运动现在已经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使边区内没有一个未及退伍年龄的退伍军人留在家里，他们早已整批的自愿的在民众热烈欢送之下，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队中来。

至于由前线溃退下来的友军官兵，经过边区的，我们除了一面发动群众给以殷勤的慰劳外，还专门派人招待他们，给他们以很多政治上的鼓励，使他们很快的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参加抗战。

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为了免除抗日军人对家庭的顾虑，使他们能够专心一意地参加抗战，同时又为减少抗日军人家属对于自己的父子兄弟的挂念，使他们经常的能够得到精神的物质上的安慰，我们曾经采行了下面各种办法：

（一）组织代耕队，代替抗日军人家属种地，根据各县前前后后的调查统计，脱离生产直接参加前后方抗战工作的，约二万户左右，其中多数在抗战部队中充当指战员，部分参加其他抗战工作。他们一般的都是耕有土地，且是比较贫苦的农民，有的不仅耕具种子不足，甚至简直没有耕具的也有不少。为了使他们的土地不会荒芜，而减少生产，使他们不致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影响抗战情绪，政府便发动农民组织代耕队代替抗属耕种，曾颁布了义务耕田队的组织条例，明文规定，边区农民均须加入，无报酬的耕种抗属土地。我举固林、神府为例，固林代耕了三万九千九百六十三亩，神府代耕了一万零二十八亩。这种代耕工作究需怎样大的人力呢？据安定南区部分乡的调查，在一千四百五十五垧（一垧等于三亩）抗属土地，只有四百二十五个农民代耕。平均每个农民须要耕种三垧半，而每垧地须要九个人工和四个牛工才能耕好。这样看来，平均每个农民每年至少须有一个月的义务劳动去做优待工作，并且有的还要带耕牛及耕具，这不能不是边区人民一宗对抗战的巨大贡献，也是各级政府一项巨大的组织动员工作。

(二) 改善抗属生活，提高抗属社会地位：政府为改善抗属生活，曾在法令上规定抗日军人家属免纳捐税，购买合作社物品时，可享受特殊廉价的优待，政府并经常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在许多社会生活和享受中，给他们以优先权，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给他们以社会的光荣和尊敬，如领取救济款的优先权，开会看戏坐在前排等。

(三) 安置边区以外逃难来的抗日军人家属：因为得不到优待而从边区以外逃入边区的抗属以安定、延安为最多。例如延安县为数达一千以上，在去年六、七、八几个月中，每月单是吃食粮便要七十担之多，全由边区政府募捐来供给。边区政府为了彻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把他们分别安置于各乡，分给他们土地，发动农民代为耕种，同时资助他们组织模范乡。

(四) 创办抗日军人家属学校：为了提高抗日军人家属的政治文化水平，给他们以充分的与有系统的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抗战的干部，曾创办了一个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该校先后收容学生三百余人，已毕业的在百人以上。这些抗日军人家属原来是目不识丁的，由这学校毕业之后，已能写信给自己在前方抗战的家人了。

(五) 创造了模范的抗日军人家属：正因为政府和人民各方面优待抗属和尊敬抗属，就使得这些参加抗战的战士成了人民派去参加的代表。抗属方面，许多都觉得抗战是自己的任务，应当去参加，因而他们也努力自己去耕种，不愿受人民各方面的优待。这些抗属真不愧为模范抗属，值得我们特别钦敬的。

四、慰劳前方战士。为了提高前方战士抗战的情绪，使他们亲切的感到他们自己就是后方民众派出去的代表，同时也为了扩大后方民众的参战运动，使他们深刻的了解帮助前方战士

乃是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慰劳前方战士便成为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边区的经济，一般说来，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两年以来在募捐慰劳前方战士的运动中，我们却看到了惊人的成绩与踊跃输将的情形。前年曾经募捐了十万双毛袜和手套，去年又募捐到了六万双，都获得了顺利的完成与超过。这里最值得表扬的是有一个妇女做了七双毛袜和手套。抗日军人家属还破例的首先自动捐助前方。

五、剿匪除奸。本来边区经过土地改革后，原有的土著土匪基本上早已消灭，反对革命的分子，早经驱除。但是自从抗战发动，八路军出发前线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有计划的收买、勾结、组织和利用边区以外的土匪叛兵以及汉奸托派来分头进攻边区，有的混进边区内部来进行间谍破坏的勾当，有的奉命留在边区边境的地方，进行各种扰乱活动，有的打进友区的各机关中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工作，这就不能不在一定期间在某些地方形成了猖獗一时的匪患。例如，前年八月宜川叛变的一营部队，枪约五百，盘踞于黄龙山。从韩城窜入郿县之散兵二百余。哨聚在关中五台山者也有二百余。此外著匪有赵老五、张廷芝、张玉明、王四、董良如、吴从荣、董优明、夏老么、聂虎山、秦恩儿、武文英、陈老大等，总计不下四十余股，人枪不下二千余，这些叛兵与土匪，除了一般的打家劫舍杀人掳掠以外，还曾经实行过劳山劫车事件，以及枪杀抗日军人家属、退伍军人、爱国志士、政府工作人员等，同时并实行抢掠合作社、破坏国防交通，勾结少数抗日部队哗变，宣传日本王道，以实行武装替日寇作汉奸等等。

边区为要有效的帮助前方，坚持长期抗战，自然须要有个巩固的后方，首先保证有个安宁的社会秩序，因此剿匪除奸工作，就加重了它在抗战动员中的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自慰的，是两年以来在剿匪方面，我们消灭了大小四十多股，被我们击毙击伤的有八百人左右，俘掳的有四百人左右，缴枪一千多支。现在我们可以说，边区内部的土匪在基本上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伟大的胜利。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残匪依然还活动于靠近边区交界处，未能彻底肃清。这里主要原因，是由于未能取得与友区的合作，或是因保安队活动范围所限制。这不能不算是个极大的损失，使残余土匪得以苟延残喘，尤其在这敌寇深入之时，更足为抗战的后患。

在锄奸方面，我们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锄奸运动。每乡建立了民众锄奸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领导十个以上的锄奸小组，每个小组平均有十人以上的锄奸组员。目前边区统计有七百个以上的锄奸委员会，将达九千个的锄奸小组，包含十万多的锄奸组员。这种群众组织，一年来经过教育整理，成为坚强伟大的力量，在乡村及城市中，配合自卫军经常进行放哨、盘查、侦察、宣传等等锄奸警卫工作。

两年来破获敌探汉奸案件百余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进行秘密侦探组织案九起，利用宗教团体进行汉奸活动案二起，组织土匪枪杀扰乱案四起，化装民众进行汉奸活动案五起，勾引抗日战士拖枪逃跑案五起，托派叛徒案二起，偷取军用电话线案二起，投放毒药案一起。

同时锄奸工作的成绩还表现在如下各方面：

（一）配合地方部队进行了剿匪工作，破获了土匪案件一百五十多起，瓦解股匪争取匪众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杆（保安司令部剿匪成绩不在此限）。一般的肃清了边区内部的匪氛，保证了地方治安。

（二）保障了政府命令的执行，检举了不明大义、不顾大局的豪绅地主及捣乱分子，没收了烟土七千余两，破获了伪钞

票案二十多起。直接间接均有利于边区人民。

（三）帮助了友军，一年来扣送逃兵案不下二百起，同时帮助解押护送等等，皆站在共同抗日、互相帮助的立场上，使抗日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发展。

（四）保护群众利益，各县保安科对于警戒盘查及肃清盗匪工作，皆能经常注意，领导群众积极进行，特别是延安市公安局平时的努力与敌机轰炸时的英勇果敢，对于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市民财物方面，表现了显著的成绩，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六、进行了救济难民、抚恤残废、保育儿童的工作。

（一）抗战以来，广大地区沦陷在敌人铁蹄下，无数同胞不愿受其蹂躏，扶老携幼、奔走逃难、无家可归，对于他们予以救济和安置，不使走入饥饿死亡或流为盗匪，就成为了后方的一个重要工作。边区邻近战区，从山西、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三万以上。另外边区四周的抗日军人家属，因在各地不能得到救济优待而逃入边区的亦复不少。例如，从绥德、米脂、清涧等地逃入延安的，至今尚有三百余人，在延长者四百四十人，在延川者一千零八十二人，在安定者七百一十六户，人口约三千左右，其他如关中、靖边、庆、环各地方都有。

对于这些难民的救济，除了中央政府前年亲自派员在边区散发救济金外，又承甘肃省政府拨交边区政府赈款计三万六千余元，去年又经行政院赈济委员会拨给边区赈款十万元，其中以三万元为急赈之用，其余七万元用之发展手工业生产及水利，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救济难民。同时又得到国联防疫大队的兰道尔先生向各方捐给边区一万元，以作救济难民之用。但因难民数量较巨，专赖协款、捐款还不能彻底解决，而且边区政府本身经费又极窘绌，所以不能不一方

面依靠于广大群众，实行互助互济的办法来解决，一方面使难民经过一次救济后，自行谋生，或则介绍到农村，在农民协助土地工具和粮食之下而参加生产，或则介绍到工厂中作工，或则介绍到机关工作，或则介绍到学校念书后再回到自己家乡参加抗战。

除外来难民外，在边区内是没有什么难民的。仅仅在敌机轰炸延安以后，一部分居民遭受牺牲，房屋财物遭受损失。边区政府除对伤者全部予以免费医治外，并对于死难居民予以相当抚恤，其因受伤或财物损失而影响生活者，分别给予了救济。

(二) 在抗战中，抗日战士不断的牺牲和残废，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保卫祖国的忠诚和英勇的模范精神，同时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铁的保证。因此抚恤和优待牺牲战士和残废战士是每个人民和政府的责任。边区许多区域的百分之十的人民，加入了抗日部队，而且大多数是在前方直接与日寇作战的，一部分则在后方担负剿灭土匪巩固后方的工作。由于抗日战士有着高度的民族意识，以及由于战争的残酷性，边区的人民也就有不少为国捐躯或残废。加以边区与八路军有最密切的关系，许多牺牲和残废的战士也就都到边区请求抚恤和优待。两年以来，经边区政府抚恤优待的数目达六千以上。其死者则除一次发给抚恤金外，并永远优待其家属。残废者则按其轻、重、久、暂不等的程度，分别发给残废优待证，每年发给十元至三十元的抚恤金，并派人代耕土地。此外老弱退伍的战士除发给退伍金外，亦由政府给以土地和房屋，并代他们解决了工具种籽，俾在退伍后仍能保障其生活。

(三) 为了培养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减少人民的家庭顾虑，边区政府曾在前年建立了托儿所，首先免费收容工作人员的婴儿。去年九月间承战时儿童保育总院总董事长宋美龄先生

拨给五千元基金和各方面的帮助，又将托儿所改为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院，现在收容儿童数已达二百余名，且在继续扩大中。两年来虽因为管理经验缺乏，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未能达到期望的成绩，然而却开辟了边区培养健全后代和减少工作人员家庭顾虑的门路。尤其是因为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首先是战时儿童保育总院、红十字会、国联防疫队和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及周恩来等同志以及中外人士在经费上物质上的帮助，使儿童获得了较为优良的待遇。如每三个儿童有一个保姆，五个幼稚生有一个教员。每天有白面、白米及代乳粉和牛羊奶等较好滋养料的供给。同时住的房屋亦较为舒适，儿童文化、卫生设备亦已稍得具备，对于幼稚生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教育，这于培养民族优秀后代是有极大贡献的。

第二，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们两年来坚持长期抗战，武装动员民众力量，争取胜利的总的战略方针与中心任务。

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针与任务下，曾经作了一些什么工作呢？得到了怎样的成绩呢？这里我们须要指出：

一、我们把统一战线的方针变成了全边区民众的方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统一战线的方针普遍的教育边区的人民和深入到群众中去。

去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

武汉失守以后，敌人企图进行一种阴谋，一面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傀儡政权，做公开的号召，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内部掀起一个反对国民政府反对蒋^[2]委员长的分裂运动。我们马上就在各地召开广大的群众大会，表示坚决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以及他的抗战到底的主张。

最近汪精卫叛党卖国，发表汉奸主张，反对国民政府反对蒋委员长的坚持抗战的方针，反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民众为了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底坚定不移，为了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抗战方针底忠心不二，又举行了一次拥蒋锄奸大会，和全国一致反对这个民族的败类——汪精卫。

此外在边区还有各种抗日党派，他们不仅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并且还享有各种工作上的便利。在延安国民党有党务指导员办事处，在纪念日時同样的和其他团体一般的印发宣言，张贴标语。在大会上，国民党的负责同志时常被选进主席团去。边区政府对于一切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无论由任何党派去领导，都不加以限制。

因为这些缘故，所以边区的人民，对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国策和主张表示了诚心诚意的拥护。

二、我们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建立了边区内各阶级抗战御侮的团结。

远在苏维埃时代，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以后，边区就已根据取消苏维埃、停止没收土地的宣言，在经济上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同年五月十二日以后，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公民权。

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为要把这些政策更具体地实施起来，使边区内各阶级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整，曾经采取如下的办法：

（一）关于地主和农民间的关系：

甲、凡地主土地在苏维埃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

乙、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分土地和房屋，并享有公民权利。

丙、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

这些办法实行以后，许多在苏维埃时代脱离了边区的地主、富农、有产者，纷纷回返边区。例如保安一县便有四十余家，定边地主、绅士、富农除四户外，其余一律回乡。安塞回来的也有一百零五名。回来以后，都恢复了公民权，分得了土地房屋，青年和儿童受到了免费教育，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和儿童团。有的地主、富农还被吸收在政府中工作，定边回来的四十三名知识分子，其中有三十二名已参加工作。但是有一部分地主豪绅不明大义，企图利用边区政府底这一统一战线的政策，采取各种方式，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强迫农民偿还已被废除的债务和地租，以挑起农村的阶级斗争，于是边区政府不得不有去年五月十五日的布告及六月九日的两个决定，以遏止这种现象的发展。至此强迫交还土地、债务、地租的纠纷才得以停止，阶级斗争才得以缓和。

（二）关于雇主和工人间的关系：

为了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来投资，奖励工商业者扩展边区经济，增强抗战力量，我们采取了下列办法：

甲、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

乙、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但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边区底生产，同样地为了增强抗战力量，我们又不能不：

丙、严禁高利贷的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

丁、实行一种仲介制度，在政府仲介之下，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两年以来因为边区政府采取了上面的政策，调整了各阶层的关系，取得了全体人民的拥护，使全体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三）和友区政府建立互助合作关系：

边区虽保持它政制的特点，如政府负责人的民选，民众的普遍组织，全民的武装，普遍的义务教育，土地的分配，统一的税制等等，但对于友区的制度和行政设施，边区各级政府是尊重的。在工作关系上实行互助合作，以进行锄奸剿匪，扩大抗战部队，巩固地方武装等等，均有过实际的收效。例如安定的瓦窑堡汉奸案的破获，鄜县县政府与保安队缉获从边区跑走的土匪；边区的保安队替友区的保安队缉获逃犯叛兵归案；延安等县宣传友区逃出的壮丁回家等等便是明证。

不过，统一合作总的趋势虽然是一天天的向前发展与巩固，但由于汉奸、托派、顽固分子挑起的纠纷和误会，还是不断的发生，例如神木县进占边区的神府五区；安边堡进占定边的五区五乡的三路渠贺家峁等村庄；甘泉县友区政府的逮捕群众等等。友方常常是以武力相威胁，但边区各级政府始终以劝导说服和平谈判来求解决。正因为如此，所以两年来虽有不少的磨擦和误会，但并未引起足以破坏团结合作的不幸事件。

（四）帮助友军巩固部队，解决困难：

在边区境内，有些地方驻有一些友军，为了帮助他们巩固部队，增加抗战力量，我们曾经不断地发动民众慰劳他们给他们以精神上的物质上的鼓励。例如：骑六师十七团刚驻

入神府一区后，即发动该区民众开欢迎大会，并给以慰劳，经常能够帮助他们协缉逃犯叛兵，不问其叛变逃跑的原因如何，一律无条件把人枪送回原部。如和四九四旅及八十六师的关系。

在驻了友军的地方，县政府都组织了采办粮食处，以帮助友军解决给养，同时发动了自卫军帮助运输。例如定边本来产粮不多，自给尚不足，但经过当地政府对农民的宣传解释后，农民竟把自己用的粮食卖给驻军，保障了驻军的给养。又如骑十七团去年在神府驻扎四个月中，共动员帮助购买与运输了谷米一万四千五百七十斤，草三十五万二千五百四十四斤，料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六斤。

至于战区医院及驻在边区以外附近的国军，则一般均去慰劳过，并帮助过运输，这就是边区各级政府帮助友军巩固部队，解决困难的一般情形。

第三，抗日民主制度的实施。

由过去苏维埃民主制度转变为今天的抗日民主制度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巩固和扩大国内团结，建立抗日民主的模范，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抗日民主制度底主要特点，表现在新的选举原则——就是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原则上。这一抗日民主制度是在民国二十六年年底开始建设成功的。在这新的抗日民主制度的实施中，无疑地，我们有着许多的弱点，然而在基本的方向上，却谁也不能否认获得了如下的成功：

一、我们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在选举运动过程中，我们听到过许多人表示怀疑说，给予地主资本家等以公民权，这是一个形式，甚至是个假面具，所谓抗日民主制，在实际上将依然是个工农专政，然而现在我们可以用事实回答他们了：

在我们现在的抗日民主制度下，不但地主、绅士、资本家已事实上恢复了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各种抗日的党派，已有了公开活动的可能，以及进行竞选的自由。我不想多举事例，下面的统计表就够说明这些选举的结果。有些地主、富农、商人，也还当选为参议员。

固林、延长、安定、曲子四县选举结果（百分比）

	县级	区级	乡级
工人	四	四	五点六
贫农	六十五	六十七	七十一.四
中农	二十五	二十二	十七
富农	一	二	二
商人	一	一	二
知识分子	二	二	一
地主	二	二	一

二、我们发展了边区民主运动。

这首先表现在选举各级议员时一般的地方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选民参加。其中如：安塞、蟠龙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及个别小脚妇女外，差不多全数参加；只有少数地方到得较少，但也都在半数以上。又如延安则一般的均是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尤其北一区差不多全体参加了，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更非到会不可。总括来说，全边区的选民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参加了选举的。

其次在各级选举会议中，均报告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细心的倾听。报告以后，提出了许多质问，以及正确的批评。尤其是安塞四区一乡，蟠龙区一、三、五乡的工作，更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反之，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却又得到选民热烈称赞。

在各级选举议会中，一般的均有提案。在这些提案中，如西分区的选民，除了关于抗战动员，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生活，锄奸剿匪等等外，更纲领式的提出：“今年的选举是为了团结所有力量，去打日本鬼子的，不是回到革命以前的道路，不是不干革命了，更不是放弃了工农利益，而是要保卫祖国，保卫全民族的生命……”至于妇女方面，更明显地提出了她们的要求，例如安塞的妇女提出：妇女参加生产、放足、剪发、废除买卖婚姻等，这些差不多成为每个妇女选民的呼声。

再则，选民对于选举什么人的问题，更是非常的关心与慎重的。这表现在当着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有的则到处宣传某人的坏处等等。又如安塞四区一个乡长因工作消极，蟠龙区一、三、五乡乡长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等，均遭到反对为候选人。至于那些平日对抗战工作努力的分子，在选举中都当选了。

根据以上各点看来，选民已经在热烈的实行民主权力，而且善于利用民主权利来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要求，选举自己所信任的人去实行自己的希望。

三、建立了廉洁的抗日的全民的政府。

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各级议会中产生出来的，这就保证了真正坚决抗日的分子，真正人民的代表参加了各级政府的工作。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和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最能了解民众的要求与代表民众的利益。

我们的政纲，是抗日的与民主的。因之，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一般的是忠实于抗日的事业和抗日人民的利益，坚决为抗日与民主的政纲而斗争的。

在我们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的模范，在现在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五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二点五元，每天粮食一斤四两，菜钱四分，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二十元至三十元之间。

在战时财政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节省一切，以支付战争的费用。凭着我们过去一贯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自我牺牲，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之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四、民众团体有了广大的发展。

由于广泛的民主政治的实施和政府的有力的帮助，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已百分之九十五加入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农会。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边区的人民，至少每人加入了一种组织，有的还加入了两个以上的团体。这些组织是根据民主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并有其自下而上的组织系统，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团体的纪律。

边区群众团体的纲领，其共同点是广泛的动员全边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拥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提高会员文化政治水平，改善群众生活，巩固既得利益，实行武装自卫等。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动员群众从各方面参加抗战工作。例如优待抗属，慰劳抗日部队，替军队运输，修筑国防工事，锄奸剿匪，加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参加春耕秋收运动，缴纳救国公

粮，发展工业等等。这些工作都获得了每个群众团体的热烈响应，而且他们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群众团体，对于政府是个有力的支柱。没有群众团体，则政府的抗战建国动员工作是难于顺利实现的。政府的每一个号召，都经过群众团体的推动，而能够很快的完成。行政工作只是站在领导与指导的地位，政府则尽可能来帮助群众团体的发展与巩固。例如经费上协助群众团体，物质上分配办公房屋和开会场所给群众团体，替群众团体解决印刷机器、交通工具等需要。这样来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同时对于脱离生产参加群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政府则发动农民帮助其代耕土地，以减轻家庭的顾虑，使之更能注全力于群众组织的工作，使群众组织成为在抗战建国中最有力的依靠。

第四，经济建设。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目的，在于创造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边区经济比起全国其他各地，虽然非常落后，然而由于边区人民在政治上已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在经济上已经废除了各种苛刻的剥削和障碍，从这方面说来，在边区进行国防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政治上的优越条件。两年以来，我们为了要在这一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国防经济更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曾经采取了如下的办法：

一、在农业方面。发动民众组织劳动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劳动热忱。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并发放农贷款，以流通农村资金。

二、在手工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三、在公营企业方面。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

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为现代工厂。

因此两年以来，边区在经济建设上得到了如下的成绩：

(一) 农业生产表现出猛烈的增加。例如，耕地面积：二十五年为八百四十三万一千零六亩；二十六年为八百六十二万六千零六亩；二十七年为八百九十九万四千四百八十三亩。两年以来已增加了五十六万余亩。新开荒地，二十六年为十九万五千亩，二十七年则为三十五万八千四百八十一亩。其中延安一县二十七年即增加了三万亩。志丹县去年春耕时计划开荒二千垧（每垧三亩），结果开了四千七百一十六垧；延长去年统共开荒七千零三十垧。安定原计划开荒四千垧，结果超过四千四百八十四垧。粮食收获量：二十六年为一百一十万石（四百斤一石）；二十七年为一百三十万石。植林：二十六年为三十万株；二十七年为四十八万零九百五十二株。农业副产：牛羊数目，两年来已增加到三十万头以上。

(二) 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例如定边一县二十七年比二十六年就多增加了皮场十处，染坊三处，木器铺十三处，裁缝铺五处，铜匠铺五处，鞋匠坊五个，刻字铺石印二处，银匠铺五处。这里群众集股开办的木器、缝纫、瓷器等合作社及政府投资创办的毛织、棉织、硝皮、造纸、农具、磨面等手工工厂还不在于内。

(三) 商业方面也已开始发达起来。从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现在新增加的商店约在一千以上，尤以延安近年来增加更多。神府、靖边等县还发展了集市以便利交换。此外合作社在全边区也有了一百五十五处，社员有三十七万八千四百四十五人，股金有三十八万九千六百七十九元。其中如延安南区的合作社，所获得的红利已超过股金数倍。这不仅发展了交换，而且社员能分得红利，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四）公路方面：也有了大的改善。如桥梁涵洞的建设，坡度的削平，弯度的改进，路线的加宽与改正，路面的铲填等等，均有明显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所以能维持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五）国营企业部门：已创办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各一处，煤矿厂三处，印刷厂一处，修械厂一处，造纸厂一处，制药厂一处，农具厂一处以及制灯造肥皂面粉等工厂。以上的工厂都系小规模的经营，但产品可供给边区一部分的需要。如纺织工厂现在只一部分机器开工，已出产了大批洋布、袜子、毛巾、毛衣，生产品并不落后；若全部机器开工即可广泛供给群众的需要。

四、边区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在革命以前简直贫困到了极点。那时广大农民没有土地，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生产的粮食除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必须当做地租交给地主以外，还须以一部分当做各种捐税交给军阀和官僚，有的还要以一部分当做利息支付高利贷资本家。再加上那时连年不是天灾，就是内战，弄得民众无法生活。强者只有去当土匪，弱者只有坐以待毙，绝大多数民众是经常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革命以后，形势完全转变过来了，土地收归农民耕种，不受任何人的剥削，生产的粮食全部归自己享受。因此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当时曾经不可避免的内战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经济封锁和劳动力的缺乏，一般的民众生活的改善仍然不够。可是现在又有些不同了，经过了这两年以来的经济建设，一般民众生活已经达到了够吃够穿的程度了。在边区内，抗大的伙食要算比较好的，然而据抗大一个采买员说，他走了几十里路经过了几十户人家，他们都比抗大吃得好些。这已够证明边区人民的生活改善方面的很大进步了。为了证明这点，我引出下面一个不完全的农民生活统计表：

姓名	住址	人口	雇工	劳动者	去年 种地数	去年 收成数	去年 牲畜数	今年 牲畜数	今年 耕地数	今年 增地数	今年 收成数
刘建甲	延安南区二乡 一村南庄河	五	零	二	二十五垧	二十石	牛五头 均死	牛二头 羊七十	四十垧	十五垧	三十余石
范克呼	延安南区二乡 二村王家窑	七	零	二	二十五垧	二十石	牛二 驴一	牛四 驴二	四十垧	十五垧	三十二石
吴满有	延安南区二乡 三村枣园	五	零	二	二十垧	十五石	牛二	牛三 马一	四十垧	二十垧	三十石
傅万岐	延安南区五乡 一村仗道坪	八	零	二	二十垧	十二石	牛一 驴一	牛一 驴二	四十垧	二十垧	三十石
胡建	同上	三	零	一	四垧	二十四石	零	零	四垧	零	五石 (女人)
张明魁	甘泉三区 二乡雷村	四	零	一	不详	零石	不详	不详	二十九垧	不详	二十五石
王存儿	甘泉三区 二乡渠里	八	零	二	同上	十七石	同上	同上	三十二垧	同上	三十四 点三石
李桥	甘泉三区 二乡雷家沟	十一	零	三	同上	十八石	同上	同上	三十四垧	同上	二十五石
杜发福	甘泉三区 五乡阳庄梁	三	二	三	同上	五石	同上	同上	六十垧	同上	三十四石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一般农民家庭两年以来的收成，若以六口之家计算，每年消耗十五石，每家平均有十石以上的剩余粮食。

在边区内，因为农业生产一天天地增加，农民不再受到剥削，已经不会再有破产的农民。另一方面，又因为工商业一天天地发达，对工人的需要逐日增加，所以不仅在基本上消灭了工人失业的根据，而且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

下面是现在工人工资比革命前增高的百分数：

工人分类	与革命前增加的百分数
煤矿工人	百分之三十
制造工人	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
泥木工人	百分之二十五
雇工零工	百分之二十五
店 员	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

地别	革命前的工资	现在的工资
安定	00.20~00.25	00.30~00.35
靖边	00.20	00.30
安塞	00.10	00.30
保安	00.15~00.20	00.30
郿县	00.20	00.40
古林	00.15~00.20	00.30
庆环	00.20	00.30~00.40
延安	00.20	00.30

（此表以元为单位）

从这两个表中看来边区工人的工资比革命以前的工资是大

大增加了。

第五，财政政策。

边区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边区抗战经费底自给，满足各项工作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我们的财政政策在于一方面增加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还不致影响到人民生活底改善。因之我们的财政底基本来源便只能是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生产，在改善人民生活与实行合理的负担（即有钱出钱、钱多的多出钱）的前提下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边区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区域，人民生活，还存在着浓厚的自足自给的状态，既不需大量消耗品输入，也没有大量农产品输出。因之边区的财政收入是很有限的。根据二十六年十月到二十七年九月，一年中的统计，边区收入共有如下几项：盐税和出口货的营业税共占五十九万一千余元；救国公粮费四十二万余元；公产及公营企业收入占十八万元。边区财政的这种有限的收入，自然就不能不使政府的支出束缚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以求得收支的平衡。这样也就使许多应兴应革的事业，不能不受经费上的相当限制。虽然我们的财政表示出了极大的困难，然而我们的财政政策却造成了如下的几件不可否认的成绩：

（一）取消过去四十二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低税率。例如边区现在只对食盐和出口的皮毛、药材等征收统一税，减为每一驴驮只收税二元，并且取消了盐税附加。一切税收除了一次的统征外，都没有任何附加或重征。因此边区人民的负担也就大大减轻了。下面就是新正县人民在革命前后负担比较表：（下表以元为单位）

区别	革命前的负担	革命后的负担
善兴区	八千二百	三千九百七十一
怀兴区	二千八百五十	九百四十二

续表

区别	革命前的负担	革命后的负担
太和区	七千六百四十	三千四百三十七
底庙区	七千四百三十	二千五百零二
交区	八千四百三十	三千七百二十一
总计	三万四千四百六十	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四

这表系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统计，由这个表就可看出革命后，人民的负担比之革命前是减少了一倍以上。

（二）我们的财政政策得到了群众热烈的拥护。例如救国公粮前年曾征收了一万五千担。去年决定征收一万担，但结果超过七千余担，并较之预定期间提前一个月而完成。尤其延安、延长、固林、延川、甘泉等县许多区域实际只有三五天便完成了任务。许多抗日军人家属和贫农本来照例应当免税，但他们都自动的送粮食捐给政府。更有许多农民自动超过规定标准而缴纳公粮等。由此看来，边区的人民是在热烈地拥护政府，帮助政府的抗经费。

（三）我们的财政基本上满足了抗战工作底最低限度的需要。例如支持抗战、培养抗战人才、帮助生产事业的需要等。

第六，创造与发展了国防教育的模范。

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

国防教育的实施，虽然因为边区财政困难以及各种物质条件的困难而受到了限制，然而在全国范围内，边区是第一个创造与实行国防教育的，把教育从少数人的专有品中解放了出来，把教育和实际生活打成了一片，使教育成为了抗战的一个

有力的武器。我们在这一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成绩，给与抗战以很大的贡献。

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二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二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数年以来，文化教育的发展蒸蒸日上，以惊人的速度进步着。下面的统计表就是一个明证：

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表

未成边区以前	一百二十校	学生不详
二十六年春季	三百二十校	学生五千
二十六年秋季	五百四十五校	学生一万零三百九十六
二十七年春季	七百零六校	学生一万四千二百零七
二十七年秋季	七百七十三校	学生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五

其中有完全小学十六处，模范小学七十八处。二十七年度比之革命前增加六倍，比之二十六年春季亦增加了一倍以上。

中等教育首先建立了鲁迅师范，在前年一年中已毕业了一百八十余名，分发到边区做小学教员；现在还有二百余学生，并添设高级班，以造就高小教员及教育行政干部。去年又新建立了边区中学，学生有二百人以上。在妇女教育方面设立了抗属学校，先后招收了三百以上的学生，给了他们文化政治上的基本训练。

高等教育，在边区内设有抗大、陕公、鲁艺、卫生等各高级学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等。不但边区的青年成年均能便利的去受高级教育，以求得军事、政治、艺术、卫生、科学

各方面的知识，参加抗战各方面的工作；同时给了全国数万个青年以求学的便利。

至于社会教育方面，为了消灭文盲，实行了消灭文盲的运动。现在社会教育的组织及参加的人数如下：

识字组	五千八百三十四组	组员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三
夜校	二百零八校	学生一千九百一十七
半日校	六十一校	学生九百一十九

冬学运动亦收到很大的成绩。例如二十六年冬季原定四百所学校，六千学生；结果达到六百学校，一万学生。此外有着极大教育意义的俱乐部、救亡室，亦在各个机关和农村建立起来了。平民教育馆和抗战剧团民众剧团亦在延安等处发展着。体育歌曲的发展，更有了不少的成绩。最近以来，电影亦在边区放映了。

报纸的发行，边区亦成为普遍的。如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解放》、《团结》以及全国重要的报纸刊物如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群众、全民周刊等亦有很大数量的销行。从以上情形看来，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在发展着，人民的文化水准是大大的提高了。

第七，司法工作。

边区司法工作的目的，在于保证抗日民主制度及边区人民的合法利益，因之边区司法工作的优点在于：

（一）实施法律制裁的主要对象是破坏抗日民主制度的汉奸土匪等。

（二）是处理案件不拘形式，一切为了人民的方便。

（三）审判案件绝对公开，于必要时还要组织民众法庭或准许民众推派代表参加审判。

（四）对一般犯人更多注意政治教育和感化，使他们改邪

归正，禁止对犯人施行报复手段或虐待犯人。边区司法虽具有这些特点，但它所依据的地方单行法令都是在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抗战建国纲领的最高原则下制定的。两年以来，我们根据这一方针进行工作，结果得到了如下的成绩：

甲、边区基本上解决了土地、婚姻、债务等问题，因此民事诉讼大大的减少了，在司法工作中已不占显著的地位。

乙、改善了犯人的生活待遇，犯人的饮食、卫生各方面，也都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一样，而且可以自己阅读书报，学习写作，举行各种问题的讨论，出版墙报。

丙、由于实行了政治上的感化教育，在政治上表示转变而被释放的人数占了全数已判决的犯人的三分之一。

下面的统计表即是一个明证：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度判决犯人刑期统计表

刑期	法院	各县	总计
教育释放	十七	二百八十五	三百零二
半年以上徒刑	二十	一百七十九	二百一十七
一年以上徒刑	五十五	一百三十一	一百八十六
二年以上徒刑	五十	三十六	八十六
三年以上徒刑	二十二	十四	三十六
四年以上徒刑	二十九	二	三十一
五年以上徒刑	十八	四	二十二
死刑	十九	六十五	八十四
合计	二百三十	七百三十六	九百六十六

第八，对少数民族的工作。

我们对少数民族是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及抗日救国的情绪和坚定其对抗战的信心，帮助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帮助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尊重其宗教习惯，联合他们共同抗日。二年来在这个少数民族政策下收到了如下的

成绩：

（一）洗刷了过去大汉族主义的恶劣传统，改善了回、蒙民族与汉人的关系，提高了政府的信仰。例如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到了定边以后，即将被强占了数十年的蒙古盐池、苟池、北大池和过去军阀所占去的蒙人土地完全交还蒙人管理，得到了蒙人对我们的热烈拥护。

（二）帮助少数民族营业上的自由，并帮助其解决困难问题。蒙古地带多系草原沙漠，皆以游牧为生，一切粮食及日用品完全仰给于定、盐。而他们的牲畜及食盐的销售过去不但苦于税务繁重，营业又无保证，动辄被人拐骗。现在边区政府不但减轻了他们一切税务的负担，并且给他们营业以保证，使他们不受任何损失。同时给他们在粮食与日用品方面以极大的经常帮助。宁夏、灵武、金积等地的回民，也有苦于苛捐杂税太重而移到边区来从事各种小职业。

（三）解决了蒙、汉、回民间的纠纷问题，提高边区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信仰。定、盐两县接近蒙古、宁夏，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下，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对汉人积累了许多民族的仇恨，汉人中有些坏分子，欺压蒙、回民，偷盗他们的牲畜，强夺和欺骗他们的财物。过去的政府对这种事情，多偏袒汉人，不作理会。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对这些问题总是秉公处理，对那些坏分子给以制裁，获得了蒙、回民众们的热烈拥护。

（四）尊重并帮助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蒙、回民族干部，政府曾在定边县开办过一所抗日回蒙学校。课程均采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并曾不断的用蒙、回文字译成各种抗日书籍和小册子。凡边区接近蒙、回人的地方，都有定期与不定期的蒙、回文刊物和墙报。同时对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习惯，边区人民是一律尊重的。

* * *

同志们，以上所说的一切，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二年来所做的工作与所得到的成绩。这是由于边区人民及各级政府对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国策的忠诚拥护与实行，由于边区人民与政府的团结一致，由于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努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获得的。这种成绩使边区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完成了使陕甘宁边区真正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区的伟大任务。

同志们！边区工作的开展与成就，无疑的使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建国的信心大大的增高了，而且更证明给世界先进人士看：中华民族如何富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正如世界学联的代表和许多国际友人所说：“全中国如果都像边区一样的团结，中国永远也不会亡的！”

但是，同志们，我们在工作中虽然获得了上述的成绩，但是两年来边区政府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缺点，是从来不愿隐瞒起来的。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希望同志们给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以很好的批评。只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使以后的工作有所改进。据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缺点，主要的表现在下列三点：

第一，统一战线还不够巩固。客观上由于少数人士还未能捐弃成见推诚相与，因而引起了不少的误会和磨擦。而少数以防共为第一的顽固分子，更忘记了抗日为当前任务，故意的制造磨擦，捏造谣言，欺骗人民，甚至不惜采取武装侵占边区，逮捕边区工作人员，挑拨阶级斗争等等，实际的妨害了我们抗战的动员，妨害了我们许多工作的顺利进行。这种行为更给了汉奸、托派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好机会，实际上帮助日寇灭亡中国。为了巩固边区，巩固团结，增加抗战力量，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及时的迅速的有力的加以制止。但是这个工作，我们过

去却还做得不够。同时不愿意或不会同友党友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门主义的残余，在少数同志中还存在着。这都是使统一战线还不够巩固的重要原因。

第二，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客观上这是因为经费的困难，技术的缺乏，经验的不足等。但主观上计划性的欠缺，组织上推动的不够，也是不可否认的。因而一方面不能高度的供给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不能达到更高的程度。

第三，边区虽然实施了广泛的民主政治，但是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却还没有普遍的深入的发展起来。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还未能彻底消灭，还存在着个别的脱离群众的现象。

第四，文化教育工作，还不够深入，边区在文化上还非常落后。

同志们！这些缺点，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只有克服这些缺点，我们的工作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肯虚心的了解自己的缺点，有了改正缺点的决心，那我们这里的一切缺点，是能够克服的。

根据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出版的
《解放》第六十八期刊印。

注 释

〔1〕即林伯渠。

〔2〕指蒋介石。

关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其 内部磨擦问题^{*}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

王 稼 祥

一 统一战线的现状与磨擦现象

1. 统一战线的现状：

(1) 自六中全会、武汉、广州失守后，现在抗战进到新的时期——到新阶段的过渡时期，困难增多，敌人暂时缓进，英美借款。

(2) 汪精卫逃走降日，国民党开除汪之党籍，蒋^{〔1〕}驳斥近卫宣言，抗日阵线中亲日分子头目之出走，抗日阵线之进步与巩固、弱点。

(3) 防共、反共之增涨，国共间磨擦之增多。

(4) 小结论。

2. 磨擦——关于共产党方面的：

(1) 政治上的攻击：共产党既声明拥护三民主义，必须放弃马列主义，取消共产党，转变、投降。

(2) 五中全会否定六中全会提议，反对双重党籍，要求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 这是王稼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3) 共产党破坏统一。

党、八路军、边区存在破坏统一。

(4) 强迫扩大国民党，严格限制公务人员条件，清查双重党籍分子（对付六中全会之决定），打击同情分子。

(5) 内线工作。

(6) 张君勱的文章、各杂志文章、防共材料。

(7) 诬杀、暗杀共产党员。

3. 磨擦——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

(1) 对于八路军、新四军之攻击：破坏统一，干涉行政、破坏行政系统，特殊化，不游不击，实行共产。

(2) 磨擦现象关于军队方面的。

限制八路军在一定地区不得擅自移动，在河北山东者应归还二战区建制（山西）。

调兵到敌后方，并且是调的非中央嫡系军队来与我磨擦（河北石、高^[2]部，山东于、缪^[3]部）。

取消八路军名称，取消八路军、新四军新编队伍名义，以达到消灭政策。

八路军游击队一概归省府指挥，企图消灭、吞并我领导的地方群众武装。

武装冲突（在河北张荫梧部对我博野驻军的袭击，在山东省府委员袭缴我十支队、十七支队武装，在豫北我修武游击队被郭^[4]专员包围缴枪三百余支）。

以上现象主要是划定地区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

(3) 磨擦现象关于政权方面的。

八路军不准干政。

取消冀察晋、冀中、冀南抗日政权。

利用省政府权力出布告，下委任，撤换我所支配的或与我所接近的抗日县长，武装接收县政——发生两县长现象。

公务人员不得参加其他党派。

以上现象主要是用政权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

(4) 磨擦现象关于财政方面的。

不准自筹粮款。

强迫各县向省府解款。

武装接受税卡。

企图用财政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

4. 磨擦——关于陕甘宁边区的：

(1) 政治攻击：破坏统一，割据，特殊，立异，要求取消（不但不批准）。

(2) 从外边来侵入，侵占地区，组织周围反共力量（地主、黑军、土匪、叛徒），进出人员之拘留。

(3) 从内部来瓦解政权、军队，派遣特务，取消边区人民已经得到的各种权利（土地、民主）。

二 统一战线与磨擦之本质、性质、危险性及其前途

1. 统一战线与磨擦之本质。

(1) 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对立的统一，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地主与农民是对立阶级，共同抗日是统一（另一对立，中日之对立）。因此对民族统一战线的了解，只看见统一，而不见其中之对立，或只见其对立，而不见其统一，都是不对的。

两种敌对阶级都是觉悟的：有其政党——国民党、共产党，有第一次统一战线破坏及斗争之经验，都有军队与政权。

(2) 磨擦之本质，磨擦就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之表现与

方式，统一战线中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存在，磨擦就存在，不可避免性，无磨擦是幻想。

（3）统一战线是在对立的斗争中，是在磨擦中发展与巩固，不斗争无磨擦统一战线不能进步与巩固，国民党进步之被迫性。长期统一战线，长期内部斗争，长期磨擦。

（4）磨擦之性质，对方磨擦本是对抗战不利的，有害的，我是反磨擦，是应该的，革命的，必要的。反磨擦之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2. 资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及共产党之政策。

（1）政策之本质。

抗日、容共、限共、孤共、溶共、灭共正是资产阶级的政策本质。

武器：三民主义，“统一口号”国家中央政权。

封建资本主义传统，特务工作，以求在思想上、组织上溶化共产党。

资产阶级政策之矛盾，民族的与阶级的冲突。

（2）对八路军、华北华中敌后政策。

重视敌后方工作，设立战地政治总局，制定沦陷区防共办法，任命沦陷区省府主席。

用中央命令来限制八路军的的活动。

用杂牌队伍到敌后方，使与八路军磨擦相互对立，相互削弱。

使军政分离，不许八路军干政，亦不用握有主要兵力之友军干政（如河北、山东），使军政对立，取消八路军之政权依托。

3. 国民党进步与磨擦之增减的关系。

（1）国民党是在进步中，还要进步。

（2）国民党进步并不等于国共间磨擦之减少。

(3) 国民党为了限共而进步，进步增加磨擦。

(4) 国民党进步之数量上与质量上的区别，现在进步是在抗日溶共政策下的数量进步，质量的变化必须有阶级基础之变化。

(5) 因此不要以为国民党进步，磨擦一定减少，也不要以为磨擦加多国民党便不进步了。

4. 统一战线中磨擦发展的规律。

(1) 磨擦有时高，有时低。

(2) 敌攻紧时低，松时高。

(3) 我力量发展之地点及时时候增加磨擦。

(4) 我正确让步减少磨擦。

(5) 我让步对方更逼，亦增加磨擦。

(6) 我反攻已成事实，磨擦亦临时降低。

5. 目前磨擦加多的原因。

(1) 日寇与汪派加紧挑拨离间，制造磨擦来破坏团结，企图以反共代替反汪，求得媾和投降。

(2) 敌人进攻缓和，配合汪派之媾和运动。

(3) 失地很多，我们在敌后力量的发展，与敌后抗战的经验，使蒋及国民党也注视敌后方工作（战地政治总局之设立，沦陷区域防共办法之提出）。

(4) 利用我六中全会光明正大立场，逼我再让步。

(5) 目前磨擦还是对方抗日溶共政策下的斗争，而不是破裂问题。

6. 磨擦与斗争之危险性与其前途。

(1) 危险性：

如对方磨擦来，我们只是让步，结果我们政治上、组织上阵地会丧失，统一战线没有了，抗日会失败；

如我们斗争过火，即日寇汪派利用统一战线破裂，抗日同样失败；

在敌后磨擦（有军队、政权、地点）会起武装冲突，有被日寇打塌危险。

因此我们政策过左过右，都可以破坏统一战线。

（2）统一战线与磨擦之前途：

资产阶级政策之目的胜日溶共——资产阶级独裁。

无产阶级应当是：巩固统一战线，挤掉亲日反共分子，争取同情者，麻痹反共分子，以改变抗日溶共政策，以达到建立新式的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两种倾向斗争是一个过程，斗争结果——磨擦由量变成质变，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三 我们关于巩固统一战线及对付磨擦之对策

1. 总方向：

（1）共产党中央及六中全会早已说明，巩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一切为了抗战利益。

（2）但一味退让，放弃自己立场，不能巩固统一战线，因此对统一战线中斗争与磨擦应有正确对策，说明我们主张之正确，严正批评对方错误是必要的。

（3）在对方磨擦来时，我们应在总原则下，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防御（拖延）或反攻，或让步，或给以进攻（有守有攻，有进有退，有软有硬）。

（4）统一是主要的，斗争是服从的。

2. 共产党之独立性与思想上站稳阵地：

（1）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性：

马列主义在民族自卫战争与民族解放中的纲领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战争之立场。民权——

资产阶级性革命的民主共和国。民生——马列理论。马列主义帮助了孙中山确立三民主义。因此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政治基础，共产党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差别性：

思想体系上的差别。在将来目的上的差别。在实际阶段上之差别。孙中山之错误。

为什么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比国民党更坚决彻底。

三民主义共和国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阶段。国民党的阶级限制性。

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

三民主义是武器（三民——一民），但马列主义是更高的武器。认为我们现在的主义是三民主义，将来的主义是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是等于放弃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把三民主义解说得像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一样，也是等于放弃马列主义的武器。因此对三民主义之解说，只应实事求是，所谓发展三民主义问题，三民主义的两种变法——资产阶级的变法（一民），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变法，都应反对。

（2）国民党、共产党抗日之立场、主张、政策之相同点与不同点：

大家都抗日是一致的，但怎样抗日便有区别。

民族问题的区别：外交。国内少数民族问题。

民权问题的区别。

民生问题的区别（减租、减税、减息）。

对内部阶级斗争问题之区别。

对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区别。

对抗战胜利后，目标及将来社会理想之区别。

3. 回答对八路军新四军之政治攻击：

(1) 统一。政权军队之统一。

(2) 特殊化。

(3) 干涉行政。

(4) 敌后抗战之两种政策。

共产党八路军之政策。军政党民之一致。指挥行政区域之划分。民权民生之实行（减租、减息）。指挥之集中与机动。与友军之合作（非中央军）。长期抗战胜利之保证。

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阻碍民权民生。军政之不一致。维持老省界。指挥之不统一。友军磨擦。磨擦冲突到失败。

4. 扩大自己力量原则：

(1) 力量扩大与统一合作之一致性与矛盾性（只有自己力量更加扩大，更能保证统一合作）。

(2) 向抵抗力最小的方向发展方针之不正确（比如我今日向东北发展，对国民党磨擦自然少，但是因东北今天不易发展，磨擦才少，一旦我打出局面后，国民党也会去，磨擦仍不能免）。

(3) 力量之发展应当适合统一战线发展之规律与磨擦之规律，不平衡的，受抗战形势变化影响的。

(4) 力量之发展应照顾今日，同时照顾将来，照顾将来同时又照顾今日，照顾自己又照顾人家，照顾部分又照顾全局。

(5) 力量之量的发展与质的发展。问题：在环境顺利时不要失去量的极大发展的条件。同时为了照顾将来长期的工作，为了适应某些困难环境，有时又当偏重质的发展。要善于隐蔽力量，不轻易暴露力量，要使我们在各方面工作（党政军群众团体）不仅有量的发展，并需有质的加强。

5. 让步原则：

(1) 让步是统一战线政策中的成分之一，绝不让步是不对的，可以有原则的让步（如为了团结抗战，停止土地革命）与具体的让步（如让出某些防区某些县政权）。让步有一定的限

度。单纯让步的路线是不对的。

(2) 让步是为了巩固团结，推进合作，因此：凡具体让步是以减少磨擦推进合作，则让步之。凡具体让步，反助磨擦增长顽固反共气焰者，则不让。凡有破裂危险时应该让步。轻易言让步会吃亏。

(3) 让步的时机要恰好。自动的让步与被迫的让步，着重自动的让步。过早的让步与过迟的让步，要合时。公开的让步与不公开的让步，着重公开的让步。让步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应着重积极的作用。

6. 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原则：

以我们之知识力量、干部及经验来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应根据以下原则：

(1) 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

(2) 但他们想用我们的知识、干部、经验造成对付我们的条件，制造磨擦，而不利于整个抗战者，我们应拒绝帮助。

(3) 因此我们必须有条件的，有限度性的，有进展程度的，否则所谓大公无私，披诚相见，实际只是自己搬石头打自己脚，不但于我不利，而且于整个抗战有害。

7. 对磨擦反攻的原则：

(1) 对磨擦反攻是巩固统一战线的必要办法。

(2) 反攻必须政治上占上风，站稳政治立场，理直气壮（不要乱加汉奸名义）。

(3) 反攻要注意第三者同情之获得。

(4) 要在对方最无理时举行反攻。

(5) 为要反攻先可让步，仁至义尽。

(6) 不宜乱反攻，反攻须有准备，务求胜利，压倒对方。

(7) 反攻适可而已。

8. 对地主阶级政策：

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农村，农村主要阶级是地主与农民，他们间有着严重矛盾：

(1) 日寇争取地主为汉奸。

(2) 顽固分子在本地依靠地主与我磨擦。

(3) 敌后抗战之主要力量是农民，而不是地主，但今天地主尚帮助抗日。

(4) 因此对地主阶级政策应当是：农民政策不应过左，负担不应过大，无秩序，不应推地主阶级向日本，即令有些地主阶级走向汉奸道路上，要使他愈少愈迟愈好，以孤立日寇。不应把地主阶级组织起来，应孤立他，麻痹他。政权武装要注意转入可靠的抗日分子手中。对地主政策之变化，应看整个形势与农民组织、觉悟程度，减租减息应有一定限度。不应落到地主阶级立场上处理问题。

9. 巩固共产党，发展共产党：

(1) 共产党今天所处的环境：对日战争的环境。统一战线与阶级合作（斗争）的环境。大批新党员，大批知识分子入党，并在抗日口号下。党的组织大半在农村中（工人少），许多地方是在八路军势力下发展的，合法的，因此应警惕我们党的组织任务，严密党、巩固党，防止组织上之破坏溶化。

(2) 共产党之组织原则：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统一战线组织（政党、政、民、团体之不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民族左派急进党（简单的民族先锋队不正确）。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的工具，又是无产阶级在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在为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

(3) 共产党员的政治条件：不仅承认共产党的现在的纲领，并承认最高限度纲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社会）。党员

与同情者分开。党员与普通抗日分子分开。自首叛党分子不能再入党，严防奸细。

(4) 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重要：教育应放在一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重要？思想上的混乱。

应教育党员：忠实于党，忠实于无产阶级，就是忠实于民族。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学习马列主义。是阶级的战士，民族的战士。克服党员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提高纪律性。

教育方法：

(5) 巩固党在军队、政权、群众中的工作：

八路军、新四军，教育巩固新军。对友军工作——接近阎^{〔5〕}、石、高、东北军。政权中的工作。群众中的工作，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更密切的联系。对友党，争取同情。

(6) 最后，党内的口号：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忠实于民族。

保持共产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只有更深刻地认识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统一战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石友三、高树勋。

〔3〕指于学忠、缪激流。

〔4〕指郭仲魁。

〔5〕指阎锡山。

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等关于 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

县委、县府、抗敌会、保安队：

(一) 中共中央为着在长期抗战中，保证抗战供给，改善人民及工作人员的生活起见，特号召全边区人民及各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广泛发展生产运动，以达到财政经济上能自足自给。为此全边区要于本年内增开荒地六十万亩，并同时增加施肥、锄草、改良耕种方法、发展水利，以达到本年农产收成能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获。

(二) 边区以内党、政、军、民、学校各级人员，每人应保证从今年秋收后，粮食菜蔬完全由自己生产以自给，从今年七月份起，边府减发菜钱两分，从秋收起不再发粮食。因此，各级工作人员的任务，便是要在今年春季，立即计划耕种，能从秋收后屯一年的粮食和菜蔬。而且党和政府及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任务是两重的，即一重是要保证每个农民今年生产能增加百分之二十，又一重是保证机关工作人员在秋收后自己有粮食自给。

(三) 各县级机关接此通知后，除立即通知各区准备进行外，并由县府、县委、县抗敌会、保安队共同组织一领导全县的生产委员会，以为领导今年全县的生产运动。此委员会的主任，县长或县委书记充当之，并立即进行以下工作：

甲、县一级党、政、军、民、机关工作人员共有多少？每人吃一年的粮食菜蔬应种地多少？此项土地怎样取得？如果县一级所在地没有或少有土地又应当怎样调剂？区乡两级应当怎样解决等，均需讨论出具体实现办法。

乙、具体分配各机关应生产的粮食任务（边区各级党、政、军、民、学机关工作人员约一万一千人，中央分配总共应生产细粮一万六千五百担。即每人应生产细粮四百五十斤）。如保安队劳动力更多点，每人应生产多少？妇联劳动力少点，每人应生产多少？同时每伙食单位按其人数多少，应喂猪羊鸡鸭各多少？以便使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任务。延安有的提出每人种地两垧，各县亦应斟酌提出种地多少？每个工作人员均要去完成，不劳动的便不得食。

丙、要达到粮食菜蔬自给，关于耕牛、耕具、籽种等问题是要首先解决的。各机关除了有自己的牲口可以利用或与群众可以调剂外，还要边府帮助经费多少，可立即报告前来，以便酌量发给，以便立即买进耕牛、农具等。

丁、各伙食单位（如保安队、县府、县委）应组织一个生产委员会，受县级总生产委员会管理。这些生产委员会的主任，县府的应由二科长充当，县委的应由组织部长或秘书充当，保安队的应由指导员充当，使委员会真正是领导机关，真能指挥全体工作人员生产。

戊、最重要的是抓住时机，古语云：“一年之计在于春”，因为过了时便不能耕种，因此，望于接此通知后，立即准备好土地、耕具、籽种、肥料各条件，以便能按时犁地下种，并将准备情形报告边府。

（四）群众中的春耕运动，应立即组织各乡的春耕委员会，乡政府应立即分配农民的任务。要立即宣传今年增开荒地六十万亩，多锄草施肥以达到增加收成百分之二十。要具体分配各

区各乡应开多少荒地，或怎样增加肥料，增加锄草等工作，使每个农民均动员起来。

（五）各县接此通知后，不必等待县长或县委书记回县后再讨论，而是立即讨论执行办法，报告边府，以免失掉时机为要。

边 委 高 岗
边 府 高自立
边抗敌会 毛齐华
保安司令 王世泰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
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不出席国民 参政会问题给南方局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

南方局并伯渠^{〔1〕}：

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且发指令各地对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冀察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立，同时，前次参政会决议亦毫未见诸实行，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2〕}及国民党反省，因此不仅王明^{〔3〕}不出席并提议吴老^{〔4〕}因病亦不必出席。

中央书记处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刊印。

注 释

- 〔1〕 即林伯渠。
- 〔2〕 指蒋介石。
- 〔3〕 即陈绍禹。
- 〔4〕 即吴玉章。

朱德等关于整军计划 给各兵团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

各兵团首长并刘、徐、邓^[1]：

甲、估计全国战局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时，华北战局必然更加严重致艰苦。为着求得战胜将来的严重困难，保障与巩固根据地，以争取持久抗战之胜利，坚强部队的战斗力，用一切努力加强部队党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提高自觉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技术教育，切实建立军队中的一切制度，克服游击主义，使之正规化，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

乙、战斗力应予继续发展下去，拟分期整理，第一期以三个月为期，整理三十个团（共约十万人），区分如左：

A. 一一五师第一期整理五个团。

(子) 三四四旅之七、八、九三个团集中于高平、长子、长治、潞城，独、特两个团仍在原地发展。

(丑) 萧华、士桀^[2]各整理一个团，由该部自择适当地点。

(寅) 陈罗^[3]率六八六团及师直一部，护卫彭^[4]过路东，进入鲁西北，使六、五两团发展成旅，待机伸入皖北及华中。

B. 一二〇师第一期整理四个团，应整理之兵团及地点，由贺关^[5]自择。

C. 一二九师第一期整理九个团。

(子) 陈锡联旅应即充实三个团，位置于辽县西北，整理

并随时打击和顺敌之南犯企图。

(丑) 另以一旅(三个团)集中和顺以东适当地区整训,打击昔阳出扰之敌。

(寅) 其余三个团以策应东阳关及和顺作战之目的,似应集中松烟镇附近整训为宜。如顾其粮食,暂留路东整理亦可。

D. 聂^[6]区包括吕^[7]部整理九个团,整理地区、兵团由聂司令自择。

E. 山东张黎^[8]纵队第一期整理三个团,总部整理一个团。

丙、各整理兵团均按云阳改编时的编制表充实编制,惟团属步兵炮连逐渐补充,后方已修好三十门,拟增工兵连一,增侦察连一,全团武器应配足。

丁、战术应保持我军优良作风,及以步兵战斗条令为基准,其它一般基本教练(除纪律、内务条令外)概以国民党民国二十四年颁发之典范令为基准,各部必须按部队各种水准定出具体进展,并将进展计划到月终检查,随时送陈本部核考。

戊、在未整理之前之各兵团,应积极打击敌人,并利用一切时间进行教育。各地方武装应按总部以前规定,严格整理,严肃纪律。

己、各兵团首长、各级司令部、政治部,应以最大努力以一切方法为完成这一整训计划而斗争,此计划从三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朱彭左傅^[9]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

〔2〕即陈士榘。

〔3〕指陈光、罗荣桓。

〔4〕指彭德怀。

〔5〕指贺龙、关向应。

〔6〕指聂荣臻。

〔7〕指吕正操。

〔8〕指张经武、黎玉。

〔9〕指左权、傅钟。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华北各地 磨擦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敌人正在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冀察晋、晋东南等区，而我抗战阵线中，又因鹿沈^[1]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磨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因此共产党中央及八路军领导者提出下列主张，一面与蒋^[2]及各将领谈判，一面实行去做坚持自己之立场。

一、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决不能任鹿胡干，危害抗战。

二、冀察鲁三省为山西中原西北之屏障，若无八路军在三省英勇抗战收复失地，中原西北均危，山西现状亦不能保。为发展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而三省八路部队则决不能减少，否则只利于敌不利于我，且八路在三省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位于抗战之最前线，成绩昭著，功在国家，决不能听鹿钟麟等之昏乱报告，汪精卫之汉奸胡言，而自乱步骤，危害抗战。

三、敌后抗战形势证明建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省界

是错误的，因此，冀察晋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当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四、使敌后军政党民不一致，使指挥间不统一，限制排挤八路军等之政策是错误的，是对抗战有害的，长此下去势将引导失败，因此必须加以纠正。对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五、当敌人进攻我军血战之时，忽闻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实使抗战将士敌后民众闻之愤慨，影响甚大，决不能从。

六、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决不能枵腹作战。

七、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

中央书记处

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沈鸿烈。

〔2〕指蒋介石。

周恩来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自从武汉陷落后，中国内部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由十月三十一号蒋^[1]委员长告国民书，经过长沙会议，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直至开除汪精卫的决议，可说是走的向上发展的道路；自国民党五中全会蒋委员长发表了外交问题的谈话，国民党发表了不很彻底的宣言，秘密的发表了限制异党的通告，政治部发表了对各党派之态度及办法的训令，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蒋委员长关于抗战到底的解释（指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为抗战到底的限度），以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决议案中某些暗射的文句（如精神之改造部分关于思想问题的解释等），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的成立（训练已届三期，关于对付共产党的问题有专门的讲演与讨论，且训练的中心在对内而不在对外），可说是走的向下发展的道路。虽然这两个阶段，总的方向还是坚持抗战，并不能截然分开，不过在其发展的方向上却有区别，前者的重心是对外，后者的重心是对内；前者的眼光是向着敌人向着前线，向着沦陷区，而后者的眼光则是向着自己，向着中共，向着后方。在前一个阶段，国民党当局及前线将领，均在一心一意计划如何支持长期抗战，如何指导二期抗战，如何深入敌后与敌人展开全面战争，故当时的努力，重在加强抗战的力量，谨严对外的立场，巩固团结，肃清汉奸。在后一阶段亦即目前的阶段，国民党的当局及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

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磨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其所以显然分成这两个不同的阶段的原因，乃由于前一阶段，正当武汉陷落之后，始则敌情尚未分明，继则敌人诱降政策过于蠢笨，且重在联汪，国际援助正待努力，而内部情形亦正在动摇之际，蒋委员长又在前线，前线将士抗战意志极为坚强，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影响颇大，故一切发展多为向上的。其后，抗战进入二期，敌人重在“扫荡”敌后，正面进攻一时沉寂，国际形势渐趋好转，援助亦略有增加，内部之军政整理，表面似已就绪，中共与八路军之发展，在某些地区，使国民党发生妒嫉，而蒋委员长又正回到后方，党政军中顽固分子，加紧包围，故一时现象乃转入逆流。

这种逆流，现在并未停止，而且还正在发展。这种逆流的来源，不但是由于上述的一些客观原因，主要的还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于敌人，对于国际主要形势、对于自己，也就是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尚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思想，现在分述如下：

第一，他们以为敌人已经不行了，我们只要时间拖足了，就可等到胜利。这种过分估计敌人弱点的错觉，是由于他们只看到敌人的兵力不够，进攻困难，生产不足，财政不够，难于持久，国际孤立，内部矛盾，政策屡变，便以为敌人完全不行了。尤其是武汉陷落以后敌人的决战失败，诱降不成，全国厌战，急于想结束战争，而正面进攻又一时沉寂，即使抽兵进攻（如对南昌、枣阳），也是相机试探，进而复止，便更以为敌人实在不行了，和的条件可以减低，所争的只是面子，否则，只

有等着失败。他们根本不了解，敌人的困难虽多，但并非无办法克服；敌人的正面进攻，虽一时沉寂或时攻时止，但敌后“扫荡”却非常活跃。敌人二期作战的重心，就在于敌后的“扫荡”和经营，敌人想借此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中国，这就是他克服困难唯一和可能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某些当局忽视了这种严重性，故他们过分乐观，以为只要时间拖足，敌人就会垮台。过去他们过分的估计敌人的力量，以为无论如何都没有法子战胜敌人；现在又以为无论如何敌人总是不行了。这在根本上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估计及其发展，总没有正确的认识，总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其结果，与右倾的悲观主义将得出同样的结论，不会积极的去发展与培养自己的力量，去准备反攻，在实质上，将同归于失败。

第二，他们以为国际形势既已好转，东方的国际会议不久可以开成，新的“九国公约”会逼使日本让步，结束战争。因此，他们就将抗战胜利的结局，寄放在国际会议上，这是目前中国英美派的抗战外交，也可说是外交的抗战。假使说一期抗战初期，他们的法宝是押在国际的出兵上，那么二期抗战初期，他们的法宝，便押在国际的会议上。他们抗战的重心，总是依靠外援，不是自力更生，所以蒋委员长在五中全会关于外交问题的演说，指出“英美俄联合之必要与我外交之方式：中美为政治中心之外交，中俄为军事中心之外交，中英为经济交通之外交。”这个演说的意义，再加上他在其他方面的演说，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就是说：英国支持中国的财政机器和交通，苏联支持中国的军火，加上军事上对于日本的威胁，美国用政治力量来召集会议，逼使日本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东北四省留待苏日战争再来收回。（故蒋委员长有中俄外交可密切到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说话）。这个外交的算盘，自力更生的意义甚小，依靠于外援者甚多。现在就说日英会妥协，来

出卖中国，逼使中国就范，未免言之过早。不过，假使我们自己不努力不争气，而天天幻想会议，天天幻想敌人会降低条件，则总有一天英国会来做这个买卖，因为英国最怕的是中日直接讲和，出卖了英国在华的利益，倒不如他来做中间人。假如我们不自己努力，而专等会议，专等调停，最好也决达不到华盛顿会议的局面，最坏将近于慕尼黑会议之结局。

第三，他们对于国内问题的观察，以为在抗战大前提之下，政治统一了，军队指挥统一了，民族团结了，各党派表示拥护三民主义了，国民党内又开除了汪精卫，从此“四海之内，莫敢予毒”（即是全中国没有人再敢反对的意思），所剩的只是一个共产党问题了。既是敌人已经不行了，国际会议解决的前途已经在望了，那末，中国可以不必再用多大努力，便可得到最后胜利，于是成问题的，不在如何加紧团结，争取胜利，反而在胜利之后如何巩固政权了。自然，问题的中心，便向着共产党，不向着敌人，不向着国际的活动，不向着自己作战力量的增加，生产的提高，政治的改善，汉奸的肃清，而向着防共限共乃至反共了。

由于以上这三种错误的认识，故自国民党五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逆流的情形，是相当严重的，并存在着一种危机，内中事实可从下列各方面来看：

一、思想方面，渐渐的趋于复古，十三四年前戴季陶的思想又在复活。假使我们从南京陷落后的宣言直到开除汪精卫的决议为止，可看出一切中心都在对敌，都是前进的，都是革命的，而自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宣言开始，接着国民党参政会的宣言，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以及蒋委员长在党政训练班许多次的讲演，虽大前提，仍然在坚持抗战，然而问题的重心，已渐渐趋于对内，于是某些思想上的表现，乃为防制异党，是复古的，又可说是反共的。因为过去的重心在对敌，故思想上在

求同，以冀能包容兼收团结各方，共趋进步。现在的重心既转向对内，故思想乃在求异，以冀能独树一帜，有别于共党，有别于进步分子，于是乃趋于复古。讲哲学是唯心的，一切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被攻击，书籍被禁止，甚至用唯物史观眼光写的文章都被检查。讲政治是大学中庸之道，哀公问政之篇，于是民主政治，民族自决却被反对，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渐渐的受了剥夺。讲科学是“致知格物”之道，于是八卦哲学，五行物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道理却又一时兴起了。讲社会思想，以礼运大同篇为尚，于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乃被称为不合中国国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与马克思主义平分世界，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乃被禁止宣传（中苏文化刊物为政治部贺衷寒通令禁止前线阅读）。因为这一切思想正在走向复古之路，于是凡是中国的旧的思想，都被作为好的解释，凡是外国的进步思想，都被称为坏的不合国情的思想。我们并不反对中国好的思想，也不反对中国化、民族化，但这种平分世界的思想，只能是复古的、退步的，而且是反共的，只能使中国进步的群众、广大的青年离开国民党，离开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是破坏统一战线、妨碍抗战，决不能领导抗战抵于胜利。这是目前危机的主要因素。

二、行动方面，渐渐的趋于保守甚至反动。因为国民党的注意力，渐渐转向对内，思想又渐渐趋于复古，所以他的行动，便向着保守方面发展，许多进步的事情，不仅怕做，而且不让别人做，恐怕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故凡是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怀疑为共产党分子或者同情共产党分子，甚至有些年老的绅士，有时说两句公道的话，批评一点内政，都被怀疑为共产党张目（举例，如川康建设视察团团长之一张澜，是一个过去的省长，他批评了一些县政，地方上国民党部县长便联名告他反动，为共产党张目。如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抗战

中做了一些进步的工作，如主张保甲长民选，开保甲大会，组织游击队，训练青年，国民党部便攻击他思想成问题。这类事情，每省每地都有，真是举不胜举）。凡是进步的事情，都被怀疑有共产党从中推动，从中领导。国民党部或者复兴社的人，不是将这种事情弄垮了，便是将这事情弄到手里压着不做（举例，如许多抗战工作，本来是民众自动做起来的，党政当局不是下令把它取消，便是归并到他的领导之下，弄到无声无息）。凡是民众自动组织起来的团体，甚至抗战以前就有的团体，党政机关都用登记审查等等手续将其取消，所剩的只有党政机关能够绝对控制的团体，所以现在全国，只有那些有作为的战区司令长官或者省政府主席，才允许一些民众团体存在，而在国民党顽固派直接控制的省份，都看不到广大的民众团体，即有也是一些粉饰门面而无实际工作的团体。在重庆，这些表面的情形要好些，国民党顽固派现在最注意的是些进步的书店和报纸，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社等，他们最为嫉视，开始他们用书店对书店的办法，想开些书店，如青年书店，七七书店，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压倒他们，但因为他们的出版物落后者居多，不受群众欢迎，于是便以高压手段，封闭书店（如西安、汉中生活书店，便被封闭，其他也发生动摇）、进步的书报，在许多地方都受打击，许多书受检查不能出版，许多报借口转移登记证（任何地方的报纸都需向辽远的内政部请求登记，并得到批准后方能出版）而被取消。因此，现在出版界发生畸形的现象，愈在前线、愈在地方（如广西、浙江）、愈在敌后（如华北）、愈在沦陷区域（如上海），反能得到自由，而在中央及其直属的各省限制极严，许多文章均不能发表。

三、党派方面，一党思想仍在发展。国民党当局对限制共党，孤立共党，乃至反对共党的思想一贯存在，其总的目的，

是在企图取消共产党，虽明知其是不通，却仍在作此打算。过去公开的关于一党的争论，报纸已经揭载。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前，蒋曾几次向中央代表谈及一党问题，在五中全会上，蒋更公开的提出溶化共产党的问题，于是影响到国民党许多进步的将军也在谈论一个党的问题。他们在思想上硬以为共产党既然承认而且实行三民主义，便等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无存在之余地（他们常常强调与曲解孙中山与越飞的宣言：公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共产党的中心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们又以为三民主义既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国民党便可以拿三民主义的旗帜党化全国。他们更以为有两个党就必然有冲突，有两个不同领导的军队，就必然要打仗，所以他们认为，要么就是两党合并，要么就会两党火拼。他们还幻想共产党既然声明不在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发展，就必然可以做到限制乃至停止共产党发展。他们有了这些错误的想头，所以虽明知道取消共党不可能，但仍然是在进行许多错误的办法。防制异党活动的通告，是国民党中央所拟定的办法，拿到下级便发展成为捉拿暗杀共党，用兵压迫边区的办法。现在各地所表现的事实，大约有共产党特别是延安出版的书报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常被查禁；地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力强的地方，如被发现常为其借口非法活动，受到检查和逮捕，虽经中共代表保释，亦都不放，有些地方共产党员，如福建、江西、湖南、陕西常因为过去土地革命的仇恨，为人暗杀而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共产党员所参加或组织的团体一旦发现，不是团体被解散，便是共产党员甚至同情的人都被开除；上级共产党员，虽也有在军事机关做事，或参加某种委员会，某种官办团体的指导机关，但仅只陪伴作用毫无实权，就在国民参政会，稍微与政府有出入的提案，或批评，总难通过；他们在边

区采取封锁与分化的办法，一切出入边区的人常受检查，尤其青年学生更被扣留去受训练，他们派进边区的人，总是好做分化和收买的工作；在华北八路军及江南北新四军作战的地方，他们派去的党政及特务人员，总好做些造谣挑拨的报告，制造一些磨擦纠纷，以为难八路军与新四军，甚至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也常常禁止在报纸公开揭载。因为最后两种事实，是直接向边区和八路军进攻的，所以事态的发展，最近竟发生武装的冲突，他们的借口是说中共封锁边区如同铜墙铁壁，并以武力向外扩张，八路军无限制的扩张力量及活动地区而不接受约束，所以发生冲突。自然在边区及八路军所在地，统一战线的工作还做得不大好，诸待改善，八路军的发展活动，及施政情形，太没有打国民党的招呼，诚足以增加国民党某些借口，但基本上国民党是在要制造纠纷，不惜分化以限制和破坏共产党及八路军之发展。不但如此，他们更想用党化全国的手段，即是说要全中国人都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可以消灭第三种分子及中间分子，乃至同情共党分子的存在（他们公开对进步分子说，要就加入国民党，要就加入共产党，不容许在中间存在），另一方面，可以使共产党无发展之余地（即是说共产党既已声明不在国民党发展，则全国皆国民党，如守信义便不能再发展了）。他们却不懂得另一真理，全国皆党便等于全国无党，所剩的更只有一个共产党了。他们对其他党派的想法，认为一部分是无足轻重的，有共产党才有他们，并可以利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外围（如国家社会党，国家青年党等）另一部分则是共产党的外围而极力加以限制和打击，他们甚至于认为同情共产党的政治团体（如救国会）比共产党还可恨，势非消灭他们不可。对于一般社会上的进步分子，他们采取要求他们入党的办法，特别对救国会的分子公开的说，你们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就加入共产党，站在中间我

们是不放心的。对在军队及政府机关做事的人要他们一律入党，免被共党混入，如有坚持不入党的，则被开除职务。对一般青年，首先在抗战服务的团体中，采取一律加入青年团的办法，不加入的值得怀疑而被开除，有些思想进步的分子，在这些团体中连加入青年团也不要便被撤消工作，对于分化和破坏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办法，他们通常的采用派遣内线打入共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内部以取得信用和位置，因为他们收买的是青年居多，所以常常发生向共党及八路军自首的现象。武装冲突，现在是闹得很严重了。他们对边区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省政府委的县长带保安队及特务机关人员，在内部捣乱造成冲突，外面派队增援，来借此缩小边区（他们的口号是收复边区）；他们在八路军作战的地区，故意培养与八路军对立的部队，与八路军争夺地方武装，对八路军领导的民众团体尽量破坏，对八路军委任的或民选的县长多予撤职，甚至利用土匪，大刀会，收买投机的伪军与八路军捣乱，以至发生武装冲突，对新四军因其作战地区有限，且受敌情限制，遂采取监视的办法或者派与新四军对立的部队，驻扎在新四军防地之后，或者派遣党政特务人员在新四军作战地区，限制与监视新四军活动。他们现在的方针：第一，是不许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参加和掌握地方政权（如八路军参加河北省政府，表示迟疑），想用政权来限制军权，即是说，使八路军、新四军便不能自由筹款，便不能扩充；第二，是不许八路军、新四军自由在敌后活动（如八路军在山东沦陷区域的活动和发展，军事委员会便命令他们退出，新四军在豫东的活动，军事委员会不批准，甚至河北已为主力，军事委员会还有人要他退回山西，新四军在江南作战区，完全束缚在芜湖、南京、镇江一个敌人所占领的窄狭地区上，纵不到三四十公里，横不到一百五十公里，宁可使太湖以东沦陷地区空着，而不容许他向东发展），以限制他

发展，以缩小他的影响。也有人主张将察热两省交给八路军而换回河北，当然更会有人想，最好八路军开往东三省，岂不更加省事；第三，是不愿意边区取得合法名义（边区事实早已存在，条件也早已讲好，其所以迁延不决，不予承认者，即是想拖到边区让步，或者等到敌人攻入陕西，以不了了之），扩大影响；第四，除边区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外，根本不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尤其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不得已时，他只承认某些有地位的有历史的中共领导分子，而且只容许他们在中央活动，不容许他们在地方上工作（如各省参议会，便不容许任何一个中共代表参加），想以此来缩小中共的发展范围，甚至消灭他的某些地方组织；第五，在下层，在背后在军队中在机关中，公开的做反对共产党的宣传和限制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暗中利用过去内战中反对中共的分子，尤其是中共叛徒及托派的分子，进行反共的宣传和活动。他们现行的这种方针，是由于认识现时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是不会消灭的，所以先从限制防备孤立，反对和破坏入手，从军权与政权分开入手，从地区的限制入手，从打击所谓“不合法”“不听命令”的行动入手。自然，在这样的方针之下，有些反革命派及顽固分子，已经在发展着“不惜武力解决”的思想，因为他们认为抗战是无前途的，失败是日本的，胜利是共产党的，所以回复到“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思想来了。不过这还是少数，而且多半是汪精卫之流的思想。然而因为国民党只反对汪精卫个人，不反对汪精卫之流的活动，所以具有这类思想的人很容易与汪派结合，得以在抗战阵线之内进行挑拨，成其为目前危机之一。

四、国民党本身方面，有着进步的要求，但求进步的方法却不得其道。国民党自抗战后，经过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及五中全会，都有着一种要求进步的趋势，在去年临时代表大会，正

处在第一期抗战的坚持时期，注意力重在对外，故当时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召集国民参政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想在领导上、组织上为国民党找一进步的出路，但同时并未放弃取消共产党的观念，而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包容国共两党合为一体。等到去秋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提出进一步的合作办法后，影响颇多，国民党开始迟疑不决，以后抗战进入第二期，因其对于敌情，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内部问题，有了如上的错误认识，故在其五中全会便想从与共产党竞赛及限制、防备、反对与分化共产党之两方面的办法，来求国民党的进步，结果，不论在下在上，多数实行起来，无不以后一办法来找出路。国民党的一位老同志说得好：有些地方国民党部所以尽量制造磨擦，不外两种原因，一种是卸责，一种是讨好。因为要卸责，所以诱过于国共磨擦或共产党捣乱，致无法进步。因为要讨好于某些喜欢听信磨擦报告的人，所以故意制造磨擦纠纷，以便邀功。卸责、讨好的人愈多，求进步的人愈少，所谓与共产党竞赛的指导，便变成与共产党造磨擦了，对立了，甚至火拼了。他们现在实施的办法，在思想上不容许中共党员宣传和解释三民主义，特别是禁止共产党编辑的三民主义书籍，因此，他们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便更加复古，更加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组织上他们想大量发展党员及青年团员，但他们的办法，首先对他们认为有共产嫌疑的分子进攻，对进步分子进攻，对青年群众强迫加入，而他们的党内生活又毫无民主，毫无自由，青年团因更实行特务纪律，党与团之间又互相攻击，党部机关等于衙门，青年团部类似军营，于是社会上好的成分、进步分子总难得有大批加入，他们因此更怀疑，实质上更诱过于共产党阻碍他们发展，而首先以破坏、分化甚至消灭共产党，为他们发展党与青年团的路线了。在干部培养上，他们尽力想改造他们老的干部，培养新的干部，但在实行起来，常

常适得其反。譬如改造老的干部，他们现在正努力办党政训练班，调各地高级党政干部来重庆训练，蒋委员长亲至参加，但上对下骂多于教，教者多敷衍塞责，其最起劲之课，是为防制异党活动，受教者在讨论生活中，亦常集中于对付异党问题，因此善于卸责善于讨好之流，便以攻击共党为能事，而党与青年团亦从中争夺干部，于是洁身自好的进步分子，反倒采取消极态度，训练的成绩也就可想而知。又如培养新干部，他们办了许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收容青年原是好事，但因为他们要与陕北抗大、陕公竞争，竟不惜采取扣留出入陕北的青年，强迫施行训练，有些地方教员的程度极差，训练的方法极旧，因此都不能使青年满意。再如在南岳会议所决定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初办起来，系汤恩伯将军与八路军叶剑英同志合作，训练方法、内容与精神都还好，颇得学生拥护，但国民党及青年团怕这群学生太接近八路军的办法，受共产党的影响，不到一期完毕，便将汤将军调回，改变训练作风。总之，蒋委员长及其左右分子，迫切希望国民党进步，但其这种相互矛盾的办法，不仅不能够与共产党比赛进步，而且只有日益增加磨擦，制造纠纷，以便汪精卫派的利用。许多国民党的元老，进步将军，及社会上有见识的人，都以为国民党只要进步，对共产党便不足怕，纠纷便能避免，重心还在对外，但这种见解，还未为国民党大多数当局所采纳，而且影响并不大。

五、军事方面，南岳会议的决定并未切实执行。这半年来，敌人“扫荡”敌后重于正面进攻，但我们却并未运用二分之一的人力、兵力、财力去争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许多得力的将领，如张发奎、汤恩伯、孙连仲愿往敌后游击，都不得允许，而派去的许多部队，不是没有在敌后作战决心，便是不善游击战，与群众关系不好，甚至专门派去监视八路军、新四军，制造磨擦的同时，在敌后作战，不仅八路军、新四军受着

限制，职权不能统一，便是国民党的军队，在军政的指挥上也常常不能统一，甚至还受党部的牵制，而国民党与青年团所各自领导的武装，也常有争夺火拼的事。因此，敌人在半年来的“扫荡”，便有相当的局部的收获，敌后的游击根据地，便不能到处建立。假使中央多派得力部队深入敌后或信任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展，则敌人的“扫荡”计划必会更加失败。半年来正面的战斗比较沉寂，于是许多部队便不免发生懈怠，南昌的迅速失守，便是这个懈怠的结果，其实敌人今天的重心在“扫荡”敌后，正面进攻的部队极少且极不够，只要部署适当作战努力，敌人的进攻是很难深入的，西北之渡河未成，随县、枣阳之进而复退，长沙始终未敢进入，便是明证。因为正面进攻的比较沉寂，新的力量的准备也很松懈：第一，兵役的动员，因为方法不好，工作不努力，连补整的部队始终不能足数；第二，新的力量的培养不是依照部队的历史条件，战斗力，战功来选择几个中坚部队，求其近代化、机械化，而是毫无根底的成立几个近代化的师，这不仅不能用于反攻，就连担任普通战斗任务也不见得会好；第三，后方的训练工作，也做得很差，这些近代化部队的军官，多半是没有参加过战斗的，补充部队的军官，更有许多是落伍的军人；第四，军官学校的教育也很差，数目不够前方的需要，教育不合抗战的实际，生活不能吃苦。因此，作战部队军官的补充，多靠士兵提升，教育极少，指挥的情形也就更差。这些都影响长期抗战尤其是反攻的准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敌后的部队，遂不免于磨擦，在正面的部队，遂不免于懈怠，在训练中的部队，遂更难有成就，而待遇不公，方法不妥，尤其是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限制（八路军担当华北游击战争的主干，恢复了河北许多地区及山东的一部，正规部队扩大到十五六万，而经费仍然是三师之数；新四军担任江南北游击战争，任务繁重，数目扩大，

但经费很少增加，地区极受限制等），对于长期抗战的坚持，最后胜利的争取，必然会发生不好的结果。

六、政权方面，国民党仍坚持其以党治国的思想。他对地方政权，只要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服从中央的命令，便加以委任，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参加河北政权的事情，他们只承认某些事实，而不愿意加以合法的保障，他的办法是要边区八路军在绝对服从中央的形式下，将边区改为专员区，委任几个共产党员参加河北的政府，即是说他虽承认边区的各县，但不承认边区的统一，他想把边区分散为各个专员区，便于他的统治，在河北他只允许个别的共产党员参加政府，而不愿承认共产党合法的加入政府。关于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虽有共产党员参加，虽有救国会分子及许多仗义执言的人，但趋向于民主及与政府出入的提案，总难通过（国民党员占多数）。在各省参议会的职权比参政会更小，而成分则旧的官绅居多，进步分子甚少，共产党提出的名单，统被拒绝，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愿意共产党在各省取得公开合法地位。民主政治在全国范围来说，还受着极大的障碍，但在某些进步的省份，如山西、浙江、广西，已有着保民大会，保甲长民选，及部分的地方民意机关（山西）的建立，在战区动员的组织比较发展，他们能过问局部的地方政治。在这些地方，共产党员有不少的参加，但还不能以公开的面目出现。不过无论怎样，中国今天的政治，还是军治大于民治，这是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所以国民党要以政权限制共产党军队的发展，明知其困难，其解决之道，便想以绝对服从命令，听调动来作补充。

七、外交方面，总的路线是英美苏法，但对德国仍存一些幻想。对苏外交常常受着英美尤其是英国外交的影响。国民党自己队伍的人都在说，对苏是将信将疑，譬如最近因为空军义勇队几位退伍的苏联同志，由重庆经甘肃到西安过新疆，西安

方面竟造谣苏联有三辆卡车满载军火，经西安到延安，姓名就是退伍同志的姓名。报告上来，居然派人调查。中苏文化协会出版的中苏文化，被禁止在前线阅读（已见前），许多负责人在讲演中，对苏联总有微辞，他们最喜欢挑剔苏联物质上的帮助，甚至常常说德国的帮助还好过苏联（他们竟瞎说德国可以以货易货，而苏联要现款交易）。对英常常采取流氓办法，公开说英国再不帮忙，中国便要倒在苏联怀里，以威吓之。对美国幻想甚大，希望再来一个新的太平洋会议，而不认识日美的经济关系与美国的内部困难。对德国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党政军负责的地位替他说话，称道德国好处，甚至故意说德苏可以修好，似乎中国不妨联德。

总结以上的各方面严重现象，其发生的原因，在思想上，由于对整个抗战认识的错误，已如上述，同时在组织方面也还有内在的根源，在今天党政军的国民党当局，情形极为复杂：第一，汪精卫的残留分子还不少潜伏在中央及某些战区当中；第二，国民党部 CC 派的主脑，其对日妥协与反共的思想，异常浓厚；第三，黄埔复兴系与现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干，其反苏反共尤其是反民主的思想日加发展；第四，国民党的上级将军，进步的不很多，庸懦而糊涂的占不少数目；第五，政学系一类的新官僚，他们重在做官；第六，欧美派接近英美的多幻想太平洋会议会能成功，而为德意宣传亦大有人；第七，银行系图私利的重于谋国，不论谁是在台上，营利图私，都放在第一位，真正为国家打算的不多见；第八，国民党的元老中，无兵权的将军中，尚有不少主持正义及民族意识甚强的人，但他们没有干部，没有群众，CC 复兴也不让他们掌握实权，接近群众，因此他们说话也不发生效力，使成一个孤君寡人；第九，国民党下级群众在党政军中占不少的数目，他们一般的是不满意现状，但一部分意志薄弱，甘于堕落，一部分年轻气

盛，愤而脱离国民党，但这还是少数，而大多数则唯唯诺诺，随波逐流，或牢骚烦闷，消极气馁，其中真能奋发有为决心改造国民党的更居少数，即有常常因受打击，走不通而发生悲观；第十，还有些地方的军政领袖，在抗战中颇能有些进步，有些作为，并能团结一部分群众，但国民党中央便不看他们是自己的人，认为他们是地方派别；第十一，最后还有许多共产党的叛徒，尤其是托派老分子，钻在国民党内渐渐的窃取高位，他们的思想行为无疑的是反苏反共，尤其是托派分子，更会与日寇汉奸里应外合的进行挑拨。国民党在上述这样基础上，虽然抗战需要他们进步，他们的领袖也确想进步，而客观的条件，主观的方法，很难使他们有很好的进步，反而向着逆流发展。

自然整个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党政军在各方面的进步（因为这个报告中心在说磨擦纠纷问题，所以不再详述进步）还是有的，但这种进步还赶不上客观的需要，因此，才使上述的危机增长。总结一句，整个的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表面上还需要团结的，这是与汪精卫的投降路线截然两途，但是抗战中妥协性存在的，团结中反共的思想和行动是发展的，这是逆流，这是日寇及汪精卫托派之流正好利用的基础，可以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朱德、彭德怀关于克服困难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给贺龙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贺、关、吕、程、刘、徐、邓、聂、萧克、郭、张、黎、张、张、杨、黄、陈、林、倪、毛、周^[1]：

（甲）敌情见左^[2]参谋长通报。判断敌在青纱帐前企图“扫荡”河北及山东平原地带，巩固交通线，沿铁道筑垒，扩张其占领区，巩固城池大镇与修复公路，组织伪军及伪政权，然后相机以主力进攻山岳地带，摧毁我根据地。

（乙）我们必须以最大毅力克服困难，坚持华北持久抗战，不断粉碎敌人之围攻、各个击破，从艰苦战斗的胜利中来取得全国人民的热诚爱戴与民族解放的核心作用，并以坚持河北、山东平原地带之游击战，巩固山岳地带之根据地，以围攻与反围攻配合起来粉碎敌之围攻合击，在统一战线原则下争取军民亲密结合与持久以游击战为主，削弱疲惫敌人，争取收复平原已失城市，为我坚持华北战争之基本指导原则。

（丙）立即健全冀中、冀南各军分区及政府机关之领导，在组织上必须短小精干，适合游击战争环境，健全与加强各军分区之各基干游击队。必须由刘、徐、邓负责以各种方式建立与健全鲁西北之军分区，待陈、罗^[3]到后移交。鲁东、鲁中具体计划由郭、张、黎自定。

（丁）根据总部七日电，整军计划切实执行，造成巩固山

岳地带根据地之基干兵团，使敌进攻山岳地带时受到严重打击，为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以及前途计，实为争取战略主动之重要一着。依目前情况，被整训之兵团应移平汉铁道以西，均靠山地进行整训。

（戊）任贺龙为冀中总指挥，吕正操副，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统一冀中指挥，但仍各兼原职，直属总部直接指挥；第三纵队及地方游击队之行政，仍属聂司令。

（己）平汉路东之重资材，尤其冀中兵工厂及器材，设法搬运到路西山地。

（庚）晋察冀区须大量储粮食、医药、交通器材及其他军用品，准备贺、吕两部及本身之供给。

（辛）在路东之贺、吕两部及一二九师主力，在不得已时应移至路西，贺、刘、吕指挥机关，在某种情况下亦应移至路西指挥。

北方局、集政均另有指示，望注意接收。

朱、彭

十一日十六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聂荣臻、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张宗逊、张平化、杨得志、黄克诚、陈士榘、林枫、倪志亮、毛泽东、周恩来。

〔2〕指左权。

〔3〕指陈光、罗荣桓。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加强 干部教育的训令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各兵团政治首长并总政毛、王、谭^{〔1〕}：

一、华北战局转入新阶段，为了坚持华北抗战，克服困难，巩固与壮大自己，准备反攻，必须努力提高现有干部（工农干部变为工农知识分子），创造大量新干部，加强干部教育应是政治工作人员中心任务之一。

二、过去的干部教育制度虽有成绩，但已不够，必须逐渐求得干部教育制度的彻底革新。

三、一方面立即实行开办干部轮番训练班的制度，必须切实求得六中全会决议的深入教育；另一方面立即训练大批干部教育人才，以求得干部教育制度之彻底革新。

四、干部教育制度应达到由以营（团直属队）为单位，设立教员一人，营教导员（团政委）领导之下。甲、连排干部以营为单位集中上课，增加上课的次数至每周三次，并进行讨论；乙、增加干部学习科目，包括基本理论、中国问题、马列主义、日本研究、党与政治工作、数学与自然科学；丙、首先在被整理的部队达到此种要求，拟供给大批教员，责成师、旅政治部、处立即开办教员训练班，将来派往营、团担任教育干部之责任。各师首先训练三十至五十人（党政区包括军区一百人）。

学员资格：甲、党员；乙、部队工作半年以上，忠实努力；丙、中学程度或相当文化程度，可在现有教育干部、抗大一、二期毕业学生出身中选拔，训练期间三个月，训练办法采取看书研究及讨论；丁、科目：民族统一战线及新阶段、中国革命史及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概论、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党建、政工；戊、开办此项训练班，何日开办，人数多少，望报告我们。

五、旅以上的干部组织学习小组，责成《前线》杂志注意帮助高级干部的学习。

六、以上训练要求政治机关计划执行及时报告我们。

集 政

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王稼祥、谭政。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 妇女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

为了开展全国各地的妇女工作，中央有如下决定：

一、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决消灭党的一切组织与党员中对于妇女及妇女运动所存在的那种陈旧的、庸俗的及中世纪的态度各种残余，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

二、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的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其中的工作人员，不应经常调动，以造成真正熟悉妇女运动的干部，使妇女运动的经验能够不断的积蓄起来。

三、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起来担任妇女工作，鼓励她们，使她们对于妇女工作发生兴趣，相信妇女自己的力量，帮助她们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并用同志的态度耐心的纠正她们的弱点与可能发生的错误。

四、注意于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

五、很好的根据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关于“三八妇女节”及一般妇女工作的指示，准备将要到来的“三八节”工作及切

实开展一般的妇女工作。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出版的
《解放》第六十六期刊印。

朱德、左权关于抗击日军“扫荡” 晋东南的部署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彭并报毛、王、滕^{〔1〕}：

甲、敌陷和顺后，南面敌续陷翼城，现和顺有敌千余，继续大批屯积粮弹。临汾敌十八日进陷浮山、洪洞、赵城。敌前、昨两日，分三路东犯，已占苏堡，有犯安泽模样，灵石敌亦不断东犯，已占静升。据卫^{〔2〕}通电，敌二十师团陆续向横岭关、伯马集结。平汉南段敌向安阳集结。

乙、敌“扫荡”华北作战，除晋东南、晋西北外，均已进行“扫荡”，虽未达成其目的，但可告一段落。目前将转向晋东南，但以晋东南地区庞大，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我军、民、政各种工作之进步，敌可能首先采取局部的逐渐分割、逐渐缩小围攻圈等方法。现和顺、翼城、浮山已失，安泽危险，沁县、沁水、辽县、晋城、林县可能成为敌之最近攻夺目标。因此反对敌对晋东南地域之进攻，已成为今日的最具体的任务与工作。

丙、为确保山岳地带，为利用晋东南各种有利条件，求得适时的给进犯之敌人以打击，就必须立即有确实的准备。除晋东南我军及高武决死队等，仍以现有姿势，一方面整理，一方面抗击进犯之敌，并呈报蒋、程、阎^{〔3〕}、卫，联络晋部、卫部各军有力增援外，我还必须：

（1）一二九师应整理之各部应迅速西移整理，以便不失时机打击敌人。

（2）冀中、冀南继续坚持作战拖住敌人外，并拟各以有力部队向平汉线活动威胁，以有力部队向正太路及其以南行动，同蒲路以西部队及时策应作战。

各节请考虑即行。

朱、左

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

〔2〕指卫立煌。

〔3〕指蒋介石、程潜、阎锡山。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党 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中央有下列意见：

(一) 根据蒋介石的开幕词，五中全会宣言及各方所得材料可以看出：

(甲) 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为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同时并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失望情绪以及企图使国民党本身进步发展与强化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这些都是五中全会主要的与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加以赞助和发扬。

(乙) 据各方消息，蒋在五中全会前后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要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同时，五中全会的公开文件，虽未明白表示这类意见，但其实质上亦包含有抗战最高目的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况，及不依靠民众而依靠外援，对民权主义实行，一无表示，蒋在参政会演说则公开反对民主政治，这都是不正确的。这些缺点错误的根源，基本上是由于蒋和资产阶级对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历来就与我们有不同的路线，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

促成。

（二）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对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应该赞助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对其缺点错误，则应根据我党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口头上文字上的批评解释工作，目的是要以我们和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彻底抗战路线，来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抗战路线。在批评时，一般的不作为正面批评五中全会及蒋意见的方式提出，而作为一般地解释此等问题的方式提出。批评态度应该婉转说理，积极严肃，以争取全国大多数同情为主。

（三）此指示只用口头传达不得油印发下。

中央书记处

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毛 泽 东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单是空唤是不行的，一民主义也是不行的。空唤无裨于实际，敌人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稍有良心者何忍至今徒存空唤？单单军事抗战，算是实行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没有决心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使与抗战相配合，要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遗嘱上面，说他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欲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必须实行两大革命原则。就是：（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岂有国难严重到了今日的程度，还可以不实行孙先生的临终训示？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蒋^[1]委员长与国民政府号召实行于上，全国民众同声拥护于下，却有不少人员对于这个纲领讳莫如深，不但讳言之，而且阻挠之。对于这个纲领中实行民权主义的项目，例如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不是实行者奖，而是实行者罚，

* 这是毛泽东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的序。

这种状态是非常离奇的，是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的。晋察冀边区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值得奖励的。过去汪精卫辈开口闭口八路军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则在四圈八圈麻将世界里大打其“游击”，真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晋察冀边区里面没有汪精卫党徒，也没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蒋委员长曾经着重称赞华北的战争，不是没有原因的。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于其出版之始，乐为序之。

毛 泽 东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工作和青年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各集团政治机关：

一、据报平遥、介休、石家庄一带敌兵均称八路军真不杀俘虏，身上多藏有我军通行证备用。

二、据辽县战斗俘虏敌兵供称：该部队非常疲劳，运输给养极困难，最怕我游击队，士气低落，军纪不振至发生自杀。

三、依以上材料，对敌宣传必须特别加紧，大量制发对敌宣传品，利用群众设法输送到敌中去，并将得材料随时报告。

四、根据总政在八路军政工会上讨论提出，青年工作是在党政机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时检查过去青委会组织又过于重设，而实际上工作进行仍然是经过政治机关及青工部门去推动领导执行的，青委会是青工集中意见与讨论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不是工作的执行者，主要由青年部门负责。因此，决定将营一级及旅以上各级青委会取消。

五、但须适合目前需要与健全青年工作，在团为单位行动较多的情况下，决定仍保留团一级的青委会，使团青

委成为青年工作的基本执行者，责成各政治机关直接加强其领导。

集 总 政

二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八路军·文献》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对鹿钟麟政策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

发前总、重庆、中原、山东、三个师^[1]、聂区^[2]、桂林、新四军：

今后对鹿钟麟政策我们有以下意见：

(一) 对各方说明与总结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3]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撤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

(二) 国民党方面对同情我们的人，时常采取孤立与消灭其力量的政策，而与我磨擦最力之分子，则提高其地位，增厚其力量，因此我们对策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鹿钟麟这个临阵脱逃分子，还须继续加以打击，以压低磨擦气焰，使存心与我磨擦者有所警戒。

(三) 对人解释此问题时须多举事实，须采取严肃坚决和

沉痛之态度。

中央书记处

三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

〔2〕指晋察冀军区。

〔3〕指彭德怀。

毛泽东等关于改进 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

朱彭左傅^[1]并告一分校何周^[2]：

关于抗大分校之教育计划，应当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生活，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以及重新配备教学方法，训练教育干部，使之更加适合于新的教育对象。这些改变的意见，我们在原则上均同意，惟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再提供下面意见：

（一）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党的建设，只作党内教育，一般的学生只讲共产党问题。国际现势亦不必教，为着重于临时的时事教育。

（二）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每周上课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六次。

（三）因此军事教育内容似乎太多，如教育时间仍为八个月，则除以连以下的步兵战术及游击战术为主要内容外，只能教一点战略学（以《论持久战》为教本）及下级干部所必须具

备之筑城、兵器、地形的知识。交通、军制、马学、卫生学、典范令，虽亦有其重要性，但以时间所限，恐仍以不教为宜。

（四）学生将来主要在八路军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教育起见，党的支部应当公开，并实行党日制。

（五）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

上述意见尚希你们再加考虑。

并发聂彭^{〔3〕}及二分校。

毛 王 滕 罗^{〔4〕}

三月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左权、傅钟。

〔2〕指何长工、周纯全。

〔3〕指聂荣臻、彭真。

〔4〕指王稼祥、滕代远、罗瑞卿。

关于新四军进入江南第一年 抗战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叶挺 项英

第一、我军进入江南地区作战时期

一、在未进入江南地区（去年六月以前），敌军主要的据守城市如芜湖、南京、江宁、句容、溧阳、天王寺、丹阳、宣城、金坛、镇江、武进等地，除京芜、镇常有来往之敌外，其余各城市常驻有部队很少，多则不过五百余。民气消沉，维持会林立，加之地方武装如夏开才、朱永祥、余宗陈等部，不仅无积极行动，反借抗战为名，与地方火并，敲榨勒索，敛财殃民，形成土匪倾向；而地方人士在敌寇威迫与“游击队”滋扰之下，不了解中央国策，对抗战失望，仅仅组织自卫，专力防匪，对敌寇则采取敷衍妥协办法。因此，敌军此时能三五成群下乡焚杀，任意掠夺，奸淫掠抢，无所忌惮。

二、自我军进入京、镇、当、芜地区后，首先宣布委座及中央政府抗战国策，并多量散发委座迭次对抗战时局宣言，引起广大居民的兴奋和欢迎，尤以委座告沦陷区同胞书散发最广，影响最大，人民中始知抗战正在进展，日寇力量日益削弱，而中央政府顾念沦陷区同胞之德义普遍得有明确认识。同

* 这是叶挺、项英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的作战总结。

时本军坚决以积极动作进袭敌军，争取战斗胜利与宣传作实际配合。经过卫岗、新塘、新丰、句容、高资、下蜀、江宁车站、鸡笼山、永安桥、薛镇等地战斗，予敌巨创，威逼京、镇，敌胆为寒。此时正配合着我国军主力在徐州及沿江战线上的活动，敌寇在江南日夕数警，更使江南民气极大兴奋，抗战决心增强，比如七、八两月间，曾动员十七万居民进行破坏交通，江南抗战从消沉中有了很大开展。这是本军进入江南地区后的概况。

第二、敌情

一、敌人采取之策略

（一）第一时期，为我军初进入战区至九月中旬。因我军积极进袭，在卫岗、句容、新丰、下蜀、高资、东昌街、江宁车站、鸡笼山、永安桥、薛镇等战斗，斩获甚众，敌受严重打击。尤以本军一部于丹阳珥陵地带配合友军七十九军，将敌人下乡部队二百余人全部歼灭，于战局转变有决定作用。于是敌寇变更办法，遂处处设防，阻塞交通。复因伪组织纷崩瓦解，民众抗战情绪奋发，敌遂用尽一切方法，集结兵力巡击我军，冀达到驱逐我军企图，但均归失败。

（二）第二时期，为九月至十一月底。当时武汉吃紧，京芜、京沪国道为敌交通枢纽，受我军不断胜利与威胁，敌不得不抽兵增援，进行进攻防御，将所有市镇交通要道，均分兵驻守，深沟高垒，以主力采取分进合击办法，前后战斗共二十余次，均为我击败，敌之企图，仍均失败。

（三）第三时期，为从十二月份起至现在。敌新筑公路，建立星罗棋布之据点，除城市集中构有较顽固之据点外，并在交通道五里至十里左右树立碉垒式据点，欺我火力微弱，企图缩小我军活动范围，分区“扫荡”并进行政治欺骗，分化收买，引诱利用，以达到分裂我民心，破坏我军影响等阴谋。

二、敌人战术优点

(一) 敌后区交通便利，无殊天罗地网，运动增援迅速且能隐蔽，协同动作与时间配合均很适当。

(二) 敌军班、排下级干部强，战斗动作熟练，不论任何环境，均沉着，善于掌握部队。

(三) 敌军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伪装隐蔽前进，组织火力，射击比较准确。

(四) 敌兵善于游泳。

(五) 敌人运用战术很机动与灵活，善能抓着我军弱点，如受我军打击时，立即迅速改变其战术方法。

(六) 善于利用村落战斗。

(七) 敌军由于武士道的教育，受军阀欺骗宣传，养成战斗顽强性，死不缴枪，但现在在程度上降低了。

(八) 敌善于研究我军政治工作。对策上，以一切方法破坏与降低中国抗战力量，常以金钱收买汉奸，动摇民心，欺骗民众，收买土匪、两面派，以华制华。此乃由军事进攻改以政治进攻办法。

(九) 敌人通讯联络迅速准确。

三、敌人所采运之战术

(一) 强化其星罗棋布之据点，修复与新铺公路，依赖其据点、公路，以缩小我军活动范围并实行分区“扫荡”计划。后利用交通迅速组织流动巡查队，人数一中队以上，梭巡各支点间，昼夜不息。发现我军袭击时，各据点分途增援合击。

(二) 采取分进合击，夜行晓袭。善能遵守时刻，协同动作（分进合击，其中有两路主力，但敌后是空虚的），若某路发现我军，则其他各路均转向这一目标前进。

(三) 敌常采轻装掩进、伪装远袭。有时伪装撤退，以埋伏打击我军。

（四）敌常利用河道运动，避大道走小路，取曲线式前进，进行迂回包围。

（五）敌常于树上、房顶放哨，在公路桥梁处处设伏，企图预防与伏击我运动和破坏桥梁、公路之部队。有时夜间转移宿舍，使我袭击部队落空，并侧击我军。

（六）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欺骗我军。

（七）敌与我军遭遇时就地伏下，然后以火力摧毁我军，再掩护其前进。

（八）敌通讯联络法，夜间以红绿信号弹，战时以旗语联络，班、排则以记号指挥，每据点内设有小无线电机，联络便易。

（九）敌在铁道、公路交通线上，除以据点维护外，每次虽被我军破坏甚广，但因地区开阔平坦，可改路旁田中驶行并以保甲制分段强迫担保护修，敌军随带铁板、帆布，以为通过破坏桥梁之需。

（十）沿江，则以兵舰、铁甲汽船上下来往巡查；内河水浅，则以小划子加以摩托驶行便捷。

四、敌人据点

敌人据点构造法，利用巩固之独立民房，略加修葺改造成功。墙凿枪眼，外围铁丝网；房顶筑机关枪掩体，设有瞭望哨。夜晚扃闭门户，另辟地道与屋外交通。地道出入口另有三道散兵壕相贯通，并设有掩盖物。散兵壕外遍布铁丝网，上系煤油箱及铜铃，以备我军接近时报警。据点侧防之散兵壕，通常距其据点约五十米达，并附交通壕，担任交通联络。每一据点通常容四十至百人，常设有两三班人守护。守兵与居民隔开驻扎，在情况紧张时，夜间三五成群，分散睡觉。据点内设有探照灯。

第三、我军活动地区苏皖边之地形交通条件

一、地区狭小。本军活动地区数经变更，现缩定为南陵、繁昌、芜湖、当涂、南京、江宁、句容、镇江、丹阳等九县。北临长江，南向则以县之界线为限，全部区域成一半月形平面。

二、地势平坦少山。自芜湖东南与东北，南京以南，句容、镇江、丹阳间，全属开阔平原，平坦无涯。此外，虽有少数峦山，如小丹阳东之横山，当涂东北之太平山、鸡笼山、夜合山，句容东南之茅山，句容以北之北山等，但均面积局促，半为孤山，咸为濯濯，土壤光滑，毫无树木可资掩蔽。山麓、山顶之大庙宇，亦已为敌焚毁。

三、河川多并成水网。如芜湖东北、东南，小丹阳之南大官圩，南陵以北及青弋江，皆成水网。水深泥底，无法徒涉，水面超过陆地为七八尺，全赖土堤防护。小丹阳之石臼湖水患时兴，有淹没小丹阳附近波及其西南之虞。

四、公路星罗棋布，不怕破坏，并强迫附近人民作报告，昼夜组织巡查队，修复极易。

五、据点林立，各据点距离大约五里至十里，并在据点空隙间常有伪军驻扎与活动。

六、铁路两侧肃清民房，防我潜伏破坏。

七、水道上利用木船、汽船、橡皮划子运动。

八、森林缺少，且乡村多狗，我军运动时，犬吠不息。

九、惟村落多可借之，便运动与隐蔽。

第四、我军战斗之缴获

自进入战区后，于六月十八日卫岗战斗起至一月份止，共计大小战斗二百九十九次，总获枪支一千九百二十四支。

第五、我军所采之战术

一、在第一时期，我军乘敌不知我军性能并不及预防，疏忽无备，遂采取积极进袭，伏击敌人，成绩颇大。尤以痛击汉

奸伪组织，准其自新，更发动与提高民众抗战热忱。

二、在第二时期，针对敌人战术之变更，我军所采战术：

（一）分途派得力部队配合地方民众，袭扰与彻底破坏公路、铁道、桥梁，尤以京镇、京芜、京杭等干线，阻敌交通运输，迟滞敌之计划，并得配合与策应我军主力保卫武汉任务。

（二）伏击敌运动部队与车辆，袭击敌伪薄弱点，以战斗胜利调动、吸引、疲惫与分散敌人。

（三）动员地方民众配合，粉碎敌人“扫荡”围攻计划。乘敌分进合击中，击破其薄弱之一路或袭击敌之侧后。

三、第三时期，在敌施行公路、据点政策，企图缩小我军活动范围并分区“扫荡”时，我军所采之战术对策：

（一）以积极行动袭扰和打击敌之护路与修筑据点部队，阻敌公路据点计划施行。

（二）各活动区组织许多精干游击小队，从敌空隙穿插敌侧后，分途袭扰敌人，断敌交通，疲扰敌人。

（三）另集结适当兵力，组织一、二突击队，乘敌调动中，求得突击与打击敌人。

（四）实行民众的游击战术，与地方民众打成一片，坚持在侧后作战。有时集中打敌，有时在敌大举进攻中，以民众掩蔽下化装为民，以掩敌耳目。

（五）强袭敌据点，另以有力部队埋伏敌必经道上，以伏击敌人，争取胜利。

第六、后方勤务

一、由于我军地区狭小，地形犬牙相错，前后方交通线长，而不便后方勤务，极感困难。同时必经敌封锁线之威胁，邻近友军常限止通过。因受此困难，前方物质、弹药不能得到及时供给，伤病员有时赖民力掩护诊治，送后不易。

二、物质困难，经济无法维持。前方米价已涨至每元十三

斤，不仅生活不能改善，日不饱食。至于衣服破烂，每班平均毯子四床，江南雨水多，雨伞斗笠无效，每次行军遍身透湿，赤脚难行，故影响军风纪不整。

三、江南气候水土不合，指战员生病者极多，伤员逐增，因无药治疗，经济不支购买，伤病者不能立愈，亦增加我军困难条件。

叶挺（印）
职 项英（印）
谨拟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新四军·文献》（1）刊印。

朱德关于日军“扫荡” 冀中、冀南情况及八路军之部署 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

蒋、程、阎、卫、孙^[1]：

接彭德怀同志文亥电称：

甲、津浦、平汉及北宁诸铁道线之敌大举“扫荡”冀中、冀南情况，现状如下：

1. 敌依据铁路向前推进，进占各县城后，正在积极构筑据点，修复公路，并以沧石线以南之德州、南宫、宁晋线，邢台、威县、临清、高唐、济南线，邯郸、大名、冠县、聊城线屯积大兵为其基干线。

2. 敌依据已占之据点，仍逐渐向外发展，扩大其占领区，更进一步的来缩小我活动区域，若一查明我军所在地时，即由各据点组织成快速部队，分数路向我行包围，企图歼灭。

3. 到处密布特务机关，组织伪军、伪政府及各种会门，强用伪币，损去法币，特别加强其侦察通信网。

乙、我部以坚持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战以保卫西北和策应山西、山东作战之目的，部署为次：

1. 以有力一部继续在冀中、冀南坚持平原游击，并配合当地民众游击队、自卫队袭扰敌人，拆城破路，摧毁伪组织，继续巩固抗日根据地。

2. 另一部进出津浦、平汉线上，袭击敌进攻基干地，破坏铁路，以夹攻冀中之敌计：

（一）陈光率六八六团进出长清、肥城线，向济南地带之敌袭击，微日进到郓城，当消灭日军百余及伪军刘本功部，获枪三百余支，俘伪团长以下日伪军四百余人。

（二）以贺龙率一二〇师之一部及吕正操之第三纵队，继续在冀中坚持游击，日有战斗，尤以一日在河间黑马张庄村一战为尤烈，敌人伤亡二百余，我伤亡连长以下百余人，略有俘获。

（三）以徐向前率陈再道之东进纵队、宋任穷司令所部及一二九师一部，继续在冀分区活动，每日均不断与敌接触，江日枣强徐河村及支日高唐刘均寺^[2]等战斗极为激烈，我东纵政治部主任邓永耀同志阵亡，营长以下伤亡六百余。

（四）以刘伯承率三八六旅及先遣支队转到磁县、邢台线、平汉线两侧，袭该地带之敌，现与磁县附近日伪军战斗中，结果后报。

（五）以萧华部袭击沧县、德州线上之敌，尤以陵县，消灭日军五十余，伪军于志良部三百余，缴获机、步枪二百余支。

（六）以聂荣臻部进袭完县、满城线及以东地区，袭击保定、涿州线之敌等情。

是否有当，伏祈鉴核祇遵。

朱 德

元午

注 释

〔1〕指程潜、阎锡山、卫立煌、孙连仲。

〔2〕似为琉璃寺之误。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兵团、游击部队政治机关并报王、谭主任、毛^[1]：

一、为了坚持华北抗日，克服困难，准备到更困难时以自己劳动所得解决必须给养，各部队须发动热烈的生产运动。

二、军政民应协同一致提高生产，提早完成春耕。

1. 各部队除协助民众耕作外，应协同当地政府、群众团体及友军组织各地生产委员会，周密计划，普遍发动。

2. 以农救、妇救作为生产运动中心力量，发动妇女学习生产，老弱可参加劳作，为抗属代耕，调剂农具、种子、生产力等。

3. 动员一切务农工具，普遍深入宣传，指出提高农业生产对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意义。在进行生产运动中，并号召反汉奸、托派之造谣破坏。

三、要求政府指定公田地给军队和灾民种，各学校、医院、机关、团体、地方武装要认真春耕。

1. 各部队应以自己总的人数全年需要数量、田地面积、各种粮食、菜蔬的产量，要定出精确计划。

2. 多种瓜菜，尤应注意成熟的季节及产量，使生产计划成为较长久的经营。

3. 经营土地时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密切互助，求得部队

离开时民众能代我们间苗、除草、灌溉、施肥等，可先用劳力与民众以作交换。

4. 部队中须经常储存肥料、应用农具，可以用我们人力、马力给群众使用。

5. 部队的生产运动，不仅限于驻地附近，远处可派人、马去从事耕种并派人照视。

四、上述事项在不妨害军事行动：

1. 政治机关及政治首长须负责任。

2. 以党的力量推动及干部做模范。

3. 有计划的作各方面的动员，造成部队中生产热潮，必要时可实行礼拜六办法。请将工作布置情形详报。

集 总

三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王稼祥、谭政、毛泽东。

朱德关于鹿钟麟部袭击八路军 制造磨擦事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

蒋、程、阎、卫^{〔1〕}：

顷接彭副总司令删电呈：德怀此次奉令随刘古风先生赴冀解决河北问题，因鹿瑞伯^{〔2〕}主席已过路西，而冀南情况仍属严重，即暂留积极部署作战。秉委座坚持华北抗战意旨，激励前线将士，全军战斗意志因以愈加振奋。近复歼敌多股，并不断袭扰敌，破坏敌交通，使之疲于奔命，虽两月来敌分区“扫荡”，使我行动陷于苦境，幸赖军民一致团结，仍得支撑危局。然近据刘师长伯承、徐副师长向前、宋司令任穷报称：鹿主席所部，处此寇深祸急急需更加团结之时，竟不以民族为念，屡向职部挑衅，希图制造磨擦如下：

1. 我汪^{〔3〕}支队前二月八日在束鹿附近作战，失去联络，其第一营第九连被鹿主席部徐旅在宋家庄解决，计屠杀政治指导员何宜桥一名、排长一名、班长四名、战士十五名，缴去长短枪二十一支，带路百姓二名亦被杀死。

2. 鹿永祥、赵云祥部在一、二两月份内，共活埋我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达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及医院人员，并挖取我军埋藏之经费、重机器多件；近日赵部更活埋我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业已会同石^{〔4〕}副总司令派员验尸，并查明确为赵部所害。

此类事件过去数月层见叠出，日趋严重，甚至鹿主席所属之胡和道、赵云祥等利用会门屠杀我来往人员，使我军作战极感掣肘。职等以事关团结，始终告诫部属处处容忍，采取正当途径解决，惟当兹日寇大举进攻之严重关头，既未见徐、赵各部积极对敌抗战，反处处向八路军打击，消磨抗日力量，残害自己同胞，实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职部将士目睹身受，痛心愤慨。请转呈示遵等情。除复所属刘、徐、宋继续力求团结外，特电奉恳委钧座，转令鹿主席严厉制止，以利抗战，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等情特呈，敬祈裁夺。

朱 德

十七日 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程潜、阎锡山、卫立煌。
- 〔2〕即鹿钟麟。
- 〔3〕指汪乃贵。
- 〔4〕指石友三。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

各分局及各省委市委：

一、各局各省委各特委还无统一战线部者应赶紧成立。

二、统一战线部的主要经常工作为：

1. 具体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如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则还须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情形。

2. 具体研究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各地驻军政权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提出适当的对策以打击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和巩固及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3. 负责进行和指导对各党派各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4. 争取帮助和爱护同情分子及非党干部。

三、各局各省委特委必须经常讨论和领导统一战线部的工作，目前须特别讨论如何争取和帮助友党友军中的进步分子，以及如何自己严守秘密工作及公开工作规律，并帮助同情分子注意秘密工作及应付方法，以免受顽固分子打击等问题。

此外，各局各省委各特委必须用一切力量出版公开的地方报，最好购置铅印，如万一无法购置铅印亦须出石印、油印

报纸，并经常将报纸出版情形及报纸寄交中央党报委员会审查。

中央书记处

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袁国平、邓子恢关于新四军 政治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

毛、王、谭^[1]首长：

此间“二七”举行过第二届全军政工会议。开会前，曾电请赐示方针，惜未得复。会议经过情形，请参阅《抗敌报》披露之文件，便知概要。

一年来政工经过及现状，除向恩来^[2]同志作过详细口头报告托为转达外，并作有书面报告寄来，请给予指示。

江南环境复杂，处境困难，故一年来是采取巩固、发展方针，凭着军分委正确的领导与部队的艰苦奋斗，也争得三百余次战斗的胜利。部队十倍的壮大，争取了四千以上的地方武装，由军队直接负责创立了三个特委，发展了十四个县的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特别在江南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广大群众中坚固不拔的信仰，为以后向前发展造成了良好的条件。这些成绩，比之八路军在华北的成绩自然是落后的，但我们已能自信在江南立稳脚跟，不惧任何困难，为党的路线坚持奋斗到底！

江北四支队远离军部，鞭长莫及，在那里的的工作还不能有把握的作出估计来，更说不上实际的领导。但自张云逸同志过江后，已能进一步的建立关系，至少八团队、游击纵队及军特务营（共约五千人）已能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至于高敬亭直接领导之第七团，则尚是待决的难题。

政治工作在新四军，虽有过去传统的精神，但除了这种精神以外，一切是从开步走做起，现在大体上说已建立起应有的基础。一年来军队建设之中，据军分委负责同志估计，还是政工建设方面的成绩要大些，但主要弱点是尚少新的发挥与创造。以后的方向，是如何巩固已经建立的政工基础，并力求在这一基础上争取新的创造与发展，为保证正规建军与坚持作战两重任务之完成。

因为部队壮大、工作开展，干部比初成立时还感困难，但现在我们已确立自力更生的方针，从工作中培养干部，来克服这一发展中的困难。我们已办了一个一千人的初级干部的教导队，最近又新办了四十人的高级训练班。在这一方面，或许能获得一些成效。最低限度应做到干部自给，以至进一步做到帮助供给南方党的军政干部。

统一战线在江南的成绩还偏在中层与下层，上层只有些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过从全国大局、江南环境与战争趋势诸方面看来，上层关系的进步在江南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在政工会讨论中，我们曾提出三个方针，即巩固上层，坚强中层，扩大下层。在江南，统一战线也有许多特殊的经验教训，以后得暇另文报告或向《解放》投稿。

政治部在大胆引进新的干部中已粗具规模了。组织部长李子芳，这是你们知道的。宣传部长朱镜我，帝大学生，原在上海中央分局与东南局宣传部工作过的。敌工部长林植夫，帝大学生，曾在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负过委职的，非党员，但经过一年的锻炼，大体已有入党的条件。民运部长，由子恢兼任。秘书处长，最近拟以黄诚充任，黄系清华大学学生，已有三年党龄，为民先发起者之一。

我们对总政治部有如下之希望：

（一）尽可能把八路军政工经验介绍给我们，最好转告八

路军政治部与我们交换出版物和公开的文件。

(二) 带全国性的材料，如基本的政治教育材料及政工条例之类，最好仍由总政负责供给（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在尝试进行，但因人力与时间关系，还不敢自信弄得好）。

(三) 可能时，常给指示。

即此谨致

敬礼！并祝康健！

袁国平、邓子恢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新四军·文献》(1) 刊印。

注 释

〔1〕指王稼祥、谭政。

〔2〕即周恩来。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三月)

周恩来

一 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

今天，抗战正向新的阶段过渡，敌方、我方、国际三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敌人的政策明显地表示了三个特点：

(1) 认定“扫荡”敌后方是它的中心。不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敌后方，所以四个月来敌人没有进攻与深入内地的形势。

(2) 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敌人要拿这个政策来利用我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3) 无论如何还是继续战争的局面。不是以政治为主了，战争就可以停止。除非是中国胜利或者是中国屈服，战争决不会停止，敌人也不会因“扫荡”后方就停止进攻。

二、我方的政策已转到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我党总结了一年抗战的经验，在六中全会决议案中讨论了敌后工作问题。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强调了全国军民

* 这是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和各党派应重视敌后工作。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优势的地方，欢迎各抗日党派共同到敌后去工作。

三、国际上也是极注意中国问题的：

(1) 非常注意敌人占领地区的情况和敌人在占领地区的政策。

(2) 非常注意游击战争的发展。

(3) 非常注意中国共产党在游击区的政权。都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国的利益，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是否能真正破坏敌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施，还要看这些军队能不能壮大起来成为正规军与敌人进行更大的胜利的战斗。

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二 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

正是因为这样的形势和环境，所以我们新四军是有发展前

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愈在困难的条件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三、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我们如果打算把新四军所在的地方建立成根据地，就要依靠这个地方的广大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发展。

四、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只有在复杂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

五、愈有竞赛，愈能够使我们本身进步。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了彼此竞赛，我想江南江北地区特别是江南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各方面同我们竞赛，更能够锻炼我们，使我们进步。

六、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国全世界。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在这样困难的地区，我们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就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自卫抗战中是能够发展的。

虽然我们有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困难还是存在的：

一、敌人的政策和他的军事技术在不断变化。我们绝不要满足于现在能够克服敌人的进攻。敌人遭到挫折就会改变，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研究新的政策。所以，虽然今天的困难我们能够克服，还有明天的困难需要我们研究怎样克服。

二、我们活动的地区是有限的。大江南北和华北的情形不

同，北方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而大江南北敌人所占有的地区是有限的。而且敌人要加紧造成电线公路网，在北岸要造铁路，以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

三、地形交通条件不利。

四、江南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十分有利。

五、我们的力量还小。虽然一年的战斗锻炼了我们，坚强了我们，我们还是游击队。

六、友党友军不会放弃江南，这个重要地区是他们誓死必争的。

这些困难我们如何来克服呢？

一、要坚持游击战争。拿战争的胜利来克服困难。只有我们胜利的扩大、胜利的增加，才会使友党友军重视我们，使敌人畏惧我们，使国际友邦尊重我们。

二、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

三、要坚持强大自己。要使我们的部队发展，使我们的地位提高，使我们的力量增强，这样才便于我们在大江南北进行工作。

四、要坚持深入群众。要使大江南北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环绕在我们周围。由劳苦群众以至上层分子，只要不当汉奸，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我们要到群众中间去埋头苦干，扩大我们的影响。

五、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我们采取帮助的方法，影响的方法，使友党友军感到我们是合作的朋友。

这些就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针。只要坚持这样的方针，我们就能够基本上克服困难。至于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那全靠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实际运用。

三 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讲四个问题：

一、发展的方向。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

(1)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

(2)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二、作战的方针。

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三、建军工作。

以强大为原则，也就是说，第一要精，第二要发展。我们不能忽略精的方面，因为我们的扩充是有限制的。我们要使一个人有十个人的用处，一个干部当一百个干部用。我们走向正规军不能采取跳跃的方式，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功的。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

展。在这一方面，新四军要用很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政治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地培养和教育。

战斗动作的教育很重要，特别是夜战、白刃战。要学习跳跃、游泳，这是打游击战特别要学会的，比如攻据点时跳铁丝网，携枪游泳袭击敌人。将来我们要在长江上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运输，发扬水上游击队的特长对我们游击队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爆炸的方法也要研究。还要学习爬城，这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动作。在游击战中我们要把体育运动提倡起来。

我们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

四、对敌人的政治经济斗争。

过去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游击队胜利地集中，迅速开赴前线，转入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要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政治经济斗争。敌人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开发占领区资源的政策，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尽量摧毁敌伪政权。能够破坏的应该去破坏它，能够推翻的应该去推翻它。

(2) 保障恢复我抗日政权。在敌后，应该尽量帮助地方，配合地方自卫武装，恢复和保护抗日政权，并帮助地方群众团体进行工作。

(3) 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到最后五分钟不拼命。

(4) 瓦解伪军。敌人从本国抽调部队到中国来是非常困难的，主要的是利用伪军，以华制华，来弥补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们应该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

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

（5）利用维持会、伪军等做内线，为我们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可以里应外合。

（6）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这不仅有军事上的作用，而且有政治经济上的作用。

（7）爆炸敌人的矿山、工厂。

（8）封锁敌人的商业。

（9）敌人发行的伪币，我们的地区不能使用。

（10）研究在游击战中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譬如江南有许多棉花，应研究怎样自纺自织，供给自己的需要。

（11）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提高民众的文化程度、政治认识，使他们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一天天地提高起来，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

（12）发展地方自卫武装，由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进而发展到游击队。

（13）争取青帮、大刀会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进行政治工作，争取他们。

（14）适当地改善民生。凡是跑到敌人那方面去的地主，不可以回来收租。

（15）坚决肃清汉奸。在伪军伪政府中是有两面派的，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策略。

（16）加强宣传工作。对我们的胜利消息应该尽量地宣传，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应该不放松地驳斥。敌人贴了一个布告，我们也应该贴一个布告，揭穿敌人的欺骗。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要迟疑。我们政治部以后应该听敌人的广播，好来研究对策。

（17）在大城市中建立秘密的工作。

我只能够提出这些大纲，请大家来研究讨论。在跟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中，有这许多工作要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不亚于拿刀枪跟敌人斗争。我所说的是很浅薄的，仅仅是过去的一点经验和现在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共同努力，提出更多的具体材料和具体办法，表示出我们新四军不仅有模范的游击战争，而且在游击战争中有模范的政治工作，模范的和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的成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边区政府公布)

陕甘宁边区在国民政府和蒋^{〔1〕}委员长领导下，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特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

(一) 民族主义

一、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

二、高度的发扬边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妥协投降的倾向。

三、厉行锄奸工作，提高边区人民的警觉性，彻底消灭汉奸、敌探、土匪的活动，以巩固抗日后方。

四、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

五、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

六、在不损害边区主权的原則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

方面的活动。

(二) 民权主义

七、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

八、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

九、充实抗日地方武装力量，发展与健全人民抗日自卫军、抗日少先队，加紧其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教育与训练。

十、以政治工作与组织力量的配合，实行兵役与参战的动员。

十一、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

十二、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

十三、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

十四、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发扬自我批评，以增进工作的效能。

十五、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

十六、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

十七、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才。

（三）民生主义

十八、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

十九、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

二十、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奖励商人投资，提高工业生产。

二十一、实行统一累进税，废除苛捐杂税。

二十二、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

二十三、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之困难。

二十四、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度，改善劳动待遇，保护工人利益，同时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效能。

二十五、优待抗日军人与工作人员之家属，使抗战军人安心作战，工作人员安心工作。

二十六、废止高利贷，政府举办低利借贷，奖励合作社之发展。

二十七、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

二十八、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灾民，不使流离失所。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甲、在党内解释纲领的两面性，一方面为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

乙、在一切党的公开机关，公开党员，公开党报上，对此纲领应采取如下的立场：

(子)基本上拥护此纲领，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倡为国家民族、为精诚团结、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为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而牺牲奋斗、而竭忠尽孝的革命精神，来养成奋发有为、朝气蓬勃、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新国民气象，同时以此来反对与打击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一面反对防共分子的观点，一面反对反民族分子的观点。

(丑)指出这些积极的东西不但本党历来主张而且本党已在实际上执行了与执行着的，以事实证明共产党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寅)对纲领中某些两面性的条文与说明给以我们的明确解释，批评其中所包含的缺点，打击一切利用这些缺点进行防共和反八路军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等活动的阴谋，指出这种阴谋是违反团结抗战国策、违反纲领的基本精神的。

丙、在党的力量占优势的地方，应进行拥护此纲领的动

员，充分运用此纲领公开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及防共的阴谋，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

丁、在非蒋^{〔1〕}系统治的地区，则我们应与当地进步势力及较接近我们的同盟者采取一致的步调，共同打击以此纲领破坏团结进步的阴谋活动。

戊、在我后方，如有可能，我们应以普通群众的资格运用此合法的机会去进行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认真的拥护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联系到当地反贪污腐化等的斗争，并在实际上减弱与打消国民党地方党部与政府以此来进行防共活动的阴谋。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

由于抗战的长期坚持，汉奸、敌探和反共分子对于本党的进攻与阴谋破坏，也大大的加紧与更系统化了。最近由于下列一些事实，常常引起党的工作之重大损失，这些事实是：

(一) 在友党、友军统治地区的党委，散失秘密文件及党与公开工作干部名单；

(二) 各地党报登载各种党所领导的工作通讯（如事实上为党所领导的团体、机关、部队的工作情形，但尚未公开者）；

(三) 各地秘密党员和接近我们的群众与延安各学校、机关及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通信。

为此，书记处特作下列决定，望各地党委切实遵照执行，并在党内进行教育：

(一) 凡在友党、友军统治地区的党委及党的机关：

甲、不得保存秘密文件，所有秘密文件，在阅读后立即销毁。过去的秘密文件（如工作报告、通知等）须立即清查销毁。

乙、不得印刷登记表去登记党员及干部，过去已有登记表须立即销毁。各党委负责人如有必要记录干部姓名履历时，须采用特别秘密的办法，并不得有任何泄露。

(二) 除特别允许公开发表者（如陕北边区、八路军、晋

察冀边区的情形等）外，各地党报不得登载各种党所领导的工作通讯。

（三）教育党员及接近党的群众与同情者，不要和延安及其它公开共产党机关人员通信。

中央书记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朱德等关于克服财政经济困难 给聂荣臻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

聂、贺、关、吕、程、萧^{〔1〕}：

为着保证军队之供给，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各部队应依据各地具体情况，严格执行。

(1) 确立预算决算制度，严格限制预算外之开支。

(2) 厉行节约，节省办公费、杂支与粮食，反对浪费。

(3) 加强贸易、生产等开源工作，开荒种菜、种瓜，力求节省菜金。

(4) 举办各种合作社，手工业工场，织造布匹、鞋袜，以供给部队需要。

(5) 慎重发行边区银行的票币，以免影响信用，增加困难。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

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萧克。

我们目前战役的纲要^{*}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

刘 伯 承

其一 融合游击战和运动战并调剂其分量

一、游击战与运动战在战术上的分界

(一) 游击队的战术动作：游击队的兵力小（通常千人以下），军实缺乏，灵动性大，隐蔽容易，突击力小和顽强性弱。因此，它应特别把握着主动地位，发扬宽大的灵动性，以突然的袭击消耗敌人的精神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的捕捉为避害，只有胜利的进攻，绝少防御，也不挡仗，行动通常急转直下，也难于集中指挥。他的战术，通常是突然袭击运动或驻止之敌，特别是袭击运动之敌，所谓伏击与急袭者是。伏击又是其中最好的手段，虽对优势敌人也可采用的。破坏敌人的军实资源，尤其是交通，在游击队一切动作中，都是很重要的。

归纳游击队动作的要领有以下四点：

1. 政治主张要公开要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如果游击队的政治主张不公开，不明确，则不能组成为广大民众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如果军事行动不秘密，不诡诈，则不能作趋利避害的机动，就不能达到消耗敌人发展自己的胜利战斗。如行动于富饶的平原与人烟稠密之

* 这是刘伯承在山西省黎城县乔村军事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

地，则便于从政治上组成广大的民众以强化游击战争，特别容易发展之成为大量的正规军队。但在敌人大军“扫荡”时，则游击队的编成要小，分遣要疏，特别要深入于广大群众掩护之中行动。如行动于偏僻的山岳森林地带，则便于在军事上作趋利避害的机动，但兵员补充，资材征集，都较困难。这些都要求我们严格估计情况，善于调节军事与政治的、公开与秘密的相互为用的关系。有些人忽视了山林便于军事的机动这一方面的作用，而片面叫喊“反对上山主义”，这是不对的。

2. 要游要击，并使游与击相互配合。“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起来。如果游击队游而不击，只是“游来游去”，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失去了他进展的前途，这自然是不对的；但若反其所为，主张“击来击去”，击而不游，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游击队武装力量小，且多系老百姓初结合起来的队伍，不但要有把握的胜仗才打，以提高及巩固其情绪，而且打了要在游的空隙中来实行政治工作和军事教练。换句话说，要积蓄力量，才好再击。因此我的结论是：“单纯的击来击去不对，单纯的游来游去也不对，必须游来游去又击来击去才对”；或者换一句话说：“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

3. 紧握主动权，灵活而有计划的袭击：我们在广大民众及自卫队组成与掩护之下作游击战争，可以机动自由，是具有主动的基本条件。现在来说紧握主动权，这只是指挥艺术的问题。宽大机动的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他的弱点，给以有计划的突然的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方法。积极的声东击西，利诱威胁敌人；消极的隐蔽自己的真实行动，使敌人误解我们的行动，使他在布置兵力时对付我们的刀尖不是向着我们，而是把他松懈的弱点向着我们，给我们好去袭击他，这

就是创造了敌人的弱点。如敌人正在行军并未准备打仗，此时又无堡垒罩着，使我们得着这个好机会来伏击，这就是寻找了敌人的弱点。倘若我们偶然陷于被动，特别在不利状况时，则毫不犹豫地机动于新的有利方向，转成主动。老住一地，将遭袭击，老走一路，将遭伏击，这是最有害的被动。我们必须根据当前敌情、本身、地形与时间，灵活的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并且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我们多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自然需要炼成迅速而突然的袭击动作，特别是指挥员养成秘密而周到的计划与准备，使之成为习惯。如已计划实行袭击，忽然情况大变，以致胜利没有希望时，则游击队就应灵动地停止袭击或者急速退出战斗。这是有根据的灵动，并不是随便的妄动。

4. 组成游击集团：区属各村自卫队是就地配合各村游击组侦察及游击敌人；区游击干队则辗转行动于各村，成为各村游击组的突击队，这些统称为区游击集团。县属各区游击集团就地侦察、游击敌人，县游击干队也辗转行动于各区，成为各区游击集团的突击队。以上递次类推，使军分区的基干支队成为所属各县游击集团的突击队，军区基干纵队成为全军区的突击队。

这样组成游击集团，可以发展全面的游击战争：一则使日寇组织的汉奸政权，困难立足与生根，而我们的县长、区长、村长（都兼任各游击队首长），更有利巩固抗日政权。二则各游击干队得着所属游击集团就地的侦察、游击和掩护，更便于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突击，以扩大游击战争的威力。

（二）正规军队的战术动作：正规军队的兵力大，军实充足，隐蔽较难，突击力与顽强性都大。因此他通常发扬运动战的威力，以主动的进攻与追击消灭敌军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以至变成防御退却为避害。且其侦察警戒亦较游击队

为有规律。无论他战斗或行军宿营，都着重于协同动作，也多采用集中指挥。

总而言之，小部队的游击战也罢，正规军的运动战也罢，他们趋利避害的原理是一致的。不过两者的兵力大小不同，作战的威力也不同，指挥方式也不同，而战术的范畴，因之也就不同了。“游击战是手工业，运动战是机器工业”，我们从这个譬喻中也可以标识其在战术上的分界了。

二、融合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

为便于研究战术的运用起见，划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范畴，正如地图上假定划分的经纬线以便于研究地理一样。这在学理的研究上都是必要的。然而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割断的鸿沟，而是相互连贯着的。就游击战向正规的运动战发展的过程及其连贯性来看，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在战术上说，这些基干支队和县区干队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他的钳制队，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其正规战的进攻战斗发展的；伏击运动中之敌，是向其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是向其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这些发展的连贯性在大部队作游击战时，越发融合一体分解不开。如敌人大军云集，不利于我集结大的兵力行动时，则我正规军可以减弱集结的主力，而分遣其部队于各区去领导强化各区的游击战；一见敌人布兵稀薄或有隙可乘之时，则集结附近区域的部队作运动战。但我正规军一般是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为经常，因为要发扬其消灭敌军的威力才能制止敌人进攻，这也是正规军的任务，这也是手工业向机器工业发展顺利的进程。即使完全进到正规军的运动战的时期，也还是要吸收游击战的优点的。例如苏联步

兵战斗条令第二十八条说：“如有良好的隐蔽接近地时，接近敌人到轻机关枪火力的距离后，突然展开进攻是特别有利的事。接敌运动的隐蔽确实是进攻突然和进攻顺利底主要保障”。这就是吸收了游击队突然袭击的优点。防御而新添了运动防御，侦察部队而新添了突然袭击、伏击与分散退却，这都吸收了游击队灵巧机动的优点。

总之，我们目前融合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是不能割裂的。游击队自然是采用游击战斗的方式，就是正规军的运动战也是以游击战斗方式来进行的。这是由于我们运用大兵团的灵活性，特别是政治的紧张性带有历史的传统，而可以做得到的。

三、适时调剂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分量

我们融合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已如上述，但是两种分量那一种占多少，这要严格综合、估计和对比当前敌我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军队数量、质量以及技术条件的优劣，乃至地理经济条件如何运用来决定。例如目前敌人在冀南平原正占领各县据点，运用快速部队，尤其是装甲车队、炮兵、飞机对我军围攻“扫荡”，则我正规军应以多的时间分遣部队发展与强化各区的游击战，以消耗该敌，借此可以大量繁殖游击队并扩充我军。又如山西，山岳条件和敌人状况是与冀南相反，则我正规军即以较多的时间集结兵力，在军区游击动作掩护之下，准备整训以抓紧开展战局的重心，或作运动战以消灭敌人。这是就战役情况来调剂两者配合分量的。但就战略的目前阶段来看，则是游击战的分量占主要地位，运动战的分量只占辅助地位。一般说来，在华北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在相持阶段过程中是逐渐向运动战机动地发展着的。将来在我力变强、敌力变弱的尖锐开展的局面下，不但运动战的分量要升到主要地位，游击战的分量要转到辅助地位，而阵地战也要出现于华

北。这种正规战分量的日益增加，是随着“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乃至“把日本强盗打出中国”的实际过程而发展的。

其二 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军队作战

我们有普遍的自卫队，是抗日作战底第一个因素；在自卫队中成立村游击组，区和县游击干队以及其他游击队，是抗日作战底第二个因素；在诸自卫队诸游击队之中，又有地方性的军区基干的纵队与支队，特别又有全国性的野战军队，这些统称为“基干”或“正规军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三个因素。我们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地配合作战。这样才算得全面的有组织的抗战，并使这样的抗战成为世界被压迫者创造的精彩的作品。

一、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军队作战

(一) 军区、军分区应依据各县、各区的军事行政系统，负责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作战。其主要的方式是组成上述的游击集团，独立的进行全面的军事政治配合的游击战争。其地域如有基干军队行动时，特别要以基干军队为核心而配合他受他指挥，以争取作战的胜利。具体说来，军区、军分区在指导诸游击集团行动，尤其在敌人分进合击时，应利用民众性及其地方性进行下述工作：

首先组织间谍的、部队的、战役战术之敌情地形的侦察，同时扫除敌人的侦察，使“我军耳目聪明，敌人耳目聋瞎”。

其次，组织抗日戒严、盘察、巡查，建立我军通讯网，同时封锁消息，特别注意肃清敌人通信机关，以“扩大我军聪明，增加敌人聋瞎”。

再次，在基干军队战斗时，组织所在地游击集团，掩护我军行动的安全，同时在敌人侧翼和背后活动，特别是对于铁路

汽车路的不断破毁，断敌交通，以使“我军手脚灵动，敌人手脚蹒跚”。

此外，如动员补充兵员，救护伤病员，采买粮秣之类，都应尽量帮助他，使他毫无顾虑地机动自由消灭敌人。

（二）基于军队应随时随地指导游击集团，依照上项所述，进行配合作战的工作，务使其在自己的统一作战意旨之下活动；但要为他们设想周到，不可给以不能胜任的任务，有时并派出小部队领导他们游击。游击集团原来是民众抗日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其配合作战时，一定要估计到游击集团的特点——老百姓队伍，缺乏组织性的，只能令他各在现地域即在基于军队的外围，或调他另在适当地点，执行做得到的任务。不可与部队混在一起，以免引起部队的骚动。

二、基于军队对敌围攻的部署

（一）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这是被围攻部队的作战的基本原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而把握着的。敌人在分进还不能合击之先，各路不能彼此策应，尤其是在山地策应困难，我们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就是先要采用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的弱的而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他，并且击破他的地点和时间又必须在敌预定合击的地点和时间以外，以免陷于被动的地位。倘若各路合击的敌人，把我围在窄小地面将行捕捉之时，那就毫不犹豫地转到被围圈以外作战。如决定击破某一路时，则令游击集团积极活动，虚张声势，以麻痹吸引其他几路，是必要的。这种麻痹几路毒打一路的办法，要靠各部队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又要靠各部队依据总的企图，各向当前之敌积极行动，切不可彼此等待误事。

特别要了解的事就是：打运动中之敌比打驻止之敌好得多，正在分进还不能合击之敌，也给我们好打。我们应预先令

游击集团分头抓紧对敌人可能合击的各路，严密侦察，破路，游击扰乱分散疲惫与迷惑抑留，以便我主力适时实行打那路的机动以先发制人。倘若犹豫不决或久停一地，则敌人尤其是他快速部队的捕捉队已达合击的地步，那是危险的事。我××部队长久滞留于荏平徐家楼地域，被敌快速部队分进合击；我××团在敌人六路合击平定娘娘庙时，适时转到泥澄口，击破了敌人一路的步兵大队，这是可以供给我们对照来研究的教训。

（二）分遣作战。如情况需要，尤其是在避开敌人合击时，可以基干兵团或部队为单位，分遣到各地域独立作战，以领导强化各地域的游击战争。但在可能合击敌人时，则抓紧时机，调来合击敌人，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这是不可放松的，因为各个击破是被围攻部队的基本原则。

其三 截断敌人交通

敌人后方的铁路、汽车路，特别是铁路，是他前送兵力、弹药、汽油、被服、粮食（特别因我空室清野要运粮食）和后运伤病员等的一条生命线。飞机载重有限，是不能代替他的。如果敌人的交通线全被我们截断了，那敌人不但不能打仗，而且不能活命。这首先要抗战军民人人深刻认识其重要性，才能坚决执行截断敌人的交通，才能做到“使他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而走到困死”。

一、截断铁路、汽车路。对敌铁路、汽车路，或用重兵截断破毁之，或用游击队经常破毁之，或军民联合乘夜全线破毁之。

二、劫夺或烧毁兵站辎重。敌人兵站辎重，应由基干军队、游击队、自卫队尽可能地劫夺或烧毁之。劫夺不但可断敌

接济，而且供给了自己。万一自己运走或散发民众都来不及，则应毫不犹豫地烧毁之。

其四 拿反围攻对付围攻，造成敌人腹背受击

敌人对华北是分区围攻，我们是在被围攻的区内，对他实行各个击破。举例来说，去年秋季敌人从平绥路、平汉路、正太路 and 同蒲路四面围攻冀察晋的五台山区域，我冀察晋区军队是从内部各个击破他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把未被围攻诸区的军队，从各方面调来合击这一围攻我们之敌的背后。这就叫作“拿反围攻对付敌人围攻，使敌人腹背受击”。这是击破敌人围攻最好的办法。就前例来说就是：为要策应五台山作战，晋西北区军队向东进攻，晋东南区军队向北进攻，冀中、冀南二区军队向西进攻，这样三面合击敌人，结果使围攻五台山的敌人腹背受击而失败。其他诸小的区域的内外配合作战法，也该采用这种最好的方式。

举行反围攻的军队，他的动作的纲要是：

一、夹击围攻之敌。我反围攻的军队来配合被围攻的军队作战，应该统一于战役企图之下实行夹击。但是要估计到敌人的纵深配备，切不可被其铁道与据点守备队或钳制队所吸引，而失其配合夹击的效力。

二、截断铁路、汽车路。这是反围攻军队最易做到而最易收效的动作，但不能因此而放松夹击围攻之敌的主要任务。故举行反围攻的军队，应适时派出专门部队，不断地截断敌人的铁路、汽车路。

根据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八期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 武装力量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局：

1. 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过去由竹沟出发之少数部队，如八团队彭雪枫部现已发展合计万余人，在鄂境我新成立之游击队亦有数千人，便是明证。在江南则因国民党之限制及其统治力量之雄厚，致发展迟缓，在将来发展亦有很多困难，在华北则过去已有大量发展，现在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因此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2. 蒋^[1]已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

甲、在武装力量上：华北已准备一部在适当时机转移到华中；乙、在军政党民的干部补充上，除中央正在计划从陕北调遣一批去华中外，北方局及前总应计划调一批县及营以上的干部到华中，东南局及新四军应决心抽调一批营以上军政干部到江北，请将讨论结果及计划电复。

3. 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2]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

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交托叶陈袁^{〔3〕}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现由华北调大员去，在对外关系上不适宜。

4. 新四军在江南者现尚仅万余人，而发展前途可受大限制，许多大员仅指挥数千人，实不符合其才能之发展与^{〔4〕}的方针，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请讨论电复。

又关于江北指挥部人员及前委委员调动暂缓发表，待商妥后再说，因江北指挥部成立，中原局即可与指挥部靠近，不必另设前委。

中央书记处

四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即张云逸。

〔3〕指叶挺、陈毅、袁国平。

〔4〕原文如此，似缺字。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东南局并中原局转八团：

(一) 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要努力去作。

(二) 但依皖东目前情况，必须我们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三) 目前军事上的目的是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民成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因控制两条铁路对我们工作无大帮助，也控制不了）。

(四) 要迅速扩大我军，大大发展地方党，开办教导队与党的训练班，分派干部到每一县区去建立县委、区委，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

(五) 要特别注意推动地方政府进步，与行政人员合作，努力求得同志及进步分子去作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并保持严格的

秘密，但对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顽固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让步。

（六）上述各项望与林凯详谈。

中央书记处

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朱德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给陈光、罗荣桓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陈罗：

(一)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重要方针之一。估计此次敌对华北各地区之“扫荡”气势逐渐发展，平原各城镇驻敌较前减弱。但敌可以城镇为据点，继续四周“扫荡”，以图根本肃清我军或根本危害我之存在与活动。估计此种毒计实现不可能。我以较多兵力继续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仍有可能，亦为必须。萧华处似亦同此情况，因此非万不得已时我各区部队不应轻易离开根据地。

(二) 在平原游击战争中，特应注意秘密机动。依靠地方党、救亡团体、政权、部队，政治工作与民众密切结合，加强平原游击战术，加强侦察警戒不受敌袭。加强团以下部队单位之领导，以便时分时合，并尽量利用一切间隙时间进行部队整理，不得因专为整理部队而调离根据地。

如何？望考虑之。

朱 德

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为开展国民 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1〕}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特指出如下各点：

(一) 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在抗战以前，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党不断地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我党和那一切简单的“唯武器论”者，很久地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去注意各方面力量的动员，其中包括着对于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两年以来，我党无情地反对各种式样的民族失败主义

者。在去冬我党六中全会上，又复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十五条，其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中的报告，关于一切宣传鼓动工作，曾经这样的指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

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

（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党过去一切主张与行动，都是环绕于这些号召的周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牺牲精神，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严厉地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摘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摘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实行这个原则：“唯求军事之胜利乃为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唯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必须“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唯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违反这个方针，就必然会使意志分散力量分散。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一真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这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因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种阴谋活动，必然会造成意志分散力量分散之局面。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磨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

（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

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借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号召和实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实行起来。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

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除掉。汪精卫一类人因为不能艰苦奋斗，失了朝气，而陷于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深渊，所以他出卖民族利益，叛党叛国，做了汉奸。可知一切不愿意做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则尤为必要，这就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第一，在“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要纠正那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要纠正那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并且要纠正那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第二，在“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邪说。要广大地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因为他们“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他们响应日寇主张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共同体”，并进行所谓“共同防共”。要反对一切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欢迎日寇做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拱让自己国家听任敌人宰割。第三，在“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根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标，要纠正一切破坏军政军令的韩复榘式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要纠正一切无纪律现象，要纠正一切企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的人物，要纠正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阳奉阴违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不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人物。第四，在“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的企图，要纠正一

切利用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企图，要纠正一切为一己之私利或为少数集团的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利益而妨碍与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之行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像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反蒋反共的邪说，依赖外力的空论空想，以及否认劳动人民是民族基本主干的反民族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好朋友的反劳动阶级论调等等，都是属于不利抗战的分歧错杂的思想，都应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八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的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
《解放》第七十一期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民精神 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 国民党已决定从五月一日起至月底止举行全国精神总动员。

(二) 各地党部必须根据中央书记处四月五日指示及中央日内广播的宣传大纲主动的积极的进行工作。主要的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我党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打击日寇汉奸汪^{〔1〕}派托派反蒋^{〔2〕}反共，挑拨离间，和平妥协的阴谋活动，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但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应依各地不同的情况有区别。

(三) 在我党我军占优势的地区必须：

(甲) 在宣传鼓动中明白的显示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实质，以我们的立场给精神总动员的条文以正确的解释，以防止和打击顽固分子利用作为防共武器的企图。

(乙) 在五月内举行宣传周，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大会上在有准备的讲演之后，举行宣誓，通过宣言通电等。

(丙) 报纸上发表文件文章讲演稿。

（四）在国民党统制区域的各种报纸刊物亦应发表各种适当文章文件讲演，积极推进此运动。

（五）在党内应根据中央前后两个指示进行讨论，以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

中央书记处

四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汪精卫。

〔2〕指蒋介石。

朱德关于要求制止张荫梧制造 磨擦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蒋、程、阎、卫^{〔1〕}：

顷接冀中游击司令吕正操宥午电称：张荫梧民军千余人刻由南开来，已渡过滹沱河向我军驻地安、博、蠡等县开进，来势汹汹，采取向我进攻之战斗准备，到处肆意污蔑八路军，使用河北省伪钞及杂钞，声言国共两党根本不能合作，并诬我中央持久抗战国策系八路军为发展自己所提倡。此次系奉中央命令收复安、博、蠡、涿、清、霸失地并解决八路军及共产党所领导之游击队，政府及民众团体。已在深泽县境内捕去游击队员四名，并到处搜索我部队及政府、民众团体机关驻地。以致我军对外既须御敌，对内又须自卫，进退两难，军心惶惑。且该地居民均闻风逃散，形势危急，请转呈设法制止，免肇事端等情。据此电呈委座钧座转饬制止，集中力量共同对敌，毋自相煎，以松祸端，谨电奉闻，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职 朱 德

二十八日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程潜、阎锡山、卫立煌。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毛泽东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

*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写的文章，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期。

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

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刘 少 奇

中国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然而我们要取得这个战争最后的、彻底的胜利，我们还有很远的路程要走，还要经过各种的努力和牺牲奋斗。在这里，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从抗战发生以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呼声，已经遍于全中国。许多的人们，因此即去从事民众运动，许多地方的动员委员会也组织了起来，并且发布了不少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法律、命令。但是大多数民众是否已经充分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了呢？这，在全中国除开少数地方（如华北）以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成绩的。这，在抗战中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要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样对于这个问题的拖延迟缓，不去解决，也就要给抗战以极大的损害，延长与增加全国人民在抗战中所受的痛苦与牺牲。

为什么在抗战中民众运动不能广泛开展？为什么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成绩如此薄弱？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没有民众运动的自由，某些人还来统制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期。

与限制民众运动，甚至摧残压迫民众运动，所以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不能广泛的开展起来。为了动员千百万民众去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纠正这种情况，是十分迫切与必要的。因为没有民主自由，不扩大中国现有的民主自由，要动员与组织真正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战，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推动中国在各方面走向进步，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争取民主、争取民众运动的自由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应该不可分离的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暂时抛开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民众运动的关系不谈，首先专来讨论一下民众运动本身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即是假设在一般的情况下（不问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何），怎样使大多数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

在民众运动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即组织问题、行动问题（或斗争问题）、宣传教育问题。而这三件事情又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要使民众的行动成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动，要在民众的行动中、斗争中去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我在这里主要的来说组织民众的问题。

一 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

要去组织民众，首先就要认识民众，并认识民众运动的规律，然后才有可能引导民众组织起来。

开始，就要认识民众是什么？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因此，组织民众必须采用和组织木头与机器不同的方法，即是不能把民众当作纯被动的东西任意去组织，而必须根据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

在开始，我们要组织民众与民众是否要组织，两者之间是

不完全一致的，是矛盾的。必须解决这个矛盾，使我们要民众组织与民众自己要组织完全一致起来，然后才能组织民众。

因此，我们去组织民众，必须首先去启发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了解他们有互相组织的必要，然后根据民众的这种自动性，给以推动、协助和引导，才能真正的组织民众。如果民众还不了解有组织起来的必要的时候，那你就即使去强迫命令，他们也不会组织起来，而且他们更加会走到和你对立。但是民众如果认为他们自己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即使你不让他们组织，他们也会多少组织起来，不能公开组织，他们也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种特点，就是因为民众是能动的人群而来的。

强迫民众组织起来的团体，不是真正的民众团体。在这种团体中民众自己的意志虽然暂时表现不出来，但与强迫者之间蕴藏着极大的矛盾，要么是强迫者暂时的优势，民众被压服着，使这个团体弄得毫无生气；要么是民众自己的优势，抛开强迫者，照着民众自己的意志前进了。

为什么说在民众运动中要发扬民众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呢？因为民众是人群，没有民众的自动性与积极性，就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也不能有民众运动。

为什么要在民众团体中实行民主生活、尊重民众的意志呢？因为民众是人群，没有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不尊重民众的意志，就不能使民众真正组织起来，不能使这个团体活跃，也不能有真正的民众运动。

为什么民众团体的内部生活不能受外力的干涉，要保持民众团体的独立性呢？因为民众团体是人组织起来的团体，不保持组织生活上的独立性，就要窒息它的自动性与积极性。

某些人不了解发扬民众自动性与积极性的重要，不了解在民众团体中实行民主生活、尊重民众意志的重要，不了解尊重与保持民众团体独立性的重要，在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不懂得民

众团体是人组织起来的团体。他们以为民众也和其他的东西一样，可以由他们任意支配。因此，他们就去统制民众、劫持民众、命令与强迫民众。他们不知道民众是不可以统制、劫持与强迫的。历史上任何强迫民众的人，最后他还是要被民众所强迫，在民众面前屈服，或者为民众的压力所粉碎。

某些人幻想：他们需要的时候，民众能够起来，他们不需要的时候，民众能够安静下去。他们不知道民众是有思想的能动的人群，不能由他们叫起来就起来，叫安静就安静。

某些地方政府曾经下令限民众在若干时期以内组织什么团体、什么服务队等，但是民众并不听这些命令。这些地方政府不懂得民众是人群，要组织民众必须根据于民众的自觉与自动。

某些民众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要去组织民众，但他们以民众上司的态度去对待民众，他们独断专行，任意的去指挥与役使民众，结果他们必然为民众所拒绝与摒弃。他们不懂得民众是人群，不能由你要组织就组织。

民众是人群，这是一个浅显的认识，然而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不少的人们在实际行动中在工作中常常暴露他们没有这种浅显的基本的认识，或者忘记这种基本东西，所以他们就发生各种错误。

我们虽然不能把民众当作机械一样去组织，但是我们能够引导与推动民众组织起来，赞助民众组织起来。

因为民众是人群，虽然民众今天还由于政治、文化水平的不够，还没有觉悟到他们有组织起来救国与自救的必要，但我们可以去提高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准，启发民众的觉悟，使民众了解有组织起来救国、自救的必要，这是一切民众先觉者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去推动和协助民众组织起来，不应该让民众自流的发展，作民众的尾巴，而应该领导民众。

应该教育民众、说服民众、启发民众的要求与自动性，并协助民众组织起来。但是真正民众的领导者，他不以领导者自居，不板着面孔去教训民众，不站在民众的头上去命令民众，而是以兄弟的、同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说服民众；他不把民众属于他所有，而把他自己认为是属于民众所有；他不要求民众服从他，而认为他自己经常要服从民众的多数；他认为他没有任意支配民众的权力，认为他这样做就是在民众面前犯罪，相反，他认为他经常要受民众的支配。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民众真正的领袖，才能够真正从民众内部去教育民众、领导民众、提高民众的觉悟与自动性。只有不自封、不自称领袖的人，而且又在各方面能协助民众解决问题的人，民众才心悦诚服的推尊他为自己的领袖。又只有在民众中产生出领袖，才能真正的、最后的把民众组织起来。

我们说不要强迫民众，也不是说在民众运动中不要民众自己的严格的纪律，只有有纪律的民众运动，才是真正坚强的民众运动。而纪律总是多少带有强迫性的。但是这种民众运动自己的纪律的强迫性：（一）它是建筑在民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即是民众自己了解、自己承认、自己愿意遵守的在民众运动中不可少的那种纪律；（二）它是依靠民众的大多数对于极少数人的某种程度上的强迫。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众运动中保持行动统一的最重要的纪律。我们经常教育民众在行动上少数有服从多数的必要，民众也了解这种必要。那么在行动中民众的少数常常能自动的、自愿的、暂时牺牲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多数人的主张，与多数人在行动上、组织上保持一致。那么，这种纪律就成为民众自觉的纪律。这种自觉纪律的执行，也是依靠民众的自动性，自觉的、自动的遵守纪律，而不依靠强迫，虽然纪律是带有强迫性的。

总之，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要组织民众

必须依靠民众的自动性，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这种自动性，并在民众的自动性发扬以后，加以适当的配合、组织与指导。在这里一切的主观主义，都要受到惨酷的失败。

二 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

民众是有要求的人群。民众的要求，是民众组织的目标与目的。离开民众自己的要求，就不能组织民众。民众是为了达到他们一定的共同要求，他们才组织起来。

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由于要求的不同，民众团体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我们根据民众要求一般可以分作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第一，政治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政治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政党、政派及其他政治性质的组织等。

第二，经济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经济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合作社等。

第三，文化组织：主要是在一定的共同文化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如研究会、俱乐部、剧团及其他学术团体等。

各种民众组织的性质，由各个组织的主要要求纲领来规定。除开主要要求外，各个组织还有它的次要要求，但这并不变更这个组织的性质。比如政党常有经济的、文化的附带要求，工会、农会也常有政治的、文化的要求，俱乐部、学术团体等也常有政治的、经济的要求。但是，你如果把这种次要的附带的要求，变成为主要的经常的要求，那就要变更这个团体的性质。比如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放弃它的政治任务，仅仅为某些经济要求而斗争（如经济主义），那在实质上这个政党就不成为一个政党。一个工会或俱乐部如果长期放弃它原来的经济

的、文化的要求，主要去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活动，那这个工会组织或俱乐部就要变为第二党，即使它的名称与组织形式不变更，但原来团结在这些组织中间的人，必然会变更，即那些对政治斗争、政治活动不感受高度兴趣的人，逐渐的会要脱离这些组织，直到只剩下少数几个政治活动家保存在这些组织中。那么，这些组织在实质上已经不是什么经济的、文化的组织，而成为政治组织了。所以在民众运动中，你如果不准备变更某些团体的原来的性质，那你就不要放弃这些团体的原来的任务与主要要求。

在民众运动中有许多人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懂得各种团体的性质，是由各个团体的主要任务与主要要求来规定的，团体的任务与要求变更，团体的性质就要跟着变更。他们不懂这些，他们常常不顾民众的要求与情绪，主观的随便抛弃某些团体原来的任务与要求，而为另外的要求斗争，结果变更了这些团体的性质与内容，他们还不知道，这种情形常常要损害民众运动。

在另外的情形下，自然也可以利用这个原则去发展民众运动。比如有某些团体原来的任务与要求是不很好的，不很合乎民众要求的，虽然它们的名称叫工会等等，但实质并不是工会，而是别的东西。因此，民众对这些团体冷淡，不积极参加。但是你如果去变更这些团体的任务、要求与实质，那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民众来参加，使民众组织起来。又如使某些同乡会、佛教会变为经济组织或抗日组织等，也许对于民众运动是有利的，但在这里必须要求人们作具体的分析与估计。

在各种民众组织中，经济组织是最主要的民众组织。所以要组织真正广大的民众，必须注意在民众各种经济要求上去组织他们。因为民众不论是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至商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经济要求，因为经济要求是民众自己最直接、最

容易感觉得到的要求。如果我们不问年龄、性别、籍贯及政治信仰的不同，凡是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那就可以组织最广大的民众。

政治组织是各种组织中的高级形式。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因为它须要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才能加入，才对政治斗争经常保持兴趣，所以政治组织不是民众组织的主要形式，政党还不属于民众组织的范围以内。但在某种时期，某些单纯的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也常常能够动员与联合最广大的民众，如抗日救国、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等。在这些口号与要求下常常能够发动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民众到一个联合的组织中，如目前的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就是这类组织。这类组织在某些一瞬间也常能成为民众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这类组织有它的弱点：（一）它的主要要求比较单纯，因此就影响到它的内部生活的不充实、空洞、单调等；（二）它的主要要求是暂时性的，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发生这种不同阶层、职业、地区的民众的共同要求；（三）联合在这种要求上的各种不同的民众，还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与要求，因此，他们内部是有许多矛盾的。而在这种要求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大多数只能采取联合的形式。因此，它的内部不巩固。

所以，如果不在民众的经济上去广泛的建立民众的经济组织，而只单纯的用政治口号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大多数。比如你单纯的用抗日救国或牺牲救国的口号去组织民众，而抛弃民众自己的经济要求，那就只有那些对你的抗日救国或牺牲救国感受兴趣的人，才会跟你走，才会到你的组织中来。其余大多数不大感受兴趣的人，或不可能来的人，就不会到你的组织中来。所以除用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去组织民众外，还必须用民众的经济要求与经济口号去组织民众。否

则，真正组织民众的大多数，并长期保持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

必须在民众各种要求上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团体，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这一点并不是许多人都彻底了解的。我们看见许多人，他们要求民众组织起来，要求民众起来抗日救国，协助军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侦察队等，或者要求民众起来革命，反对某某，拥护某某，……然而他们不管民众的要求，不管当时当地的民众要求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只要求民众，而不管民众的要求，他们就要民众照他们的要求组织起来，那自然是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而只在他们自己的主观要求上去组织民众。民众的要求没有满足，民众自然不会去满足这些人的要求。

另外有些人要求民众不要起来救国，不要参加救国会，不要罢工、增加工资等，然而这些又恰恰是民众的要求，民众为达到这些要求常常自动的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而不管这些人的要求。这些人也不懂得民众的要求是必须满足的。

我们说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而要把民众的要求永远限制在落后的狭小的范围以内，或者甚至把我们的要求也降低到落后的狭小的范围以内，这是错的。我们要积极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民众的要求是可以启发与提高的，比如一个农民本来没有感觉到减租的要求，但当你向他说明他穷困的原因以及减轻痛苦的方法之后，他就会有减租的要求了。这个农民本来没有感觉到有武装抗日的要求，但当你帮助他减了租以后，并且向他说明日寇来了亡国之后对于他的种种不利，以及保证他已得的减租利益，而必须大家武装上前线之时，这个农民也许会有武装抗日上前线的要求了。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必须经

常的、积极的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从低级的提到高级的，从经济的提到政治的，从部分的、暂时的提到全体的、永久的，从地方的提到国家的、民族的。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在被启发与提高了的民众要求之上，去组织广大的民众。然后才能最后组织广大民众到抗日的战线上来。

民众要求的这种提高，当然也不是不顾客观情况与客观联结的纯主观的瞎提一顿。如工人本来只要求增加一毛钱工资，而我们硬要提高到增加一块钱，工人本来只要增加工资，而我们硬要提高到消灭托派等，这种提高是要根据客观情况、客观联结与民众的觉悟程度，而且是要有步骤的去实行的。应该了解民众从他感觉到有某种要求，到他决心为某种要求而起来组织、斗争与行动的时候，还有很远一段过程。如从民众感觉到有抗日的要求，到他决心起来拿起枪去抗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要求，不只是须要宣传解释工作，而尤其须要民众自己的实践，民众的实际斗争。在民众的斗争实践中，民众才能亲身体验到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个人的要求与国家民族的要求，原来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这样才能引导民众到高级的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来。

民众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与文化要求，是有区别的。但这些要求又不可分离的联结在一起。民众的每一个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每一个政治要求与文化要求，都有经济原因作为基础。因此，民众的经济要求应该与政治要求、文化要求联系起来。当民众起来为一个简单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个简单要求的行动所牵涉的一切方面，引导民众去了解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并且引导这个行动走到更高的阶段上去。这是每一个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从民众要求的启发、提高与联系的问题上，使我们可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我们的要求与民众要求的矛盾问题。开始，

我们要求民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而民众要求减租减税，这，我们与民众是矛盾的；然后，我们在民众减租减税的要求上引导民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再从民众减租减税的行动中，提高民众的要求与觉悟，使民众也起来要求抗日救国，如是我们与民众又取得了一致。在开始，我们要去暂时将就民众，在最后是民众接受我们的要求。要把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口号，变为民众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口号，这里需要艰苦的教育工作与民众充分的实践斗争。这是每一个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所应该了解的。那些要求民众在他们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抗战的党派和人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如果一方面要求民众在他们领导下起来抗战，同时又不为民众的切身要求而斗争，甚至反对民众的要求，那即使你再加强你们的统制，民众永远也不会是你们领导之下抗战的。相反，你们将会变为民众的敌人。

三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

民众并不是一样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性别、地域、阶层和文化觉悟程度等。因此，要组织民众，就必须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组织，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多数。民众内部的复杂性（再加上外部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规定民众组织方式的复杂性。如果企图采用单一的方式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民众，那必然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企图把各种各样的民众纳在单一的组织方式之内，也是必然不能成功的。因为我们如果把医生、大学教授和码头工人与农村中的老太婆纳入一个组织之内，过共同的组织生活，那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如果从组织方式上来区别民众组织，那我们可以分为以下的类别：

第一，以产业为界线的组织。即是凡在同一产业部门中工作的工人、职员，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如工人团体中的产业工会——铁路工会、纺织工会、矿工工会、海员工会、印刷工会等。

第二，以职业为界线的组织。即是凡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员，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如裁缝工会、木匠工会、医生的团体、新闻记者的团体等。

第三，以地域为界线的组织。即在同一地域的某种人员组织起来的团体，如某某地方的工会、学生会等。又如同乡会等也是另一种以地域为原则的组织。

第四，以年龄为界线的组织。即青年、儿童组织以及某些地方的老人会等。

第五，以性别为界线的组织。即妇女团体等。

第六，以阶级为界线的组织。即是在经济上站在同一地位的人组织起来的团体，如工会、商会等。

第七，以信仰为界线的组织。如各种宗教团体、红枪会、白枪会等。

此外，以各种组织的内部机构来分，又有所谓集体的组织与联合的组织。集体的组织，即是它的组织机构是整个的，它的各部分与下级组织没有独立性的，这种组织机构适用于战斗性较强的团体。联合的组织，即是许多独立的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共同组织，仍旧保存各个团体的独立性，这种组织机构适用于内部情况较复杂的团体。

在各种组织中，产业组织与职业组织，是组织民众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主要的民众团体，应该是工会（其中又有各种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体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的团体等。如果在全国各地到处建立这些组织，那就可能真正的组织民众的大多数。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并不是主张民众组织的分散而不要统一。我们是坚决主张民众运动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必须：（一）首先要依照民众内部各种复杂的情形，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的大多数；（二）在民众组织的各部门中，在共同的要求与纲领上求得各部门的统一，如求得工会的统一，农会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种组织的统一；（三）最后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联合一切的民众团体，组织统一的救国总联合会，在各地同样建立这种联合会的系统。这样就能把一切的民众组织统一在一个总领导机关之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统一全国民众运动的领导。

在目前统一民众运动固然要紧，但组织民众的多数尤其要紧。如果不采用似乎是分散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不能把民众广泛的组织起来，民众运动的统一就不能有更大的意义。要能够广泛的组织民众，又能够真正统一民众运动，那只有采用上面提议的方式，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有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见民众内部这种复杂的情况。他们把民众看作一样的没有分别的东西，他们采用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态度与言语去对待各种各样的民众。他们更不会去分别研究各部分民众中的情形，以及这些民众中的生活、习惯、情绪、要求、文化程度等。因此，他们不能深入民众，不能与民众结合在一起，不能提出组织这些民众的适当的办法。

另有许多人也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允许民众去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尤其不允许民众按产业和职业的原则组织起来。他们只建立一种组织，要各种各样的民众去参加他这个单一组织，他们企图用一种单一方式，把各种各样的民众都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为了要统制民众运动，不允许各种民众团体的独

立存在，不愿意采用联合的方式，用他们纯粹从主观上想出来的那个单一的团体，去并吞其他一切民众组织，而美其名曰：这是统一民众运动。自然，这种人是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他们的办法对于民众运动不独没有丝毫的好处，恰恰相反，只有摧残民众运动、分裂民众运动，并且要引导民众起来直接和他们对抗。

在今天我们看到有某种人口里讲着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但是他们：（一）不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并且反对民众自动组织起来；（二）他们不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并且反对民众的要求；（三）他们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并且反对民众各种各样的组织。这种人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违反民众运动的上述三个基本原则。

在这里我仅仅说到组织民众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他的问题都没有说到。至于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全国各地的民众运动应该如何进行？如何组织？并且如何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动，来改变民众运动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那只有留待下次再讲。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节选)*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聂 荣 臻

一、在战斗中成长的晋察冀边区

我们今天在敌人远后方建立起来的晋察冀边区，包括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已成为敌人心腹大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这并不是如外间人想象的那样神秘的事情，但同时却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边区的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的历史，是一段残酷斗争的历史。边区一年来始终是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在无限困难条件下，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华北广大人民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洪流中的产物。这一年的血肉斗争，充满着痛苦和兴奋、辛酸与悲壮。自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绵亘不断的山岳地带，直延至冀中的广袤平原，而达冀察热辽边境，在正太、同蒲、平汉、平绥以至津浦、北宁几条铁路干线之间，到处交织着暴敌血腥的屠戮，和千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黄帝子孙抗敌的杀气，燃烧着神圣的为和平正义生存而自卫的烽火，到处响着敌人疯狂的炮声和民族抗战的怒吼。今日的晋察冀边

* 本文原为聂荣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后经作者修改补充，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毛泽东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朱德、王稼祥也作了序。

区，在华北广阔的领土上，无疑已经形成了相当坚固的堡垒。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堡垒从它初创到形成，自己也不自觉地居然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

这个地区，当去年（一九三七）十月间太原失守以后，不但和国家的总后方隔离了，无所凭借，而且在这一地区的范围内，由于太原的失守，已陷于极端紊乱的状态。那时各县的政权机关，实际上已经完全瓦解。在主要的晋东北区域，除了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在现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主任和胡仁奎副主任领导之下，仍能执行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偌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出原有地方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紊乱，散兵、流匪乘机活跃，汉奸随时随地欺骗造谣，影响到人民情绪的动摇，因不安而逃跑，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任何信心，悲观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我们走过了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了县城，县城是空虚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年老的汉子和婆婆。许多县城都像是快要死灭了一般，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许多的困难。

那时正值严冬的季节，五台山上积压着层层白雪，雪花像鹅毛一般，在这山地区域里昼夜纷飞着，寒冷的气候，就是过惯了北方山地生活的居民，也都感到艰难。但是，那时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穿着草鞋，寒冷刺骨的风雪，打着每一个人的肌肤。幸而大众的内心，都积蓄着一股杀敌勇气，鼓舞着救国热情，还不曾变成沙场冻死的枯骨。然而部队的给养，毕竟使得当时供给部的同志经常感到苦恼。因为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顾得今天，顾不得明天。而且又加以少数商人乘机居奇，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又受了更多的损失和耗费。

在运输和物资动员方面，那时似乎真的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许多退军把车骡、粮秣往南拖去，我们的部队要往北开，就受极大的影响。当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发的文件中，就曾沉痛地说过：

“一批一批的退军，拉得一批一批的驮骡毛驴，载的东西是面粉，锅灶，破旧衣服，此外还有人。然而手榴弹、枪、子弹、炮，都是沿路扔。因此上边定下长差与短差的办法，可是实际上短差也大部都是长差，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请求上边办理，公事上说：‘已令饬该部队放还矣’，然而有多大的效果？车骡是当下养不出的，前线上死了多少，丢了多少，退军拉了多少，哪里有取不尽的车骡被征调呢？有一天，许多撤退的部队，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这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见宋劭文氏动员骡车粮秣的经验教训）

在其他军队撤退紊乱的状态中，我们的供给和动员问题，当然不能不感受万分的困难。眼睁睁地看着山巅的白雪，地上的灰冰。纵然，使我们的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栗，然而战斗任务激励着我们，要忍着饥饿，鼓起勇气，挺起胸膛，握着枪杆，和那残暴的敌人作战。

那时，由于战局的紧张，敌人正在到处建立伪政权，组织汉奸队伍，不断企图消灭我们的游击队，稳固他的后方。我们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摧毁伪政权及汉奸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不得不以我们所仅有的少数基本队伍，配合着地方上新发动的一些群众武装，积极袭扰敌人。但是，每次战斗总免不了有伤亡，而这些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感到缺乏。许多伤员，往往几个星期敷不到必需的药剂，就是勉强能敷上一点，许久也不能换药，加以食物不足而且恶劣，吃的尽

是些干涩而缺少滋养料的小米、山药。躺在民房土屋中，天气寒冷，被褥又难得到补充，身上衣薄，且血迹斑污，一时又找不着替换的。但他们为了国家、民族，虽然辗转呻吟于床榻，却能含辛茹苦，没有丝毫怨叹。伤势稍轻的，每日还不肯放弃政治学习，仍然张着枯黄的脸，撑着如柴的躯骨，不懈地讨论着战争形势。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热血男儿，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拼着血肉，忍受着创痛，只觉得是应该的，大家都忘记了流泪，而且也不得不忘掉流泪。我们也曾竭力设法，希望从其他地区和后方，多少找一点医药物品补充，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直到后来，我们得到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大夫来军区热心帮助我们，担任军区医药顾问，建立了模范病室，才逐渐解决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上的各种困难。然而，起初很长的时间，我们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只有节衣缩食，忍痛挨冻，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经验告诉我们：困难时期，只有自己设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舍此以外，一切消极悲观，就只有灭亡。

其次，在游击区开辟当初，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是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而新的队伍又缺乏经验，急切难于制敌。

当时这一地区所留下的部队，实际上是非常的少。当八路军主力南下赶赴娘子关与晋南战场时，此地只剩下一个特务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兵力单薄，又缺乏友军配合。然而紧迫的战争环境，却给这些部队以重大的战斗任务。那时我们仅仅以两个游击支队，东西驰骋于阜平、曲阳、完县、唐县、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满城、易县、平山等地。所到之处，毁敌交通，推翻伪组织“维持会”，建立抗日地方政权机关，发动群众与组织地方武装。抛弃了一般的强迫招募方式。依靠着广泛的政治动员，创造了新的抗日部队。从

战场上取得残缺不全的武器，凑合了民间捐输的破旧枪支，武装起来，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战斗，使敌人积极沿主要铁路交通线向河北、山西腹地进攻的计划，遭到意外的严重打击。靠着地方群众热烈拥护与协助，我们的游击支队，胜利地用单独猛攻、急袭的行动，深入敌后，纵横穿插敌军之前后左右，杀伤其人马，缴获其辎重，牵制敌人以利正规军作战，虽然起了不小作用，得到了许多出人预料的可喜成绩，但我们当时力量，毕竟还很薄弱。许多地方，为了要和敌人作战，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需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民众之外，显然没有第二条路。但是民众武装，也不是急切能够训练成为坚强不拔的战斗队伍的。在敌人四面包围不断威胁中，到处是散兵土匪。素来没有军队的教育与训练的边区民众，多数四散逃亡，本来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抵抗敌人侵略的力量，加以汉奸乘机造谣，诱惑群众，不要参加武装，安心做敌顺民，以动摇落后分子，更多少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固然，由于日寇残暴的抢掠、奸淫与屠杀的残酷行为，使民众从愤恨中掀起了反抗的烈火，和我们游击支队神勇战斗的模范行为，引起了群众的信仰，与军政干部耐心深入的宣传鼓动的努力，迅速地发动了觉悟的群众，积极参加到游击队和义勇军里来。然而那些在仓促中组织起来的新游击队、义勇军，毫无作战经验，而时机紧迫，事实上又来不及从容训练，只好迅速集中了已经编成的队伍，及时开上前线。依靠着老部队与个别干部及战士的领导教育和影响，高度发扬群众的抗日情绪，坚决和敌人苦战，撑持着初步建立的游击区域，在撑持中，逐渐求得发展。可是，那时许多新成立的武装队伍，首先普遍感到的就是没有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和退军所遗弃的枪炮子弹和缴获的武器，多数残破不全，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自己设法修理，勉强使用；破坏了铁

路，把铁轨改制成刺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们解决武器问题的办法。所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游击队歌，在这里真正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同时，也收买并搜集了些民间捐输的枪支，及义勇军自己带来的枪支，帮助解决了武器问题。但是，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干部问题，起初更表现得严重。干部的缺乏会使每个人皱眉，四面八方喊出的声音，都是要干部！要不出来也得硬要，不让他们要也实在不行，结果就是我们原有的稍为老的警卫员、勤务员以至于马夫、伙夫，也都不得不让他们要了去当队长或指导员。为了要应付紧急的战局，为了回答群众的要求，为了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当前凶恶的敌人搏斗，他们既有上前线血战的高度热情，我们又怎能因为恐怕他们经验与能力不够而“吝啬”地不让他们去呢？！虽然许多人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送一批下级干部，来弥补这个缺憾，无奈后方被敌人切断，一时难以打通；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遥企着辽远的后方，何处有“神兵天将”？况且，在全国抗战急速开展的过程中，所谓后方，到处也都普遍感到干部缺乏。自己要训练一批干部，又不是立刻可以造就的。因此除了在战斗中锻炼，大胆提拔之外，显然已没有较好的解决干部恐慌的办法了。后来我们自己开办了“军政学校”，逐渐解决了部队下级干部的恐慌。但是在初期，干部严重困难，却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下，以不熟练的干部，率领着新武装队伍，和强大并且装备着先进武器的敌人作战。对于没有坚决信心的人，是绝无此种勇气的。我们幸而有此勇气。但在开辟游击区的初期战斗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和苦恼，在回忆中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在游击区开始创立的时候，由于地方武装的复杂性所引起的不统一状态，又曾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困难。

沿着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山麓，在敌人继续深入华北，

太原失守的前后，无数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相继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千百成群聚成队伍。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起来，和敌人作战。同时，有许多原来在华北抗战的部队，因与主力失却联络，留在华北，或根本不愿撤退，决心要在敌人后方继续作战，他们也都自动地形成一种武装组织单位，吸收当地民众参加，各自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武装力量，为数亦颇不少。此外，还有一些积极抗日的军官，得到政府或地方上军事机关的承认，在华北建立游击队伍。他们派人就地收容流亡散兵，也组织了若干游击队性质的部队。这些部队和各种自发的人民抗日军，都是在这—地区活动的武装力量。

但是，也正因为地方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各部分的地方工作和作战方针也就很不一致。虽然大家的目标都是“抗日”，可是各人的“抗”法不同。各武装部队对于民众的关系以及部队与部队间的互相关系，都很不密切。最可恨的是汉奸从中挑拨离间，少数兵痞、流氓乘机活跃，地方上的不安宁现象普遍存在，抢掠、胁迫、勒索时常发生。少数队伍纪律不良，给了民众恶劣的影响。我们收到这类告发信件，日必数起，老百姓有的痛哭流涕要求“剪除地方之害”。但我们觉得这些少数不良分子，假借抗日名义，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乃是初期紊乱状态中所难免的。我们相信：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难中，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稍有热血心肝的人，绝不愿忍心荼毒人民；即使是纪律极坏的军队，也不是完全不能争取而转变过来的。因此，我们对于少数落后的队伍，仍然耐心的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不断进行说服解释工作，极力消除各部队彼此间的误会与隔膜。有时个别友军中不明局势的士兵或工作人员，偶然在外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劝阻；有时遇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

服教育之后，仍一律用公文送还原部队。同时就此对民众作详细的解释，以促进各方面的关系，使这些不良现象逐渐减少。虽然在各方面还没有深切了解，没有确定统一战线的办法与制度之前，此类困难与纠纷，总是无法免除的。我们的工作同志，整天耗费在这些令人头痛事件上的时间，竟达到可惊的比例。那时我们的一个连部和地方上的动员委员会，一天就曾经处理了十二起扰乱治安的案件。

至于各个部队之间作战方针上的不统一，在同敌人进行战斗时，不能共同协作，配合作战，力量分散，甚至造成军事上的损失，这在初期更是无可申诉的苦楚。往往在一个战斗中，各个部队互不联络，谁找上敌人，谁自己去干，别人只能在旁观战。事实上只管各个的防区，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无形中便宜了敌人。在这一游击区开辟的初期历史中，此类事实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在游击区开辟初期的历史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只能给我们的工作以某些程度的苦恼与阻碍，却不能根本停止我们开创游击区以至于建立根据地的伟大事业的决心。在我们地方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我们部队指战员的英勇搏斗之下，在广大人民的热烈帮助之下，我们毕竟开创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游击区域。但那时我们所占领的区域还不曾稳固。虽然我们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就在五台县城准备成立晋察冀军区，各直属队宣布开始办公，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了军区成立并划分军分区的命令，各军分区及其基本部队宣告成立，但各分区的武装还不曾普遍的发展，新成立的部队本身还很不健全，质量也差，还只能组织零星的游击战，没能把进攻这一地区的敌人尽数打败。我们攻克和保持的地方，还很不巩固，汉奸、伪组织的活动不曾基本肃清，民众的抗日组织没有普遍的建立，发动民众武装的工作也很不够，民众的积

极性也未普遍发扬。尤其是那时在许多县份，原有政权机关被敌人摧残和瓦解后，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政权。因此，我们的工作，在当时只开辟了一个华北较大的游击区，还没有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但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各方面不断加紧努力，这一游击区的条件逐渐有了大的进步。这一进步，造成了晋察冀边区新的局面，踏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边区中心区域的广大县份里，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相当巩固的基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游击区的形态，而是一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了。

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这一转变过程，完全是和一切困难作斗争，逐步克服那些困难的最艰苦的缔造过程。一切客观条件的改变与进步，都依靠主观的努力。

当时我们认定了：为要早日完成我们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的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我们既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提出而且坚决执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为了执行这个方针，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发展武装和巩固部队的工作。我们用了全力，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当时在晋东北各县，广泛号召组织游击队或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在冀西各县，普遍组织义勇军。积极提高并紧紧地抓住了群众抗战的热情，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采取打扫战场、收买民间枪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办法来武装自己。同时，把少数的基本部

队，放手分散出去，并派出尽可能有的干部，坚决执行扩大武装的任务；不断提高政治教育，扩大政治影响，加强部队干部的领导；各级干部也都能埋头努力，吃苦耐劳，为完成任务而斗争。这样，我们在各分区就建立了相当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与大量建立武装的同时，便集中精力，积极克服各种严重的错误倾向，肃清了土匪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纠正了地方上初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滥发委任状，利诱式的发动武装，违背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部队中坚决清洗了地痞、流氓等坏的分子，加强并提高了部队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发扬了战斗中的模范作用，把部队逐渐巩固了起来。

总观这些武装部队发展与巩固的全过程，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军区才成立的两个月间。那时正当边区初期作战紧张的时候，除了我们基本队伍之外，各分区的武装方在萌长；有的基本队伍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未及扩大；有的新发动武装力量还很小，并且散在乡村间尚未集中；有的还正在着手发动组织。为了应付前线的战事，匆匆把已经组织和编制好的武装及时开上前线；未组织好的加紧组织，陆续调往前方，进行零星的游击战。依靠着全体指战员高度地积极和勇敢，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如三分区的游击队在平汉线，二分区的游击队在同蒲线作战，都取得了不少的收获。在胜利中提高了群众对游击战的信心，因而参加抗战的武装动员工作就更易于进行，各分区的部队随着也有了迅速的增加。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心，只是放在发展部队方面，对于部队的整理与训练还谈不上。

第二阶段，武装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各分区都成立了相当数量的队伍。这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加紧整理与扩充，开始淘汰坏分子。经过一番整顿，各区县逐渐集中起来，把赤

手空拳的农民变成武器相当齐备的民族战士；把许多小的零星的游击队、自卫队、义勇军逐渐汇合而成营，成大队，成支队，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四个基本的游击支队。在各部队中都建立了正确的政治制度与生活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教育，同时仍继续开展着游击战争。以少数部队向四外活动，牵制敌人；大部分则集中整理，加紧训练。若干小队伍，此时已组成兵团性质。而在这一阶段终了的期间，有些大的队伍，已向正规化的道路转变。通过这一阶段，各部队的作战都更加活跃起来。这一时期也约有两个月。

第三阶段，是从今年（一九三八）二月份开始的。这时工作的中心完全放在巩固方面。这时期因为部队经过一番大整理，继续不断地洗刷淘汰了许多坏的成分，质量有了极大地改善与进步；战斗员在政治上日益坚定，战斗力增强，所以能够全部出动攻击敌人。这些部队不但能够进行小规模游击动作，而且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大的战斗，到处表现出兵团态势的活动。大部分的部队都走向正规化了，同时在这些部队的周围，更繁殖着新的游击队。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军区武装力量乃得巩固地向前发展。这些武装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八路军的产物。他能够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他们都能采取八路军的制度与方法，仿效与学习八路军的精神。同时，在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时期中，我们又和吕正操司令所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取得了大汇合。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的第三纵队。在吕司令指导下，这个部队学习八路军的传统精神，学习八路军的经验，迅速提高和发扬了战斗力，成为支持冀中军区的伟大中心力量。当时我们把这些武装力量聚合在一起，更加强了杀敌制胜的信心。至于广泛的地方上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自卫队的建立，也于此时得到了初步的完成。而且在这几个时期的工作过程中，边区各部队的

纪律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模范的纪律影响之下，其他纪律不好的队伍也逐渐改进了。在实际工作中，使大家认识了“没有优良的纪律，部队就会死亡”的真理。我们和友军之间的关系，这时更趋密切，而各友军之间彼此的联络与团结，也都有很大的进步。各武装部队都一致了解互相团结是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促进各方的关系，克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错误观念。我们的同志更逐渐了解各友军之间的不同特点，在团结各友军中，渐次纠正了标准太高，求之太急的态度，严格地和团结友军工作中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努力与友军建立起一种互相破除一切怀疑、猜忌的心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磨擦，互相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对于各友军的胜利，曾予以普遍的发扬，以互相鼓励，坚决反对自骄自傲的态度。就是遇到友军的困难，我们也总尽力设法帮助。我们固然补充自己，但同时也积极设法补充友军。我们曾协助友军进行了扩大部队的工作，而且发动群众帮助友军，慰劳友军。有许多友军官兵掉队、落伍、失去联络、受伤、害病的，我们总极力代为收容，招待治疗，并送其归队。一部分群众，对友军有不满和怀疑的，我们也总代为解释，使友军得以挽回政治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保持着和友军彼此间善意的、诚实坦白的批评精神。这样，大大促进了边区以内各部队的和谐与团结，因而边区武装力量得到更强大的发展。我们运用了自己所建立的游击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为正规兵团，配合友军，不断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这样就造成主要的条件，具备了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力量的一环。

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恢复地方的政权。当时各县政权机关，在敌人摧残之下，事实已全部瓦解。但是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扩大与

巩固，这一地区所包括的三省数十余县的地方，势不能任其长久陷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经我们武装力量收复的晋东北十二县，冀西二十县，冀中二十县和察南四县，与原来各省政府隔绝，无法联络，而其下层之区村各级政权，亦均逃跑或惨被摧残。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计，实有立即恢复地方政权的必要。就是边区各界民众，在我克服县境，地方秩序略趋安定之后，亦皆迫切要求政权之再建。虽然当时各地也曾建立有群众半政权的机关，如晋东北各县及冀西某些县份中有动员委员会，冀西沿平汉线之某些县份有自卫会，冀中各县有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他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地方一切动员工作，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机关。但是此类性质的机关，纯粹是混乱时期的产物，绝不能认为是长期抗战过程中的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亦不尽相同，其最高机关只到县一级为止。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边区的行政，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那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宋劭文先生亦有见于此，即积极建议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以统一边区行政，使地方政治有集中之领导，以发挥抗战之力量。我们数度商谈之结果，都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于是我们一面致电请示第二战区阎^{〔1〕}司令长官转呈中央，一面于去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十八日，在河北阜平，和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袖交换意见，大家也都一致赞同这一建议。阎司令长官旋即来电转达中央批准建立边区地方政权的意旨。“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乃于十二月五日正式成立于河北阜平。除分别通知各方成立经过，并决定了代表大会召集法之外，筹备处派了宋劭文、仇友文、李杰庸、王斐然、白静斋五位先生，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得到了圆满的结果。今年一月十日“晋察冀边

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乃在阜平正式召开。大会继续了六天，至一月十五日闭会。正如大会宣言中所说：

“这一代表大会，有着边区全体武装部队的代表，有着四十余县的政府代表，有着一百余万群众团体的代表，更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及和尚、喇嘛的宗教代表与国共两大政党的代表。在大会中，代表们都贡献出自己抗日救亡工作的经验，诚恳的坦白的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勇敢的批评并纠正了过去的缺点，确立了今后正确的新的工作方针。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晋察冀边区的抗日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在行政的体系上，也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在将来收回全部失地，恢复晋察冀三省政权的时候，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结。在这次代表大会中，充分的表现了各党、各派、各阶层、各群众团体、各武装部队的精诚团结。在抗日高于一切的一贯的精神下，很仔细地讨论了各种有关抗日救亡的重要提案，并选举了积极抗日的前进分子，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大会充分表现出统一战线的异常巩固。这种巩固，是正在极力拆散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不能想象的。这更充分地表明了民主精神的逐渐加强，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坚决地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将使华北抗战更能持久，更能适合于中央之抗战方针。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有着它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切事实，都和大会宣言所宣示的完全符合，当时到会的全体代表，都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热烈地坦白地勇敢地

贡献出自己的意见，决定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民运等各项方案，并且民主的选举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以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等九人为委员，以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将大会经过详情与行政委员会的组织，一一呈报上级机关，并且得到了蒋^[2]委员长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批准。

在这个统一的边区临时政权机关建立之后，边区数十余县一千多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摇动荡的心，重新得到国家的爱抚，有所维系与依托。政府一切法令，普遍统一地施行于全边区的各县、区、乡村之中。这些区域里的一切人，除了甘心卖国的汉奸以外，不分阶级、种族、党派、男女，普遍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信仰、居住的自由；都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武装自卫的权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逐渐结束了各地方群众团体，各级动员委员会和救国会等在过渡期间代替政权的现象，而成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在边区政府成立以后，逐渐有了八千个乡村政权，完全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因为政府是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抗日的民族利益，坚决执行抗战时期的一切政策，所以它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捍卫国土主权，打击敌寇汉奸的有力武器。统计在边区政府建立以后，我们继续收复了三十五个新的县份，把这些县份里的汉奸伪政府与维持会全数扫清，建立了民众所爱戴的抗日政权，归入边区政府统辖之下。北平汉奸政府虽然在平汉沿线的某些县份中，派有伪县长，但由于那些县份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因此那些伪县长始终无法到任，伪政权无法建立。保定周围即为我军活动的地方，致使伪河北省府不得不设在伪中央所在地的北平。而北平汉奸的伪中央政府，事实上也是“号令不出都门”的。因为就在北平近

郊的宛平等县，我们已经都恢复了县政府的组织，那里的人民所执行的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汉奸政府的伪命。甚至就是在敌伪统治下的少数城市的人民，以及若干伪政权官吏，他们也都愿意接受和执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使用边区银行的钞票，购买我们政府所发行的救国公债，向我们政府交纳赋税，向我们报告敌伪消息，捐款接济我们政府和军队，而始终不愿接受敌伪的命令，使用敌伪的钞票，向敌伪交纳赋税。这样使得我们的边区政府，实际所统辖的地区，不仅仅限于我们已经收复的县份，而且包括了敌伪所统治的县份。同时，由于边区各级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各种政策，使得边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许多改革与进步，更加强了它在人民中的信仰。在全边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春耕垦荒和秋收运动的结果，增加了边区农业的生产量，普遍丰收，保障了人民的粮食与部队的给养，使广大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由开始时期的合理负担，进到建立统筹统支和必要的税收制度，并发行自由认购的救国公债，使民众没有感到负担的痛苦。对于战时文化教育工作的努力，创办了若干学校与训练班和小学教育，更提高了民众政治、文化水平，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进步。这个边区政府，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一个坚强武器。它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政治机构。它从与敌伪政权进行不断地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适应着军事的发展，积极地摧毁伪政权，粉碎敌寇对华北统治的企图，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广大领土与主权。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主要的条件，使我们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可能，而且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但是，使晋察冀边区能够从一个游击区转化为巩固的抗日

根据地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广大抗日民众的积极性的提高，民众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与一般民众武装之普遍与壮大。由于边区的民众，普遍获得了抗日的初步民主与自由，因此他们一开头就表现出空前的活跃。当我们这一个游击区刚刚开辟的时候，部队也积极地帮助战地民运工作。当我们首先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就尽可能抽出许多工作人员，组织许多工作团、小组，分散到各个地区工作，向一般人民广泛解释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凡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当地民众即纷纷起来自动地响应抗日军队，各自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一时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在各县区里都先后成立组织，参加各种救亡工作，帮助部队从事抗战动员；实现群众生活的改善。虽然他们最初都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因而也还没有统一的工作纲领，但是，他们在一致热烈地抗日情绪的激荡之下，都发动了成千成百群众，勇敢的参加游击队、义勇军，帮助军队维持地方秩序，积极推动救亡运动，都有很大的成绩。等到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那些较大的群众团体，已经能够选派多数代表出席，而且工、农、妇女等主要群众团体，就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一月十六日），同时在阜平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全边区的筹备会，各自决定了筹备时期初步的统一工作方针。到了三月三日在筹备工作完满之后，这几个团体同时召开全边区各县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各个团体在边区总的领导机关，确定了各团体在抗战时期的工作总方针与具体纲领。从这以后，他们的组织日趋健全，工作日益开展，开始走上了稳固的发展道路。这些群众团体，都拥有广大群众，即如农民救国会的会员人数，在成立之后很短时期中，统计已达五十七万以上，其他群众团体的会员，也都占有很大的数目。他们自成立以来，除了积极推动群众教育，普遍建立群众识字班，帮助政府改善人民生活之外，最主

要的成绩，首先在于他们能够积极拥护政府。他们始终用了最大的努力，支持政府的各种政策，努力执行并完成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动员。如：征收赋税，推销救国公债，在群众团体普遍深入的动员之下，短时间内就得到了优良成绩。他们更不断帮助政府，完成维持治安任务，实现了政府建立地方自卫武装——基于自卫队的计划，同时还帮助政府推进了民主政治，发动民众参加乡村选举运动，严格执行了反贪污斗争的章程，提高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仰，加强了各级政府的威信，巩固了边区政权。其次，他们工作的成绩，更有力地表现在对战争的直接帮助上。这些群众团体，自他们建立之日起，即以扩大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只就农民救国会，在成立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所发动的武装来说，已达一万五千余人；工人救国会并且单独组织了工人游击队。同时各县的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非常踊跃地在每次战斗中，发动当地群众，普遍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员，有时是搬运战利品，协助部队清扫战场。在过去的战斗中，有不少县农会负责人，竟亲自率领着几百个担架进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勇敢救护受伤的战士。至于接近敌区各县群众团体的成千成万会员，还能经常配合军队作战。在沿平汉路各县的群众团体，帮助作战部队破坏敌人公路、铁路、电线，动辄数十里以至百余里，每次满载而归，几乎从未间断过。我们曾继续不断地得到各种报告记载，说明群众此类英雄行动。如：去年春节的晚上，平汉路附近唐县，一个乡村的群众，自动在望都、清风店之间，割了六百四十多斤电线，立时“破坏敌人交通”的浪潮高涨了，谁也跃跃欲试，于是一千斤、二千斤、三千斤……直至一万斤电线，都连续不断送到县政府里来。望都、清风店之间的电线，数日内完全被拆光了。鬼子们索性不要线杆，改用皮线，但没有几天又被群众割完了，敌人把线杆镶上铁皮，也被锯了。敌人用了所有的方

法，都没有效果。后来计算起来，一个群众拆回的电线，共达八百多斤。又如：二月七日晚间，曲阳县城南一个村庄里有六个群众，自动去破坏敌人交通，正在动手的时候，敌人压道的铁甲车开来了，他们都爬伏在地，车过后，他们把小铁桥上的铁轨钉子很快的拔下了，不到半点钟，后面的火车，噓着气得意洋洋的驶来，立即出轨，跌进小河沟里去，后面的车辆，迭压下来，车上七十多个日寇兵顿时都被砸死了。再如：一月二十二日晚，唐县县长带着一百多个小学教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极度高兴的情绪下，竟忘记了一切，一齐出动去破坏敌人交通，第二天他们捐了几千斤沉重的电线、铁丝，兴高采烈的胜利回来了。像这样的例子，简直举不完。不但平汉沿线如此，就是同蒲路沿线各县，也有同样的成绩。现在同蒲路北段已成了蔓草丛生的荒野了。有些地方，青年救国会还秘密组织了许多积极青年，成立了“破坏交通先锋队”，数十人编成一中队，有计划地去破坏敌人交通。某些特殊的县份，群众团体还有“土枪队”组织，英勇地协助部队在火线上与敌人作战。地方上日常锄奸工作，更几乎完全由群众团体来担负。各区、村普遍都有锄奸组织，除站岗放哨之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乡村，还建立了秘密锄奸网，帮助政府及军队侦察汉奸匪徒，检举破坏分子，加强政府保甲制度。此外，各地群众团体，最普遍地执行了慰劳战士和伤兵的工作。譬如平山一线，只就农会在短短数月内募捐的鞋子，送给前线战士就有八千余双；其他如米、面、猪、羊等，更为群众赠送给战士最平常的慰劳品。一般群众，特别是群众团体的会员，自动给抗日军人家属担水，送柴、送米和帮助他们家庭耕地，挑粪等，都成为日常工作。至于动员枪支，进行归队运动，在各群众团体的努力下，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在群众抗日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之下，民众组织的普遍建立

与发展，一般民众武装的成长与壮大，群众对于战争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行动，日益活跃地成为边区抗日不可制服的力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群众条件，这一条件的具备，就使我们晋察冀边区确定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

虽然，今天的晋察冀边区，还不能说已经是全部完成了它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整个转变过程。过去它已经在残酷的斗争中成长了，今后它还要在更残酷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

二、一年来我们在敌后战斗的收获

总计我们从这一游击区的开辟，以至建立根据地的整整十三个月的残酷斗争过程中，在敌人四面八方围攻之下，我们部队在军区周围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和敌人不断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消灭了一万五千以上敌伪军。我们无日不在和敌人作战，特别是在配合主力战场战斗紧张的各个时期和青纱帐期间，更加积极的活动，昼夜不停袭击、伏击和扰乱敌人，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感到严重的损失威胁，因而引起了敌人这一次对边区布置了更大规模的新的围攻，而我们粉碎敌人新围攻的战斗，直到今天还没有最后结束。这在后面将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为明了过去一年间，我们在敌后战斗的经过，我想先就这一次敌人的新围攻没有开始以前的历次战斗，做一回顾。同时这对目前敌人围攻边区和我们粉碎敌人围攻的形势了解上，也是必要的。

军区从开辟的那一天起，就用了挺进、急袭的行动，与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不断地获得许多光荣的成绩。其中，比较大的战斗叙述如下：

（一）开辟时期的战斗（一九三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初）

这一时期还在军区成立以前，正当敌人攫取太原，向山西腹地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主力在平型关胜利以后，又配合忻口、娘子关战斗，接着晋南战事转紧，我主力南下增援。晋察冀这一块广大的地域，就只留下少数队伍。那时纵横游击于敌人侧后的，仅杨⁽³⁾支队和骑兵支队。杨支队活动于灵丘、广灵、涞源间；骑兵支队活动于阜平、曲阳、行唐间。我们靠这两个支队的积极活动，深入到了察哈尔和平汉线两侧。杨支队于九月二十五日在灵丘附近开始与敌作战，击溃敌人两个联队，毙敌三百余；十月十日攻克涞源城；十五日伏击广灵、灵丘道上之敌；十六日收复广灵城；二十三日克灵丘城；二十六日攻占蔚县；十二月二十七日又收复龙华，占领易县。中间战斗十余次，缴获与毙敌甚多，造成以蔚、涞、广、灵四县为中心的游击区域。骑兵支队进入河北后，于九月十九日开始击退敌骑数百于阜平之倒马关，保住了阜平；十月间石家庄失守后，又复深入到平汉线敌人后方，大肆活动；十月十八日占曲阳，后击溃进犯曲阳之敌；二十四日占唐县；二十九日占完县；十一月十一日又进占满城，开创了冀西的游击区。

这两个游击支队的迅速行动和积极艰苦的战斗，配合广大民众，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经过二十余次战斗，获得了不少胜利，奠定了晋察冀军区的基础。

（二）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太原失陷后，由于我军区在敌后方的创立，更由于我军区部队不断地向冀、晋腹部深入活动与破坏交通，使敌感受莫大威胁，故自敌南进至临汾以后，更企图用较大兵力来“肃清”我们，巩固敌寇的后方及其交通线，把我们晋察冀抗日力量完全“扫荡”净尽。这便是第一次对我军区的八路进攻。

这次敌人的兵种，有步、骑、炮、空军及机械化部队，兵

力约两万人，分进合击，来势汹汹，大有一举而踏平晋察冀军区之势。

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起，敌人即开始了“八路围攻”行动。第一路由怀来向蔚县进攻；第二路由天镇、阳原攻蔚县；第三路由应县攻浑源、广灵；第四路由保定、易县攻涞源、灵丘；第五路由定县、新乐攻曲阳、行唐；第六路由石家庄、获鹿、井陘攻灵寿、平山；第七路由平定、寿阳攻盂县；第八路由代县、忻州攻繁峙、定襄。第一路开始后，其他各路先后协同动作。但由于我军区游击队的奋勇作战，和群众的积极配合，敌人的企图终告失败。当北面之敌进攻广灵之乱岭关及蔚、浑间之北四村时，即遭我军迎击，发生激战，敌寇死伤五百余人；东面由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之敌，有步、炮、骑三千余人，飞机数架，进占涞源，经我军于大小龙华予敌以袭击，敌即仓惶向易县溃退，我缴获汽车及无线电台各一，其他军用品甚多。由定县、新乐攻曲阳、唐县之敌，有步、炮一千七八百人，汽车百余辆，分进至高门屯、豆家庄时，亦均被我击退；西面自代县、忻州来攻之敌，刚一开始出动，即被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并袭占原平，敌死伤百余人，即败退忻、代县城；南面由平定向盂县之敌，被我伏击，大败于清城；从井陘向小寨进攻之敌，亦中我埋伏，惨败而归。总计全部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战斗，从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下旬结束，在不断斗争中，敌军伤亡达一千余人，我缴获枪械子弹军用品极多。我军虽亦有若干伤亡，但敌之伤亡尤重，终于把敌人围攻的计划粉碎了。

（三）洪子店、温塘战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当敌人“八路围攻”失败后，我军战斗情绪与战斗力更加提高了，民众抗战积极性也更加发展了，因而在军区周围各条

线上的活动，也就日益加紧，使敌人遭受更多损失。当时，敌人对于晋东南一带的军事运输，主要是依靠正太铁路，而正太铁路却不断被我破坏；乏驴岭铁桥亦被我炸毁，井陘煤矿被我袭占，自来水井亦遭我破坏；自石家庄至平山之汽车路，更经常遭我袭击，敌军运输大感困难，无日不受我之威胁。于是敌人乃于一月十一日抽调步、炮兵二千五百余，由平山、井陘分两路向我房山及东、西回舍进攻。但敌由南向北之一路，首先遭我伏击于南、北马塚，敌伤亡二百余，残敌固守村庄顽抗，后敌增援部队赶到。同时，温塘方面，我军与敌之主力开始接触，双方激战甚烈，敌虽伤亡将近三百人，但因两路会合向我猛攻，我军乃暂退洪子店。敌于二十三日攻占洪子店，我军机动转移至敌军后路，积极活动于平山、洪子店之间，敌以后路空虚，经我突击挫败，至二十四日晨，即仓惶退回平山城内，洪子店、温塘终被我收复。

（四）平汉线的奇袭（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

当敌人加紧进攻津浦路与晋东南，我军反攻，主力战场战事紧张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为了配合主力作战，策应晋南反攻，于二月九日夜间，在平汉线举行了大规模袭击。分九路向新乐、定县、清风店、望都、方顺桥、保定、满城一带，全线猛攻。结果于一夜之间，克复了新乐、定县、望都三城，击毙敌军官兵数百名；摧毁了新乐、清风店、望都、保定、满城一带的汉奸维持会，捕获了大批汉奸；缴获步枪、子弹、战马、军用品极多；破坏铁路总计达数百里之长；俘虏敌军多名；新乐、望都、定县、清风店、方顺桥各车站均遭我焚毁，并焚、毙负隅顽抗之敌宣抚官等十余人；还动员了千余群众破坏铁路、电线，获电线、铁轨数万斤。同时，我军另一部于是夜袭占浑源县城，与平汉线各部队行动相配合，获得了各方称誉的平型关以后的大胜利。

（五）阜平、完县、唐县、满城之役（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至十日）

平汉线之敌，于二月九日遭我猛烈袭击后，异常震惊。敌为保护其交通线之安全，并图残暴之报复，乃抽调大兵增至高碑店、保定、石家庄之线，总数达一万二千余人，在飞机十余架掩护下，于三月四日起，分向我军区进攻：一路由易县向紫荆关前进，于次日进占大、小龙华；一路进至满城，九日进至倒马关；一路经完县、唐县，八日进占军城北关；一路经曲阳，沿途烧杀，于九日晨进抵阜平。进攻阜平一路之敌，数达五千人，另有骑兵千余人，并以猛烈炮火轰击阜平以西之法华村，以掩护其前进。我军当时正面兵力较薄，经在曲阳、阜平大道上两度苦战后，遂放弃正面阻击，待敌深入后，我各支队及游击队在敌之侧后及交通线上猛烈袭击，敌后方损失颇重，首尾不能并顾，极感恐慌，遂于十日开始撤退。退却中因受我军截击，不敢稍停，行动慎重，竭力夺占路旁高地，并在重要村庄构筑工事，队伍分三四路跑步退却，恐中埋伏。后面掩护队更不断向后无目标射击，同时复以汽车守候于曲阳、完县、唐县各地，退却部队到达，立即登车驰奔。阜平之敌亦于十日夜间慌忙逃退一百二十里，登车后复以骑兵掩护而去。我军截击，缴获手榴弹、子弹数十箱。

（六）代县之攻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至四月十六日）

我军一部，于三月三日向代县作猛烈袭击，把代县的敌人驱逐向阳明堡方面溃退，缴获敌军枪弹军用品甚多，并捕获雁门关以南七县维持会会长大汉奸王维堂。与敌军相持了二十余天后，敌以六百步炮增援，我军退而复进，于四月十六日再度夺城，攻入城内，毙敌六十余人，缴获子弹、手榴弹、电线甚多。

（七）涞源大战（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

军区部队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之半个月间，与敌在涞源大战。这在军区是有重大意义的战斗。敌人于三月中旬，以步、炮、骑兵十四个联队，由易县经紫荆关进攻涞源。企图打通易、涞和涞、蔚公路，并修筑机场，选择重要据点构筑工事，以切断军区与第一军分区及伸入敌人远后方各游击队的联络，使军区活动的范围缩小，保障敌人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敌人事先在金波构筑坚固工事，屯积大量粮食，然后即向紫荆关、涞源进攻，前后六天间，经过四次战斗，始进至涞源。但当时由于我包围涞源的部队机动、坚决、勇敢，以运动战与游击战适当配合，坚持战斗近半月之久，敌不断被我袭击、伏击、夹击，大小凡四十余战。敌军每次均遭受重大损失，伤亡达一千四百余人，我军俘获人、马、武器、辎重甚多。特别是在于善铺至浮图峪之线，敌遭我四次痛击，终于四月十一日拂晓四时，仓惶向东退却，我军当即收复涞源城，并乘胜追击，直至易县城下。此役，敌军除遗弃辎重外，尚有尸体数百具焚烧未竟，臭气冲天，狼狈不堪。总计自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止，在浴血大战中，我军终于完全打败了进攻涞源的敌人。

（八）冀中各县的袭占（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一日）

平汉线东的河间、高阳、安国、大城、献县等县，曾被敌人视为冀中的军事据点，特别是安国，敌人企图久占以为其坚固据点，借以阻碍我军的行动，减少我军对平汉线东西夹攻的威胁。但由于我冀中部队的英勇战斗，自一月二十六日起，即诱击高阳敌驻军板垣师团第一大队之一、三两中队，将敌全部消灭，并击毙敌第三中队中队长。其他各路亦相继猛攻，经不断之围困袭扰，安国首先于四月八日被我军袭占，敌人向定县溃退。高阳亦于四月九日被占领，肃清残敌，俘虏甚多。大

城、献县于四月十一日前后，在我军围攻之下，亦相继收复，大城之敌向唐官屯退去，献县之敌向沧州溃窜。河间亦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我军与民众武力配合之下，被我克复。至此，敌人久占五县的企图，尽告失败。而我冀中军区的基础，遂臻巩固。

（九）平西之游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

当津浦线主力第二次大会战的时候，我军区游击支队一部，为策应主力，牵制敌向津浦、徐州的进攻，于三月间即积极向北平方面挺进。三月十九日，一部已占领了矾山堡，摧毁了该地的维持会，解决了该地的公安局和伪警武装。一部至门头沟，于四月十日与该地反正之保安队及警察联络，与平津开来之大队敌军激战，敌伤亡极多。又一部进至妙峰山，该地伪宪兵带了全副武装反正过来，良乡西之坨里车站警察，亦全部反正。北平四郊交通，均被我游击队切断，敌异常恐慌，将北平城门紧闭。五月十三日一时，我军分途袭占昌平县城及阳坊镇，缴获长短枪、战马、子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俘获日军及汉奸十余名。同时且有敌伪宪兵二十余名反正。良乡、涿州、涞水等县亦均一度经我收复，建立了平西游击区域，成为我军向冀东及热、察、辽边境挺进活动的根据地。

（十）石保线之扰击（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

当徐州攻守战紧急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为了配合津浦线徐州主力的战斗，除了一面派遣游击支队向平西一带挺进活动外，同时于四月下旬起，更积极在平汉线之石家庄至保定一段，不断袭扰敌人。我游击队一部于四月二十八日与五月三日两度夜袭保定，并占领南关，活捉敌军，缴获大量汽油及其他军用品，敌伤亡八九十人，我军更进袭敌之飞机场。另一部于五月三日及十四日两度夜袭方顺桥及于庄车站，与当地群众配

合，破坏敌之铁路、电杆、电线数十里。同时又一部数次袭击定县，亦均获胜。致令敌人不得不以大的兵力增援到保定、定县、石家庄一带，以维持其交通，我则达到了牵制大量敌军之目的。

（十一）平汉线、平绥线的攻扰（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当主力战场战事中心向武汉转移，保卫武汉战斗开始的时候，我军区部队在平汉、平绥两路沿线上，分头出动，扰乱敌人，牵制敌人。敌曾企图报复，如六月十九日敌伪以一千五百余人进攻安国，大肆烧杀，但愈激励群众与我军战士之同仇敌忾情绪，我军各路活动愈加猛烈，连续不断地攻袭敌人占领的城市据点，破坏敌之交通，多方面予以扰乱。平汉线上，我军于六月二十日即大举反攻安国，数度激战，将安国之敌击退，收复安国，并于敌军逃窜时设伏兵击之，敌遗尸百余具，伤亡三百余人，我缴获枪械、子弹甚多。六月十八日我军复向保定之敌进攻，一度袭入保定北关，并破坏桥梁一座，敌火车一列出轨。二十五日我袭敌于正定西北之东柏棠，毙敌颇众，缴获亦多。二十八日敌我遭遇于徐水、容城间，发生激战，我终将敌军击败。我挺进纵队六月十七日一部向兴隆之敌袭击，敌在该地筑有十一个堡垒，被我攻克九个；八日又在洗马庄伏击敌人，并反攻杜家庄，均有收获。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我军在广灵附近与敌激战，将敌击溃，并将井东集、安家皂、友宰堡之敌消灭，总计前后将近半个月，平汉、平绥两路沿线敌军，片刻未曾安宁，无时不受我军之攻扰。

（十二）纪念“七七”全线总攻击（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深夜至八日清晨）

为了回答日本法西斯的对华侵略战争，为了纪念伟大抗战一周年，我军区各部队一致决定了“七七”纪念日举行全线总

攻击的武装示威运动。我们的布置：在平绥线上分成五路；平汉线上分成三路；正太线上分成二路。配备完妥后，即开始向敌人进行猛烈地攻击。

平绥线上我一路某部，于六日夜前进至门头沟东北山地一带，至当夜三时（七日三时）骤然袭击北平城西北的石景山发电厂，两座大锅炉和一个火车头顿时在英勇战士们的枪炮和手榴弹的愤怒猛击之下炸毁了，北平顿时变成了黑暗世界，枪炮声音震撼了整个傀儡的所谓“首都”，敌寇紧闭四门。我同时占领离北平不远之西山、香山。直至六时许敌人始仓惶开出援兵五六百人，并以飞机九架协同向我进攻，我军奋勇激战至下午四时，在两度反冲锋下，最后将敌击溃。我第二路进攻北水泉堡垒之敌，在猛烈冲击下，突破敌之坚固工事，攻入堡内，虽敌企图迂回包抄我军，但终被我突破，酣战至天明，于拂晓时退出战斗。同时，我另一部占领桃花堡。第三路在广灵、西合营、暖泉间展开了激战，我将敌全部包围。后敌来援，又被我截击，敌不支，全线溃退，我击毁汽车十余辆，缴获极多。第四路在九宫口、牛大人庄与敌步、炮兵激战，我军灵活机动，攻敌弱点要害，左右夹击，将敌击溃。我第五路进攻兴隆附近花盆村之敌，将驻守该地之敌伪三十五师三十二团的一个营全部消灭。

平汉线上第一路我军两部，于六日晚向易县城、店北车站、二十里铺、门墩山等处之敌进攻，彻夜战斗，激战至七日，易县除东、西城楼有敌外，全部被我占领，直至九日午后四时，我方退出城外。此役缴获极多，店北车站亦被我克复，门墩山亦被我占领，二十里铺以西铁路、电线大部被我破坏，直至九日尚未通车。我第二路于六日开始向保定、定县、新乐、于家庄、方顺桥之线进攻，分由南北夹击，将保定南北两关占领。另一部将保定、定县间铁路一段拆毁，铁轨破坏，适

有敌车开来，即行出轨，我并将敌车头炸毁。定县车站亦被我袭占。清风店伪军一班，当时在我军影响之下，即行反正。第三路在徐、满一带，以步、骑配合，袭徐水以东之王村，击溃敌伪保安大队，俘九十余人，该大队长亦被我俘获。同时，我军复猛攻满城东之曹河车站，敌仓惶逃遁。我军一部进到易县时，敌警戒部队亦被我击溃。

正太线上，我某部任第一路，于六日夜间长驱直逼平山城，当地敌守军虽众，但赖我指战员的英勇，往返冲杀，展开激烈巷战，卒将城东北门占领，因我后援未及时赶到，乃安然退出战斗。第二路我军亦于六日夜间进至正定附近，以少数部队诱敌出击，然后在埋伏圈打击敌人，敌遭惨败。我破坏交通队挖毁铁路二十余里，并获电线三十余斤。同时，我军另一部攻入新乐及长寿车站，击毙敌之守军。

总观“七七”总攻，自六日夜间开始，至八日结束全部战斗。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主动灵活有计划地给予敌寇重大打击，使敌遭受重大损失。总共歼灭敌军约一千四百五十人，俘虏敌伪军一百三十名，伪军反正者十二人。我缴获敌步枪共三百余支，机枪四挺，驳壳枪十二支，手枪二支，迫击炮一门，子弹二万五千余发；战马十四匹，望远镜一具，钞票一千五百元，收回电线约九千斤，炸毁发电厂锅炉两座，火车头二个，铁甲车一列，载重汽车二十三辆，铁桥两座，破坏铁路百余里，其他军用品及粮食、布匹等未计。敌除了军队伤亡及被俘与武器弹药的损失外，被我夺获及破坏的物品价值亦甚重。

（十三）冀察热辽边境的游击（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至八月七日）

六月间我派遣宋、邓^[4]挺进纵队，深入到久经敌伪统治的冀东，进窥冀、察、热、辽边境，以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在月余的浴血苦战中，收复了冀东十七县，不断取得很多的胜

利。在我军直接影响与帮助下，当地已有的及潜伏的武装，一致联合，并形成“抗日联军”，于七月九日在洪麟阁、李运昌二氏领导之下，在昌黎、乐亭、滦县、迁安、遵化、丰润等县起义。七月十九日复有唐山煤矿工人七千余人暴动响应，将北宁路截断，炸毁敌伪之矿山、油库，与日伪军进行激烈战斗。我宋、邓挺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开会，结果组成了冀、察、热、辽游击军区，以统一指挥，继续长期的战斗。八月四日袭占迁安县城，七日复攻克蓟县，胜利地开辟了广大游击区。

（十四）灵寿保卫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至八日）

九月初旬，敌人准备向我军区大举围攻的时候，为了完成其包围计划，曾首先向我位于行唐、平山之间的灵寿作三次猛烈的进攻。第一次在九月五日，敌于清晨五时由正定出发，前后开来汽车三十辆，步、炮兵九百余人。我军一部在化皮、塔底与敌激战；另一部由慈峪跑步赶到，将敌包围，敌不支向韩家楼逃窜，又被我军迂回痛击于南义合庄。敌由正定再度增援，我与敌前后激战七小时，敌军败溃，我追击十余里，毙敌百余人，敌以五辆汽车载尸而逃。次日，我军得报，敌已准备第二次进攻，我军乃设伏于曲阳桥，以截击敌人，至晨七时许，敌军以汽车十四辆前进，到一千公尺距离时，突向后逃窜，事后知有汉奸走漏消息。我伏击未果，但敌已恐慌逃退。八日拂晓敌复以四十八辆汽车，千余兵力，向我作第三次进攻。进至南纪城，即遭我伏军迎头痛击。敌情况不明，知中埋伏，交战不久，即向韩家楼逃退。此时我主力复从灵寿赶到，截击逃敌于同下以南，以猛烈之冲锋，将敌先头部队一百五十余人，全部消灭；后继敌军亦被我击退。我复追击数十里，再毙敌八十余人，击伤五十余人，“皇协军”死一百二十余人，伤七十人，敌伪军共伤亡四百余人。总计三次进攻，敌死伤六百余人，终不得入灵寿一步。

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我军区开辟以来直至此次敌人新围攻开始以前，比较重要而有意义的战斗。此外，还有其他大小的战斗，不及详述。但根据我参谋处所统计的结果，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军区成立之日起，直至今年十一月七日军区周年纪念日止，各兵团正式报告统计的大小战斗，凡四百三十四次。至于军区初开辟未正式成立以前，未详细统计及遗漏的各次战斗，以及粉碎敌人新围攻中未总结的战斗，如果都把它综合起来，那么，我们估计过去总的战斗次数，当在六百次左右。现在只就已正确统计了的四百三十四次战斗，依东西南北各线，顺序列表于后。（略）

以上在这大小四百三十多次战斗中，我们杀伤和俘虏了很大数量的日伪军，缴获了许多胜利品，破坏了敌人许多交通工具与建筑物，这些收获，于下列表中可见：（略）

这里所统计的，同样也只是从军区成立以后至周年纪念日止，根据正确报告调查的数字。如果把军区成立以前和未正式报告的，以及最近未详细统计的材料，综合估计，当然还不只这个数目。

但是，我们一年来的收获，实际上还不仅仅是在于这些统计数目字上。

由于军区在华北的存在，在牵制敌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配合主力作战上，曾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着战略上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太原失守后，敌人的南进主要是经过同蒲路，然而同蒲线的铁道、公路并三条干路，却都被我军区游击队袭击，毁坏了两条半（有一条是时断时续没有完全破坏）。正太路方面也受我们经常的破坏，致敌人不能方便地利用，我游击队曾不断袭击正太路的敌军运输队，获得了大量军需品。当太原失陷，正规军转移时，我们能立定脚跟，修筑了韩侯岭工事，牵制敌人，使敌人不能及时继续向南进攻，长

驱直下风陵渡的企图遭受阻碍。这样，就便于我们晋南主力的休息、调整，布置反攻。后来敌人不断抽调兵力向我军区进攻，但均先后被我粉碎，我经常牵制了大量敌军于军区周围。这些都证明了我军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在战略上起了第一步的作用。

军区部队的作战，对于全国主力的配合与策应的作用，更是被铁的事实证明了的。

当津浦线战事紧张，晋南主力开始反攻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不但采取了小队伍的游击动作，并且曾经用了大队伍在平汉线以兵团的动作，举行了大规模的袭击，攻下三城，猛烈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不得不在平汉线增兵几万以上，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使它不能开赴津浦路和晋南参加作战，减少了敌人在主力战场上的力量，配合了全国范围的战争，造成了平型关战斗以后的大胜利。虽然所得的战利品不及平型关之多，但已完成了配合全国主力战斗的部分任务。敌人虽然恼羞成怒地向我军区边境大肆烧杀，逞其残暴兽行，从完、唐而至于阜平，但我们所完成的光荣任务，并不曾丝毫受到动摇。战争本来是富于破坏性的，我们绝不能因一二城镇之被烧杀而忽视了我军伟大的战略作用。

再如，津浦路第二次大会战时，敌人匆忙的把兵力转移到津浦线方面去。那时我们军区部队更积极地出动，袭击敌人的远后方，以牵制其向津浦路徐州的进攻。我们的挺进部队，直逼平郊，占领了昌平、阳坊镇，使北平敌伪感到极大的恐慌与动摇，良乡、涿州、涞水也都被我军一度收复。其他如石家庄、保定等地及晋东北各县，亦不断有我们的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袭击车站，占领城市，使敌人不得不向保定、石家庄一带增兵，感到首尾不能兼顾的苦恼。北平附近的宛平，早已建立了我们的县政府，摧毁了许多伪组织，使新的汉奸政权也

无法建立。我们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政府，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拥护。有的县份虽然敌人占领了城镇，但我们仍然能够建立游击政权，与汉奸政权对抗，争取广大群众到抗日阵线上来。而在保卫武汉的主力战开始以后，我们更不断在平汉、平绥线上大肆攻扰，举行了“七七”全线总攻，并猛烈地向冀、察、热、辽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在战略上对于主力配合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军区已往的全部军事行动，其目的完全是在配合主力作战，我们的战略任务，完全是随着主力的任务而转移；我们的利益，完全服从于主力的利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我们的行动，无一不是为求主力的胜利。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主力远在津浦、陇海、华中、华南，近在晋南，我们都能够与他们配合。我们有时虽然明知吃亏，也要为主力的胜利着想而勇敢作战。

除了配合主力的战略作用以外，在另一方面，我们这一军区起了各方抗日力量团聚中心的作用。自从军区成立以后，影响不断扩大，各地群众都纷纷归聚到我们这里。有些动摇不定的少数地方军队和半土匪性的军队，也因为我们有我们在这里而不敢投降敌人，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抗日的立场，团结在我们周围。如果没有军区的存在，我们相信还有许多新的汉奸武装可能产生，现在不但他们抗日的立场稳定了下来，而且大多数都逐渐转向积极抗日的道路上来。同时，在我们坚持抗战、英勇牺牲的精神，和不断胜利的影响之下，加以敌寇残暴兽行的刺激，使军区周围许多被逼迫而暂时屈服于日寇暴力底下的武装同胞，纷纷率领部队，脱离了伪组织羁绊，举义归来，重新投入祖国的怀抱。在军区部队过去大小战斗中，各地武装反正的同胞，或一班，或一排，时有所闻，且互相影响，逐渐使武装反正成为一种热潮，反正的数目日益增多。仅就今年八月份以后说：八月二十二日有满城“警防队”石振声部四百余人起义

归来，八月二十五日保定“警防队”八百余人在李允声、王彦东率领下，和徐水“警防队”四百余人，同时起义，并与石振声部会合，同来军区。最近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复有从永清县河头之“皇协军”四千余人全部武装反正。这些武装归来的同胞，我们都已经在并且还要继续在抗日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中，完全证实其英勇、坚决与忠诚。他们都是伟大中华民族优秀的男儿，高度地热爱着祖国，愿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光荣的胜利而奋斗到底。此外，还有许多仍然在敌人压迫下的武装同胞，时常给我们传递消息，或捐输抗日经费给我们。这样，使我们军区更加成为一切抗日力量团结的核心，而敌人在华北的统治更加动摇。

尤其特殊的是：军区的周围，紧接着晋东南、晋西北、冀察热辽和冀中等区域，而灵活巧妙地配合包围着占据几个大城市和交通线的敌人，成为华北军事上的一个最重要枢纽和收复华北及东北的前进阵地。这一地理上的特点，使军区更有力地威胁和影响整个华北，控制华北敌人交通运输全线及其后方的命脉。

然而，这些还只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考查。实则，我们一年来在敌后英勇地坚持着长期的战斗，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政治上，最明显的，谁都知道，当国军南撤时，华北正到处酝酿建立伪政权，有的且已建立，但由于我游击战争猛烈的发展，收复了广大领土，并恢复了边区数十余县统一的地方政府，使已建立的伪组织全部被摧毁，未建立的始终无法建立，使敌伪欲实现其对于华北统治的企图，完全失败。而边区一年来巩固与发展的事实，不但在国内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促进了其他沦陷区的游击战争，而且在国际上粉碎了日寇已经占领华北的欺骗宣传，增加

了外国人士对于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甚至如美国的人士，还来电愿帮助将边区的救国公债在美国推销；美国医院愿意到五台进行救护与治疗工作。这样使国际对我的视听起了很大转变，使他们了解到：日本占领中国的某些城市是一回事，而能否统治已占领了的区域又是一回事。从而，国际间对于我国抗战所抱的态度愈趋有利。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政治上重大的收获。

在经济上，由于我军区的建立、扩大与巩固，边区政府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保障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经济，特别是促进了战时的农业生产；确定了商业贸易与金融制度，保护了民族经济，并且使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打击了敌伪经济，使敌人不能顺利地掠夺边区所生产的原料，无从继续其对于广大华北人民的榨取与剥削，更无法开发和利用我华北的资源，以补日本国内经济的枯竭，从而难以支持对华长期侵略战争中财力、物力的供给。

无疑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我们一年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战，不断顽强地战斗的收获。

三、日寇的新围攻和我们的反围攻斗争

正因为我们军区在过去一年的斗争当中，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军事、政治、经济上各方面的许多胜利与收获。对外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的影响，不断地扩大与提高，引起敌人极大的不安与忌恨。同时军区地理位置重要，更成为敌我在华北必争的场所。敌人欲肃清华北各地区的抗日势力，必然首先要进攻成为华北重要枢纽的晋察冀边区，企图首先消灭这个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堡垒，除其心腹之患，然后继续进攻其他区域。因此，在过去一年间，敌寇曾不断抽调大军，向我边区进

攻，虽然过去的那些进攻都先后被我粉碎，但是敌人进攻的计划，却不曾因此而中止，反而随着我军区的继续扩大与巩固，更疯狂地更有计划地向我们举行更大规模的围攻。

最近敌人就是这样举行了对我军区新的围攻。在这一次围攻中，敌寇所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较过去任何一次都多而且大，并且还在政治上采取了更毒辣更巧妙的方式，更有计划地配合它的军事行动。因为敌人对于我们军区首先就有了很高估计。就我们所看到的，在敌伪报纸的社评上，曾经用尽一切挑拨离间的字眼，无耻的诬蔑之词，大吐狂言，煽动对我军区的进攻。它们对我们军区的估计有如下文字：

“数月来中国共产匪军，即所谓朱德麾下之第八路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惟查彼等匪军之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属支蔓。不图近日益居心不逞，意图扰乱内长城线，威胁京师，日军坐视不忍，遂决心分兵围剿，开始犁庭扫穴工作……以价值论，汉口、五台，各为党军及共匪军最后根据地，日军之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军事收获一般伟大。”（见十月十六日汉奸正报的社评）

其他敌伪军通讯中，就我们所得者言，也都经常有此类文句。如敌寇的同盟社电讯曾云：“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见十月五日汉奸正报载同盟社四日电讯）

在这些夹带着诬蔑谩骂的文字里，恰恰表示了敌寇对于我军区所给予它的威胁与打击，感到了极度深重与不堪的苦恼与仇恨情绪。而它对于军区的估计，也就使它不得不以相当强大的力量来应付我们。

的确，敌人此次对于我军区的新围攻，是集合它过去一年间屡次进攻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经长期准备计划之后，集中一

部分力量，慎重地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的大规模围攻。

这一新的围攻战斗，是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开始的，而且直到今天，这一围攻的战斗还没有完结。

本来，敌人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计划与准备之后，自九月十日起，即已开始抽调兵力，纷纷向我军区周围各交通线增兵，直至九月二十日止，军区周围交通线上的敌人，总计已达二万人以上，至九月三十日止，敌先后向军区周围继续增兵，总数达三万余人。敌人的战术在此次大围攻中，有相当改进，敌军的动作一般都非常慎重，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步步靠拢，非有特殊情况，不轻易深入，前进路程甚短。且沿途所过，以各种新方式进行其政治欺骗，掩饰其残暴的烧杀、抢掠、奸淫之兽行。

这一次敌人围攻的军事行动，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敌人第一步的围攻计划，占据军区周围铁路沿线重要城市为据点，以备深入。此时敌人以二万余兵力，首先从东面开始进攻，分兵三路西犯：第一路由定县出动，第二路由望都出动，第三路由保定出动。我们最初拟在敌人分进合击之时，即予以猛烈地各个击破，如晋东南粉碎围攻一般。但是，因为敌人此次围攻边区的战略战术与边区的整个形势，与晋东南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得不运用其他方式以对抗敌人。因此，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开始进攻时，我们就避免正面不利的战斗，仅以少数部队与敌接触，只在特定的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当定县之敌进攻曲阳，进至七里庄时，我某部主力由李赵邱出击，与敌激战三小时，杀伤敌军百余人。当敌增援部队由某司令官率领进犯时，我即撤退，至乔家马时，则复以激烈之战斗，毙敌五十余人及骡马数十匹。从望都出动之敌，入唐县店头镇时，我军乘有利

时机予以迎头痛击，激战竟日，将敌击溃于麻黄头附近山沟中，歼灭百余人。后敌增援，施放猛烈炮火与毒气，我复撤入山沟中。虽然敌人终于先后占领了曲阳、唐县、完县及吴村镇，我军未能阻止其前进。但我们在敌优势兵力下也并不企图阻止其前进，以争取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给予突击而消耗之。当敌人占据沿铁路线各城镇据点后，战斗即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自九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敌四面增兵，进行第二步的围攻计划。以二万三千左右之兵力，分十路向军区内地进攻：第一路由曲阳向阜平、龙泉关；第二路由忻县、定襄向东冶、五台；第三路由盂县、上社、柏兰以趋五台；第四路由代县、繁峙向峨口、五台；第五路由浑源向大营；第六路由广灵向灵丘；第七路由蔚县向涞源；第八路由易县经紫荆关向涞源；第九路由正定向灵寿；第十路由平山经温塘向洪子店。此时，敌仍继续增兵，截至三十日止，已达三万余人。这一阶段中，敌人的战略是以步、骑、炮、空军、机械化部队向我军区腹地猛烈进击。我军此时则以尽可能阻滞、牵制，大量消耗与个别击溃敌人之目的。

其时，东线敌军于二十四日由曲阳进至刘家马时，首先被我游击队伏击，敌军溃败，大肆烧杀，退回曲阳，在附近修筑工事，并以飞机向党城一带侦察。二十七日乃分兵三路来犯，其主力则进入党城、灵山与王快之线。十月三日敌乃进窥阜平，我军占据方太口附近，仅以一连之兵力向敌英勇突击，将敌主力数百人完全击溃，敌仓惶退窜东土林口，我追击十余里，毙敌百余人。同时，我军一部在王快镇北伏击向阜平继进之敌，复与敌激战三小时，后敌以大军增援；五日，以步、骑、炮兵三千五百余人向阜平猛进，我军再度侧击于东、西庄、方太口一带，战斗一日，毙敌三百余，敌乃以飞机大炮掩

护，发射四百余炮弹，内有毒瓦斯弹百余发。六日午时，阜平被敌占领。

北面之敌三千余人，于九月二十日后，自蔚县、广灵、易县向南深入，经我迎击于冯家沟、圣佛寺、吉略沟、灵丘各点，先后消灭敌五百余人。至十月一日，敌人始进占涞源，复图南进，被我击溃于插箭岭，敌伤亡甚重，退回涞源城。

南路之敌，自盂县进抵神泉时，以主力绕道攻上社镇，遭我某部袭击，伤亡达四百余人。二十九日晨，敌复渡滹沱河，由清水部队长率领，逼近柏兰镇时，我军展开兵力，英勇冲杀，敌被夹击于山沟中，伤亡惨重，清水部队长亦被我击毙，造成此次反围攻中有名之柏兰战斗。此时自平山、井陘进犯之敌，亦与我激战于温塘，敌四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洪子店失而复得者凡两次，终被我反攻夺回。敌谋夺灵寿城亦未得逞。

此数方面敌人，在战斗中，均有重大损耗。后敌自西面定襄出动，与代县之敌配合进攻五台，于九月二十三日进至东冶、河边村，与我两部分部队接触，我即退入东部山地，敌乃于十月三日进占五台城。

至此，敌已先后进入军区中心各据点（阜平、五台、涞源、灵丘），乃结束第二阶段之战斗，进而开始第三步之进攻。

第三阶段自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五日。此时敌占领各据点后，遂企图向我腹地“搜剿”分进合击，缩小我活动区域，以期肃清我军，实现其第三步进攻计划。

我军此时对续进之敌，诱于适当地点而消灭之。对据点之敌，期以围困、逼退，在退却中消灭之。

当时五台之敌三千余人，配合东面及北面之敌，分路向我台怀镇进攻，各路分进合击，均企图在石咀、台怀之线与我军决战，一鼓而歼我。但我军先将主力隐蔽于山地，集结待机，仅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敌各路分进合击，步步深入，最后

却扑了个空。乃发觉我主力转移于山地内，前后向敌成包围形势。敌恐慌万状，急奔回台怀，我复以小部队截击其辎重，敌遂弃台怀向沙河逃遁。其时，敌另一部自五台退回盂县，沿途遭我不断追击与截击，敌狼狈窜走，我夺获辎重一部。进攻灵寿之敌，因屡遭击败，复图进攻，于十月九日进至距城十二里之同下附近，被我伏击，亦终仓惶败窜。此时，据守边区腹地各据点之敌，因我民众坚壁清野，极感恐慌，搜剿我主力之目的又未达到，已陷入困难状态。敌人的进攻计划至此已开始失败，我军布置反攻，驱逐敌人，粉碎敌人的围攻，也就在这时开始了。于是战斗遂转入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自十月十五日起，直到现在（十一月七日）还没有完结。这一阶段中，敌完全处于困守的状态，我军则坚决机动，不失任何一个有利机会，抓住敌人的弱点，予以严重的打击，并不断在敌人前后左右截击其辎重，断绝其交通，积极地袭扰、迷惑敌人，使敌人后方交通无法维持，各据点的敌人陷于孤立，造成我主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

首先，东线占据阜平之敌，经我军截断其后路，与之进行了十九次战斗。其中，尤以十月二十日截击党城、王快之役，予敌严重打击，计截获敌大车二百余辆，歼敌三百，击伤敌军无数，敌损失惨重。高门屯夜袭，冲破敌之铁丝网与工事，复将敌在高门屯所设粮站中的粮食全数缴获，使党城、王快、阜平之敌，更形恐慌。于是，阜平城之敌千余乃向后增援，而我另以有力之一部复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次夜袭困守阜平之敌，继之以一日之激战，敌死伤极重，遂于二十七日晨以飞机掩护，大量施放毒气，弃城向东逃窜。我军从后猛追，再度击溃逃退之敌军于王快附近。敌军固守王快，我复发动群众，协同部队，炸毁王快、党城间之石高崖，并破坏党城、曲阳间之

青阳贯道路，敌给养运输益感困难，乃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八时放弃王快向党城退走。

南面之敌，几次进攻，均遭受打击与失败，仅占领温塘一点。但因我某部于十月初进至正太路之娘子关、寿阳、盂县、平定一带活动，破坏敌之交通、截击辎重，不断袭扰敌人，遂使进攻平山、温塘、盂县之敌，不得不抽兵回去，维持其后方之安全，使前面进攻之部队改为固守，仅留少数敌兵，扼守据点。

北面蔚县、广灵、暖泉、西合营、涞源一带之敌，因遭我某部不断袭扰其平绥线后路，大感恐慌，急调兵向平绥线移动，以维持其后方之安全，各据点留部队固守。十月十八日，我军一部在广灵南之张家湾附近设伏，截击敌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步炮兵八百余人及汽车二十辆，激战终日，敌伤亡过半。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归森炮兵大尉、山奇少佐及另一步兵中尉均被我击毙。是役，我获步枪五十余支、轻重机枪七挺、山炮一门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十月二十一日晨，由广灵南至张家湾之敌复被我某部击溃，毙敌四十余人，俘虏晒叶中尉一名及汉奸一名，缴获亦不少。十一月七日，我复在涞源、蔚县间之明堡，伏击敌汽车三十五辆，敌军四百余人被我完全消灭。

西面敌自占据五台后，我军某部即向同蒲路东西两方不断活动，打击敌之运输辎重，使五台之敌亦不得不抽兵维持同蒲沿线之交通。此时，我军一部即移至定襄东北地区活动，准备打击五台之敌。十一月三日，敌从五台抽调四五百人，迅速秘密行动，于黄昏出发，以一夜之行程，深入高洪口附近，竟图袭击我驻防部队。我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另以有力之一部由柏兰镇西之绕头出动，绕至石盆口附近，截断敌之归路。敌于黄昏时由高洪口退回至河口附近，恰中我伏，激战一夜。至次晨十时，将敌全部歼灭，计缴获大炮三门、小炮四门、步

枪三百四十二支、轻机枪三十一挺、无线电一架、战马一百五十三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五台城内之敌，震惊异常，惟固守待援。

总观敌人此次以雄厚之兵力配备，凶猛的来势，对于军区的大围攻，其目的本欲从四面八方“扫荡”我军区，完成其肃清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第一步计划。但是敌人这一“扫荡”的目的，在今天来说，已经是失败了。除了烧、杀许多房屋、居民，掠去台怀镇上的大批“破鞋”（当地娼妓之别名）之外，不但毫无所获，反而折了常岗、清水、田原、归森、山奇等数员将校。这些将校之被我击毙，就在敌寇的报纸上也已逐一登载而证实了。即如我们偶然得到的十月七日的日本福岗日日新闻报上面，恰恰就载有十月六日同盟社所发关于那位在“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的电讯。该报所载如下：

“……而在这些将校的死亡之外，其兵士死伤的人数，更不在少数。”截至最近止，据十一月七日合众社的电讯，日军已死伤七千人；而据我们在战斗中杀伤敌人所已得的统计言，亦达五千以上。我军固亦有壮烈之牺牲，而敌寇所喋喋不休的“犁庭扫穴”，结果就不过如此。

当然，我们所以能够在战斗中严重地打击敌人，得到这些胜利，完全是依靠着我们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发扬了最高的英勇牺牲、坚决奋斗的精神。在军区过去一年间的战斗中，我们部队各级指挥员与全体战斗员，都发挥了高度的牺牲精神。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周建屏、朱仰兴、辛力生、陈宜盛、吴起凤、何兴云、张向松、崔明山、张妙轩、赵汝勤、纪振雄、刘裕勤、王德平、赖洪文等就是在过去一年间无数次不断的英勇战斗中牺牲了的。还有无数英勇的指战员，也都光荣的流尽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而在这一次反攻日寇新围攻的战役中，我们

的部队，无论是直属队或是各分区的部队，许多干部和战斗员更是表现了顽强战斗的积极精神，造成了许多壮烈光荣的模范，下面所举的就是那些模范例子的一部分。（略）

由于这些干部和战斗员的无限英勇卓越的战斗精神，敌人虽然用了优势兵力，向我们疯狂进攻，终于遭受了极严重地打击，走向失败。至于敌人此次配合其新围攻而施展的政治上的新阴谋与欺骗，更遭受了我边区有民族觉醒的广大人民，一致强烈的谴责与彻底揭破。事实上，敌寇汉奸在这次围攻中，所施展的各种分化、离间、欺骗、造谣、挑拨、中伤的新花样，基本上仍然是它们过去所用的那一套卑劣恶毒无耻的惯技，不过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段与新的表现方式罢了。而这种旧阴谋惯技的新表现方式，也难以欺骗有一年斗争经验的边区人民了。

敌寇及其御用的走狗——汉奸、托派，因为看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趋扩大与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全民抗战的力量；因为看到了晋察冀边区是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有坚强的团结，成为日本强盗的心腹大患；它们为着要集中力量，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边区人民的团结，企图达到它们灭亡中国，灭亡边区的目的。因此，它们在这一次进攻边区当中，首先就分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剿共灭党”、“灭共保安”等基本口号，还采用了“专打八路军，不打别的军队”、“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等手段，以侮辱我抗日各友军并进行其欺骗宣传。企图诱惑我友军将士“投诚”。而对于边区某些部队，故意表示虚伪的所谓“互不侵害”的“亲善”态度。同时更无耻地扬言：“皇军是百姓的救星，不要听信红军匪徒”，企图分化边区人民与抗日部队的团结，以期达到它各个击破边区所有抗日武装，最后灭亡边区的阴谋目的。但是，我边区广大人民，从他们过去血的经验中，都清楚地了解到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八路军坚决、英勇，不顾

一切牺牲，为保卫领土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流血斗争的事实，边区的人民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些野兽般的所谓“皇军”，残暴的奸淫、抢掠和烧杀行为，对于边区人民，更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明它们才是真正的“匪徒”集团。日寇扬言“只打八路军”，正是在边区人民面前，证明了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抗日武装力量，使日寇最感威胁。这更增加了边区有觉悟的人民，对于八路军的爱护。而我边区各抗日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始终都知道，他们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忠实儿子。都明白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大家始终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为驱逐日本强盗，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在我们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宣传、解释之下，边区各部队的团结和广大人民对于抗日军的拥护与帮助，更有了积极的表现。日寇的无耻分化政策，事实上已全部粉碎，无所施其伎了……

日寇因为看到它过去一贯的烧杀、奸淫、抢掠政策，遭受了全边区人民的无限愤恨与反抗，更加激起了边区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烧杀的怒潮，对它企图征服边区、奴役边区人民，在边区进行较长期的战争，而谋建立对于边区的统治是不利的。因此，日寇在这一次围攻边区中，为了掩盖它到处烧杀、奸淫、抢掠的野蛮强盗行为，乃改变策略，扬言：“只烧通八路军的老百姓的房子”而不实行普遍的烧杀政策，企图减轻边区人民对它的仇恨与反抗。同时在另一方面，更企图借此政策，以离间边区人民与我军的亲密团结，欺骗落后的民众，达到它对边区人民长期的血腥奴役统治的阴谋目的。但是，日寇并不能因此就得到丝毫的结果。它终于无法换回和掩盖它过去的丑恶暴行。日寇以往在边区各地的屠杀、奸淫、抢掠和焚烧，还非常鲜明而沉痛地刻印在边区每一个人民的脑海里。而且，在此次围攻中，敌人仍然在继续烧杀、抢掠与奸淫，特别

是在敌人遭我重大打击之后，必大肆烧杀以为报复，已成惯例。这使得边区人民更彻底地认识了：要根本逃脱敌寇的焚烧、屠戮，只有积极勇敢地参加作战，用全体人民的武装力量，驱逐日寇出边区。敌寇笑里藏刀的欺骗宣传，终于被我们用铁的事实粉碎了，下面的一段通讯，就是最好的例证：

敌人此次败溃退出阜平时，沿途各线大肆焚烧，大沙口、甘河、沟口、大园、河口、全庄、社里、四里庄、庞家庄等地，全遭烧毁。铁蹄到处，尽成焦土，大量同胞，无家可归。被灾民众，对日军之残暴兽行，莫不痛恨入骨，对日寇之“只烧八路军不烧老百姓”之欺骗宣传，更彻底明了云云。（十一月七日抗敌报）

虽然敌人在此次围攻中，收买雇用了一些汉奸，并用飞机散发反宣传的标语、传单，动员了许多人力、物力，集中大部分力量，从政治上进攻我们，以配合它的军事进攻。但是，敌人只能利用少数的汉奸造谣，而我们却有千百万人千百万个口舌和他们对抗，响亮的回答并彻底地打击了它们的欺骗造谣；敌人只能用飞机在几个城镇上撒一些满纸荒唐无稽与不通的传单，而我们却有深入山沟小道偏僻角落的无数宣传品；敌人有汉奸新闻纸，而我们也有抗敌的民族报纸；敌人只能无耻诬蔑造谣中伤，而我们却以堂堂正义与正确的真理来回答它。敌人在此次进攻中，狂吠着：“军区司令部打散了”，“边区政府打塌了”，而我们的军区司令部，却安然地指挥着广大的部队，步步粉碎着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边区政府，在战争中却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各级政权机构，更加有了新的改进，愈益适应于战争的环境与要求。

特别重要的是：在敌人残暴的围攻之下，全边区的人民，在地方群众团体的领导之下，更加团结在政府的周围，更加和军队打成一片，积极地从事于战争的动员，积极帮助和配合军

队作战，以至于更勇敢地直接参加战斗。因为，边区的民众运动在过去斗争的一年间，已经奠定了相当强固的基础。在历次打击敌人，反抗敌人进攻当中，都造成了许多光荣的纪录。而在这一次反抗敌人新围攻的斗争中，更表现出了伟大的力量，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成为我们粉碎敌人围攻，争取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当敌人开始进攻时，凡敌人所经之处，民众普遍地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所有粮食、用具、一切生活必需物资，都搬运埋藏了：老弱妇孺都预先迁走了；交通路口重要道路都破坏了，把敌人封锁围困起来，不但使敌人企图趁秋收之后来抢掠粮食以补救它的粮食恐慌，或焚毁我们的秋粮以困毙我边区人民的计划归于失败，反而作茧自缚，自取困毙。在我民众彻底实行坚壁清野之下，敌人的行动休止，都感受到极大的困难与痛苦。边区各地的民众，在此次反围攻作战开始时，就自动有计划地组织了各种战时动员委员会、工作团、慰劳团、突击队等，帮助政府实现战时动员计划，鼓励士气，加强地方工作。在边区新闻报纸上，满载着此类消息。（略）

这一广泛的全民抗日怒潮，目前正日益澎湃于整个晋察冀边区，牵引着广大人民，走进长期残酷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去。我们依靠着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一伟大力量，依靠着群众游击运动的开展，已经取得有利条件，开始粉碎敌寇对于边区的新围攻，而且将继续更有力地最后粉碎敌寇的新围攻。虽然，目前边区的群众运动，还存在着许多弱点，还有待于全边区的民运领导者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继续努力、推动与改进。然而，无疑的，它已经成为我们争取反围攻最后胜利的有力因素之一。

目前，我们正继续运用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集中和配合各方面的力量，把进攻边区的敌人从它现在固守着的不多几

个据点中，继续一个一个地打出边区去，达到完全驱逐敌人，彻底粉碎敌寇新围攻之目的。我们相信有力量把敌人全部从边区里赶出去，犹如我们相信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一样，将来胜利的经验与事实，必将最后证明我们是有力量最后战胜敌人的。

四、边区抗战的经验对于全国抗战的教训

我们晋察冀边区，在这一年当中，在敌人不断的围攻底下，曾经遭遇了无数困难。许多客观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限制着我们，给予我们工作上许多障碍。然而，在我们主观的努力之下，我们毕竟逐渐克服了那些困难，逐渐改变了客观条件，逐渐扫除了那些障碍，在敌人血腥铁蹄践踏过的旧领土上，建立了这样一个抗日根据地。

一年来所得到的一些成绩，虽然是这样的微弱而有限，然而它所给予我们的也不无经验与教训。全盘的整理这一经验与教训，还不是此刻所能够的。不过在总的方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提供一些，以供参考，增强我们抗战的信心。

如果要问这一年来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在基本上，我们的回答是很简单的。

第一、由于我们高举起了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使边区内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一切为了抗日”；施行了各种抗日的政策；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政权、抗日的民众组织及抗日的武装部队，把边区内的一切力量，都发动到民族自卫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来。

第二、由于我们紧握着统一战线的武器，在“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把全边区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族、各职业的一切抗日人民都团结在统一战线的堡垒中，彻

底破除一切成见，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德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虽然，在开始时曾经发现个别分子及个别地方，违反甚至破坏统一战线的现象，但由于各方领导者及工作者，都一致坚决地和那些不良现象及一切不正确倾向作不懈的斗争，终于迅速地纠正了。使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飞速的扩大与巩固起来，得到了伟大成绩。

第三、由于我们在全中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战区司令长官和朱、彭^[5]总、副司令的统一意旨与统一领导下，积极地本着自力更生国策与既定的战略方针，坚决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依据各时期总的战略任务，适应主力的要求，配合主力战斗，不顾一切牺牲，勇敢作战，而取得许多胜利。

第四、由于八路军出征以来英勇奋斗，不断打击敌人，博得了华北各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民众中建立了威信，民众欢迎我军到来，乐意接受我们干部的领导和接纳我们意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

第五、由于我们各级干部，一年来脚踏实地埋头艰苦工作与英勇的奋斗牺牲。各分区及直属队各部门干部，大多数都发扬了高度积极性，用了最大的努力，尽了最善的心思。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培育造就了大批中下级干部，巩固与改造了许多部队，恰当解决了干部的缺乏；以及后方勤务部门领导同志的勇敢积极负责，供给、卫生等工作的迅速改善，提高了工作效率。各部队中，连、排以上各级干部在指挥战斗中坚决勇敢，英勇卓绝，壮烈牺牲的模范精神。这些都积聚成了伟大的成绩。

第六、由于边区军政党民的高度一致与亲密合作，以及民众的热烈帮助，军区部队真正成为边区政权的主要支柱。部队经常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军队帮助政府，保卫政府，严格遵

守政府的法令。军队和民众团体也保持了正确关系，真正成为民众的军队。政府确定全盘施政方针，一切经过政府，但政府也不干涉军队及民众团体的工作布置与内部生活。民众团体完全有其自己的独立性，对军队及政府有批评、建议和弹劾之权，但也不干涉军队和政府。人民积极帮助政府和军队。军、政、民三方面密切配合工作，各级政府都按时举行政军民联席会议，如边政会议、县政会议、区政会议等，协商决定一切大小问题。而民众自动热烈帮助与配合军队和政府，尤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如果没有民众的帮助，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我们将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就因为我们高举着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紧握着统一战线武器，在全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和战区司令长官及朱、彭总、副司令的统一领导之下，各级干部发挥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获得军、政、民的高度亲密合作与民众的热烈帮助，正确地运用了游击战术，发挥我们自己的一切长处，抓住敌人弱点，我们才得到了许多战斗胜利。

当然，要取得战斗胜利，特别是在敌人远后方被包围区域中的部队，要取得战斗胜利，必须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尽量发现和制造敌人的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一年以来，我们在战斗中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的弱点是能够找到的，尤其是当敌人深入到山地区域，它的弱点也就更加暴露，更有利于运用游击战术去打击它。

敌人的弱点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敌军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在我方民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之下，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山地区域，交通不便，携带大量的食用物品，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军队的行动，增加了部队的滞笨性。我们的游击

队就最便于袭击它，截击它。譬如敌人此次进攻五台的部队，就曾经用了将近一千匹牲口，携带大量辎重，每日行军至多不过十余里，经我军截击于柏兰镇附近，遭受重大损失，清水大佐亦因而阵亡。该部敌军，虽有优越的装备，亦终不得不停止前进，直待忻口、代县两路分进部队到达后，才敢继续前进，抬着清水的棺材进了五台城。收复阜平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当时敌军因给养困难，由党城方面以大车骡马载运粮食及军用品，被我骑兵及步兵在定县、曲阳间及党城、王快间予以截击，各歼敌三百余，缴获大车二百余辆；阜平敌军立即感受极大威胁，这些都证明敌人一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而遭受失败。

第二、由于敌人必须依赖其交通线而生存，因而就造成了第二个弱点。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敌人占据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立即陷于孤立危殆的状态，无法存在，结果非败退即被消灭。最近我军收复阜平的战斗，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敌军极力修筑了从阜平至曲阳的一条道路以为其运输交通线。经过我游击队不断袭击其运输队，最后击溃敌最大之辎重队于党城、王快道上，终使阜平之敌陷于困境，在我主力继续猛攻之下，遂不得不败退而谋固守王快镇。但此时敌集结于王快镇的兵力，仍然不少，而其后路交通仍未遭受猛烈地破坏，照一般的情形说，敌人还有固守王快而进一步再向阜平反攻的可能。然而，由于我们发动了地方民众的武装配合游击队，彻底破坏了党城、王快间之石高崖和曲阳、党城间之青阳贯这两段道路，使敌人的联络运输完全不可能了。固守王快之敌，遂失其存在之依靠，因此就不得不放弃王快，往东逃窜。只就这一件事就足够证明，在后路交通断绝的条件下，据点中的敌人即无法立足。

第三、敌人弱于夜间战斗。因此，它最怕的也就是我军的

夜袭。但是敌人最害怕的东西，我们偏要最喜欢它、运用它。事实上，夜袭确是最易得手的。用不着充分的火力准备，只要我们有最顽强的战斗力，不管敌人有多么严密的戒备，我们总是会得到胜利的。因为敌人畏惧夜间出动，所以当我军袭击其据点时，敌人只有固守顽抗，以待天明增援。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夜间战斗的任务，在天明以前，坚持予敌以猛烈之袭击，则在敌人未增援而亦不能增援的情形下，即不难胜利地结束战斗。此次反围攻中，我军在高门屯的战斗情形即是如此。敌人在高门屯设有粮食站，周围装置了几层铁丝网，并筑有工事。但我负担夜袭的部队，坚决勇猛地攻击，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铁丝网与工事，消灭了固守顽抗的敌人，焚毁了敌人的粮站，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敌人的增援部队，直到我军胜利凯旋之后，还没有渡过它那畏惧出动的时辰。

第四、敌军在山地区域里，不但机械化武器大半失掉作用，而且部队的转移运用也感到极大的困难。大的队伍在山沟里无法展开，较少的小队伍离开据点单独行动，更不敢轻易深入。过去一年的经验是如此，最近在敌人新围攻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仍然是如此。如最近的河口战斗，敌企图以四五百人，深入高洪口袭击我军，结果被我伏击于河口，全数歼灭，给予了敌人深入进攻的企图以一个致命打击。现在事实完全证明了敌人要想深入山地寻袭我军，是不易的。而我们却可以经常举行山地袭击与伏击，有计划地根据地形、敌情，适当部署，不难消灭敌之一部或全部，这是敌人最感头痛的。

第五、敌人有一种可笑的机械的惯性，由于其要保持所谓皇军的威严，怕失面子，因此在每次遭受我军严重打击之后，第二天必定要派兵进攻，并大肆烧杀，以为报复，这几乎没有例外，无形中成了一种有规律性的行动。但是，这恰恰又便于我军准备布置，继续予以打击。只要预先适当配置相当兵力于

一定地点，伏击敌人，总不至于落空的。因此敌人往往遭受一次严重打击之后，必将继续遭受一次打击而后甘心。

这些都是就山地作战的经验说的。至于在平原区域，一般人总认为敌人有很多优越的作战条件，而且事实上，敌人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也的确能够发挥它的威力。然而，这是否能做出结论说：“平原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呢？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国内已经有不少文字指出过了，同时也有许多事实证明过了。我们在冀中区一年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关于这一问题，吕正操同志曾有专文论述）。这一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就是在平原区域，由于我们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掩护，侦察敌情，对敌封锁我方消息，我们的部队仍然能够秘密地运动，随时打击敌人，获得不断的胜利。虽然敌人武器比我们强，机械化部队在平原容易发挥威力，而我们没有机械化部队与之对抗，但我们可以利用的道路总比敌机械化部队为多，且村落多甚为荫蔽。最近敌人进攻冀中区时我们所得到的新经验，又证明了我们的短处也是可以克服的；敌人这个长处，还是没有保证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的。

最近我们在冀中区把所有的交通大道以及田野，普遍挖掘近丈深的壕沟。大道当中的壕沟可以通大车，路两旁沟沿上，可以通自行车和牲口，田野上的沟壕里，一样也可以通大车。这样就使得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坦克、装甲车等活动，大受阻碍，到处碰壁。这种普遍的壕沟，并不像寻常道路破坏后那样容易修复。过去敌人对于我们破坏了的道路，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修复，现在对于这种普遍的大壕沟，一时无法修复了。可是我们军队在普遍互相联贯的大壕沟中，运动却更加便利，更能够隐蔽前进，接近敌人，袭击敌人。当然，这样普遍的大规模地挖壕沟，构筑工事，不是军队能够单独完成的，而是要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的。各个村庄同时动员，既普遍又迅

速。群众在正确说服解释的政治动员之下，都非常踊跃地参加工作。就是他们自己的田地掘成壕沟，为了便于作战，他们也都非常高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项普遍而巨大的工程。同时我们发动了广大群众，把所有的城墙都拆平，几乎不留痕迹了。每当阴晦的天气，或微雨的时候，展望一片平原，完全辨认不出何处是旧日城镇。这对于敌人是一种害处，但对于我们却是有利无害。因为拆了城墙，敌人即便占领，也无所据守，我们的游击队易于反攻、袭占。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我国旧式的城墙，对于敌人固守据点在战术上是有很大作用的。敌人往往凭着他的重武器，固守一二城镇；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城不易。可是转换位置，我守城而敌攻城，此时，我无重武器而敌有之，结果敌能攻，而我不能守。拆了城墙，则有利于我，无益于敌。这不仅在平原中如此，在山地中亦是如此。敌人也看到这一点，所以近来敌人在军区周围各据点，正积极构筑堡垒，企图固守，并封锁我们。不过这也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因为我们有广大群众的帮助，敌人只靠几个孤立的堡垒据点，还是不济事。我挺进冀东的游击队，就曾经于一夜之间，攻破敌人九个堡垒。

实际上，目前敌人只欺我游击队无重武器，这的确是我们很大的弱点，所以我们就不能依靠什么险要的地势。因为没有重武器的部队，事实上无险可守，守亦无益。不过今后抗战逐渐走进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些处在敌人远后方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我们相信将会得到正规军帮助，得到重武器补充，以克服我们的弱点。那时敌我作战形势，必然有重大转变。目前我们只有尽量避免我们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依靠着我们已经取得的各种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去克服一切困难，正确地运用游击战术，利用我们已得的经验，积极抓住敌人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求不断的胜利。

过去一年间，我们在艰苦斗争中，就是凭借主观努力，才能得到各方面胜利的收获，才能够在极端困难与不利的环境中立足，而且不断发展。

一般说来，我们这一地区的环境，较之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区都存在着更多的困难。

首先，在交通地理方面，我们军区处于几条铁路干线的中间，四面都被敌人交通线封锁着，这就造成了几种困难：第一、敌人调动和增援迅速便利，时间不容易估计，随时可以向我们进攻；第二、我军的活动受周围铁路线限制很大，无论向东、向西、向南或向北，到处都遇见敌人的铁路和沿线据点。敌人构筑了各种工事，守卫着铁路及其据点。虽然我们始终毫不间断地破坏它的铁路、袭击它的据点，但因技术条件限制，这种破坏与袭击，毕竟是有限度的。这一特殊情况，是我们军区所独有的，它对于我们游击战争的开展，曾经给予了不可忽视的困难。然而，这种情形在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域很少存在。

其次，正因为我们这个军区是处于敌人的远后方而又在敌人四面包围封锁之下，和国家的总后方隔绝了，陷入无后方联络状态。从而，在财政经济，医药物品以及干部等各方面，主要都得单纯依靠“自给自足”的政策，增加了许多实际的困难问题。如果是在华中、华南或其他区域，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必然会相对的减少至最小限度。

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和主力军距离太远了，难于取得主力军的扶助而迅速充实我们部队的装备，提高和改进我们作战的技术条件。不如华中、华南各地区游击队容易和广大装备完善的正规军取得密切联系，容易得到主力的帮助，而充实其技术装备。虽然我们相信，在很近的将来，在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和主力的距离将逐渐缩短，能够得到主力

的帮助而逐渐解决我们这一困难。自然这一困难的经历，在华中、华南各游击区显然是可以避免的。

至于就政治、经济的自然与历史条件上说，我们这一地区和华中、华南等地区也有显著的差异。

从政治上说：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人民政治生活的落后，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上相当的守旧与落后。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这对于我们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战的工作上，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与障碍。

从经济上说：旧的封建、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很顽强的存在着。加以帝国主义对于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掠夺榨取，更使得这个地区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长期沉陷在半殖民地式可怜的畸形贫穷状态中。这种经济上的落后性，也就是造成政治上落后的根源。边区以内最大部分的地方，是山岳地带，真可以说得上是“地瘠民贫”。山沟小道中虽然给游击队活动以某些便利，然而交通不便，物资不丰，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物质条件之困苦，物力、财力动员的艰难，也给游击战争的开展以很大的限制。

这些政治、经济的，自然与历史的特殊条件，在华中、华南等地没有这样严重，甚至于已经不存在了。在那些地方，政治经济都比较进步。近代我国经济的发达，主要是在华中、华南各省，而近十年来政治的中心，更是在华中、华南各省。那里的民众，有着丰富斗争经验。譬如华中以武汉为中心，曾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政治斗争的洪炉；华南以广州为中心，更是近百年来我国革命的策源地。尤其是近代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以华中、华南各省为普遍。人民政治文化生

活都有了比较高度的发展，物质条件更远胜于边区数十倍。这些都构成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足以支持长期残酷的民族自卫战争。

如果说我们在这样恶劣的客观条件下，都还能由主观不断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改变了客观的条件，支持了在敌后一年余的游击战争，获得了许多胜利，那末在华中、华南各省那样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有了坚决的领导，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将是毫无问题的。

当然，要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必须忠诚的高举民族自卫旗帜，紧握住统一战线的武器，在最高统帅和各战区司令长官统一领导之下，建立在广大人民中的威信，发扬各级干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深入发动民众，并保证军、政、民亲密合作，取得民众的热烈帮助，这是主观努力的基本条件。

我们一年来，就曾经依靠着这些主观努力的基本条件，在敌人远后方被包围封锁着的客观条件恶劣的区域中，建立了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这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在放弃广州、武汉之后，全国抗战向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转移，华中、华南许多沦陷区域的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和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一样，已成为当前坚持长期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我们一年多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在敌后沦陷区域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并使之在不断斗争中扩大巩固，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使敌人遭遇更残酷而又长期的全面抗战，准备我全国主力在第三阶段的大反攻而获得最后胜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一可能更要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了。

我们完全不用悲观。在华南、华中，以及全国其他区域，客观条件较我们晋察冀为优越，只要主观努力，取得各种有利

的基本条件，将更能顺利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更广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不怕敌人的任何围攻，胜利地打败敌人。就是客观条件较我们晋察冀更为恶劣的，也能够经过主观努力，获得各种有利的基本条件，战胜困难，克服并改变一切客观的不利条件，而完成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任务。虽然它的处境会更艰苦，但是在全国各地游击战争普遍开展之下，这一艰苦的程度，还会逐渐减轻，而最后则将会给我们以伟大的胜利。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尽管有更多而又更大于过去十倍、百倍的艰难与困苦，但是渡过了这些空前的艰难与困苦，就是空前的胜利与光明！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聂荣臻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 〔1〕指阎锡山。
- 〔2〕指蒋介石。
- 〔3〕指杨成武。
- 〔4〕指宋时轮、邓华。
- 〔5〕指朱德、彭德怀。

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项 英

抗日战争，正在坚持争斗中，这一战争，关系民族的解放，决定民族的生存。当前的侵略者，是具有近代装备的。要战胜这一凶暴的侵略者，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力量，尤须要超群卓绝，富有最坚强战斗力的军队，才能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

日本是依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军事上造成对华的优势，企图以这优势来灭亡中国。但是日本是帝国主义中最脆弱的一个，无论在政治、经济等条件上，均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不能在长期中保持对我优势。这是决定了日本在持久战中必然失败的一个基本因素。

同时，历史上任何革命军队，开始时不能获得优良的装备，形成劣势对抗优势，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而将敌人最后歼灭。主要由于革命军队他依靠正确的领导与广大民众最高度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意志与忠勇的牺牲精神，以造成最坚强的战斗力。能克服一切困难，逐渐增强自己，达到最后胜利，抗日战争既是革命战争，我们又是革命军队，能够继承和发展一切革命军队的传统，不仅能进行持久战，而且能在持久战中

^{*} 这是项英对记者的谈话，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集纳出版社出版的《项英将军言论集》。

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我们最后能战胜日本的一个基本原因。

目前抗战正过渡到第二阶段，是我们从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条件上来准备我们反攻的力量。首先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军队，精神重于物质，这种准备力的成绩如何，是决定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可是准备的最后的目的是为要建立最坚强而能战斗的优良军队，直接来歼灭侵略者，驱逐他们出中国！因此坚强军队的战斗力，建立与扩大新的军队，成为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最中心点了。

我们新四军是产生和生长于长期民众革命斗争中，那不仅有了过去为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历史，而且创造了、继承了革命军队的许多优良传统。我们依靠这些优良传统，构成军队惊人的战斗力，来克服任何困难成为不能被人战胜的军队。现在当直接争取民族解放的抗战中，我们新四军应该贡献一切力量，发挥一切力量，坚决的为完成自己在抗战中应有任务而战斗。

我们新四军，在装备上说，不但与日本相比优劣悬殊太甚，而且与一般抗战友军相较也相差很远。可是参加江南抗战以来，能够对于抗战有所贡献，获得初步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于长期斗争中所创造与继承的革命优良传统，来构成我军的特殊战斗力，加以长期作战经验与灵活运用战术，故能以最劣势的武装对抗优势的日本而取得胜利。

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因素。坚强战斗力的基础，使我军能够以最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这是革命军队的特点，也是革命军队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军优良传统是什么？总括一句，是我军的各种新的制度与新的工作精神、新的战斗和作风。有些是继承历史上革命军队的传统，大部是我们在艰苦战斗中所创立的，经过无数次的

试验而把它订为新的制度，造成新的战斗作风，养成新的工作精神，这样把它保持和发扬起来。

现在我们具体的来解说优良传统的内容。

一、官兵平等友爱团结

凡是革命军队，无分官兵，政治上的目的是一致的，不是以官阶分贵贱，更不是以生活好坏作区别；不过因能力大小、责任不同实行分工，以进行部队的战斗。大家既是同志，就能万众一心的把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造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

我们新四军，不仅是革命军队，并且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生长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而壮大起来的。在政治上说，我们新四军，一贯来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战斗。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儿。

正由于这样，我们新四军，继承了革命军队的精神，而且发扬了这种精神。“官兵平等、友爱团结”，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化、实际化。

为什么要“官兵平等”？因为革命军队是革命分子所组成。参加军队的人，不是为了薪饷，也不是为了官位，而是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而斗争！所以官兵应实行平等，但“平等”不能误解为“平均”，只有实行“官兵平等”，才能团结全军坚决战斗到底。

为什么要“友爱团结”？政治意志相同的人称同志，同志与同志应友爱！才能亲密互助，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愈坚固，力量也就愈强。战争是力量与力量对比。要战胜敌人，必须力量强过敌人。要力量强大，必须要团结。所以我们新四军的指战员、工作员，应实行友爱，应团结一致，这样才能使全军上下一心，同患难共甘苦，造成铁一般的战斗力。

我们怎样实行“官兵平等、友爱团结”？（一）部队中都是

革命的同志，只有工作上的分工，无贵贱之别。不准有谁侮辱谁的话，谁轻视谁的态度，谁压迫谁的举动，互相间无严格的界限区别。（二）生活与待遇，官兵是一样，如伙食费一样多，而且一样吃，不准有小厨房和特别吃好。服装是一样，官兵共甘苦，要好大家好，有苦大家吃，首长更要以身作则，为士兵的模范。（三）官兵没有饷发，只有零用钱。有时因经费困难，仅有伙食钱，没有零用钱。官兵都是一样，官长不能单独有过分的特别享受。（四）官与兵，同志与同志，都要互相尊敬，态度要诚恳和蔼，说话要坦白和气。敬礼是互敬，不准上欺下、下凌上，更不准有侮辱和欺压的举动。（五）官兵同志，互相敬爱友善，有疾病相扶持，有患难相扶助，有困难相帮助，有经验互相交换，有错误互相规劝，不准互相仇视对立。（六）上级对下级要爱护，先士兵后自己。下级对上级应尊重服从，老战士要帮助新战士。

二、政治工作制度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最高的一种方式。因此，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斗争。

军队是政治的武装斗争集团，进行和贯彻政治主张最有力的必要工具。全军队应有政治领导，因为政治工作就是保证革命军队的精神与彻底执行政治任务、完成政治任务的工作。它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行动上去保证这一军队，好像人身的血液一样。没有血液与血的营养，人就会死亡。所以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不仅不能生长壮大，而且不能生存。

三、与民众打成一片

军队是民众的武装，是从民众与民众斗争中产生的、生长的，与民众是一家人，与民众利害相共，痛痒相关。

一个军队，不仅要团结民众、爱护民众，而且要代表民

众，保护民众。如鱼失掉了水，不单要打败仗，而且易被消灭。换句话说，军队有了民众拥护，就能生存，定能胜利；失了民众，要失败，要消灭。

我们新四军过去与现在一贯来为民众利益而奋斗，事事以民众的利益为利益。到处帮助民众，团结民众，所以到处得到民众的信仰和拥护，所以时时在民众帮助之下有力的战胜困难、打败敌人。

怎样与民众打成一片？（一）爱护老百姓，成为我军三大纪律之一。（二）十项注意中，九大项是我们对民众的纪律，人人要做到，项项要执行：1. 上门板捆稻草。2. 房子扫干净。3. 说话要和气。4. 买卖要公平。5. 借物要送还。6. 损失要赔钱。7. 大便找厕所。8. 洗澡避女人。9. 进出要宣传。10. 优待俘虏兵。我们要和老百姓混合起来。

四、艰苦奋斗坚持到底

中国军队是为达到民族自由独立的的目的而斗争，不达到目的，决不停止斗争。只有斗争，坚决斗争到底，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即或遭受打击，剩下一个人还是要坚持斗争。妥协，就是对革命动摇；对敌人屈服、投降，是革命的叛徒，可耻的罪人。

我们新四军不畏任何困难，只要能战胜敌人，任何苦都要吃，任何劳都能耐。艰苦奋斗，是我们锻炼的传统精神，吃得苦，耐得劳，是我们的本领。

我们经过了无数的困难，遭受了无数的困苦，为忠实于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至死不屈。宁作英勇牺牲，决不苟延残喘，这是我们斗争的精神。

五、自我牺牲英勇奋斗

革命要牺牲才能战斗，战争要牺牲才能胜利，牺牲了自己，才能挽救民族、解放民众。不能牺牲的人，不配称为军

人，英勇牺牲，是军人的本色，是军人的光荣事业。

我们新四军为抗战救国、为解放民众，在过去作了最英勇的牺牲，到现在仍在牺牲奋斗！

六、自觉的遵守纪律

军队没有纪律，就要瓦解、消灭。纪律是保证军队的行动一致，维持军队的的生活规律，密切军民的关系，是巩固与坚强部队战斗力的原素。谁的军队纪律好，谁的战斗力强，谁就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纪律的好坏，就是军队好坏的标准，所以军队要有严格的纪律，军人要严格的遵守纪律。

军队战胜敌人，主要的不决定武器的优良，而决定于军队的英勇牺牲，勇敢善战，团结民众，上下齐心，尤须有铁的纪律。

什么叫做自觉的遵守纪律？普通的军队多是以强制方法要人遵守维持着的纪律。如强制力量不强，纪律也随之松懈。因为遵守纪律的人，不是自愿的自动的，而是被强迫的，所以常常发现阳奉阴违、瞒上不瞒下的现象。这种纪律就不能巩固，更不能维持长久。

所谓“自觉的遵守纪律”，换句话说，要大家懂得纪律的重要，自动的遵守纪律。不要在强制方式下被迫而遵守纪律，也不是有了监视才遵守纪律，而是随时随地都是自动遵守，使守纪律成为一种自然的行动，把犯纪律认为自己罪过的行为。

七、绝对废除肉刑和打骂制度

肉刑是封建时代统治者对付被压迫者，主人对奴隶的残酷手段。稍称文明的社会和开明的军队，都不采用这种封建的刑法来管理社会和军队。只有封建军阀的军队，或者保存封建残余很重的军队，管理士兵用肉刑（如打军棍、打手掌等）。这种法刑，等于把士兵当奴隶对待。革命的军队，绝对不准许有

这种刑法的存在。

我们新四军自建立以来，就彻底废除肉刑，绝对禁止打人骂人。谁要施用肉刑，不但受纪律的严厉制裁，而且遭受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反对与打击。谁要打人骂人，谁就要受处罚和斥责。不管首长对下级和士兵，或者士兵与士兵、军队对老百姓，如若违反了这种纪律，都要受制裁。

八、学习政治武装头脑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战斗力

军事技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战争剧烈的进步而发展。革命军队是最进步的军队，一切求进步，一切要超过于人。革命军人应当不断学习军事，提高军事技术，以增加自己的战斗力；同时不但要会使用自己的武器，而且应努力学习使用敌人的武器，以便夺取敌人武器以消灭敌人。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使自己不被敌人消灭，又不致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要依靠自己，要有巧妙的战术与战斗方法，因此更要求革命军人不断学习军事，提高军事技术。

我们新四军每个官兵应当都了解政治，学习政治。政治生活是生活的主脑，一切从政治上去理解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特点。

我们军队从未经过军队的一定的训练和教育而能作战，我们的指挥员从未住过完备的军事学校，多是由文人提升，由文人变为武人，但是能够战斗，而且获得许多惊人的战绩。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学习，这样使我们不断前进，成为最进步的军队。

九、动作敏捷行动机警攻击勇猛紧张活泼

我们的战斗作风是：（一）动作敏捷。由日常生活中养成敏捷动作，方能在战斗时达到动作的敏捷。学习敏捷动作，养成敏捷行动，发扬动作的敏捷。（二）行动机警。战斗不仅是斗力，而且是斗智。谁能巧妙的战斗，谁就能克敌致胜。谁能

灵活利用战场情况的变化，谁就取得有利的地位，可以减少损失，取得更大的胜利。（三）攻击猛勇。我们新四军不但是攻击精神旺，而且攻击很猛。只有攻击猛勇，才能震撼敌人的精神，动摇敌人的斗志，达到白刃解决敌人，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的口号是：猛攻！猛冲！猛进！（四）紧张活泼。我们新四军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最紧张中进行。紧张是战斗的精神。一切散漫松懈的现象，都是妨碍工作的进展，影响战斗的进行，有碍胜利的进取。活泼才能发展人的自动性、创造性，这种精神发展到战斗中，则为机动性。但活泼不是放浪，而是表示生气勃勃，不是死板式的机械，更不是胡行乱闹，而是具有组织的、有次序的自然动态。

十、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我们军队的武器，都是从战斗中所夺取的，因为我们既没有现存的兵工厂制造武器，更不可能大批的购买。只有夺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才是我们传统的本领。因此，为了夺取武器就要学习战斗，学习从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枪炮，来充实我们的装备，加强自己的火力，以便更大的夺取敌人的新式武器，把自己造成近代化的军队。

我们的武器，都是血肉的代价所换来的。因此，要保护自己的武器，把武器看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我们的口号是：（一）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二）用战斗的手段缴获敌人的枪炮！（三）爱护武器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四）武器与生命共存亡！

我号召全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保持这些优良传统，发展这些优良传统而斗争，使新四军能成为新的模范的铁军，为完成最后胜利的任务而抗战到底。

一切破坏优良传统的行为，应该遭受全军的打击。一切腐败的现象和行动，都不允许存在我们的军队中，一切腐败分

子，要受自然的淘汰！

我重复的号召我军全体指战员，为保持和发扬我军固有的优良传统而斗争，为继承和接受一切革命传统和进步的精神而努力。这样才能使我军日益坚强起来，造成为抗战中一支最坚强的军队，团结最大的民众，协同友军在江南坚持长期抗战，准备反抗，最后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把我们的国旗像传旗式的由芜湖、南京直到上海重新垂扬起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新四军·文献》（1）刊印。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亲爱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同志：

敝会在民国二十六年成立于延安，今年三月十八日敝会常委会决定五月四日为敝会成立纪念日，同时决定这天为中国青年节，决定五月一日到七日为青年参战动员周。所以今天对于敝会不但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日，而且有着许多重大的意义。但是无论就哪种意义来纪念，今天都应该是庆祝、检查和促进中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发展的日子。建立中国青年统一战线是敝会自诞生以来的一贯主张，是敝会根据中国青年运动从“五四”到大革命到“一二九”的十余年来的一切宝贵传统和宝贵经验，以及目前国内国际环境的一切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慎重决定出来的。贵团宣布的使命是集合和联合全国各地抗日青年，这与敝会主张基本上互相符合，因此早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创立贵团的时候，敝会就向贵团团长蒋^[1]委员长驰电申贺，当承委员长以共同努力相勸勉。此后敝会并一再恳切表示愿与贵团亲密合作。最近贵团联合各地青年，进行募书献金等爱国工作，并与敝会不谋而合的决定今天为中国青年节，五一至五七为青年运动周，更使敝会感觉无限的兴奋，获得深刻的印象。敝会三十万会员一致承认贵团是中国青年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大力量，一致托付同人等在中国首届青年节的今

天，向贵团团员致以民族解放和青年解放战线上的兄弟的敬意，并为今后彼此互相深刻的了解计，简要介绍敝会成立两年来的工作情形和对于统一青年运动的意见，以待指正，兼供参考。

回溯敝会成立之日，正值敌寇凶焰日张，而我国内团结尚未巩固之时，敝会鉴于陆沉大祸，迫在眉睫，凡属华胄，皆有起而救亡图存之责。我青年素来站在一切革命斗争的前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已洒了不知多少热血，现在更当本着既往的英勇精神，团结奋斗，内以促进和平统一，外以加紧准备抗战；所以把组织西北青年、教育西北青年、武装西北青年的工作，作为当前的急务。这个方针，受到一切爱国青年的欢迎，敝会组织因此得以在西北一带迅速发展至二十万人以上。抗战发动，敝会深幸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当即勉励在八路军中的数万会员到前线去奋勇杀敌，发挥前进青年在战场上的模范作用，并领导后方的会员有计划的动员起来，参加到军队中去和一切抗敌工作中去。现在仅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会员，经过动员到前线的已有二万多人。至于参加自卫军、少先队、进行开荒、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消灭文盲等工作的，更是不计其数。为着满足广大青年对于战时教育的需要，同人等更于二十六年十月创办战时青年训练班，受训练和分配工作的青年，到目前为止有一万多人，又于二十七年底二十八年初，组织七个战地工作团，三个剧团，现在分布于华北各战区，协助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进行各种抗战工作；又于去年七月和今年一月组织两个慰问团慰劳前线将士，也深受前线的欢迎。在出版工作方面，同人等还编印了十几种关于抗战工作和青年工作的书籍和一种半月刊，流行于西北、华北和其他地方。

敝会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很困难的环境中间惨淡经营得来的。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中间的敝会会员，怎样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苦干实干，谅已为诸君和国内外一切贤达人士所共晓，

无待同人等赘述。至于其他地方的工作环境，除了物质条件同样艰苦外，有时还要加上困难的政治条件。无论敝会全体会员对于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政府一切抗战法令，怎样忠实的身体力行，无论敝会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成绩怎样得到前方军、政长官和社会各界父老兄弟的同情嘉许，也无论敝会的各级组织对于某些地方当局怎样一再呈请立案和要求指导，敝会却竟始终未获得某些地方当局列入受法律保护的团体之内；不仅如此，敝会的组织还被横加摧残，以至会员被非法逮捕，刊物被无理查封。敝会为着重视民族团结大局，每逢横逆之来，总是尽力隐忍，再四退让，冀以青年纯洁、精诚、热烈、坦白的爱国襟怀，或可收感悟之效于万一。不幸事与愿违，敝会的苦心，终不能为一部分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绝续，只顾死抱住自己从旧时代遗下的特权私利的分子所了解。敝会深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非黑白，非暴力所得而颠倒，人心向背，非金钱所得而转移，大智大仁大勇的志士，更非富贵所能淫，贫贱所能移，威武所能屈，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正是当前大时代将降大任于吾辈青年之身所必然会有的锻炼过程：敝会及全国青年，正丝毫无所用其惊惧。相反的，敝会以为过着不安定、不便利、不能维持衣食的艰苦生活，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反民族反民主势力的政治压迫，进行着神圣的、严肃的、繁重紧张的、然而又无上光荣的革命工作，这正是“五四”以来，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广大爱国青年二十年如一日的本色，中国青年这种本色早已成为全世界革命青年以至一切先进人士口中的美谈。敝会深幸能在今日继承“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所以去年六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柯乐满、傅路德、雅德、雷克难四位先生聘问中国来到延安时，在敝会的欢迎会上，热烈的称赞敝会宗旨的正大，工作的努力，生活的艰

苦，不愧为中国青年的模范，并即加入敝会为名誉会员。但是无论如何，同人等虽然生而为中华民族有良心有血性的儿女，处此严重危局，目睹大敌未除，大难未已，而政象如此，进步甚微，眷怀父母之邦，缅思禾黍之痛，俯仰天地，能不为之扼腕太息，百感交集么？同人等在工作中在学习中，虽常以活泼愉快的作风自勉，而内心的悲愤，当是诸君所不难想象的。

但是不良的环境毕竟不能战胜披荆斩棘、决志奋斗、以求光明前途的人类。敝会本身工作的发展已如上述，而敝会为促成全国青年大团结的努力，也没有完全浪费。民国二十六年五月，敝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即向全国青年团体，力陈利害，说明在今天团结全国青年，事艰任重，决非某一党派某一团体或某一领导人包办和统制所可奏效。又复说明：任何党派团体人物的高慢自大，倚势凌人，党同伐异，以私害公的结果，必然是损人而不利己，必然是既不足言团结全国青年，加强抗战实力，也不能真正巩固扩大自己的组织，提高或维持自己的声誉。并且着重指出：中国青年统一战线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分，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青年取得自由解放的必由之道，是全国青年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青年的共同希望。抗战以后，敝会为实际帮助建立西北青年统一战线，将常委会所在地移往云阳，以便与陕西省城西安的各青年团体取得密切联络。西安的绝大多数青年，都羞于抗战期间演出自相水火的悲剧，所以敝会主张很快的得到各方面的同意，而有西安学生分会、妇女慰劳分会、民先队、抗敌协会等六团体订立共同活动纲领，进行共同的救亡活动，以至学生分会、抗敌协会等团体在统一战线的纲领下成立全国青年抗敌协会西北分会等初步收获。去年十月，敝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深刻的研究了抗战以来全国青年运动的情势和经验以后，对青年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以前更具体的意见。大会认为中国青年达到统

一的道路，可以有三条：第一、是把现有的一切青年团体在民主自愿的原则上联络起来，开一个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从而产生一个全国统一的总的领导组织；第二、是由各团体规定一个共同遵守的纲领，或者再定期的召开全国联席会议，首先在行动上统一起来；第三、是以某一适当的组织做基础，旁的团体都可以按民主自愿的原则和其他一定的条件加入进去，这样来逐渐的充实它扩大它，使它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冯文彬同志在西青二次大会报告）。大会的这种意见不仅为大会全体代表所拥护，而且为参加大会的华北、华南、西南各重要省市青年团体和华侨青年团体的一百几十位来宾所热烈赞助，许为中国青年统一战线问题中的公允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意见。到会的代表和来宾们都很乐观的觉得青年统一战线已经见了真正的曙光，全国和西北的青年一定能够进一步的携起手来。

关于全国青年运动的统一，敝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来宾，对于贵团曾抱有很高的希望。大会认为，如果中国青年的统一是由第一条或第二条道路，则贵团可以做各种会议的召集人，如果是由第三条道路，则贵团将来也有可能成为大会所说的“适当组织”。但是大会也忠实的指出，虽然贵团宣布的本旨是在集合和联合全国各地的抗日青年，贵团现行的团章和现实的组织状况却还有很大的弱点。贵团的团章规定着不允许团员信仰三民主义以外任何的革命主义，这是极端妨害贵团去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青年的。这种办法，不能不实际拒绝广大的无党无派的虚心追求真理的青年，拒绝广大的被剥削的劳动青年和信仰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贵团的团章里面缺乏民主，同时又规定着许多不适用于民众团体的过分严厉的带威胁性的纪律，这也妨害着贵团的发展。因为这样贵团的组织生活难免流于沉闷、呆板，而一般青

年却是最忌沉闷呆板，最喜欢活跃生动，最喜欢发挥青年特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动性。青年加入或退出任何政党或群众团体，纯出于信仰和思想之自由，绝不能出之于威胁利诱；而遵守纪律效忠团体的精神，尤须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觉悟性和责任心基础上，亦非简单的强迫或诱惑所能奏效。关于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过去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够多了。至于贵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其中虽然不乏舍己为群、以身作则之士，但是不免反映着团章的弱点，因为未能真正吸收各党派、各阶层中有真才实学和高尚人格的人才，未能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从团员中发现大量的有朝气的青年人才，所以在干部的人选、工作方法和生活态度等各方面，也实在大有可商可议之处。敝会深切知道，坦率的指出这些弱点，可能引起贵团一部分人士的不满；凡属骄傲自大、目无余子的人是不愿意虚心听取朋友的批评的。但是古人有言：“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而“狂夫之言”，圣人犹择。况乎敝会相信自己的态度是真正爱国爱友的正道，也相信贵团在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及其他政治家指导之下，对于敝会一片芹曝之诚，恫息之意，必将不以为侮，而欢迎采纳之不暇。因此，就在一个电报里将敝会对于贵团的热诚的期望告诉了蒋委员长，并在其他许多机会公开表明了敝会的立场。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敝会之所以贡献这些逆耳的谏言，完全不是为着和贵团分道扬镳，而只是为着使我们的团结和全国青年的团结，由愿望变为活生生的事实，也为着使贵团的蓬勃发展和远大前程，由愿望变为活生生的事实罢了。如果贵团不从远处大处着想，而囿于成见，画己自封，那就恐怕只能维持一个狭隘的和停滞的局面，有些青年和青年团体即使勉强加入，也恐怕只能对贵团貌合神离，未必能心悦诚服。反

之，如果贵团放大胸怀，高瞻远瞩，知民族之大难方兴未艾，人心之趋向何去何从，鉴于现在青年运动之极需统一，鉴于过去一部分青年工作人员之脱离群众，而决心进行必要的认真的改革，那么，敝会和其他许多有群众基础和工作能力的青年团体都将欣然自动地与贵团携手，把强大的全中国青年统一战线树立起来，贵团的名字，亦必将与中国青年抗战建国的历史同在世界历史上放出瑰奇不灭的光辉。

亲爱的同志们！敌人正在加紧军事的政治的进攻，正在加紧制造汉奸，挑拨离间，破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必须建立我们的青年统一战线。“吴人与越人相恶，当其同舟共济而遇风，其相救如左右手”。二十年前的今天，北京学生正是表现了这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因此能够在中华民族解放的运动中，代表中国青年写下了第一页胜利的历史。历史只应该前进，不应该倒退，中华民族只应该趋向更广泛更民主的团结，决不应该退向磨擦和分裂，而团结的成败，现在正系于诸君的一念。亲爱的同志们！携起手来罢！抗战时期，千钧一发，稍一蹉跎，国亡种灭的惨祸，就会临到我们的头上。一切有爱国心的青年赶快团结起来，赶快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西北三十万的青年正在等着你们的回答，全中国的青年也正在等着你们的回答呵！

中国青年统一战线万岁！

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万岁！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毛 泽 东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

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中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

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

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

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

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

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林伯渠为揭露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致蒋介石等的公开电

(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重庆委员长蒋、行政院院长孔^{〔1〕}、天水行营程^{〔2〕}钧鉴：

查抗战进入二期，团结更为重要，领袖诏示应所共遵，乃后方党政军中个别工作人员，不明斯旨，背道而驰。

如中部县卢县长，于上月三十一日将八路军护士学生陈鉴等二十七名无故扣留，虽经委座电飭陕西省府转令中部县长释放，但仍武装押送拟往西安而未果，屡经据理力争，终被拘留六天，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莫此为甚，应请将该中部县长交付惩戒。

又去年十二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派少校参谋陈希念、张越、陈毅、李克坚、贾克成、陈西愈等六人赴前方工作，道经咸阳被联合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查陈希念等六人为在职军人，毫无罪过，曾屡请所管机关查明开释，总是互相推诿，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仰恳令飭迅予释放。

前经呈请开释在汉中被扣之八路军教官苏克兰，现仍羁押于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尚未释放，现该苏克兰已生病咯血，岌岌可危，敬恳本爱护青年之意，早日恢复其自由。

又四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因公道经西安北门外，当被驻该地之二十八师补充团扣留，武装押回

西安，并称系奉有命令。

按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应恳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

至于新华日报西安分馆，早由该报本馆航送纸版在陕翻印，原蒙当局核准，亦已办理有日，近忽改前谕，勒令停印，关于此事，亦敬请转令在陕照旧翻印。凡此种种，殊碍团结，既滋社会之疑虑，转令守法无由，伏恳令饬各该管量于改善，不使相类事件继续发生。庶几偏偶小草，同隶帡幪而共沐雨露，更示中央大公全无保留而昭然若揭，增力摧敌，端由于此。屏营陈言希为鉴察。

林祖涵 叩敬

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 释

〔1〕指孔祥熙。

〔2〕指程潜。

朱德等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给各兵团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

各兵团首长、贺关转吕程^{〔1〕}：

甲、支持华北长期抗战部队日益发展。敌人对我经济封锁与军事的破坏，尤其平原富源地带城市之失掉，顽固分子从中多方阻碍，中央政府对我军之限制，呈请改师为军、增加经费至现在无着落，致造成困难。呈蒋^{〔2〕}批以我军不听指挥为借口，过去原有之经费亦将完全停止发给。据屡电取消边区银行，并责以影响法币跌价，不特财政经济受各种限制，增加困难，且弹药供给亦异常困难。前呈请发子弹六百万发，仅批二十五万发。尤其经费一项异常困难。蒋即不停止过去四万五千人之经费，除陕北留守兵团（十二个团）巩固边区政权及河防所必须之经费外，剩余给前方每月仅三十一万八千元。以华北现有军队之庞大，运输、抚恤费、交通器材、医药及自造手榴弹等费用，以上三十一万八千元现有之款也尚不符开支。蒋为限制与排斥我苏鲁皖豫之各军（蒋密电朱、彭调往北宁路作战），威胁我方，不合理地解决河北问题，以及交出其他已得之地方抗日政权，可能停止原定之四万五千人经费。

乙、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

上。坚决与敌人作经济封锁斗争，打破国民党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使共产党力量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不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步骤，而且是打击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独裁的思想。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资产阶级相反，企图保持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裁及胜敌以后的独裁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是限共溶共的基本出发点。因此，磨擦丛生而且是长期斗争着的。

丙、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克服物质困难。

（一）努力发展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及手工业和营业），多种瓜菜、粮食，自做鞋袜、手巾、布匹、缝衣，特别是机关人员应大大动员并有计划地营业，统制必要贸易。

（二）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原则下，整理一切必要地方税收及田赋制度。

（三）加强敌占领区（交通线城市）伪组织中的工作，争取物质帮助来源。

（四）运用经过政权与群众团体，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献金献粮运动。

（五）晋东南、五台山、山东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收集弹壳，自造子弹、手榴弹及注意收集购买上述机器、铜铁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轻机关枪。质量必须精确。

（六）严格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克服相当严重存在的贪污浪费、吃空缺、以少报多的犯法现象。

（七）以军事战略意义划分的区域，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指导、监督执行上述任务。总部、北局拟在晋东南组织华北一个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并指导与调节各区财政

经济。

上述各节是我军的战斗任务之一，必须计划具体，督促执行。

朱彭杨傅左^{〔3〕}

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

〔2〕指蒋介石。

〔3〕指彭德怀、杨尚昆、傅钟、左权。

项英关于成立江北指挥部等问题 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

毛、洛：

一、江北部队编制：

(一) 成立江北指挥部（蒋^{〔1〕}已批准），指挥江北部队、各地方武装。

(二) 高敬亭所领导之游击团、挺进团改编为第九团，与江北四团与原七团合编为第四支队。

(三) 拟以江北挺进团编为第十团，戴季英所领导之游击纵队一大队约千余人已改编为十五团，此二团与八团可改为第五支队。

(四) 江南各支队准备扩充为三个团。

(五) 戴之游击纵队第二大队仍称江北游击纵队，受指挥部管辖。

二、干部配备：

(一) 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赖传珠任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二) 四支队仍旧。

(三) 五支以罗炳辉为司令，周骏鸣为副司令，政委物色中。

(四) 江北游击纵队以戴兼司令，孙仲德为副司令，桂逢

洲为参谋长。

以上诸问题，是否同意，请示。

项
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解决 河北问题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

发北方局、冀察晋边区、一二〇师、一二九师：

(一) 对河北问题方针：

甲、我之方针是以朱^[1]代鹿^[2]，由我们掌握河北，至少要是比鹿进步的分子，但估计目前朱任河北主席之时机尚未成熟，鹿既不一定能去，庞炳勋代鹿亦不见得较鹿好，庞有实力如再驱庞困难更多，故目前仍以不积极倒鹿为宜。

乙、在此方针下我们应与鹿谈判，估计现在的谈判亦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从谈判中继续拖延以待时机之变化，因此目前我不宜正面攻鹿，但须对鹿过去错误采取严正态度之批评，同时充分把握鹿庞、鹿石^[3]矛盾，争取庞石中立，分散其团结，并继续削弱鹿之力量，造成随时皆可去鹿之有利条件。

丙、谈判要点基本是同意过去北方局决定的纲领，但必须明确提出坚持保留冀中、冀南两主任公署之重要，我对此不能丝毫让步，过去，两主任公署之保持是我们的重大胜利。

丁、继续拖延的意义在于在拖迟中发展自己，加强党政军民之基础并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同情，争取动摇者中立，削弱鹿之基础，以便于有利时机由我们统一河北。

戊、鹿既在中央授意下提出共同委员会，我不能置之不理，授人以柄。因此同意北方局讨论之对策，在保证成为党政

军的共同委员会及我占多数的原则下与之谈判。

己、对顽固分子斗争我之基本立场是攻势防御的，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态度，以站稳自己对内对外的立场，有时亦可于对方犯我时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之，但必须极端郑重的采用这种手段。

庚、最近鹿正进行夺取太行山和冀西，张荫梧向冀中，我应采取一切方法巩固太行山、冀西战略基点，冀中应拒张入境，如其横行应抓住有利机会有力证据，从防御与反攻姿势严厉打击之。

(二) 目前成立整个华北性质的利民银行尚不可能，因无统一政府难于推行，且易受破坏，对中央亦无法说话，故仍以分区由主任公署或专署设立为妥。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怀冰。

〔2〕指鹿钟麟。

〔3〕指石友三。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宜川会议后 山西我党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

朱、彭、傅、左、聂、舒、彭、罗、刘^[1]并转晋西北区党委
陈、林、黄^[2]并转晋西南区党委：

在宜川会议后，山西局面可能有以下变化：

阎比较向右转，中央的顽固分子可能利用国民党部之职权增加其活动。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受到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但目前尚不至有基本的重大变化。

对山西我党的方针与工作，我们有以下意见：

1. 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提出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但应指出山西内部团结，只有坚持抗战，继续进步，政权民主化，保证民众组织之自由的条件下才有保证，一切落后的守旧的地方主义的方法，均不足以帮助山西团结。这样来制止阎右转，推动其继续进步。

2. 对国民党党部应采取抵制的方针，对复兴及西西等顽固分子应坚决与之斗争，最好是吸引山西各种力量与我们共同进行反复兴及西西顽固分子的斗争，直到驱逐他们出山西。因

此必须尽力揭破他们利用中央及统一的口号，以破坏山西团结，瓦解山西力量之阴谋，暴露他们挑拨离间团结腐旧势力的恶行，把他们的阴谋恶行向群众露布外，要经过群众团体及牺盟向阎及受威胁的将领告状，并适当的调正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争取士绅抗日，孤立日寇和顽固分子团结旧势力的企图。假如阎及山西新派主张牺盟民青加入国民党，我们的方针则赞成加入，而把山西国民党变成山西式的比较进步民主的组织。

3. 对山西旧军旧派应当采取争取的方针，指出脱离山西团体分解山西内部是自杀政策。在党内和左倾分子中应耐心说服他们，不要因阎开始右倾与右派开始与中央拉拢而意气地反对阎和右派，要不把山西旧军旧派当作复兴及西西等顽固分子一样看待，免将他们推到国民党顽固分子方面去，但对旧派中之某些顽固分子必须进行具体适当的斗争，才能达到争取的目的。

4. 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这对山西今后统一战线有重大的决定意义。应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方针，要使他们善于拥阎，尊重阎的领导与阎的形式，取得阎的信任，避免暴露过火的方式。要使他们与旧派的关系适当的调整，要把火力集中反对日寇及复兴西西分子。但这绝不是说新派放弃自己的进步的立场和牺牲自己的力量，应用各种方法，抵制对新派专员县长的撤换，如无法抵制而顽固分子到来时，则该地党政军民工作应有适当的准备与改变，然后力争撤换顽固分子。

5. 在党内部要明确的解说中央方针，防止和克服一切可能发生的惊慌失措与悲观失望的情绪，防止党员（特别是有公开职务的）丧失自己立场或轻易离职的现象。一切工作要适合新的环境，党的组织应更秘密起来，特别是在新军及政权中的党员更应求短小精干，秘密隐蔽，纠正一切暴露的工作方式。

要在反日寇进攻的战争中及反顽固分子的山西内部斗争中，把党的组织锻炼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傅钟、左权、聂荣臻、舒同、彭绍辉、罗贵波、刘惠农。

〔2〕指陈士榘、林枫、黄骅。

王稼祥、谭政关于加强瓦解伪军 工作给晋冀察军区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

晋冀察军区、彭雪枫、山东、新四军、陈士榘、李井泉、萧克、三五八旅、冀中纵队、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敌人正从其占领地强征壮丁，积极组织伪军，强化伪军。我们瓦解伪军的政策应加强化与积极起来。规定：

(一) 团及支队以上的政治机关部队，应即挑选政治上比较可靠有军事常识，有社会关系、有胆量、稍有活动能力的人，分批训练，设法打入伪军下层，拖枪组织逃跑与反正。

(二) 协同地方党在可能被敌占领的区域内，积极布置对伪军的上下层工作，求得事前打下下层基础，建立伪军中的内心作用。

(三) 大批收罗与伪军有关或有条件打入伪军内的人才分别利用，待遇和要求均不必一致，延安亦正在收罗中。

(四) 大量的有计划的输送宣传品去伪军内部，从传单到小册子。

(五) 对伪军军官家属，除少数积极作恶顽固不化者可没收其家产外，一般的应予以优待，以促成其反正。

(六) 策略上不可拘于全部反正，可能瓦解其部分时尽力进行瓦解，用瓦解的方法促成反正条件之成熟。

(七) 对于反正过来的上层分子，应慎重适当的处理，以

不妨碍一般伪军之争取为原则。

王、谭

五月十三日

请彭复转井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敌占区中党与非党的组织及 工作方式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

致各中央局及各分局区委党委及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机关：

在长期抗战中某些区域暂时被敌占领，亦有收复的可能。为使能在敌进攻的条件下顺利进行斗争，应该及时改变战区党的非党的组织方式及工作方式，因此中央提供下列意见，以作各地党部的参考：

(A) 在敌人进攻下或某地被占后，当地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扩大游击战争，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B) 党及政府民众团体的指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在游击队掩护下领导与巡视下层工作，并将可能隐藏的干部，分配去加强区村的领导。

(C) 一切技术机关，应秘密建立在群众中，特别加强秘密交通网的建立，以保持上下联系，并施行秘密技术的训练。

(D) 严重注意保存干部，不适于坏环境的送到上级党部训练和派到八路军游击队中去工作。无法立足的党员，可动员到军队游击队，或在安全地方开办普通训练班，收容和教育他们。在恢复失联络党员的党籍时，应加郑重考查防止叛徒敌探混入。

(E) 加强游击队的巩固与扩大，组织新的游击队，游击

队每至一处都须有党的政府的代表及群众领袖讲话，更加密切与群众连系。

(F) 在敌人统制较严重区，党的组织要转入非常秘密的形式，党应研究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去反对敌人并巩固群众情绪。

(G) 加强党内教育，防止张惶失措悲观动摇现象发生，相信在艰苦斗争的锻炼中，我们的工作定能更加深入与巩固，并可取得某些新的发展以至取得收复这些地区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

五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宣传 教育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

为了扩大党内党外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央特决定：

(一) 建立各地方党的宣传部工作，在宣传部下组织宣传委员会，经常讨论与检阅宣传教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正确的解释中央与上级党部的决定与指示，及时的说明当时当地所发生的重要情况，并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变化宣传鼓动的内容与方法，适当的使用与配合各方面的宣传形式以达到当时当地所要求的目的，统一于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

(二) 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成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时，即石印油印亦极重要。

(三) 应设法经过自己的同志与同情者，以很大的坚持性，争取对于某种公开刊物与出版发行机关的影响。对于自己同志与同情者领导下或影响下的公开刊物与出版发行机关应给以经常的帮助，但应以力求持久，不以一时之痛快为基本方针。同时应推动社会上有声望地位的人，出版一定的刊物，由我们从

旁给以人力和材料的帮助。

（四）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与机关的影响，特别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

（五）应力争在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中的活动，特别注意乡村小学教师巡回教师中的工作和通俗读物的编辑。在党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应有系统的去计划与检查一般的国民教育。

（六）要经常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及友党友军的宣传鼓动，收集各种具体材料，求得及时的给以批评与答复。对于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防共宣传，我们应依情况采取攻势，使自己完全处在主动的优势地位。

（七）宣传鼓动时应特别注意于发扬与运用当局党政军方面在讲演、命令、谈话与出版物等等里面的各种积极的东西，同时去批评与驳斥顽固分子的消极的黑暗的东西。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八）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各级宣传部有准备教员教材的主要责任。

（九）在县委以上的宣传部，应有一定数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人员，给以必须的教育与训练，及时派到下级党部去传达党委与宣传部关于宣传教育的方针方法，了解下级党部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了解当地敌党敌军与友党友军的宣传内容，并帮助下级党部组织各种流动训练班学习。

(十) 宣传部应负责组织同级在职干部的学习，定出一定的学习计划，并保障其完成，对文化程度低的同志首先应以消灭文盲与提高文化程度为中心。

(十一) 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于戏剧歌咏等的活动。

(十二) 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

(十三) 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与检查党的发行工作。在运用公开发行的一切可能之外，应即建立党内的秘密发行。宣传部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的联系。

(十四) 各级党部的费用应大大增加宣传费的比例。

(十五) 军队中政治部内宣传部的工作，基本上适用这一指示。

中央书记处

1939. 5. 17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关于在铜南繁地区如何与敌人 进行政治经济斗争^{*}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

邓 子 恢

“在抗战新阶段中，敌人的战略特点，是由军事进攻转到以政治进攻为主，从正面进攻转到‘扫荡’敌后，以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企图。”

周恩来同志这段话，在铜南繁⁽¹⁾地区中完全证实了。铜南繁被敌占领地区虽然不到一半，大部分地方还是我们的阵地，被占领区成为我们的游击区。但铜南繁地区，是处于长江南岸，迫近芜湖，是皖南的富庶之区。因此，敌人为了保障其长江运输线之安全，减少芜湖据点的被我威胁，为了巩固这些占领区，以便于夺取铜南繁的丰富资源，解决其战争需要起见，他是丝毫不会放松对铜南繁进攻的。其进攻的方法，更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配合以军事行动。最近铜南繁的紧张以及敌人所玩弄的各种新花样，完全是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鬼子最近在铜南繁玩些什么花样呢？

首先，是政治欺骗，强调反共反蒋⁽²⁾，号召和平。在芜湖及各地召开反共和平运动大会，强迫中国民众加入反共自卫团。印发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明信片、画报、小调子、报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抗敌》第一卷第四号。

纸、论文，宣传反蒋反共，诋毁领袖，到处要老百姓不要接近新四军。想用这些欺骗，来分化我们内部团结，使老百姓离开国军，使中国民众离开蒋委员长，使其他军队与新四军分开，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这样来削弱我们的团结力量，使我们内部互相怀疑，互相冲突，达到他以华制华的目的。此外，还在芜湖发动反英运动，企图排斥英国权利，转移中国民众的抗日目标。

其次，是采取怀柔政策。改变专门烧杀手段，到处宣传老百姓：“皇军保护你们，不烧不杀。”同时施舍小恩惠，如在××城××、××等处设“物品交换所”，将在各处所抢中国老百姓的东西，便宜出卖：四个鸡蛋换一匹布，两个鸡蛋买一斤白糖。组织治疗班，替老百姓看病，看老百姓生疮的多，就发疥疮药。看见小孩子给以糖果吃，看见中国老百姓故意装出嘻皮笑脸。企图这样来收买民心，争取落后群众被他利用。

第三，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一面采取怀柔欺骗手段，但到了怀柔无效时，他仍然要烧，要杀。如此次在太平街一带，因为电话线被老百姓及游击队破坏，便在电话线沿途四十里乡村房屋通通放火烧光。四月八日进攻凤凰山时，更用飞机轰炸、机枪扫射，死伤老百姓二十余人，抢去物件两百余担，猪子二十余只。敌人这种软硬兼施政策，是为了一面收买民心，一面威胁民众，使民众不得不屈膝于敌人统治之下，做他的顺民奴隶。

第四，是扶植汉奸伪政权，到处强迫民众登记户口（当地老百姓所谓上名字），成立自治会，帮助他压迫民众抗日运动，征收粮食，找花姑娘。他的办法是先派兵来通知你，限期登记，并强迫指定某些绅士当会长，不答应他的，就把你绑去，民众不登记的，则烧杀不保。

第五，是高价收买粮食。以芜湖为中心，到处利用奸商、

贫民、小贩向我内地偷运粮食、鸡蛋、猪鬃、鸡毛出口。一方面供应其军用，并造成我们粮食恐慌；另一方面经过奸商线索，制造汉奸间谍，以散布其政治欺骗，并刺探我军军情。

第六，是大批倾销日货，假冒国货招牌，行使军用手票，以流通其金融。这些日本货、伪国货，大批由芜湖输入，价格有时极其低廉。但大批都是消耗品、奢侈品，凡军事上可资利用之物品，则不准运销。相反的对我们输出于彼不利之货物，如丹皮等则封锁出口，以阻滞我之经济流通。

第七，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如在××港附近修铁路，企图开采铜南繁铁矿，以补充其军用原料。

上述各点，便是敌人最近在铜南繁地区所玩的新花样。当然，除此之外，还配合以军事进攻，在占领地修工事，造据点，架设电话，派汉奸敌探化装混入我内地，刺探军情，侦知消息后，即派队突击，企图一举扑灭我军，赶走我军。然而敌人的这种种阴谋和欺骗，并没有收到他如期的效果，而且遭遇到莫大的困难。这一面是由于我们部队积极进攻，另一面由于群众遭受敌人的摧残和屠杀，如像敌人的大烧太平街一带民房，并割去老百姓的麦子，使老百姓感受生死的威胁，不得不武装起来。而且这些武装一起来，到处发动游击战争，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几个月来，这种斗争，确实获得很大的效果，给予敌人以莫大的困难，并且从斗争中他们创造了许多巧妙的实际经验。我现在将我知道的拿来说一说。

一、如何揭破敌人的政治欺骗与怀柔政策？敌人这种政策，当时的确起了一些作用，如敌人停止烧杀后，的确有不少落后民众发生苟安心理，看见鬼子来不跑了。交易所廉价政策，更吸引了许多群众去买便宜货。敌人发疥疮药，给糖果给小孩子吃，也博得少数人说日本人好。至于反共口号，更挑起某些顽固分子的共鸣，甚至有人说：“汪精卫出去是不得已的，

中国也有加入反共协定的可能。”这实在是严重的现象。这里，我们只有根据蒋委员长训示：“姑无论他所谓共同防共的涵义如何，而在我们全国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说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指出敌人的这种阴谋，完全是在分裂我内部团结，达到他以华制华的目的。同时指出敌人停止烧杀，卖便宜货，发疥疮药，目的是在收买民心，使我们服服贴贴去做他的顺民、奴隶，这是更要害死我们。并且我们指出，如果到了欺骗无效时，他仍然会烧杀一下。经过这些宣传，在群众中是起了很大觉悟。尤其是在太平街一带因破坏电线，房子被烧光，及此次凤凰山被轰炸枪杀的事实，更使老百姓彻底明了。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中，最落后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鬼子是骗人的，都说我们讲的话是真理。所以此次民众房子被烧后，大部分还更加愤恨激昂；灰心失望的，只占最少数。至于交换所卖便宜货，发疥疮药，贪小利的老百姓当然趋之若鹜，任凭你怎样宣传“敌人的布是从哪里来的”，在开始时，都无甚效果。但因为买的人很多，而敌人的布和疥疮药有限，一下工夫没有了，敌人无货应付。群众从实际中体验到敌人是拿小利来骗人。特别有一次三个青年妇女到交易所去买布，被日本人抓去强奸，上了这回当以后，群众更加明白敌人的阴谋。我们同志就抓住这些时机在群众中宣传，揭破敌人的欺骗。

二、反对户口登记。日本鬼子来了，要老百姓上名字，但名单上却写着“待征”两字，老百姓吓死了，大家都知道上了名字后就要去当日本兵。大家都说：“当中国兵死了还有棺材装，当日本兵打伤了，人未死就被放火烧”（鬼子在芜湖把受伤未死的伪军拿去火化，群众知道）。因此，我们同志就抓住这一点，宣传民众，誓死不当日本兵，死不上名字。同时还告

诉民众上名字后，要起维持会，要帮助鬼子抽捐抽税，办粮食，送花姑娘。这样，我们就无好日子过。而且维持会帮鬼子维持后方，使他安心去打中国军队。军队打败了，中国亡了，那么大家就子子孙孙要做亡国奴。经过我们的同志这样宣传，一般老百姓是坚决不上名字了。但在鬼子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不能够反抗的。那又怎么办呢？在无办法中，群众自己想出法子，就是用拖延的办法。鬼子来了，大家劝那些被指名的士绅及知识分子躲开别的地方去，由不识字的老头子出去与鬼子接头。鬼子要他上名字，他便以不识字为词，答应等某人回来再登记。以后被汉奸迫得无办法，汉奸要替他上名字，此时无法子再推托了，结果是用报假名的方法，阿狗阿猫，乱报一顿，这样上了名字等于空的。后来鬼子又要他每人照相，身上尺寸过量，老百姓便誓死不肯，壮丁纷纷逃避。加以游击队游击组活动的威胁，汉奸也不敢随便下乡。所以直到今天鬼子在××占领区中，还没有一个地方登记完毕，维持会更只在几个驻兵城镇中存在而已。出了鬼子驻扎地以外几里路，就有游击队活动。老百姓仍然是中国人的，甚至在敌人驻兵城镇中，老百姓还到中国县政府来还□，表示他们仍然是中国的老百姓。

三、禁止粮食出口资敌。这成为铜南繁地区最广泛，而且做得最有成绩的群众运动。铜南繁地区本是产米之乡，所谓“一年丰收，三年吃不完”。但今年却不相同，二三月米价就涨至一元钱只买三十多斤的空前高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一）去年收成不好，生产减少。（二）敌人摧残，被炸毁，抢去。（三）大兵过境，难民移居，粮食消费增加。（四）最主要的还是奸商偷运出境资敌，一方面好了敌人，另一方面却害死自己。因此，粮食问题便成为今年铜南繁地区几十万民众生活的中心关键，而禁粮出口便成为解决粮食问题的中心一环，所以上级禁粮资敌的命令一下，经过地方政府向群众布

告，各地民众便风起云涌地响应。其办法是以保为单位，由保甲长协同民众团体，决定禁粮出境，组织农民哨及猎户队，日夜放哨巡查。一方面将全保存粮按户查明登记，有多者方准过境出售，不敷者只许就地售卖，如有内地难民小贩偷运出口被哨上查获者，初次不没收，只令就地照价出售，不准出口，晚上偷运查获者，抽一部分点心费，其余仍令就地出售。如奸商大批贩运出售者，则加以没收，以一半归当地民众及救济难民，百分之十赏破获者，其余归政府及游击队做经费，这是各地方保甲自定的办法。这种办法很好。因为各村镇封锁了，自然奸商就无从购买了。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保与保之间不流通。某些地方禁米出口，不是经过民众执行，而由游击队代替包办，因此，才发生坝埂头这个地方，奸商贿赂当地败类，几天晚上出米八千多担之骇闻。现在已注意保与保之间的相互流通，经过保长与民众团体之证明许可，就可彼此流通。至各保查禁责任，一定要依靠民众，使每个民众知道禁粮出口的意义，能够自动来执行，游击队只帮助民众执行就够了。

此外在禁粮出口中，某些地方还机械地禁止竹木、柴火出口，致靠山为生的地方民众，生活发生大问题。用这种办法来封锁敌人，反而先把自己闭死了。这种办法是不妥当的。在对敌封锁中，固然应给敌人以困难，但要顾到自己群众的生活，不能机械执行。当然，如属于军事工业原料，及初被敌人占领有可能迅速收复的地方，那末，当然应当无条件忍痛封锁，但封锁时，主要还是依靠民众自觉自动地来执行。政府禁令，甚至于出布告，只能是一个号召，如不经过下层动员，或者强迫执行，不仅无效，而且有时还可能发生意外的变故。

四、抵制仇货问题，在铜南繁地区已开始执行，但此中有许多困难：（一）不知道哪几种货物是仇货。（二）冒牌国货的仇货太多。（三）商人向后方办货太困难，老百姓日常用品买

不到。有了这些原因，所以前一时期，这一工作是没有成绩的。奸商大批贩运仇货入口，获利甚大，有的地方游击队将入口仇货没收，引起许多纠纷。有些地方的政府与部队，更有借此舞弊者，这是很痛心的事。现在已重新决定进行办法是：（一）抵制仇货及芜湖来的一切伪国货，改买英美货。（二）抵制奢侈品、消耗品，必要的日常用品在后方不能接济时，可以个别入口。（三）要商人运出我有多余，敌所不需之土产品出口，运回我所必需之货品，如××等。（四）在各市镇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成立仇货检查队，查明仇货种类商标切实查禁，××县由商抗会、工抗会、文抗会、学生会、保甲等共同组织之。（五）查出仇货没收，以一半或三分之一赏告发人，其余作为救济难民及政府动员经费之用。（六）在民众中宣传“不买日本货”，使民众自动不买。（七）鼓励商民往后方采办国货，源源接济市场。（八）鼓励商人及资本家集资开办小工厂，如织布等，逐渐做到经济自给，充实抗战需要。总之，抵制仇货，禁运土产出口，目的在封锁敌人，把敌人占领地方变成死城。但同时应注意自己的经济生活，不要机械执行，没有把敌人闭死，反而先把自己闭死了。

五、关于乡村武装自卫方面，在铜南繁地区是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除了县区乡自卫军外，各保都编了××名到××名的猎户队，有的称为游击队；另各保还有侦察队×人，通讯队×人，随时侦知四方敌情，消息互相通报。此外，还有农民哨（即后备队一类），担任白天放哨，晚上则猎户队放哨，负责盘查行人，禁粮出口与捕捉汉奸敌探。敌人来就打枪，阻敌前进，敌情紧急时，一面通知民众，此种猎户队即临时集合出发，把守要口，或配合军队作战。如此次敌人进攻凤凰山，××二区各保猎户队都集中配合自卫队把守要口。××凤凰山、陶凤游击队（即猎户队）经常能配合我军作战，敌人来时游击

队漫山遍野摇旗打枪，使敌人莫明其妙，未战先惊。××的游击组，敌后一种秘密组织，人数×××余人不定，更能随处打击敌人散兵、落伍兵，破坏敌人交通。前次××地方民众吊死一个日本鬼子，即此种游击组所为。太平街一带四十里长的电话线被破坏了无数次，也是他们的功绩。有一次我们一连人在××与敌人作战，这些游击组便集合老百姓在敌屁股后头打枪配合。可惜事前没有配合好，以致未把鬼子消灭。现在铜南繁地区凡有工作之处，差不多都有了这些武装组织。这些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武装，围绕着区乡自卫队、游击队，而自卫队、游击队又围绕着国军，成为广泛的卫星群一样。平时防匪锄奸，巩固后方，战时配合作战，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力量，值得其他地方来学习的。

铜南繁地区是正在敌人加紧进攻的面前，当地党政军当局应彼此互相配合，发扬各地民众斗争经验，更有计划地去动员广大民众与敌人作斗争。真正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配合国军抗战，保卫此皖南门户，以完成上级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新四军·文献》(1)刊印。

注 释

〔1〕指安徽省铜陵、南陵、繁昌地区。

〔2〕指蒋介石。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筹备了很久，早就要开的，因为生产运动的关系，拖延到今天才开。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今天开这个会，把有关学习运动的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一、学习运动是必要的

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

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我们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它的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这从一般地讲是如此。现在我来讲发起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那末，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

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

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民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

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中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

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有什么关系。

二、学习运动是可能的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确实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

“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三、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

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共产党员对学习是热情的。有人告诉我，有许多同志，自从学习运动开始后，非常热情，很高兴，本来要求调动工作的，现在不愿意调动了。这也是学习运动的功效。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有些学校最初

没有注意个人活动，不给他们以自由看书的时间，平常都是紧张得很，在组织活动方面算是不错，但这是一个不好的毛病，个人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关于这点，现在正在想法改正。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讲一点，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这是我附带说到的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時候，并没有三民

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至于外国，有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学的是唯心论。后来他在学校外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老师不同的。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现在你若还不认得字，也不要紧，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学习。

四、学习应该学到底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1〕}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除了这些学问之外，还有时事问题与党的政策。这两项，过去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但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关于时事问题，中央已在把时事问题的材料摘出来，准备编个综合文摘，可以供给同志们研究与参考。至于党的政策，六中全会的决议，大概大家都已

看过一遍，但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六中全会与七中全会之间，一切会议报告，包括政治局会议的，都要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

现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罗迈同志告诉我，底下已在催材料了，同志们已在研究了，这是很好的，充分地表现了同志们热情。好吧！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即李维汉。

军委关于收集 抗战英雄事迹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集总、四军、军区^{〔1〕}、三个师^{〔2〕}、萧克、雪枫、张、黎、吕、程、彭、罗、陈、林、方强、徐、朱^{〔3〕}：

在抗战中，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至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级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广播及《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机关供给材料。

军委 毛、王^{〔4〕}

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晋察冀军区。

〔2〕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

〔3〕指彭雪枫、张经武、黎玉、吕正操、程子华、彭绍辉、罗贵波、陈士榘、林枫、徐向前、朱瑞。

〔4〕指毛泽东、王稼祥。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陈 云

刘力功去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在抗大毕业以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了一次党的建设的课程。当他在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他作了鉴定，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又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刘力功则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离延安很远）工作，否则就退出党。为教育新党员，党组织曾经与他谈过七次话。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声明退出党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仍旧坚持自己不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极端错误的分子，认为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帮助，而且有害于事，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是他还是要求党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要“组织服从个人”。最后党组织给他一个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愿意到华北去，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三期。

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刘力功开除出党了。如果问：我们党内具有或多或少像刘力功这样观点的党员还有没有？还有。这是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

我们在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对于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这样的党员虽然他满口“干部政策”，可是他并没有完全了解干部政策。他没有想到：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决定于党的工作需要。试问，你如果是一个飞机师，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飞机，不能用你驾驶飞机的特长，那还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所以，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的需要。那种只看重个人，不顾及党的利益的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实际上是不了解干部政策。

那末，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能不能说“如果党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服从”？决不能。如果那样，实际上不

是个人服从组织，而是组织服从个人了。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接受党分配工作时，只能是这样的立场：“我个人有做某种工作的愿望，但是如果党有任何别的决定，我绝对服从。”作为一个新党员，本来应该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而刘力功却要到总司令部去工作。还有些新党员，在意见书上也说要“上层工作”。在这一点上，许多老党员与他们恰恰相反。我碰到许多久经锻炼、有不少工作经验的党员，他们常常说：“啊呀！我们新的经验不够，要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一下。”而某些新党员却以为自己已经在某个学校或几个学校毕业了，学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做“领导工作”了。他们不懂得学校内学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到实际中去运用，并取得实践经验更重要。干部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班长要从老兵中提升起来，区委书记要从支部书记中提升起来。一般说来，越级提拔常常会发生领导无经验和不称职的现象，而有害于事。领导工作的能力要从下层的实际工作中生长起来。

刘力功上过党的建设的课程，曾经举过手“拥护”党的纪律。但是，要他从口头上赞成到实际上执行党的决议时，就完全相反，不服从党的纪律了。这就告诉全党同志，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口头上说遵守纪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实际行动上真正遵守纪律。所以党观察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行动。党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党员，他平常批评别人不遵守纪律的时候，理直气壮，还要进行“不调和的思想斗争”；但是自己在执行党的决定时，就完全相反，讨价还价，甚至公然违犯党的纪律。似乎党的纪律是为别人写的，他自己可以例外。这个不成。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十四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里所谓“所有党员”，

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

那末，怎样才叫做真正遵守纪律呢？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执行决议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呢？因为党所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无非是用这样民主集中的制度来作出党的决议，统一党的意志和行动。这个决议，这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那末，为什么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呢？因为要考验你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

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看重纪律？理由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说过：“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

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今天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论党的纪律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基本原则时，说：“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正是因为它的党员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对革命有无限忠诚和责任心，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切经验证明，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会是有组织的队伍。所以，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国民党 统治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桂林、重庆、东南局、中原局、粤委、香港、上海、陈毅：

甲、中央很久以前即再三通知你们，因国民党决定逮捕所有被其特务已经发觉及正在发觉的共产党员，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地方党必须即决心调动我们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把他们送往新四军区域延安或其他能够立足的安全地区去，即此暂时牺牲若干地方工作，亦必须决心做，以便保存干部。同时中央要求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的干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认真地决心地将党的力量有计划的隐蔽和撤退，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和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

乙、根据最近桂林转来关于江西及湘鄂赣破坏情形的报告，以及与河南省委等同志来此谈话情形看，好些地方的党部并未认真彻底的执行中央这一指示，以致干部和工作均仍处在暴露或半暴露的状况，而对调动已暴露干部问题的指示尤其执行得不迅速和没有决心，这种情形有使南方东南及华中各地党遭受到极大破获的危险。

丙、中央要求南方局东南局再次严重的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的具体办法，迅速通知所属各地方党部并严格

督促他们坚决敏捷并镇静地执行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历次指示。

中央书记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陈 云

一 入 党 资 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什么人有权加入党，是我党经常留心的问题。征收党员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经常工作之一，所以，什么人有权加入党，是我党每个同志都应该通晓的。

第一，什么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依照中共党章第二条，对于什么人有权可以加入党的规定是：

“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远在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引起热烈争论和严重意见分歧的问题，并成为列宁与孟什维克基本分歧之点。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二期。

列宁的主张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条文是：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根据列宁的主张，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为了建立党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列宁曾与马尔托夫进行了斗争，坚决反对马尔托夫所提出的一个人不一定甚至不愿加入到党的任何组织，只要能在组织外同情和赞助党，都可算作共产党员的主张。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仅根本抹煞了党和阶级的界限，而且混淆了党的本质，使党降为职工会或学生会，使党沉没在同情者的大海中，“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所以参加党的一定组织，为党积极工作，是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义务。

坚持列宁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致的战斗的党。这一事实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一个建设党的根本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年来的斗争中之所以能成为英勇奋斗的强大的党，也正因为我党在开始成立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对李汉俊的合法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作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原则，奠定了党的建设之基础。

在现在我党大量发展党员时，列宁的关于党员的这个原则，更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克服我们党内还存在着的个别党员不经党的允许任意离开原来所属的组织，任意离开工作

的倾向。

第二，每个人党者必须承认党纲，但这不等于要求精通党纲。

中国共产党现在虽还没有成文地规定自己完整的党纲，但是它却有世界共产党总的纲领（共产国际纲领）和它自己的最低纲领（如历次大会的政纲和一九三七年的抗战十大纲领）。承认党纲是每个人党者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精通党纲作为入党的条件。因为精通党纲，是要有理论修养的人才行的。如果要求加入党的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必须精通党章党纲之后才能入党，这样不仅会把许多要求入党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而且也是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的责任。

第三，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必须是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所以，我党吸收党员，只有依靠经常有系统地在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及党的纲领，并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中来细心地考察和选择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

二 党员的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

第一，首先是加强优秀的工人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指出，党应当把工人

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因此，有计划地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这是我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现阶段的我党，加强和扩大工人成分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我党过去在城市职工运动中工作比较薄弱，工人阶级曾经遭遇到空前的摧残，以及抗战以来我各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沦陷，更加使中国工人阶级受着非常的灾难和损害。广大的工人由在业到失业，由集中到分散，这就使党更加加重了吸收工人入党的任务。城市中的党组织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吸收工人党员，在乡村中的党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由城市转入乡村的工人，吸收农村的雇农和手艺人入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中坚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对广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

但是，也必须指出，共产党并不是“工党”，而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

第二，党应该注意到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

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存在着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他们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生活在多重痛苦和压抑下，因而决定他们愿意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而在今后革命的进程中，贫苦的农民仍然和必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自己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放在农村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分子的上面，是完全必需的。

同样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特别在今日抗日战争中，都证明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能够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英勇奋斗的。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的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同时，经验还告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的贫苦的成分入党。这些革命的贫苦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由于他们贫苦的生活决定他们最易接近党，并且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的下层，思想和生活习惯都与劳苦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最好的对象。

第三，党应该特别注意到女工和贫苦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的成分。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没有妇女参加革命，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女党员的数量太少，这首先是由于党内对吸收女党员注意不够。要反对借口于中国社会男女不能接近而放弃共产党员介绍女党员的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首先是女共产党员应该把发展女党员当作重要工作之一。党今日应该强调提出吸收大批革命的妇女——女工、贫苦的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到党内来。党应该以此作为有计划的经常工作之一，并且注意在学习中工作中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第四，一切党员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党特别要注意在自己的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

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

三 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

第一，一定的手续。

新党员入党时必须经过一定的介绍人（依党章及目前规定是：工人、雇农一人介绍；小资产阶级出身者二人介绍；脱离其他政党而加入本党者三人介绍）。由党的小组和支部通过，经上级党委的批准。参加过其他政治派别的分子入党，必须经过区党委、中央分局或中央的批准。

第二，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规定。

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问题，应遵照中央的决定，并按具体情况决定之。其原则有四：

（一）长期脱离党，但仍在继续为党工作，党内有人证明者，恢复党籍。

（二）长期脱离党，自称仍在继续为党工作，但党内无人证明，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候有证明时，恢复党籍。

（三）曾经长期参加党的工作，中有相当时间（一两年）脱离党的工作，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而现在已经恢复党籍者，则脱离党的工作的这一时期，不算在党龄之内。

（四）长期脱离党，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经过相当长期的考察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

至于政治上变节的分子，则不得重新入党。

四 候补党员

第一，候补期的规定。

候补期的长短是根据新党员的阶级成分而定。目前党中央暂定候补期间如下：工人、雇农不需候补期；贫农、手工业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革命军人三个月；其他成分六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长之。

第二，候补期的作用，介绍人的责任，以及转党的手续和标准。

凡非工人成分入党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限。候补期的作用是教育和考察。党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况给候补党员以党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到党员的水平，分配他们一定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他们。同时，党应该审查候补党员的个人品质，以及历史地多方面地去考察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在党的工作上和对党忠诚的程度上，是否具备了入党条件，以作为转党的准备工作。

凡新党员入党都各有其一定的在政治上负责的介绍人。介绍人对其所介绍的新党员应该对党郑重负责，决不可苟且了事。他们不仅需要精细地留意被介绍者的行动和言论的表现，而且特别应该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积极地耐心地帮助、教育被介绍者；而党也可以以此作为测验该党员对党负责、忠实于党的标准之一。

转党标准。党应该根据在候补期内对于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来判断他在思想上对党的了解程度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经常积极，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是否忠诚于党，这样细心地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则经过转党的手续，由小组、支部通

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并得按该地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

转党条件不在于候补期限已满与否，而决定于候补党员对党的认识程度如何。如候补期已满仍不够转党标准，必得延长之，延长期限应等于其原有候补期的期限，必要时可停止其党籍。但是，延长候补期亦不能视同儿戏，例如延长一二十天用以作为党内的处分方法等。

至于青年党员，一般的不征收十六岁以下者入党，十六岁以上者可以开始被介绍为候补党员，至十八岁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但已加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应保持原状，不能因此开除或停止党籍。

第三，候补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候补党员应执行党所分配的一定的工作，缴纳党费，并得受适当的党的教育——阅读一定的党的文件和受政治的或军事的训练。候补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在介绍新党员时，可以提出其所介绍的对象，再由支部派人谈话和考察，作正式介绍。在党内工作上，候补党员不得为支部干事或党的小组长。以上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在新建立的支部或全支部绝对大多数都是候补党员时，可以有例外。

候补党员不能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并不给予阅读党内秘密文件。

五 共产党员的标准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

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这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的阶级觉悟，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切了解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同时，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但是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

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撼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党内有了这样为革命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会议上或稠人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就算遵守了党的纪律，这是十分不够的。

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革命力量的增长，共产党威信的提高，使敌探、汉奸、反共分子更加阴险地进行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在党的工作中，不但丝毫没有减轻秘密工作的重要性，相反地，党应该特别加紧自己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忽视、破坏秘密工作的现象作斗争。党应该指出，在今日的某些地方党部，还竟以为在现在环境下可以忽视秘密工作，这是十分危险

的。每个党员应该不忘记许多年来由于疏忽秘密工作而受到牺牲的血的经验教训。为了保持抗战的力量，为了保证革命和党的事业的胜利完成，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实现党的决议时，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革命是艰苦的长期奋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具有不怕困难、牺牲奋斗的作风。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第五，群众模范。

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分子，群众就有特别的要求。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

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

党的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应该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真正以模范党员的姿态，响应这一号召。

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任何威胁，任何利诱，都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模范党员，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斗争，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百折不挠，在种种威胁利诱下，表示对于党和革命无比忠诚。成千成万的优秀党员及党的领袖，在火线上、刑场上和监狱中，英勇牺牲。他们

在全世界和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面前，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气节，而他们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是光辉千古。他们是一切革命者的模范。我们党的党员不但要敬仰他们，而且应该学习他们。

第六，学习。

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根据目前的环境，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

（一）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二）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三）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特别是游击战争。在今日，“党员军事化”已成为全党的战斗口号。

（四）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地进行识字和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

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

（五）尤其重要的是，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

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称高明”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全党应该热烈地响应党的六中全会提出的“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的口号。

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论日军的跳跃作战^{*}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

叶 剑 英

敌军侵略，在策略上自汪精卫出走后，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但整个战线上的活动，已没有从前的积极，也没有像最初发动侵略时期如京沪会战时候那样大规模的作战，所以在最近时期内某些战线比较沉寂。然而，军事进攻虽沉寂，而政治进攻却加紧了。日本军阀得到汪精卫供给许多中国真实情报之后，正利用党与党之间的间隙，中央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地方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实行政治的进攻，实行各种破坏工作，使全国政治上起离心作用，并使之严重化，以便利他的继续侵略，灭亡中国。

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日本军阀的战略方针有没有新的改变？从战略原则上一般说来，他们进攻目标有二：（1）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其主力；（2）中心城市。过去日军曾集中力量，向一个中心城市进攻，像上海、南京、武汉，企图夺取政治经济中心，求得胜利，屈服中国。其次，是以我军队主力所在地为目标，尽可能的作迂回歼灭战，企图消灭我们有生力量。根据过去的作战事实，日军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战略方针，现在看来已经是失败了的，然而敌军采择这一方针，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这种前例。比如楚汉相争，先入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出版的《群众》第三卷第三期。

关者王。当时据日寇的估计，以为南京是全国首都，若南京陷落，便可使我们屈服。其次论到乡村与城市关系。照欧美社会情形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人口集中地，乡村只能依附城市的。日寇用这种眼光来观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因此敌人以城市作目标，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们可错了。第一，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同于旧时的封建时代，以为夺取了京城，迫走了皇帝，就能统治天下。现在，中国是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进步时期，而且有进步的政党，推动着时局。第二，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否与欧美一样呢？不是的。在欧美如法国有人说：一个巴黎等于半个法国。但中国情形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地大物博，物资人口均散布在乡村，日军虽然占领了城市，反因我们力量分散在乡村，可以把城市包围在广大的乡村之中，使敌人孤立起来。由于敌人失败的教训，使日军明白，徒然用全力进攻城市，已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于是不能不转移目标，寻找我军主力，企图与我主力决战。在作战上采用迂回包围歼灭我们。但是这一着也没有成功。如武汉会战，日军使用在江南的兵力，只有八九个师团，而中国却有七十余个师与之抗战。在这样广大的地区进行运动战，敌军以这样少的兵力，是无法来歼灭我们的，因为他既要一部分兵力钳制正面，敌所能抽出兵力与我们作竞翼运动来包围我军的兵力就愈感不够了。欧战时候，德法都运用包围敌人的竞翼运动，一直延伸到海边，假使日军也和我军作延翼的竞赛的话，那他的薄弱且暴露的翼侧，将受到我们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军作战并非不知道迂回包围的利益，只是他兵力寡少，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战果而已。今天我们主力已隐蔽在蜿蜒的山岳地带待机突击，我们只以一部分兵力深入到日军后方，一部分在最前线与敌作运动战，因此敌军已找不到我军主力的所在。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敌军目前的作战方针，中心城市既不作为目标，军队主力也找不到，这样就使敌人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这是敌人第一个困难。第二，日军兵力不够，从沿海到内地，从西北到西南，这样宽大的地面都成广泛的战场。兵力过于分散，其后方又有我游击队活动，也牵制敌人不少的兵力，因此，敌军便不能集结主力继续作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所谓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就是说，假使敌军主力用在华北，那同时就要在华中、华南配置兵力进行助攻，这是敌人的兵力有限，不能办到的。因此，现在日军最多只能在战役上组织一个突击力量，一个突击方向。例如进攻南昌时，则其他方面就沉静下来，进攻襄樊时，其他方面差不多没有动作，不能配合。

然而有一个严重事实，对于作战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我国许多交通线，无论铁路、公路、水路，大都被敌人占领了。这一事实，给敌人以一种便利，敌人可以自由转用兵力，进行伺机的突击。这就是说，敌人在军事上，虽然有两种困难，却有一种便利。

在敌国内，自武汉会战后，总的说有三种意见：第一，不停止的进攻，求得彻底的解决；第二，以军事为掩护，积极地掠夺占领地区的富源；第三，继续沿交通线进攻，占领残余交通线。这第三种意见便是代表板垣、荒木的军事意见，也是敌人在两种困难一重便利条件下所产生的战略上的变化。这种新的攻击作风，我们叫它做“跳跃作战”。像南昌的攻陷与襄樊的突击，都是这一新战略的实施。

从敌人进攻到现在，已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只是“投机性”的进攻，或者说是以“战役行动代替了战略行动”的投机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充满了战略上没落的成分。敌人采取这个“跳跃的作战”的战略，有两个好处：

第一，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沿江沿海这样广延的战线，我不可能处处设防，像法兰西沿着他的国境构筑一道完整的国防线一样，这在我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因为在军事配备上，容易暴露空隙与弱点，敌人也很容易找出我们的空隙与弱点，以迅速的攻击，取得便宜的胜利。在今天，敌人也需要这样便宜的胜利来掩饰国际上的视听，来刺激被长期的战争拖得力竭声嘶的敌国民众。

第二，他保存着交通线的便利，可以迅速地调动兵力，无有定向的向全面中某一点作跳跃进攻。造成疲劳我全线兵力的效果。

此外，敌人的全面跳跃作战，还可以用少数兵力进攻我多数兵力。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数字计算做个比方。我在华北布置二十个师，华中、华南各二十个师。敌若以二十个师来犯华中时，我华北、华南两地军队，因交通限制无法应援，仅华中二十个师单独对抗。将来敌转移兵力向华北或华南时亦然，这就是说，我六十个师的兵力只能当作二十个师用。而敌之二十个师则可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调动，自由进犯我华北、华中、华南。这就是说敌二十个师可能当作六十个师用。

敌人所采取的新的作战形式，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

第一，我们首先要认识敌人这一新战略，是在他失败之后，失掉了战略方向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将它的价值估计得太高。

第二，在战略上没有方向的跳跃进攻，虽然像沉在海水里的潜水艇，不易发现他进攻的动向，但他的跳跃作战是有一个依存条件的，那就是交通工具；任他怎样无定的跳跃，他总离不开交通路线。像进攻南昌是依凭南昌铁路、南万公路与修水航线；像进攻襄樊是利用钟京公路、汉宜公路以及随枣公路等线。既然敌人的跳跃作战依存于交通线，则主要的判断与兵力

的配备我们还是有的。

第三，我们不要被动地跟着敌人跳跃，要在每一个作战地区，配备着能够独立抵御敌人跳跃进攻的兵力。已故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说得好：“英雄跳，我们笑！”我们要以“静”的“笑”来制服敌人“动”的“跳”。就是说，当敌人在他依存的交通条件下，发动了某一点的“跳跃进攻”时，我们要在敌所利用的交通线的两边集中兵力，静待敌“动”时予敌以迎头痛击。这是兵家所说“以静制动”的实施。

第四，利用敌人兵力不够，在作战上只能发动一点进攻的缺点，我运用大部队或小部队，经常以运动战的形式出击敌军，扰乱与杀伤敌部队兵力，这叫做“以动制静”。

第五，加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努力达到“破坏重于作战”（这是我们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的任务，粉碎敌人“跳跃作战”的依存条件——交通路线，逼迫敌人改换装备。他为了适应山地战放弃现代化的装备时，则跳跃作战将失去效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叶剑英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 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

财政经济日益困难，除积极加紧生产以谋自给外，目前特别要注意认真的严格的建立财政经济的制度，发扬艰苦作风厉行节省，以便坚持抗战，坚持长期艰苦奋斗，因此，中央书记处有如下的决定：

(一) 严格统一收支。(甲) 各机关部队的收入，不得于未报解中财经部以前，自行开支。(乙) 所有公营企业，应按党政军系统统一领导，集中营业，所有盈余，概须报告中财经部，确定支配办法，不得自由支配，并将资金及营业状况于六月内确切报告中央。

(二) 严格建立预决算制度。(甲) 照中财经部通知第四号规定认真执行，每月开支预算必须负责在节省原则下切实估计，一次提出经中财经部切实审核发给，如经中财经部批准之预算有不同意见时，必须经中央书记处的审查批准，中财经部始能作第二次的修改。(乙) 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丙) 预决算及一切应缴单据必须按规定期限送交中财经部，如不按时送出者，停止发给经费。

(三) 建立会计审计制。(甲) 由中财经部建立会计处与审计处，并有检查审核各机关学校部队的会计账目及开支情况之

权。(乙)各机关部队学校关于会计审计方面有不明了及应实行改革之处,得随时分别询问中财经部会计处及审计处。

(四)为着调剂财政困难必须励行节省。(甲)从六月份起一概暂停建筑,已经在五月份批准建筑者亦需节省,限期结束。(乙)七月份,照前方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津贴一律发给一元,有特殊津贴者必须经中财经部之批准。(丙)从六月份起各种特别临时办公等费,要尽量减少,一切日常用品要想各种办法节省,以简单朴素为原则。(丁)各机关学校部队的油印刊物须分别经中宣部或总政治部批准后,始能出版,否则一律停止刊印。(戊)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

以上各项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务须切实执行,并责成中财经部随时督促检查。各部门资材限于六月底以前进行一次总清理,报告中财经部。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 几个认识问题^{*}

(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

周恩来

战略方针在第二部分已经讲过，现在我们转到讲战斗的本身。在二期抗战当中，战斗的进行在敌后，在游击战争的发展中。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的报告上也是这样指出的，第二阶段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当然这不是说取消正面的运动战，也不是说自己在后方专门地建立机械化部队重新转入阵地战，而是说今天二期抗战，特别是目前的过渡阶段，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已成为战争的中心。为实现我们的中心跟争取敌后的任务相吻合，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建立敌后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也就是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

现在要说的是关于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 游击战争要依靠广大的民众，这是大家都晓得的。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凡是在敌后组织游击战争的部队，必须要认识人人不仅是游击战争的战士，而且要做到人人是政治工作人员，这样的游击战才能够发展。因为在敌后的部队常常是分散的并且要发展新的力量，假如只靠着少数政治工作人员组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所作报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第三部分中的第一个问题。

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群众是不会广大地动员起来的，而游击部队本身在分散单独作战的时候，也常常失掉部分的战绩，不能够独立自主作战，不能够机动地作战，不能够灵活地集中与分散，也更不能够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所以，现在许多部队在敌后打不好仗，站不稳脚，这不仅仅因为它不会打游击战争，更主要的对政治工作问题没有彻底的认识，不懂得游击战争决不简单地是一些所谓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同时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个别政治工作人员的问题。这些认识不够，所以游击战就不能够广大地发展。我们说游击战争并不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一定就打得好，别的部队就打不好，而主要的原因是别的部队的政治认识不够，政治工作没有在整个部队开展起来，因而也就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所以，会得出报告第一部分所说的：敌人之所以能够“扫荡”相当的局部的游击队，是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存在这样一些弱点。

（二）关于敌后游击战争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建立游击战根据地的方法。这是游击战争很重要的任务。假如我们只是游来游去，去了又退出来，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和敌人在敌后斗争的，因为谈不上动员人民，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开展全面斗争。没有地区，没有人民，也就没有跟敌人斗争的力量，并且游击部队进去固然可以使当地的民众兴奋，然而他们退出来时，徒使人民更失望。所以，真正地发展游击战争，必须要坚持。拿华北抗战来说，自从太原失守以后，我们以坚持华北抗战为口号，造成今天华北游击战争的局面，就是因为无论如何不退出；临汾失守以后，最高当局宣布，所有黄河北岸的部队都不许退出，也造成今天山西抗日根据地。江南的新四军在芜湖、南京、镇江这样狭小的地区创立了根据地，时常受敌人袭击包围，但也因为毫不退出，所以能够坚持这些根据地。而在其他地方，敌人一“扫荡”就退出，结果便利了敌人在那些

地区开发、建设、“扫荡”。要建立根据地，必须从政治任务上认识清楚，同时，要有很好的方法。

根据地的创建要动员民众。因为游击部队假如不能够把民众动员起来，就站不住脚。刚才说的江南的游击队是最困难的，跟过去许多游击战争的经验不合：第一是平原多，很难存在；第二是河道多，如街道一样密，这样多的水不合乎游击战争的条件；再则是公路多，敌人机械化的部队经常能够行动，尤其不便于游击战争的行动；还有湖沼多，陆地行动地方很少；最后是碉堡多，差不多几里就有一个碉堡。这些条件都存在，然而江南的游击根据地还能够创立，靠什么本事呢？也就是靠群众的组织，靠群众的掩护，在群众中间创建游击根据地。江南新四军组织群众的工作达到这样的程度，在同一个村内，有碉堡，驻有一排敌兵，我们的游击队依靠老百姓放哨，监视敌人的卫兵，政治指导员能够就地召集村民开群众大会。在一个沦陷地区，这样的工作能够存在，这是从前内战时期也没有的。组织了群众，即使在这样艰险地方我们都可以活动，那么其他条件较好的地方就更没有问题的。所以，依靠群众是第一等的条件。

根据地的创建还要依靠各种条件的选择。如依靠地形、人口、生产物质的条件，有时还要依靠气候的变化、村户居民的多寡等条件。这些条件的选择，决定我们根据地的创立便利不便利，就是说要在抗战当中生长调整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群众的条件。有群众存在，我们游击战的根据地总能够建立起来，即使是小一点、分散一点，其他的条件都是辅助的。山地根据地当然更好，平原要分散一些。生产丰富的地方像江南，我们游击队的发展要大一些；生产困难，游击队发展会少。人口密，活动便利，发展大；人口稀少，像五台山地区，就小一点，像晋北更小一点。因为季节的关系，有时在

青纱帐期间，在广大的平原上可以蕴藏很大的游击队，冬季的游击队就要变小一些。这是多少大小的不同。

（三）根据地的创造决定于游击战术的运用，这是关于敌后游击战的第三个问题。要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术，单是运用老一套的游击战术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我要讲到游击战争战术原则问题。当然，我不是讲过去的，因为大家已经听过，我不过是把抗日战争中我们坚持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战术加以发展、补充。譬如，过去所说的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今天看来，有些游击战术已经超过这四句原则。因为过去游击战争的经验是在广大的地区实现的，兵力相差不大，所以可以大踏步地进退。像井冈山这个地方，一进退就是六七百里到一千多里。敌人退了，我们可以长进；敌人驻营了，我们就扰乱他们；敌人疲劳了，我们打他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譬如过去的游击战术原则“敌进我退”，现在假如我们一退，敌人马上进到我们家里来。这正是敌人所乐意的，那么这条原则就不能用了。另外一条原则“敌驻我扰”，有时也不适用，因为敌人有碉堡，他们不害怕。敌退有时不能追，因为敌人有机械化部队，有强固的工事，他们一占第二道防线把兵力布置好了，你就打不过他们。所以，这几条原则在今天看来是不够的，但并不是说根本不适用。因为那是根据江南游击战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战术原则，同样的华北也要根据当地游击战的情形进行总结。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对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另加补充。

1. 敌击我隐。敌人集中的兵力很大，向我们进攻，要找我们的主力。我们则要隐蔽起来，不要退，因为退正是敌人高兴的。我们既不是逃，也不是暴露在那里让敌人打，而是要隐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找到我们的主力。敌人找不到我们的主力，也就无用武之地。这是适合“隐”的。

2. 敌分我袭。敌人分散开来，我们要袭击他们。敌人兵力分散，我们正是扫荡他们的时候。这种袭击战术，在华北有经验，特别在江南运用得很好，碉堡都可以袭击。新四军专门在“袭击碉堡”中来发展。譬如，当涂附近一次有名的战役就是在碉堡围着的地区内打的。不过，袭击时间不能太久，否则敌人要集中并且要增援，所以袭击必须短时间解决战斗，要一击必中。因此，一般地袭击碉堡一定要有保障，打不开时，用火来烧。江南常有这样成功的战例。

3. 敌进我伏。敌人在行军中间不外乎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很疏忽地前进或者运输东西，我们便可袭击他们的辎重，杀伤敌人；第二种情况是敌人有准备，我们就埋伏起来，不被敌人发现，便于伏击、出击敌人，行军中的敌人是最好杀伤的。

4. 敌围我散。这一点也是新的游击战术。我们过去采用的一种原则是：敌人进攻，我们退出。现在不行了，敌人几道防线围我们，我们再不能退，除非放弃根据地。譬如，新四军在袭击镇江一个碉堡的时候，已经成功了，还没有退出，可是增援的敌人赶到了，对我们几路包围。我们照老样突破敌人一路，可是敌人知道我们要退，就二重三重地包围着，因此我们损失较大。那一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同志牺牲了，就因为我们没有分散而是集中地继续撤退的缘故。假如我们在袭击碉堡成功以后就采取分散的办法，损失就不会这样大。他们找不到我们主要的目标，即使我们牺牲一部分，那我们的大部还是能够存在的。这种战术在华北也早已运用过。所以，人家说在华北，敌人多的时候就不见一个八路军，敌人少的时候就到处都是八路军，好像八路军有神出鬼没的本事一样。

这是根据今天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增加的新的游击

战术原则。当然，这只不过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说，因为第一我们要创建根据地，决不退出根据地；第二我们要不断地消耗敌人，壮大自己。这是关于敌后游击战争战术的问题。

（四）关于游击战争的技术问题。现在应该有新的技术准备，这是敌后游击战争所决定的。过去的技术，大概是平常所说的爬山、打枪等等。现在跟机械化的近代化的敌人作战，同时环境也变化很大，所以只会射击、爬山等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譬如，在江南要学会游泳，因为在江南的水多，游泳比较便于隐藏，便于活动。又譬如，跳跃、跳远、跳高，这些也都成为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因为跃过敌人的铁丝网大多数的方法是跳过去，还有翻跃壕沟、碉堡，爬屋顶等等，都要有这样的技术。有时在行军中间还要采用跳跃前进、爬行前进的方法。除兵器火力的杀伤外，其他破坏的技术、爆破的技术、修理的技术、开汽车、划船、骑马等等，都需要学习。现在跟近代化的敌人作游击战，我们的本领要更强，技术要更多。所以，我们的同志不要自满自大，否则就没有办法在敌后游击战中存在、发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正在积极策动国民党一切投降分子，勾结英、美、法妥协派，图达其瓦解抗战阵线目的。汪精卫正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投降分子、反共分子正在国内普遍的坚决的进行破坏工作。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磨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二、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党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来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

三、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亲密地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和巩固国共合作，就是反对投降与反共的最好方法。党应当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公开的揭穿反共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同时党不应给民族统一战线之破裂造成借口，这

种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须要巩固和扩大的。

四、关于如此而产生的党内党外的宣传组织任务，另有电示。

五、此指示发至省委，向下一律用口头传达。

中央书记处

六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反投降提纲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
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一九三九年六月)

毛 泽 东

报 告

(六月十日)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一、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 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

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卢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卢沟桥至武汉——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变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1. 卢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声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

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2. 卢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 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A. 内蒙独立；B. 华北自治；C. 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D. 山海关到安南沿海的捕鱼权；E. 中国退出国联；F. 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 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

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软软的，只要降。

(11) 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御前会议通过，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 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A. 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B. 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C. 中、日、满经济合作；D. 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曼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1]，还有孙、于、白^[2]都参加讨论接受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 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

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A. 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B. 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C. 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D. 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 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 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 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 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

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或昆明。”不亦硬哉！

(19) 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 张高峰事变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刺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A. 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B. 承认“满洲国”；C. 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 赔偿此次战争损失；E. 共同防共。”（《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 板垣的强硬论。七月一日板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板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 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即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 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合愤而辞职。

3. 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 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

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A. “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 B. “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 C. “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予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A. “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B. “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C. “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D. “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E. “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 平沼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27) 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它是留以待蒋的。

(28) 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

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 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

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条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它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上说三节，第一节指出它的基本方针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它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它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它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它的这个阴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二、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常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纵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也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容观战，然后乘其疲惫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者以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者以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

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1. 一九三七年五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2.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3. 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

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1. 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2）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2. 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3. 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的各种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援助中国抗战最大。它没有阴谋侵害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它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过去红军即现在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

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地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官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自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计，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3]、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有蔡廷锴，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有吉鸿昌、任应岐，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孙科。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哈，有哈哈——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二、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三、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四、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

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五、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它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六、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七、佛朗哥并没有收容米亚哈，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哈。日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八、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

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一、许多军人拥护抗战；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三、共产党的反对投降；四、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一、苏联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训；三、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等。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

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二、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三、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四、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五、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七、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等现象，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当前的任务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

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对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针与现在的方针之间是否一致问题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采取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只要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为什么此时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问题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三、为什么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问题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一）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

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二) 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三) 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四)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

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蒋问题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待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五、反汪问题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地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题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七、民主民生问题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八、磨擦问题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及从某些军队中撤退党的组织问题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十、援助友党问题

(一) 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依进步程度而定援助

程度之不同。

（二）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后反噬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三）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十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十二、中央组织问题

（一）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二）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三）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四）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五）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十三、干部教育

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

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十四、学习运动

(一) 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 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三) 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四) 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五) 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六) 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七) 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

(八) 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九) 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

十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十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

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十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运动

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十九、锄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十、党的组织问题

（一）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二）严密。

（三）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四）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五) 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二十一、自力更生

党，军队，一切。

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二十二、华北问题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二十三、华中问题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二十四、保卫边区

(一) 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 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 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 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 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 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 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 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十五、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

- （一）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 （二）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 （三）因为敌情；
- （四）因为经费；
- （五）决定去一万人；
- （六）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 （七）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 （八）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 （九）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 （十）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会

- （一）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 （二）十月开会；
- （三）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 （四）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十七、两条战线斗争

- （一）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 （二）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 （三）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

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二十八、团结战胜一切

(一) 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二) 必须更加集中。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三) 全国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结 论

(六月十三日)

一、时局问题

(一) 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 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 克服小部投降。2. 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 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朗哥），故较过去的战略

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 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 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 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

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避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了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

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二、转变问题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哈），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几个策略问题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 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 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 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 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 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

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

〔2〕指孙科、于右任、白崇禧。

〔3〕指宋庆龄、何香凝。

彭雪枫关于游击支队一年战斗情况 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

毛、王、滕、朱、彭、胡服^{〔1〕}：

甲、我们是由去年十月进入豫东、皖北时，尚不满四百人，死伤仅一百七十余人。因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九个月来发展壮大八倍。在豫东，在苏北、皖北打了日寇，消灭了汉奸，大小战斗三十次。三十二中队以窰楼战斗击溃由淮阳向我进袭之敌，全部被我击溃。其次是皖北芦家庙战斗，打击了进犯皖北芦家庙之敌，保卫了皖北门户亳州，俘虏“剿共”军第一路司令崔华山、参谋长一名。其次是永城东北之瞳路口北，俘虏旅长李颜良、参谋长王克勤等各一名。杞水瓦岗与六县瑄溟^{〔2〕}战斗，毁敌汽车五辆。

一年战斗缴获如下：

(一) 共缴获步枪一千一百一十七支，短枪五十二支，手枪二十七支，轻机枪十四挺，重机枪四挺（内有九二式一挺），冲锋枪两支，手提七支，迫击炮二门，日本指挥刀二把，信号枪一支，步枪弹一万八千四百四十八发，炮弹七十八发，炸弹共十六枚，骡马一百三十四匹，自行车二辆。

(二) 俘虏共一千零六十五名，内有伪旅长一名、参谋长三名、营长三名、□民区长一名、连排长十余名，毙敌六百余，毁汽车五辆。

乙、我前后共伤、亡、失联络在一百五十余名（内阵亡副营长陈光勋、指导员康乾定、参谋戴先根、排长二名，伤排长三名、排副五名）。

丙、兹将陈、康、戴略历简报如下。（略）

雪 枫

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王稼祥、滕代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

〔2〕原文如此。

项英转报陈毅关于坚持 江南地区的意见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

中央：

陈毅电转下：

甲、目前国民党积极进攻我地方组织，争夺地方武装，但表面对我还是敷衍，并积极在下层捣鬼。

乙、二支为国民党主力决在地方，磨擦较大。一支方面，国民党尽量撤换同情我者之人员，但我主力雄厚，可保无虞。

丙、根据近来各方情况紧张，干部发表意见，要求请分委指示：

(一) 两党是否分划区域，因国民党正在宣传新四军开往华北。

(二) 我意必须坚持江南地区，保障东南发展，可向蒋、白、冯^①提议，求得合法，明确划分区域。二支担任苏南京地第二行政区域；一支担任苏、常一带战线；三支担任皖南，放弃芜湖、高淳。

(三) 必须增加上层联络，对中下层予以小利，巩固已组织之部队。

(四) 国民党错误应予以驳斥，利用国民党进步宣传推动抗战。

(五) 地方武装，好的一律改为本军正式番号，使国民党无从染指。坏的及不能争取的可作人情送给他们。另外，利用

新成立之武装，采取合法姿式掩护活动。反对国民党吞并政策，表面调停内中加剧。

（六）动员群众和我军切实帮助他们、影响他们，并批评地方政府机构腐化、堕落，将其各个击破。

（七）地方工作人员一律背符号，经常与之联络，但组织应绝对秘密，以灰色名义利用上层绅士掩护工作。

（八）强调反共反蒋为日寇阴谋，是汪精卫与近卫表演双簧把戏。

（九）二支与×之冲突可亲去解释中。

你们有何意见，九日电告。（克农转恩来^{〔2〕}）

项

十九日午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新四军·文献》（1）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白崇禧、冯玉祥。

〔2〕即李克农、周恩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时局及 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关于目前时局分析及党的任务已见六月七日中央电示。

（二）在目前形势下日寇已经并且会继续集中力量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及我游击部队，而对其他国军之进攻与缓攻则有配合其诱降阴谋之可能。因此我们任务应当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政治上，巩固自己，准备自己，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联络友军，巩固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以坚持抗战。

（三）在部队方面，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任务是在发展。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都要有决心的派遣干部帮助华中。

（四）凡在抗日根据地方面应注意加强那些能够持久的山岳地区的工作，而将不易在平原地区持久的某些部队及地方的干部及时地调到山地去。在我部队与友军杂居的地区中，除加强联络工作及提高自己之警惕外，还应进行准备自己的根据地的工作，以求在情况变化时我们仍有依托。

（五）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

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之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清查人员尤其是注意司令机关、通讯机关、机要部门，以保证我军机密与在困难条件下的通讯联络。加强锄奸工作，使其成为全军全党的工作，集中注意力于反对敌探及反共分子的阴谋破坏上面。

（六）广泛的开展反对投降的运动，与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协同发动反投降的舆论，反对“和平”欺骗，指明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宣扬我军战绩，提高各界抗战信心。对友军工作的意义大为增加，我各军政首长应尽可能的亲身进行联络工作，尤其要争取受压迫、歧视的军队与我靠拢，一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地方居民中注意适当的政策，严禁无组织无计划的筹粮筹款，争取各阶层的广大同情，孤立投降反共分子。对第三国人士及其教堂，应尊重其权益，以争取国际同情。

（七）在军队的物质方面，应有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节省运动，节省财政、弹药、医药、通讯材料等，另一方面进行征集资材的工作，进行生产运动及合作社运动，帮助地方政权开发资源，调集一批干部加以训练，以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这是一种艰难的刻苦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准备。

（八）关于各种工作的详细建议与指示另电告。

中央军委 总政治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总政治部关于大量 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 问题的训令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原则是：（一）大批的吸收纯洁的革命的分子参加下层工作；（二）经常考查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四）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的接受本军光荣传统。为了达到这目的，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分子，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另一方面必须号召新的革命分子虚心从实践中学习，向老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提出看不起工农分子就不是真正的革

命者的口号，以确定他们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以消灭新老之间的隔膜与有步骤有方法的率领和锻炼这批新的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王 稼 祥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侵华战争的战略上，在占领了武汉以后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占领武汉以前，日本战略是集中兵力，会攻中国的战略要点与铁路线，如北平、天津、徐州、上海、南京、广州以及武汉，以求歼灭中国军队，占领中国经济政治中心，达到其速战速胜的目的。在占领武汉以后，日本侵华战争的重心，已由正面移到敌后。在正面已经不是集中兵力会攻一地，而在敌后，特别是在华北，日寇则用其大部兵力进行其所谓“扫荡”，巩固其占领地区。

日本战略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因为：

第一，日本的兵力为防守其占领的点与线，已经相当分散，而中国大后方退到西南、西北以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已经使日寇很困难或者甚至不可能再集中最大兵力分数路会攻一点，譬如说会攻重庆、昆明，照过去会攻徐州、武汉一样。

第二，我军及我游击队在敌后非常活跃，并且敌后的抗战在大多数地方已经由单纯的军队抗战变为全体人民的抗战，使日寇已经占领的点与线时时受到威胁，并且不能使日寇开发其

* 本文为纪念抗战二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五、七十六期合刊。

所渴望的占领地区的财源。因此，日寇不能不调集大军，企图驱逐我军与游击队，以巩固其占领地。

第三，最重要的是日寇的军事战略配合其政略。日寇在占领武汉后，估计到武力吞灭全中国的不可能，便特别加强其政治阴谋，引诱中国讲和投降。其“扫荡”敌后而在中国正面时而攻占某些城市，时而停止前进，都有其配合政治阴谋的作用。

然而，上述诸点并不是说，中日战争已经达到了彼此相持的阶段，日本已无力再在正面前进了，而是说日寇进攻的重心放在敌后，在正面则按政治军事的需要以一部兵力进占某一城池（如进占南昌、汕头），但已经不是照过去进攻武汉式的集中最大兵力分数路会攻一地了。因此，日寇进攻中国西南、西北的某些地点，仍旧是可能的。

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目前战略的特点。

然而，战略是取决于政略的，“战争就是政策的继续”，政策变了，战略也随之而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策，也有了很大变动。日寇灭亡全中国的目的，是始终未变的，也不会变的，但为达到其目的的政策，或者说方法，便会有也已经有了变化。在占领武汉以前，日寇的政略是以军事进攻来摧毁中国的抵抗力，以达到吞灭中国的目的。

在占领武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看见中国的抵抗力并未摧毁，而自己的兵力反而分散，困难反而增多，中国的正面的抗战与在敌后的抗战，反而增多，中国的正面的抗战与在敌后的抗战，使日本的“泥足”更深的陷入中国的泥坑中。此外，日寇也估计到中国的主要大城市及铁道线失守以后的困难，认为有隙可乘，因此，便改变了它的政略，由军事进攻来灭亡中国的政略转而采取了以政治阴谋，诱降劝和，强调反共，以破坏国共合作，瓦解中国抗战阵线，而以军事行动配合其政治阴谋，企图以这样的政略来达到灭亡全中国的目的。

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目前政策的特点。

中国人民应当怎样努力来对付日寇目前的政治上、军事上的阴谋与进攻呢？

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寇的诱降阴谋，反对汉奸汪精卫及一切其他投降分子的投降活动，揭穿一切媾和的阴谋，稳定抗战阵线内的不坚定分子，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动摇，以继续执行已定的坚决抗战的国策，以驱逐日寇到鸭绿江边，解放与复兴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允许与日言和，即是投降日寇，中日寇灭亡中国的目前政策的毒计，而陷伟大的中华民族于亡国的境地中。

为达此目的，中国人民必须巩固国内团结统一，巩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反共。反共是日寇破裂中国民族统一的阴谋，是它引诱中国投降的法宝，反共是汉奸汪精卫及投降分子破坏国共合作达到投降的借口与桥梁，因此，应当不仅反对日寇汪逆的反共，还应纠正假抗战统一之名而实行反共之实的活动。反共就是破坏抗战，只有巩固国共合作与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抗战，才能有效的反对日寇投降及瓦解中国抗战阵线的阴谋政策。

在军事战略方面，我们应当认识：敌后抗战已成为目前抗战的重心，游击战略已成为目前抗战的主要方式，因此，除正面布置防卫外，应当把重心放在帮助敌后抗战的坚持上，这已经成为目前抗战的中心任务。假若敌后抗战不能坚持，则全国抗战便发生很大的危险。

怎样才能使敌后的抗战胜利的坚持下去？

一谈到坚持敌后抗战，便立刻想到应当加派军队及工作人员到敌后方去。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敌后抗战的军队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军事素质，敌后我国政府应有适

当的机构，应实行正确的各种政策；战争指导者应采取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而在我后方，政府军队与民众应尽力在各方面给在敌后艰苦奋斗的军队、游击队、地方政府及民众，以切实的接济与帮助，应当体恤它们的困难，而不应增加它们的困难。总而言之，就是应当真正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真正组织民众，真正精诚团结。一句话，就是应当实行抗战的正确政治路线。假如不是这样，仍旧是军队单独抗战，不组织民众，甚至禁止和压迫民众，政府机构依然故旧，政策仍旧不变，甚至更坏的，有些不明大义分子专心反共，抛开抗战的责任，一心磨擦，自相倾轧，抵消抗战力量，那末，一定会中日寇的奸计，引导全国抗战到失败。假如这样，不管派好多军队与工作人员到敌后去都无济于事，反而甚至有害的。这是八路军——敌后胜利的抗战的主力军之一——在敌后抗战一年余的经验，值得国人的严重注意。

在抗战二周年的时候，抗战已进到一个严重的紧急的关头，并且也是中国胜利或失败的关头。在这个严重的紧急的关头上：

中国人民的政治任务是：坚持统一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动摇投降，以粉碎日寇诱降和瓦解抗战阵线的阴谋政策！

中国人民的军事任务是：真正帮助、接济和巩固敌后的抗战，布置正面的防御，以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准备反攻，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反对投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

*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

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

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钩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

——中共十八周年纪念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张 闻 天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看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两条不同的保卫民族利益的路线：一条是不彻底的，而另一条则是彻底的。

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保卫民族利益之不彻底的路线呢？

当日寇坚决进攻中国时，它是要进行抗战的。但是必须在少数上层统治者无理的包办统制底下进行，而不赞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总动员，不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政治、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方面，只求某些不得已的、缓慢的、胆怯的、微小的改革，不愿并且惧怕各方面的主动的、大胆的、彻底的改革，尤其不愿并且惧怕给人民大众以民主的自由权利，不愿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地位，来大量的发动与组织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积极的参加抗战。相反的，它的很大力量常常不用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用于打击比较进步的分子与团体，尤其用力于打击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组织。而对于落后的、顽固的、黑暗的、甚至反动的势力，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新中华报》。

则表示最大的容忍、袒护与纵容。对于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表示不彻底与不坚决，特别对于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表示怠工。对于外力的援助有过度的希望，对于自力更生的信念极不坚定。它从没有抛弃过经过国际会议的方式，以求得中日战争“和平解决”的希望，而且不断的为着这种希望的实现而活动。对于朝野人士投降妥协倾向的打击，很不彻底，很不坚决。而且在敌人诱降的活动与英、美妥协派的调停之下，自己也表示动摇不定，准备投降妥协，甚至表示只要日寇退出华中、华南，中国就可以停止抗日。华北是准备随时放弃的，东四省则早已不放在应该收复的失地之内了。……

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路线呢？

它始终站在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用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驱逐日寇出中国、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立场上。它坚决主张全国军队、政治、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动的、大胆的、彻底的、迅速的改革，尤其着重于民主自由权利的保障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着手于大量发动、组织与武装民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中华民族与国家内取得应有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平等地位。它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且要求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它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对于全国一切参加抗战的阶级、阶层与党派有利，而不只对于少数上层分子有利。它坚决拥护与赞助一切前进的、光明的、自由的、民主的、活跃生动的运动与力量，而反对一切落后的、黑暗的、保守的、腐化的、专制野蛮的东西。它主张力争外援，但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它在敌人诱降与英美妥协派调解前面决不动摇。它坚决反对任何东方慕尼黑形式的投降妥协。它揭破一切国内投降妥协分子“防共反共”的阴谋，指出

这是他们准备投降的具体步骤，主张从一切机关与团体上肃清汉奸及各种隐藏的民族危害分子。……

谁都可以看到：前一条保卫民族利益之不彻底的路线，今天主要是为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所支持；而后一条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今天主要是为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所支持。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同一切拥护抗战的各阶级、各集团与各党派，不管它们是彻底抗战的也好，不彻底抗战的也好，进行统一与团结。中共深信，只有这种统一与团结才能扩大抗战的力量到最大限度，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而且，中共为了坚持这样的方针，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但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走到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在抗战中起了先锋与模范的作用，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和缓国内各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间的矛盾与冲突，采取真正光明正大、仁至义尽、谦逊忍耐的态度，去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正因为如此，中共也坚决的拥护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一切积极的抗战方针与方法，而且用了一切方法推动其持久与进步。但是同时，中共对于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不彻底的抗战路线中一切违反抗战利益的、错误的与消极的方针与方法，则采取了批评、忠告与反对的立场，而且也用了一切方法帮助其改变与克服。中共深信，如果中共对于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不采取这种态度，那末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断然无法贯彻，中国的抗战，也断然不能最后胜利。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认识：中共所主张与拥护的这一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

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所必须采取的路线，也是完全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路线。

不幸的很，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虽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参加了民族自卫战，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由于他们历来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所以惧怕民族抗战的最后坚持与最后胜利，他们始终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要同主张与拥护这一彻底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在全国人民前面充分暴露了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争取民族抗战的这种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当日寇向中国主要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的方针，使一切和平妥协的谈判成为无望时，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就不得不表示他们对于抗战的坚决。这种情况，也就促进了中国内部的团结，促进了中国各方面的某些进步。但是当日寇暂时和缓其军事上的坚决进攻而更多施展挑拨离间的政治阴谋，使和平妥协的谈判似乎带有某些希望时，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就立刻开始表示他们对于抗战的不坚决。这种情况，也就引起了中国内部的各种磨擦，使已经开始的某些方面的进步无形的停滞下来。特别自日寇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它侵略中国的方针主要的从军事的进攻转到了诱降的政治阴谋，同时英、美、法各国的妥协派为了保持它们在东方的权益，积极调停中日争端。于是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就大大的动摇起来，并且极力希望经过东方慕尼黑的方式，以达到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就使中国内部的磨擦大大尖锐化，把中国拉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与危险的关头。

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清楚的懂得：当他们要求坚决抗战时，他们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与支

持；当今天他们企图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时，坚决站在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彻底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他们走向投降妥协道路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今天为了准备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必须首先集中全力“防共”、“反共”，反对共产党，压迫共产党，捕杀共产党员，同共产党找磨擦，并且散布各种谣言，似乎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使他们不能继续抗战与企图投降妥协的主要原因。

这当然是一种无耻的造谣与欺骗！因为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坚持全国抗战之最有力的支柱。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彻底抗战路线。共产党的一切主张与行动，没有一件是对中华民族没有利益的。在全国各地、在我后方、在战区、在敌后方，共产党员都为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抗战的彻底胜利而牺牲奋斗。为了保卫祖国的主权与领土，而在敌后方血战着、坚持着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英勇的八路军与新四军！

一切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决不是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不能继续抗战与企图投降妥协的原因。相反的，正是因为他们企图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所以他们不能不努力“防共”、“反共”，企图以此扫除他们走向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的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物。这一点，显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清楚知道的。所以，自从占领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即集中全力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加强“防共反共”的活动。一切汉奸、汪派、托派，也都在这方面同声响应。他们知道，不打击坚持彻底抗战路线的共产党的力量，中国的投降屈服是不可能的。“防共反共”是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准备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诱降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向全国人民明确的指出，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不彻底的抗战路线，如果任其贯彻下去，必然要引导到中国的屈辱投降与亡国灭种。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那种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只能得到这样的悲惨结果。两年来的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更教训了全国人民，要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以改变与克服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那条不彻底的抗战路线，必须以自己的彻底性、不调和性与坚定性，去改变与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在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今天准备投降妥协的危险前面，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去批评、忠告与反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言论与行动，不去停止他们“防共反共”的玩火阴谋，不去向他们指出为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革命现实所再三证明了的“投降必反共”、“反共必亡国”的真理，并且用一切力量去挽救他们的没落沉沦，而自己表示动摇、不坚决与张皇失措，那就不但不能防止投降妥协的实现，而且正会加速其实现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汪派、托派及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共同防共”的逆流前面，是决不会动摇自己的坚定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指出目前时局的真相，指出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投降妥协的倾向是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防共反共”是投降妥协的实际准备；另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站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彻底抗战的路线上，一致动员起来，去克服这种危险，去击破这种“共同防共”的逆流的侵袭，使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中共必须再三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如果没有坚决主张与拥护中国工人阶级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彻底抗战路线的中国共

产党，则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将更加为所欲为，中国抗战决然不能胜利，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决然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事业，已经奋斗了十八年。它一方面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曲折性与艰难性，同时认清了中国革命正要在这种持久的、曲折的与艰难的过程中发展到最后的胜利。“七七”抗战开始之初，中共中央即指出：“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及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显然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汪精卫等的叛变而动摇中国工人阶级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也不会因为新的汪精卫等的民族叛徒的出现而动摇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必须坚持，而且必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屹然的耸立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它以锐利的目光瞭望着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光明的前途，它有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毅力去战胜一切前进路上的困难与障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友军孤立反共 投降分子策略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六月)

在投降成为目前最大危险，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形势下，开展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友军继续合作抗战，是避免自己孤立而孤立投降反共分子的最重要步骤。为此目的：

(一) 我各部队应利用一切机会，联络周围的友军，推动他们进步。我各级军政首领应尽可能的亲自去联络友军军官，利用过去同学同事关系，经常通信联络，以求在思想上、政治上去影响他们。要认识联络感情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 我们对友军的立场与态度应当是：(1) 坚定他们抗战的决心，揭穿一切投降及其准备的借口；(2) 合作抗战，不受反共宣传及活动之挑拨离间；(3) 对他们的帮助应根据他们进步的程度来决定；(4) 用一切方法推动他们的进步；(5) 在一切磨擦中，我取严正的自卫立场，孤立最顽固的反共投降分子。

(三) 争取受国民党压迫与歧视的军队与我们靠拢；表明我们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吞并消灭的政策；指出这些军队只有在抗战中、合作中、进步中，求生存、求发展，假如被反共分子利用或参加反共活动，结果一定上当。假如这些军队官长惧怕国民党而不敢与我们发生关系，那我们与他们的联络及来往，应采取隐蔽的秘密的方式。

（四）在准汉奸的部队及其首领已与日寇有关系而有明显投降决心的部队中，我们应采取严格的地下方式，准备在其首领投降时举行起义及瓦解其部队。

（五）由军事指挥官、或政委、或主任，兼任联络部长，而收集一批与友军军官有亲戚朋友关系的分子来进行工作，是加强联络部组织的具体方法。

（六）关于友军中党的组织问题，中央另有电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周恩来关于平江惨案 致陈诚的抗议电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

重庆政治部部长陈：

顷接湖南电告，新四军通讯处于六月十二日突被二十七集团军杨子惠部特务营余连包围缴械，当场击毙该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及职员吴贺众二同志，嗣又将该通讯处罗梓铭、曾汉声二同志及新四军家属六人活埋于黄金洞内。事后迄未宣布罪状，并禁止谈论此事等语。查涂正坤、罗梓铭等八同志均系负责之共产党员，在平江工作多年，与地方上向称和睦，涂同志且曾参加平江县动员委员会，努力抗战工作，众所深知，今竟遭此惨杀，显系别有用心者所为。惟杨部隶属九战区，部队行动必有主使，前弟在渝曾闻中央调查统计局派有特工委员会专驻湘鄂赣担任反共，今兹惨案，不能谓为无关。且另据电讯，谓孔荷宠部亦曾参加此事，远道闻之，殊增愤慨。弟此次回肤^①，原冀与敝党中央商讨巩固团结大计，并求平服磨擦事态，乃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愤懑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用特电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

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实无任盼祷之至。至若通讯处应否取消，亦只能以命令行之，和平商之，决不能作为以武力杀人之借口也。谨电直陈伏维察鉴。

周恩来 叩

冬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 刊印。

注 释

〔1〕指肤施，即延安。

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节选）*

（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

彭 德 怀

一 敌后战争形势

自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凶险的日寇，一面积极地施行诱降政策，企图分化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故意暂缓其正面战场的进攻；一面则回师后方，大举进行疯狂的“扫荡”，企图确保占领地，建立伪政权，消灭我民族精神，进行经济开发以实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毒计。两年以来，敌后地区，特别是华北，经历了残酷的连续的苦战，陷入严重的紧张的战争局面之中。

由于敌后目前所处战略地位的重要——尤其是华北，将来是决定最后胜负之重要战场。这种敌后严重的紧张的战争局面，必将随全国战局之发展而继续发展，随正面抗战相持局面之到来而更紧张。因此，其严重性只会日益增加，一直到反攻阶段开始，才会逐渐改变。由于我们全国的进步不够，力量的增加不够，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还不易迅速改变，如此在敌人不断的连续“扫荡”之下，在一定阶段之中，敌占区的面积一时可能有若干扩大，敌人之据点可能随军事之进展而有若干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这里节选其中一、二、四部分。

增多，不仅是平原，甚至山地都可能钉上斑斑蹄踵。因为山地固然是我们游击基本根据地，但同时也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在最近缴获的敌酋桑木师团长的训话中，便曾明白道破其企图，他说：“华北治安枢纽，实在山地，如山岳地带未能彻底肃清，则明朗华北之实现还是难说。”因之，敌后抗战的坚持是全国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敌后的坚持，就不会有全国的相持阶段。

但是，由于敌后地区的辽阔，敌人兵力的基本弱点不易克服，其对敌后各地的围攻，一般只能被迫采取集中兵力分区“扫荡”的办法。如此便利于我们以围攻与反围攻配合起来，即被围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敌人的围攻，未被围攻的抗日根据地可从四周围攻敌人，相互配合起来，粉碎敌人围攻。敌人因为消耗过大，疲劳过度，困难增多，形势不利，不能不被迫退出围攻区域，而以一部兵力留守固有交通线与城市据点，以及重新修复、修筑的铁路、公路、堡垒等交通线和据点。而其他区域我抗日军游击队，又大肆活动，敌又不能不转移兵力另行“扫荡”他区。我一度被围攻恶战的某抗日根据地，由此便取得了战役上的相持局面。我们便可乘此间隙时间，整理和巩固各种被摧残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各种工作，扩大根据地，配合邻区，打击敌人，生息新的力量，并且彻底肃清敌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毒素，准备迎接和粉碎敌人的再次围攻。这种战役上的相持局面，过去曾经有过，现在还是存在，将来由于敌人连续施行“扫荡”，地区不断被分割，战役上相持局面的过程会缩短，相持的区域可能缩小，但是基本地区与局面仍然是存在着的。

今后敌后总的形势，还是像我们以前所估计的，敌人一般只能占领一些交通要道和大小城市（若干小城市，无法长期占领），而以这些交通线和城市包围着我们；我们则占领广大乡

村和一些小城市，而以这些乡村和小城市包围着敌人，形成犬牙交错的形势。敌人由交通线和大城市出发，重复地向我进行围攻和“扫荡”，我们则凭借广大的乡村，农民的雄厚力量，再接再厉，一再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扫荡”，形成此来彼往的拉锯式的战争局面，因之敌后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而且是非常艰苦的。

这种敌后的持久的、艰苦的战争，现在已在进行之中。它与主力战场配合，构成敌人停止向正面进攻，造成全国战局转入相持阶段的重大因素；而在继续长期坚持以至最后与主力配合反攻中，构成渡过相持阶段争取反攻胜利的重要条件，也就是有力地打击妥协投降派阴谋破坏的重要条件之一。

只有在敌后坚决坚持，吸引敌人力量向我们反复围攻与“扫荡”，而同时又不断将其粉碎，严重打击敌人，与全国的进步配合起来，才能造成全国抗战的相持阶段。因此，只有彻底肃清隐藏于抗战营垒内投降妥协分子，清洗顽固腐朽分子，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动员组织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加紧充实旧军，创建新军，改善军队装备，从正面和侧翼不断打击敌人，才能迅速消耗敌人力量，增加敌人困难。只有自己的努力和进步，才能增强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困难，迅速地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争取相持阶段上的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抗战的过程，实现反攻的胜利。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敌后抗战的坚持，是决定战争形势的转变和抗战胜利的重大因素。我们深深盼望，一切留处敌后的抗日政党、抗战部队、政府机关、民众团体都能够长期地坚持不懈，肩负起这一严重的实际的战斗任务。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更将不避一切艰辛，不顾一切牺牲，与敌后方全体人民，与敌后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共同毅

然肩负起这一全国人民交托给我们的艰苦而又光荣的任务。这是争取祖国独立自由的神圣的实际的战斗任务。敌后长期的苦战和艰苦的坚持，是鉴定政党政策正确与否的尺度，考验留处敌后抗战部队本质优劣之标志，也是考验和锻炼本党本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指战员和政工员的熔炉。

二 巩固敌后方抗日根据地

基于上述敌后战争形势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敌后的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较诸全国其他战场更为长期和艰苦，同时，战事是紧张的、剧烈的，较诸全国其他战场更为紧张和剧烈。敌人的围攻和“扫荡”，在全国战局转入胜利的反攻之前，绝对不会停止，将一次又一次，一次更比一次严重和残酷。因之，要在敌后坚持，粉碎敌人的连续围攻与“扫荡”，克服一切困难，渡过这一长期的艰难困苦时期，绝非仅仅凭借军事力量所能见效，其中心一环，首在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

只有巩固根据地，树立强固的作战后方，实行崭新的进步的作法，以保障物质的供应和兵员的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否则，敌后抗战的坚持便无从设想。

也只有巩固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确保敌后人力财力以及一切物质资源勿为敌人利用，打击敌人“以战养战”计划，抑留敌人进攻和“扫荡”敌后的大量兵力，才能使敌人无法向全国无限制的进攻，才能造成全国抗战的相持阶段的局面。

巩固根据地是坚持敌后抗战的最基本任务，也是争取全国战局得到转机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要以巩固根据地的积极行动，来粉碎敌寇连绵不绝的围攻与“扫荡”，同时要在反围攻反“扫荡”的连续的胜利战斗中，力求根据地的巩固，要做到

经过一次围攻和“扫荡”，根据地的巩固程度更增加一分，最后成为敌后坚持长期战争的坚强堡垒。同时敌后长期艰苦的战争是与全国抗战不可分离的，我们还希望全国各友军，从正面、侧翼以一切有效办法打击敌人；全国人民给我们敌后以各种有力的援助，使敌后抗战不至陷于孤立，这才能使敌人肃清后方、掌握占领地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也就是征服中国的梦想，无法实现。

三 巩固根据地的基本任务

巩固根据地之重要，已如上述。目前问题在于如何巩固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的基本任务，至少有如下数点：

第一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巩固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只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巩固抗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仅是政党的合作，上层团体的联系，其基础尤在于各阶级、各阶层在抗战中的相互团结，相互合作。特别是在敌后方，在与敌人进行苦战中，这统一战线下层的基础巩固是最最重要的事。自然，这应由民主、民生两方面来着手努力，而目前最主要的还在于改善下层群众的生活。农民所负的租税过重，借贷的利息过高，工人的工作时间过长（此地煤矿工人每天作十六小时工作，雇农、牧童从拂晓工作起一直到黄昏才止），工资过低，低到不能养活一个人，这样，民族的团结绝对不会增强。反之，阶级的纠纷只会更多。敌后方若干地区的地方政权都颁布了比较进步的法令，如五一减租、减息至分半，阎锡山先生的合理负担，以及规定一定的工作时间等等。但是，真正深入下层过细检查，这些法令大多没有被执行，或者是表面上执行了，实际上穷人所纳的租税利息和负担没有得到应有的减轻。若干顽固的地主、资本家，他们想出许

多花样来剥削农民、雇农和工人。阎锡山先生的合理负担，虽有“牺盟会”和民众团体想好好地执行，执行得真正合理，但很多地方因被一部分土豪劣绅操纵，发生种种营私舞弊的现象。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应该是有钱出钱，但是被土劣操纵的地方恰恰相反，有钱的不出钱，他们把负担推在穷人头上，没有钱的反而要摊到不合理的负担。这样，增强民族团结也就难达到了。要巩固统一战线，首先便应把这些现象纠正过来，严格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法令，真正使负担归于合理，并以实际有效的办法来制裁豪绅，保障其执行。这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抗战的民族利益，是与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相符合的。

第二是实现民权主义，改善行政机构。民主政治是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这是由抗战的实践证明了的，只有实现民主，才能提高人民的抗战热情，参战热忱；才能密切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才能建立廉洁政府，提高政府的威信。只有政权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政治才能刷新，一切工作才能顺利地展开。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在抗战期间，特别在敌后方，应赶速实行。应确实赋予人民以民权主义所规定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让大多数人民确切运用这四种权利，改善县、区、村政权。谁不让这样做，谁便违反了三民主义；谁不让这样做，谁便是不想求进步；谁不让这样做，谁便是存心保持一个贪污腐化的政府，而不希望一个廉洁清明的政府出现。实行民主，改善行政机构，根据目前困难情势，应首从下层做起，先要建立起若干的模范村区政权，然后以之来推动全县、全区、整个抗日根据地，以至整个敌后方，以及全中国。

第三是武装民众，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强大的民众武装和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坚持敌后方抗战的必要

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很难支持长期的连续的战斗。只有以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游击战和正规战配合，不断困扰敌人，打击敌人，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没有民众武装和游击战，正规军便失去了耳目，失去了羽翼，它的力量将会大大减弱，它的困难将会增多。民众武装，在后方可以镇压汉奸，维持地方秩序；在前线它可以袭击敌人，配合作战。它的力量是伟大的。同时，民众武装和游击队又是补充正规军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地繁殖游击队，同时要帮助和推动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

第四是发展生产合作事业。敌人围攻和“扫荡”各个抗日根据地重要手段之一，是施用经济封锁和商品倾销。凡是必要的日用品和必需品，它封锁起来不让进口；凡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和消耗品，则以汽车运输大量倾销。以这种经济的窒息和破坏，来瓦解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封锁，排挤敌人的商品倾销政策，基本的是发展我们的生产合作事业，求得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简单说来，便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开办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生产必需品，自己来运销。敌后方的全体军、政、民应该把此看作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事业之一。要知道保护生产工具，增加生产，节省物力，调剂金融。军队方面自己要进行生产，更要鼓励人民生产，政府机关、民众团体要研究增加生产办法，并奖励人民生产。在这一方面，晋察冀边区有着很优良的成绩，他们在去年一年中不但尽量做到自给自足，一切服装等等用土布，而且还争取出超，把消耗品输出，吸收敌区法币流入，他们谨慎的发行必要的地方流通券抵制伪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这样巩固和强大，决不是偶然的。

第五是加紧锄奸工作，揭穿敌人形形色色的阴谋。在最近

敌人围攻各根据地中，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政治阴谋的加紧，特别着力于以各种方法，来欺愚麻醉民众，企图消灭我民族精神。他们公然无耻地宣称：要实现明朗华北之建设，中心在于掌握民心。在这样的口号之下制造出了许多欺瞒民众的新奇花样。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具体事实，向民众进行宣传解释，一个个将其揭破，使其不但不能起任何作用，而且反激起民众的厌恶与反感，增加其对敌寇的仇恨心理，提高其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汉奸活动的提防和汉奸的铲除，也是粉碎敌寇阴谋的步骤之一。用各种方式暴露汉奸的真面目，揭破汉奸的罪恶，开展广泛的群众锄奸运动，今天已成为急切的工作之一。对于汉奸的处理，应按不同情形而有差别。争取个别不自觉的汉奸，打击甘心为虎作伥的大汉奸，以及瓦解汉奸组织，这些办法应知善于灵活运用。

第六是严整部队的纪律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队要是脱离了民众，便会无法生存。部队纪律的严明，是保持部队和民众良好关系的基本条件。在战争期间一切决心在敌后方坚持的部队都应极度改善自己的纪律。部队内都应加紧纪律教育与建立纪律检查制。不但做到不侵犯群众利益，而且要能处处为群众打算，为群众利益着想。以资军民融成一家。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方面从整肃部队纪律着手，一方面还要加强部队内部的教育，尤其是干部的教育，以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文化水准。

敌后正处于严重的战斗环境之中，我们要加速完成上述基本任务，以求得根据地的巩固。同时，要完成上述任务，还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顽固派所采取的“防共”、“反共”、“限制异党”的阴谋。放松这些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便等于放松对敌后抗战的坚持。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胜利的途径也只有一

条，踏稳脚步，齐心努力，向胜利的目标迈进吧！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光辉前途在照耀着我们。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彭德怀军事文选》刊印。

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朱 德

八路军抗战两年以来，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一，凡是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地方，我们就能胜利；凡是在发生磨擦的地方，我们就要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冀察晋边区之能连续粉碎敌寇数度疯狂的围攻，晋冀豫边区之能成为华北抗战最坚强的铁的堡垒，晋西北根据地之能继续巩固与发展，这是靠了什么呢？就是靠着党政军民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些抗日根据地中，各党各派过去和现在都能互助互让，大多成立了比较民主的抗日政权，部分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帮助民众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给予人民以各种抗战的便利。政府爱护人民，人民尊敬政府，政府帮助军队，军队也保卫了政府，军政民之间打成了一片，军队之间化除畛域，党派之间推诚相见。这一切保障了我们的铁的团结，使我们得到了胜利。

在新阶段中，华北将转入更苦战的环境。只有党政军民的团结一致，才能够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到底。

相反地，如果不积极去巩固与扩大抗战的力量，反而作日寇的应声虫，提出“溶共”“限共”的口号；如果歧视抗日政

^{*} 这是朱德《八路军抗战二周年》一文的第二部分，全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的《前线》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府，忽视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伟大作用，而加以撤除；如果不去积极动员民众，反而去限制抗日的自由；如果纵容一些军队不守群众纪律，甚至在友军将士前线喋血之际进攻其侧背；这些就无异于放下自己最锐利的武器，用自己的刀砍去自己的手，怎能令全国人士不怀疑这些人是急于私利、忘却公义的呢？华北的某些地方，就是因为发生了这种问题而遭受了不必要的挫折。

这就是说，只有全民的更加进步和更加团结，才能坚持持久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一切落后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切不团结的现象必须铲除，一切错误思想必须纠正，一切磨擦现象必须消灭。

第二，凡是在民众运动有成绩的地方，游击战争就能展开，抗战就能胜利地坚持；凡是在民运落后或受挫折的地方，抗战一定要遭受不必要的困难。想要动员民众，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的政治。冀察晋的民众在粉碎敌寇进攻之中，发挥了最伟大的作用，使军队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冀南的民运因为受到了限制，人民没有抗日的自由，所以在敌寇进攻时，我们不免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这就是说，只有把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动员起来，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在基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熬过相持阶段，转入反攻。所有的民众必须动员起来，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必须用到抗战中去。

第三，凡是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战役和战斗，我们大致就能胜利；凡是单纯防御或盲目进攻，就会遭受失败。事实完全证明，只有争取主动就利避害的机动战才能致敌人于死命。在抗日根据地的机动战的原则，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在全国范围

的机动战的原则，应当是在敌寇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在不利情况之下毫不恋战，由单纯防御转到攻势防御，由被动转到主动，由散漫的队伍转到正规化和机械化的队伍。而这种机动战的运用，必须有民众的有力的配合才能发挥它的伟大的作用。

这就是说，只有加强我军的指挥艺术，大大提高军队的素质，才能战胜敌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依靠政治的进步，而且要依靠军事的进步。军事的进步，又需要政治的进步作为保障。我们一定要加强政治的进步，来保证战略战术的提高，一定要争取全国战略的主动，一定要大大地加强全国军队的机械化。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 纪念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1〕}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执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

民族解放战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

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黑暗的、困难与危机日益增长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地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鲜明的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的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二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伏敌前，粉墨登

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播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音，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讎，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进步的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唯恐不力，去之唯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污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磨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盖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那么，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特点，可能的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

今日而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钓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么？我们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么？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他白白的流去么？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蜜语言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么？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么？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要：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

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

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

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根据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新中华报》
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中国国民党蒋^[1] 总裁并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及全体同志公鉴：

当兹中华民族英勇抗战两周年光荣纪念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全体党员向诸同志致热烈的民族解放之敬礼！

两年来的英勇抗战，已显示出我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民族精神，暴露了日寇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狰狞面目，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我长期抗战的胜利始基，并伸张了人类正义，博得了国际同情。这一空前的伟大的民族抗战之所以获得如此成绩，应当归功于前线将士的英勇牺牲，沦陷区域民众的坚持不屈，举国人士、海外侨胞的出力出钱，尤其是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坚强领导与贵党的奋斗不息，而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精诚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更给了这一成功以基本上的保障，精神上的推动。但是抗战是长期的，欲使抗战持久，必须全国更加团结，更求进步，一切汉奸叛徒，民族败类，投降妥协分子，必须受到舆论反对，国法制裁，然后抗战营垒方能更加巩固，最后胜利方能终属我们。正为这个缘故，我们愿乘抗战两周年纪念之时，特向诸同志一论目前抗战局势及如何支持长期抗战之具体方针，敬希垂察！

*

*

*

目前局势正处在由一期抗战进入二期抗战之过渡阶段。在

这过渡阶段中，我们正遭遇着新的困难与新的危险，这正如蒋委员长在本年四月十七日广播中所说：“越到接近胜利时，我们的环境必然更艰难，更困苦，更危险。”什么是新的困难呢？我们认为是：如何支持持久抗战与如何发动全面战争，与敌后真能变为前方，使小胜真能积成大胜，使全民族的生动力量都能参加抗战，都能得到民权保障，使新的战斗力量真能生长起来，以争取相持阶段到来，准备我之反攻。什么是新的危机呢？我们认为是：日寇汪逆正在公开反蒋反共，秘密引诱投降，民主国家的妥协派正在企图作劝降的活动，在国内，投降派的暗藏分子正在阴谋挑拨，妥协分子正在消极捣乱，反共分子正在制造纠纷，这一切，有造成我内部分裂而被投降派出卖的可能。因此，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便成为目前抗战局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不克服这两种危险，不仅抗战的难关难以渡过，即亡国的命运亦难避免。这两种危险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请为贵党诸同志一申论之。

两年作战，在敌人方面虽占领了我许多城镇海口，铁路矿山，但尚未遑消化，虽杀伤了我万千将士，无数同胞，但并未能歼我主力，虽蹂躏了我老幼妇孺，树立了傀儡政权，取得了多次的进攻胜利，但也未能使我丧失战斗意志，而敌人自己的国力，却因之消耗极大，出兵过百万，死伤六七十万，战费达一百万万，公债近二百万万，现金枯竭，通货膨胀，产业衰颓，物价高涨，失业者日增，厌战反战的情绪日益蓬勃，这完全是出于敌人始料之外。一期战争，敌人速战速决之方针既破，欲以此基础来支持长期作战又决不可能，于是二期战争开始，敌人乃转入以速和速结之方针，实施以战养战之办法，进行公开招降与秘密诱降，企图以此达其逼我妥协之目的。此两期方针，虽各有不同，然其性质是属于策略上的变更，并非基本国策的变更。不论田中奏折，不论广田三原则，不论近卫声明，

不论以后敌寇任何的声明，尽管形式上有许多不同，其基本国策都是要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除非敌寇的统治推翻，敌寇的基本国策是不会变更的。但是策略变了，策略的内容便有很大的不同。当着第一期战争，敌人的重心是在前进，企图以进攻歼我主力，占我土地，丧失我战斗意志，破坏我经济生产，屠杀我战区同胞，蹂躏我老幼妇孺，以此残暴威力，逼我屈服。到了进入二期战争，敌人的重心已在敌后，进攻是相机试探，企图用以战养战的办法，在军事上“扫荡”重于进攻，经济上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政治上重在利用傀儡伪军，特别是汪逆之流，分裂国共关系，分化国民党内部，精神上重在麻醉、欺骗、怀柔，以此缓和政策，逼我妥协。第一期可说军事重于政治，这一期已是政治重于军事。军事进攻为重，我们是威武不能屈的民族，反而愈战愈强，决不屈服。政治进攻为重，公开招降的如近卫文麿的声明，固然经不住蒋委员长的当头一棒，而不得不辞职下台，所招走的只是汪精卫一流的汉奸，但是平沼上台，由公开招降，进而秘密诱降，其手段的狠毒甚于军事进攻，其方法之阴险过于公开招降，故就表面上看，他可以不谈和战，而谈建设，实际上他乃欲以前线之和缓消沉，懈怠我前方将士，麻痹我后方民众，以敌后之“扫荡”经营，消灭我游击部队，收买我经济汉奸。倾销仇货，吸收我法币，广发伪券，捣乱我金融。利用内奸，分化国民党，运用外交离间英、美、法。扶植汪逆精卫，对抗我国民政府，树立怀柔政策，软化我落后民众。制造伪府伪军，实施以华制华，分裂国共关系，破坏统一战线。苟能造成我内部分裂，则中途妥协可期，否则勾引我民主友邦，要他们劝我投降，万一此皆无效，依其“扫荡”之效果，又可继续进攻，运其反共之阴谋，更可扩大内哄。在敌人则尽量利用我之人力、物力、财力削弱我国，在我方则困难如不战胜，危机如不克服，有被迫造

成不战不和之局面的可能，而难图反攻。七七事变，敌既能不宣而战，则今后发展，敌亦可不议而和。凡此种种，均为投降与分裂的危险的根源之在敌人方面者。

两年作战，在国际方面，同情日益扩大，援助日益增加，这是值得感谢的。但由于国际形势在总的趋势上虽渐趋明朗，然在其发展上都是曲折的，长期的，而且变化还多，故欲期欧美列强对日寇实施集体制裁，决非目前即可希望之事。盖欲期集体制裁能够实现，必先之以英、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能彻底合作；欲期英、美、苏合作必先之以欧洲集体安全制度能完全成功；欲期集体安全制度的成功，必须目前英、法、苏之互助协定能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这是长期的战斗过程，决非目前一蹴可及。即在目前，英法等民主国家妥协派如不根本放弃对侵略国家之妥协政策，对苏联之歧视心理，对弱小国家之哄骗办法，美国国内之孤立派如不根本改变其政策或遭受打击，则不仅欧洲集体安全无望，英美接近难期，而有再度妥协德意出卖小国的可能，即在东方，也有妥协日寇出卖中国的可能。故国际上之对日集体制裁，我们是应当要求的，对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我们是应当拥护的，但集体制裁，必须在国际间完全互惠平等的精神之下，在国际上集体安全制度成立之后，才能有保证的实施国联盟约的制裁侵略，实现九国公约的互惠平等。这只有自力更生，长期抗战到底，方能争取国际形势对我的好转，决不是今天所能希望得到，亦决不是今天国际会议所能解决的。如果今天有什么国际会议或国际协商来调解中日战争，必然是日寇及其他法西斯强盗所勾引成的，必然是东方的慕尼黑会议。目前日寇正向伪蒙边境挑衅，正向英、法、美各国特别是英国压迫，其目的便在分裂国际阵线，促成东方慕尼黑会议的出现。即使这种会议在形式上与西方慕尼黑会议是有多少不同，那因为中国是在坚持抗战，

日寇又急欲结束战争，故表面上尽可有許多甜言蜜语，甚至有某些形式上的让步，但实质上必然是出卖中国劝诱我们投降，给日寇造成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所以今天希望国际会议能解决中日战争，犹之抗战初期希望国际出兵来解决中日战争一样的幻想，一样的错误。只有那些妥协分子才会幻想今天国际会议能解救我们，能使日寇让步，铁的事实回答却是些：海南岛的占领，斯巴特莱拿岛的占领，鼓浪屿的示威，长江流域的封锁，天津租界的封锁，上海租界的挑衅，潮汕的占领以及英日谈判等等。这都是日寇压迫英、法、美首先是英国让步，而绝不是民主友邦压迫日寇的让步啊！凡此种种，又均为投降与分裂的危险的根源之在国际方面者。

两年作战，在我们自己方面，长期抗战的胜利始基久已奠定，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与重视敌后的方针亦已公布，蒋委员长自驳斥近卫声明后，反对敌人诱降反对中途妥协与巩固国内团结之言，更不止三令五申。惟自南岳会议迄今，已过半载，我们在坚持持久抗战与发动全面战争之实际工作上，在反对敌人诱降反对中途妥协与巩固国内团结之实际斗争上，却收效并不甚大，有些情况正向相反方面发展。譬如敌后游击，我们并未能以三分之一兵力、人力、财力用在敌后，并未能都以健全的部队，坚强的领导派往（增援）敌后，并未能以统一的军政权利付诸深入敌后之有功部队，反而因心怀成见，意存歧视，发生许多不应有之磨擦，造成若干不应有之限制，以致半年多日寇“扫荡”敌后之计划，竟获得某些成功，尤其是群众关系不好之部队，常被逐出敌后，游击战术不精之部队，时受重大损失，于是敌后游击根据地之创造不能如所预期，敌寇以战养战之办法却在着着迈进。如此，敌后既不能变为前方，小胜便难期积成大胜。相持阶段之争取，势必因之推远，反攻时期之到来，更将遥遥无期。譬如新的力量的生长，在动员上已

日感困难，而前方募兵后方征兵的方法尚未能大加改善；在制度上，已整编多次，而各主力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常未能整齐一致；在训练上，已时逾半载，而近代化机械化的主干力量尚未能粗具规模；在军事工业的建设上，已计划多端，但经济各部门之配合，财政上之保障，交通上之转运，技术上之提高，都未能集中全力，使之告成；尤其在政治工作之改善上，已会议多次，但重视部队、重视主力、重视前线、重视敌后之政治工作，仍然很少成绩。如此，欲期部队充实，主力坚强，既可阻敌深入于目前，又能驱敌出国于来日，恐还不是有把握的事罢！譬如民众动员，抗战建国纲领宣布年余，国民参政会亦有许多好的决议，中央及地方上的动员法令更是盈篇累牍，然而实际的动员工作，却是受着异常限制，动员组织却是时受干涉，时遭解散，动员人员却是时受怀疑时遭逮捕，动员宣传更是常受检查，常被禁止，动员训练更是常受打击，常被破坏。动员机关的本身，多还不能得到抗战的自由，更何望于动员群众，不分前方后方，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级、信仰，真能作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地步？！如此，而欲发动全面战争，恐将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更有甚者，蒋委员长关于中途妥协即是投降之声明，虽为全国军民所绝对拥护，贵党开除汪逆精卫之决议，国府通缉之明令，虽为一切抗日人士所日夜企求，但汪逆之流的投降派，却深知公开反对必遭全国之唾弃，且更有助于国内之团结，因此他们乃用暗藏办法，厕身国内，伪装拥护中央，反对投降，实际上则到处散布敌力可怕，我力无用之胡说，动摇抗战前途，乱嚷我国不亡于日必亡于共的妖言，煽惑举国人心；收买革命中变节分子，暗中活动，企图分裂贵党，破坏领导，打击一切进步思想爱国行动，向后倒退，故使群众不满，以冀实现其造成内部分裂抗战无力，不得不趋于妥协之阴谋。犹有妥协分子，对抗战向无信心，但辄贪据权

位，作事则消极，总之，妨碍抗战；议论则不讳言和，影响人心；对国防经济建设，不着眼于配合抗战，不着眼于分区生产，不着眼于紧急需要，致令计划虽有，实施甚微，去抗战之需要实远。更有投机者，在抗战中犹复利用权位，从事倒把，于是资金外流，法币跌价，生产停滞，物价增高，此不能不影响抗战之持久，尤不能不障碍全面战争之发动。至若反共分子，则头脑顽固，故造事非，胸怀成见，颠倒黑白；对共产党员暗杀者有之；逮捕活埋枪决者有之；强指为汉奸者有之；久捉不放者有之；对中共出版之书报多查禁之；对中共参加之团体多封闭之；对中共往来之朋友多怀疑之；对中共所从事之工作多限制之。对八路军新四军惟恐其影响扩大，诬其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者有之，攻其扩大力量扩大地盘者有之，于是以武力制造纠纷，以政权逼其削弱，更以素怀成见之队伍监视其后，以冀限制其发展，缩小其活动。对陕甘宁边区，不仅对久已商定之边区范围，不愿予以合法承认，即连已宣之十八县，亦思有以缩小之，故边区周围之县长保安队借辞挑衅者有之，武力进攻者有之，得寸进尺，务以消灭边区而后快。不止此也，凡青年中一切进步分子，多怀疑其与中共有关，其所发表之言论则必受检查，其所出版之书报则多被查禁，其所组织之团体则多予封闭，以此以为可以减除中共之外围，而不知愈如此，反愈使人民离心贵党，反愈使贵党难以团结全国青年。不特此也，甚至对社会之耆绅稍持正论，党中央之元勋稍主公道者，亦一律视之为共党张目。抗战将领，地方当局，苟其所行有与中共主张暗合者，则目为危险；苟其所言有称赞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边区之治绩者，必谓其已受人骗。充其极，非反共不足以表其对贵党之忠诚，非反共不足以有别于一切进步分子。如此发展，纠纷则无已时，危亡亦可立待，此正中日寇汪逆之阴谋，而决非我全国抗战军民之所愿。凡此种

种，又均为分裂与投降的危险的根源之在于国内者。

有此三方面的根源，分裂与投降的两大危险益彰彰明甚，而反共的活动，更成为日寇汪逆投降派借以挑拨全国，造成内部分裂中途妥协之最重要的关键，最实际的步骤。蒋委员长说得好：“反共即是灭亡中国”，凡是在目前二期抗战紧要关头堕入反共旋涡的都将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作了日寇灭亡中国的俘虏，作了汪逆分裂中国的内应，成为投降的实际准备。

* * *

为什么说反共即是投降之必然的实际准备呢？

因为第一，日寇方面反共，正如蒋委员长所说“完全是一个烟幕弹”。在这个烟幕弹下，隐藏着几种用意：对内用以动员他们统治力量，继续侵华战争；对国际用以连结德意，引诱民主国家的妥协派；对我国则用以破坏我民族团结，挑拨我国共关系，造成我内部分裂，使持久抗战难以继续，全面战争难以发动，以便达到其诱我投降之目的。现在汪逆精卫正在活动建立伪府伪党，号召反蒋反共，其目的便在响应日寇这种号召，用以分化国民党，分裂国共关系，破坏全民族团结，离间国际关系，以便于日寇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之国策得以实现。所以日寇之反共烟幕弹，其目的决不止于反共，实乃包括反对贵党，反对贵党总裁全民族领袖蒋委员长，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团结，反对一切抗日党派，抗日团体，抗日言论，抗日思想，亦即反对全中国人民之全套法宝。若有人以为日寇之反共，仅限于反对一部分中国人民，仅限于反对中国共产党，便可置身事外，甚至企图以反共和缓日寇之进攻，买得日寇之欢心，斯不仅为日寇之烟幕弹所欺，抑且自列于汪精卫之流。殊不知内部分裂一起，即使敝党努力抗战，即使贵党最大多数深明大义之士，在贵党总裁领导之下，更加反对此种分裂，即使前线将士全国人民更加要求团结，然而分裂必至削弱力量，分

裂必至动摇信心。力量削弱，抗战难期持久，信心动摇，团结何能巩固？故一着失，必满盘输，日寇之进攻不足惧，汪逆之活动不足虑，惟我全民族内部，国共两党，苟不怵于日寇反共之阴谋，汪逆挑拨之诡计，稍一不慎，必遗大祸。届时国亡种灭，虽欲分别你我，分别国共，置身事外，决不可以，此愿我国共两党及全国人士深长思之者一。

第二，国际方面，法西斯蒂之反共，无疑的是在助桀为虐，是在转移目标，企图以此分裂国际援华之阵线，勾引民主国家中之妥协派，劝诱或压迫中国投降妥协。两年来，他们的作法太明显了。德意在欧洲的舆论，公开诬蔑中国抗战无力，替日寇捧场，意大利空军公开参加日寇侵华战争，德国政府响应日寇请求，撤退在华顾问，德使陶德曼对于屈辱议和的奔走，意大利秘密讲和的试探，最近德国沙赫特博士东来，企图拉拢英日关系，在东方重演他在欧洲拿手好戏之慕尼黑会议。有人以为意大利固可恶，但中德经济关系，重于日德经济关系，完全出卖中国于德国无利，殊不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不能分离的，德国固愿在中国维持其经济利益，但他想，何尝不可在其同盟国统治之下和与中国的傀儡政府分赃之下，取得经济利益？德国既承认伪满，汪精卫之陈璧君向人夸耀世界有十二国家可以承认他的伪府，我们敢断言，德国必居其一。回想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时，坚主德意路线之李圣五，大捧法西斯并奥侵捷成功之陶希圣，贪庇李、陶言论之当时议长汪精卫，故均为赫赫一时之德意路线者，而今安在？故国际上之反共，必为日寇之帮凶，必为汉奸之外援，我必须坚决排斥，方能一新外交阵线。诚然，对外政策在集中火力，对日抗战时树敌应愈少愈好，但对敌人之帮凶，不目为敌，已极客气，更何能望其为我分忧，靠其为我说项？倘不能毅然斩断对德意之幻想，则国外继沙赫特之后，必续有人来，国内继李圣五、陈公

博之后，必大有人在。在贵党主政全国，虽说不得不虚与委蛇，但外交阵列不明，必致使国际之同情我，援助我者怀疑踟躇；尤其使民主国中之妥协派以己之心度我，疑我抗战不坚，企图妥协，而故与德意开妥协之门者。这些国际妥协派特别是张伯伦政府，是最实际不过的人，他们算计中国如果妥协，德意出面调解，必至伤害他们在华利益，倒不如亲身参与调停，如果能造成东方的慕尼黑会议，则所出卖的必是中国，而他们的利益或可保全。故不能因为欧洲的局势侵略与反侵略的两条阵线日趋树立（但正如以前所指，也不是无有变化的），便以为他们在东方竟无妥协的可能，且现在东京进行的英日谈判便正是这一可耻的妥协阴谋的表现。须知民主国家的妥协派若不失败到底，他们决不肯放弃与侵略者妥协的企图和阴谋，而反共之烟幕弹，在国际上亦正是法西斯侵略者与国际妥协派所常耍弄的国际玩物。我们如不与国际反共阵线严格分开，以为那是反对苏联的事，或者反对共产党的事，则必至入了国际反共之圈套，而牺牲自己民族利益，归于万劫不复。因为国际反共的烟幕弹，经过最近几年的试验，已经证明是专门用以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是专门用以侵犯民主国家利益，而压迫其与侵略国家妥协的。试看阿比西尼亚之亡，奥国之被并，捷克之被侵，阿尔巴尼亚之亡，西班牙之失败，是反对苏联，还是侵犯英法等民主国家在各该国中之利益？是专门反对各该国之共产党，还是反对这些弱小民族之全体？德、意、日反共阵线之在东方运用，必然是牺牲中国民族之全体利益，必然是侵犯各民主国家之在华利益，并勾引和压迫国际妥协派，哄诱和压迫中国投降，决无其他好意，此愿我国共两党及全国人士深长思之者二。

第三，国内方面反共的活动，是有他内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原因已如上两段所说。内在的原因则由于十年来国内战争历

史上的痕迹以及统一战线构成后防共限共政策之所引起。历史的痕迹早应在抗日血战中洗掉，但因为全面战争的发动是不平衡的，各地方的感觉和认识不尽相同，上下级的了解和觉悟也不尽一致，工作的制度和作风还未能取得协调，所以历史的痕迹不易一时忘掉，因而常常引起可能避免的磨擦与误会，此应贵、我两党各自检讨，各自谴责，而力求消灭者。然欲巩固国共团结，若只限于消极的消灭历史痕迹，而不积极的建立今后互信共信之道，则其效果必难收获。敝党自民国二十五年发布致贵党同志书以后，中经西安事变，贵党三中全会，“七七”、“八一三”抗战，敝党对外宣言，贵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以及敝党同志在国民参政会之各项提案，及对于保卫武汉之意见等等，凡所向贵党提议及主张者，无不根据“一切服从抗战，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着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之最高原则，以及“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力量集中，意志集中”之最高原则，竭其智能，尽其忠忱，为我中华民族之解放事业，为我国共两党之精诚团结，提供各项意见，并为此意见之实现而奋斗。对信仰，则我于共产主义基本信仰外，承认三民主义为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治基础，为我全民族解放斗争之共同纲领。对政纲，则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我国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必须实行及全国国民必须遵守之施政纲领。对贵党，则承认在今日中国政权及军队中之领导地位，寄其最伟大最热烈之希望于贵党之进步与发展。对抗战主张，则坚持持久战，坚主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达于长期的最后胜利。对政治制度，则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地方平等的民主政治，以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对民众动员，则坚主必须给人民以抗日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给一切劳苦大众以最低生活之保障，始能达到有力

出力，有钱出钱之合理要求。对敝党，则忠诚的实践自己的宣言，取消苏维埃制度，改建民主的边区，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取消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声明在贵党的组织中，在贵党领导之军队中，不再发展敝党组织，以增强互信。对贵、我两党关系，则坚持长期合作，并结成以国共两党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以巩固抗战。凡此所举，均为敝党三年来不仅口说，不仅笔述，而且忠实执行者，不仅敝党全体党员身体力行，而且号召全国人士所共同努力者。此亦不仅敝党之主张，实亦全国人民之共同愿望，贵党有识之士，尤其贵党总裁，所久已同意者。夫共信既立，互信应生。乃贵党一部分人士犹鳃之，然以敝党为可惧可虑，始而主张防共限共，近更变本加厉，发展而为反共之说，于是有反共之行。其所根据之理由，一曰“有党派即有磨擦，党不统一，国家即不能统一”；二曰：“有党即有发展，中共发展，必碍国民党之发展”；三曰：“党有武力，必生对立，对立存在，抗战难胜，建国难成”。此等说法似是而非，两三年来敝党曾多次著论，辟其不当。盖政党之存在与消灭，当依其所代表之阶级是否存在及其本身是否进步为断，世界上绝无进步之阶级，进步之政党能以武力消灭者。中国之有贵我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乃由于中国历史之演进。国共分家固不幸造成十年来之内战，但第一次国共合作更造成民国十四至民国十六之伟大革命高潮，而今日之合作又造成三年来之统一与抗战。可见两党或多党之存在，并不碍于中华民族之解放，其分别只在合作与分裂，苟合作则众擎易举，抗战必胜；苟分裂则互相抵消，覆亡可待。故敝党之存在，仅能谓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建国，更有助于贵党之领导。贵党苟以全民族为重，而自居于代表全民族利益之地位，必能宏大其胸襟，加强其团结，为各党倡导，为全民族表率，则党派之磨擦自可减

少，党派之利益决不至与全民族之整个利益相违背。至谓敝党发展将碍贵党生存，则按之历史，举世各国，各党并存者甚多。按之理论，则贵党果以代表全民族自任，则其发展又岂我无产阶级政党所能限制?! 按之事实，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合全国之有党籍者不过百数十万耳，但以国中才智之士计之，亦必超过此数，若举各民族，各阶级中之优秀分子计之，岂止千万，则妨碍发展之说，必可不攻自破。其稍足动人听闻者，唯“党有武力问题”。然此乃中国革命历史之所演进，非可以他国历史比拟。盖一般民主国家形式上均无党军，法西斯国家之党军则与其国防军对立，苏联之党军则由其一阶级之专政而成。中国之历史条件，与上述各国无一类似，十数年之努力既不可使党军取消，而唯有在民族解放之大前提下，集中国共两党之武力，统一于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指挥之下，与日寇浴血奋战，为民族奠定复兴之基。有人想，有党的武力便有对立，便不免于内哄，那他是只着眼于数十年来中国军阀的纷争，十年来国共两党的内战，而没有看到这两年中华民族已处在伟大的变动时代，发动了历史上空前的神圣的对外抗战。在这伟大的抗战洪流里面，只要他真正献身于民族革命，流血于抗日战争，他必然会忘掉过去的一切，必然会在抗战队列中同心努力，一心杀敌。抗战既是长期的，终我们这一辈的一生能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已经不很容易，又谁能设想三民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争论，需要武力解决?! 今天的抗战将士，既已长期的血汗交溶在一条战线，凝结成卫国的长城，又谁能设想在抗战成功之后，民族英雄的队伍里，敢于自毁长城，重起纷争?! 况且武装的斗争是斗争形式之最高表现，今日抗战已使过去不同信仰，不同地方的各种武力统一起来，向着共同的敌人斗争，则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地方之团结，不仅不会破裂，而且会在武力影响之下，感动之下更加巩固起来，所

以中国之抗战建国，有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之参加；有工、农、兵、学、商各阶级之团结；有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之合作；有国共两党及地方上的武力之共同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历史创作。我们应发扬光大这一历史创作，我们应骄傲这一民族的伟大，决不应自任不行，自取失败。因为这种复杂的历史，创造出这种复杂的条件，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光荣，而不是不行，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创造，应该使他成功，而不应该使他失败。所以在今天来看，反共不仅在国外已成为日寇汪逆及法西斯阵线之烟幕弹，而且在国内也毫无根据，也专门成为制造分裂招致失败的因素。更有人说反共的言行固然超出今天团结抗战的范围，但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防共限共的政策势不可无。然而我们要问，防共的根据何在？限共的范围如何？假使贵党认为敝党三年来之言行尚不足以证明忠于统一战线，忠于抗战建国，而必须作意外之防备，即是说有阴谋推翻贵党，独占政权，而必须加以防制，则敝党敢竭诚相告：此种离开共信立场所发生之不应有的怀疑，不仅无此事，而且无此理。因在事，则贵党既为全中国之第一大党，且居于全国政权及军队之领导地位，又有全民族拥护之抗战领袖，只要抗战持久，建国前进，则贵党之声誉必日隆，信仰必日高，敝党有从何而非之？！在理，则统一战线为敝党所发起，民主政治为敝党所主张，今欲致全民族之团结，各阶级之合作为一党独霸之局面，此不仅自食其言，仰为全民族所不能接受。如是则失败者将非贵党，而为敝党，斯贵党又何惧于此种所谓阴谋。故敝党于去岁扩大的六中全会中便已认明，只要抗战持久，统一战线必能前进，否则反共活动果发展到一定限度，必至破坏团结，走向妥协。敝党有此坚信，故对贵党及蒋委员长之领导抗战诚必拥护，而对反共活动则不惮反复言其利害，冀有以祛除贵、我两党向之疑虑，以巩

固此长期抗战之共信。共信既立，互疑不生，防制之道，无由发生，然后精诚团结方能日趋巩固，两党合作方能期底于成。限共之说主之者则以为中共既亦存在，只有以地区以条件限制其发展，方能保证贵党之领导。其限共之方，则中共之言论尽量限制其发表；中共之书报尽量限制其发行；中共参加之团体尽量限制其活动；中共影响之群众尽量限制其来往；中共之组织尽量限制其开展。在政府机关凡中共党员概被检举，在沦陷地区，凡中共游击部队亦受限制。因一切原则概为限制，故限制不得，必为强制，强制不可，必趋破坏，其结果逮捕暗杀，查禁解散，仍入于反共之途。敝党敢坦白相告，党与党之竞赛，只能以进步相比，非能以限制成功。比赛进步乃积极的，以此可团结干部，影响群众，建立模范，加强领导，则党的进步必一日千里。限制他党乃消极的，愈恃政权之力限制他党发展，反足以磨炼他党，麻痹自己，使自党愈难进步。敝党认为以贵党今日之地位，领袖之声威，三民主义之伟大，处抗战之局势，果能坚持领导一意前进，揭破妥协阴谋，严斥反共谬说，则贵党之发展如日中天，此又何待于限制?!更有以溶共之说进者，此乃理论之争，敝党殊不愿于此多所论列。唯信仰者非一朝一夕之所成，而为社会发展之所规定，古圣先贤创之于先，志士仁人牺牲于后，方蔚成千百万人之伟大信仰，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唯信仰始足当之。故敝党处今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代，不仅自重其信仰，抑且尊重他人之信仰；不仅自爱其牺牲传统，抑且敬重他人之殉道精神，不仅自重其党纪，抑且尊重他人之党德；不仅自重其先烈，抑且尊重他党之先进，不仅疾视其叛徒，抑且厌恶他党之败类。尤其对于贵党在历史上之功绩，贵党孙总理之领导革命，蒋总裁之领导抗战，无不致其景仰之忱，但谓此即证明中共可被溶于国民党，未免离题万里。盖唯尊重他人之信仰者，方能自重其信

仰。共产主义虽为三民主义之好友，究非等于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可相信三民主义为达中华民族解放之必由道路，但绝对不能强共产主义信徒必抛弃自己信仰。故溶化之说虽为政治斗争之一名词，但用之于信仰有别之两党中间，殊感觉其不称。总之，溶共也罢，限共也罢，防共也罢，今日倡之國中，徒见纷扰，决无裨于贵党之发展，更无利于抗战之进行，其结果主观之愿与不愿，必其趋反共之一途而后已。日寇之反共，国际法西斯之反共，尚为外来之烟幕弹；国内之反共则必自造分裂，而最直接最实际影响于抗战建国，最便于日寇、汪逆、国际法西斯蒂、民主国家妥协派之合作阴谋的实现，而被诱人妥协之途，此更不能不愿我国共两党及全国人士深长思之者三。

明乎以上所说，反共实为诱降、劝降、投降之实际准备，已经毫无疑义，以贵党领导全国军政，坚持长期抗战之立场，应该断然的排斥这种意见，制止这种活动，加紧全国团结，巩固国共合作，然后才能克服当前危机，战胜各方困难，以争取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的到来。

*

*

*

然而排斥这种意见，制止这种活动，必须更进一步纠正目前对于整个形势的错误估计。因为反共思想的存在，除了上述的直接来源外，还有他目前的政治环境。为什么抗战初起那时候没有发生严重的反共问题，而现在竟至甚嚣尘上？这因为当时全国军民，万众一心，集中全力在抗战上头，那时大家了解，抗战如果不胜，谁都免不了当亡国奴；抗战若胜，大家全都有份。所以地方上虽有磨擦，日寇虽在挑拨，当时暗藏的投降派如汪精卫之流虽已在宣传中国不亡于日必亡于共的胡说，但基本上因为抗战第一的观念很强，所以挑拨者便难成功。现在抗战进入二期，由于敌人的政策，国际的形势国内的情况，有了若干变化，于是某一部分人便以为整个抗战形势变了，对

内应该重于对外。结论何以是如此呢？这是由于对整个形势的错误估计而来。首先是对于战争局势的错误估计。他们不了解敌人在两年作战当中，虽已消耗其国力之过半，而不愿继续消耗，但敌人新的政策却想用以战养战的办法，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偿他的损失，继续攻打我们，以逼我屈服，诱我投降；反而以为敌人既已无力增兵，且愿速和速结，是敌人已处于进退维谷之地位，遂不得不使战事趋于消沉（其实这是正面的，一时的消沉，敌后的“扫荡”正在加紧）。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新的力量的生长又无信心，认为单凭中国的武装力量，是不能将日寇的强大兵力驱逐出中国的，甚至以为战役的反攻也作不到，因之，他们认为敌人既已不再进攻，我们亦无力反攻，这便是相持阶段的到来。照这样看法这是不生不死的局面，决非敌我各种力量错杂对峙的相持阶段。正因为他们这样想，似乎中日两方都无法解决这个战争，而不得不仰仗于外来的因素，于是错误的估计便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是对于国际援助的错误估计。这种人在抗战初期大都是希望国际出兵的，现在他们又希望以国际会议来解决中日战争。他们不了解，今日欧洲的形势虽趋向好转，但是曲折而且会有变化的。他们也不了解，由西方的集体安全，发展到东方的集体制裁，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决不是眼前可以到来的事。他们更不了解，今天远东如有国际会议，只能是东方的慕尼黑会议，出卖中国利益，压迫中国妥协，不仅不会有什么新的华盛顿会议，甚至连三国还辽的故事也不会重演。不幸他们竟这样想，所以他们对于解决中日战事，竟依靠这个外来的法宝，而不依靠自力更生，并且他们也不相信自力可以更生，于是错误的估计，便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是对于自力更生的错误估计。这种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在作战中壮大，可以锻炼成近代化、机械化的国防

军，可以建立起相当范围的国防工业，以便长期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反而想依靠外援来解决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他们不了解战略上的持久战是要长期的打下去，而且不是拖下去的，反而想以拖的办法支持二期抗战，等待国际会议的援助。同时又因为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争之开展，他们不了解这种开展正是有助于抗战，正是全国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中之一部分，反而大惊小怪，认为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发展是在威胁他们，而不是威胁日寇。他们放着日寇集中大力“扫荡”华北，限制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不问，却危言耸听的说中共发展之可怕。甚至有人说，日寇中共同为敌人。这种错误观点的主要根源，便是不愿意自力更生；自己不愿意进步，却怕人家进步，自己不努力发展，却怕人家发展，自己不去深入敌后，却又怕人家在敌后收复失地。因为他们这样想，这样作，所以他们对内便重于对外，对共便重于对敌，自力更生便更置之度外，于是错误的估计更进入第四步。

第四步是对于投降派活动的错误估计。他们以为汪精卫被开除通缉后，国内的投降派已经肃清；他们以为汪精卫走上东京，复遭梁鸿志、王克敏的揶揄，便毫无作用，一钱不值；他们更以为只要过去汪精卫的党羽或者暗藏的投降分子声明拥护中央拥护抗战，而只反共，便可许其集中全力对内，不必对汪再有什么顾虑。殊不知汪精卫之傀儡登场，决不等于王克敏、梁鸿志，因为王梁是北洋余孽，在北伐后的中国已少作用，而汪贼在贵党中的影响，在国内的关系，决不能说无附和者，且其旧日党羽及暗藏之投降分子，齐集反共旗帜之下，正为汪逆作响应，为日寇作内奸。汪逆在外高唱反共、反蒋、亲日三大原则，暗藏的投降派在内则专意反共，其形式虽有不同，其造成内部分裂，中途妥协之作用则毫无二致。此祸不除，挑拨不已，自力必日相煎削，结果将徒为汪逆日寇所窃笑。或者谓，

若除此祸，必引内争，是以自力相煎，有害于抗战，不若争取之为愈。殊不知贵党总裁有云“我抗战为革命战争”，革命能争取群众，争取中间分子，争取动摇分子，却不能争取内奸。内奸者隐蔽之奸细，阴谋之专家，较公开之汉奸为尤可恶，其言甘，其心毒，不去之尽，不能巩固革命之阵线，不能取得抗战之最后胜利，证之革命往事，历历不爽。即以汪逆精卫及其徒党在贵党中之播弄是非，翻云覆雨，亦可知其为害之大，决非一人而已。且内奸无群众，更不敢公开作投降妥协之言，其所恃惟在反共掩护之下，进行秘密活动。只要贵党揭开其反共烟幕弹，毅然决然肃清此类分子，则抗日阵线必能一新耳目，汪逆危害方不至于坐大，妥协根源亦将因之扫除。

总上所述，各种错误的估计，在今日国内一部分人士当中，实已形成系统，若不揭穿，其祸害将无底止。盖忽视敌人阴谋，幻想国际会议，不信自力更生，轻视投降派之活动，其结论可使信之者对内重于对外，对共重于对敌，其影响所及则危害抗战，可断送国脉无疑。因为凡是如此想如此作的人，其在军事上决不愿努力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我后^[2]新的力量的准备，在政治上不愿实行抗战的民主，不愿进行全民的动员，不保护民众的利益，不坚决肃清汪逆残余，托派分子及德意路线之徒，不打击妥协思想，不取缔反共活动，在经济上对国防经济的建设消极，对经济汉奸的制裁畏惧，对节约运动的提倡无信心，对捣乱法币操纵金融的分子无制裁。一句话，一切不求进步，而愿安于落后。这种人，他的想法不是希望日寇自行崩溃，便是等待国际会议解决，宁可放任投降妥协分子作反共活动，决不信抗战力量自己会能壮大。这种估计，这种作法，只有使目前的危险加强，而不能使危险减少。我们甚愿贵党认清这一危险，注意这一危险；即使这种思想是一部分人的思想，这种作法是一部分人的作法，也要能够坚决肃清，坚决

纠正，然后方能使内部分裂之祸得免，中途妥协之害不生，斯则敝党寄其最大之热望于贵党者。

（略）

第四，以上各方面的进步，中心关键系于全民族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系于各党派的合作，各党派合作的中心，决定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全中国军民，全世界人士，不分敌我两方，不分赞成与反对，都关心这个问题。凡是拥护中国抗战，希望中国建国成功的人，都愿意国民党进步，共产党进步，国共合作长期。只有希望日寇侵略成功，中国失败的人，才愿意国民党退步，共产党削弱，国共合作分裂。前一种人是占全中国全世界之最大多数，他们听到国共关系进步则喜，关系不好则忧。后一种人是中国的汉奸，投降派，全世界上侵略分子，他们既反对蒋委员长，反对共产党，亦反对国民党，更破坏国共合作。这种政治上的分野，在现在抗战时期最明显不过，人心之向背也最明显不过。但因为还有人直到今天仍不明白这个道理，仍以为抗战同时可以反共，反共可以同时建国，反共可以使国民党独存独荣，这种观念恰恰与现在全中国全世界之最大多数所想的相反，而正好为日寇汉奸侵略派所利用，不仅用以反共，而且用以反国，不仅用以分裂国共关系，而且用以分化国民党，使真正的革命之三民主义，真正革命之国民党归于失败，这便是反共的必然逻辑。此中利害，敝党于此信中言之甚详，想贵党总裁及全党明达之士决不愿见此反共即反国，分裂国共关系即制造内部分裂，中途妥协之祸害见于国内。然欲消灭少数分子之反共成见，加强各党派合作，必须实际的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具体的办法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之所建议者，一部分未得贵党五中全会之所赞同，而大部分尤成悬案，至今未决。敝党敢再申前请，谨述其具体意见如下：

（一）各党派之联盟组织或共同委员会，原为民族革命中

各党派合作之最好形式，如一时尚不易具体实现，敝党以为至少应在沦陷区域如华北华中各游击区成立国共两党乃至各党之共同委员会，商讨整个敌后之党政军大计；在全国范围则应采取不拘形式之各级党部人员的合法来往，减除隔阂，并利各事之商讨。

（二）各省参议会，原为省一级之初步民意机关，但已成立者，敝党推举之人员均遭拒绝。各省拒绝之理由，指敝党所推举者有人反对。其实若根据十年来的痕迹来作标准，便不合今天团结全民族的原则，若云敝党所推举者不都是大学教授，不都是高官缙绅，则任何民主政治的国民代表都不能有这个限制，何况国民参政会敝党的代表亦非以此种资格入选，更何况各省参议会的人选，并非尽如人意，反对者亦大有人在，敝党特在此表示抗议，并要求取消此项禁令，容许敝党推举之代表得参加各级参议会。

（三）抗战两年，敝党党员过去因政治犯关系而在狱未释者至今犹占相当数目，许多地方因新的磨擦而被捕者，应均请贵党转令各地政府，一律予以释放。过去敝党党员被通缉者，应请明令取消，以便恢复国民权利，免致被人暗害。敝党出版书报应请许可登记发行。已登记者应请通令严禁扣留保护发行，敝党党员及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应受国家公平待遇，非经法律程序不能任意检查逮捕。敝党党员所参加之民众团体，政府工作，应视为公民之权利，不得受任何歧视或被排挤开除。敝党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一切机关经登记者，应取得合法保护，不得受任何方面之无理检查与非法压迫。以上一切最低限度之民权保障，如不能实现，不仅敝党党员对之深为遗憾，不仅全国人士对民权主义之实现发生杞忧，即全世界同情中国抗战希望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人士，亦将不能了解。

（四）陕甘宁边区在事实上早已存在，原则上及办法上亦

早经蒋委员长承认，但终因一部分行政人员不愿予以合法承认，至今成为悬案。最近且因中央有解决之意，于是地方上一部分军政人员，特别是派驻边区之县长保安队，故造纠纷，煽起事变，使两方对立，使中央难以解决。此等不明大义之人，虽尚在推波助澜，希冀酿成大乱，差幸识大体者尚居多数，现事愈渐趋平缓。敝党以为陕甘宁边区问题，应该迅告解决，照原定之范围，容敝党为民权政治之设施，以直隶于中央，以不仅示全国人以榜样，给各地方以模范，并可以杜绝日寇、汉奸、投降挑拨者诬蔑边区赤化之借口，给全世界民主国家友邦人士以边区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之证明。一部分人的顽固见解，以为承认边区即是表示分裂中国疆土，承认封建割据。其实省区的划分，原是历朝所常有的事，即在贵党主政以后，也曾划三特别区及宁青两地为省，划鄂豫皖、湘鄂赣为边区。今兹划区，正有前例可援，盖与分裂中国疆土，丝毫无涉。若之封建割据，则边区所实行者为民权政治，决非封建制度，何能称为割据？中山先生有云：“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边区各县自改制后，久已实行全民选举，故成为完全自治省区，实已毫无疑义。且边区既已存在，民权政治实行很久，因未得明令公布，地方官吏常施行无理由之封锁，又禁止外人参观，至使中外人士常惶惑不解誉之者故神其说，毁之者故甚其词，反致真假难言，是非颠倒，称为西北之谜，此与国家之统一，中外之观听，反而有碍，诚为贵党所不取。更有人顾虑在边区所辖之范围内，有一部分地主将受歧视，敝党敢负责相告，此在改制后久已无此现象。盖敝党在边区所主张者为民权政治，一切成年之男女公民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地主并无例外；对土地政策凡旧日地主，回至故乡者，政府均一律分与土地，地主之土地未被分配者，并未再行没收，对贵党在地政学会中所提之收买土地试行办法，敝党亟

愿赞助其实行；对商人政策，则边区一切苛杂久已豁免，只收营业累进税及统税；至其他一切政策，不仅符合于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规定，抑且合于中央一般法令，此可向全国关心边区政治者为明白之保证。

（五）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之成绩久为中外公认，尤以敌人累次大举“扫荡”，均未得逞，更证其坚强不屈，确成为坚持敌后抗战发展游击战争之中坚。然该两部队所受之待遇，都不同于其他抗战友军，其所发展之游击队，常不得合法承认；其所恢复之地区，常不容其停留；其所活动之范围，常受他人破坏；其所恢复及参加之地方政权，常被歧视，甚至被迫取消。以如此之部队纵不求因功受赏，亦断不应使之经费不足，衣服无着，枪弹缺乏，而复受人排挤。敝党敢请贵党念及抗战之殷，八路军新四军奋战之勤，给以应有之经费，拨以必需之枪弹，规定其游击地区，授之以统一职权，容许其参加地方政府，责成其恢复失地建立根据地，敝党敢保证此等任务能够绝对完成。果使八路军新四军得在敌后尽力活动，牵制敌人主力径向后移，与敌周旋到底，则对于抗战之持久，友军作战之配合，敌人以战养战计划之破坏，我们新的力量之培养，后方建设事业之进行，均将有极大的帮助。此对于贵党抗战建国之领导，诚百利而无一害，于国共两党之长期合作，最后胜利之争取，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亦更有决定之意义。

凡此所陈，虽不禁言之缕缕，然意有犹未尽，盖望之殷者不觉言之切，意之诚者不觉言之长。当兹风雨同舟，鸡鸣不已之时，敢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致此长书于贵党，敬请贵党诸同志一卒读之。

敝党深信：两年抗战吾人既已戮力同心，共赴国难，为长期抗战奠定了胜利始基，则目前过渡阶段，虽有若干困难，严

重危机，吾人果能一本精诚团结，再接再厉之精神，必能克服困难，战胜危机，争取相持阶段之到来，准备最后胜负之决战。

敝党深信：三年来吾人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曾经战胜若干挑拨者之挑动内战，曾经排斥若干投降者之妥协主张，使统一战线得以告成，使持久抗战得以继续。今兹所处之危险虽甚严重，但日寇汪逆诱降之阴谋，国际妥协派劝降之试探，国内投降派逼降之活动，果被吾人揭破无余，则吾人必能不为其甘言所诱，不为其挑拨所动，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敝党深信：国共两党既曾两度合作，十年内战又复疮痍满目，果使稍具民族正气者，又谁肯重起阡墙之祸？！况复大敌当前，反共亦即反国，分裂国共亦即分裂贵党，此既中敌人之奸计，复受挑拨者之阴谋，不仅为全国军民所反对，抑且为世界正义人士所不赞同。吾人既坚持长期抗战，则必不容此反共活动作投降之准备，且必然会毅然觉醒，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敝党深信：两年抗战已给我民族国家以空前之进步，但我为极弱国家，外侮侵袭已达百年，今一旦奋起抗战，决不是一朝可胜。当兹进入二期抗战之际，不论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以及两党关系上，吾人必能以更多之努力，更大之进步，克服落后现象，发动全面战争，以领导全国，力求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敝党深信：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抗战是持久的，国共合作是长期的，只要吾人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中华民族必不会被人灭亡。不仅不会灭亡，且要雄立宇宙，为民族解放，为世界人类解放，高举着胜利之旗，向前迈进。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国共两党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七日 于延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原文如此。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七月)

刘 少 奇

同志们：

我要讲的，是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现在来讲讲这个问题，对于党的建设和巩固，不是没有益处的。

一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

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和自然界进行斗争，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人们的物质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进行生产的时候，都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和现代人们的都不同；而在将来，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又会和现

^{*} 这是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一九四三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一九六二年经作者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代人们不同。

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就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社会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

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

我们说，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这就是说，要在这种斗争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

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他：（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二）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他除开要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前人的实践）而外，还必须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同各种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逐渐深刻地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善革命的方法等。

所以，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吧，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去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参加革命实践，这种革命斗争对于这些党员所起的影响，可能完全不是一样的。有的党员进步得很快，甚至原来较落后的赶在前面去了；有的党员进步得很慢；有的党员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革命的实践对于他没有起前进的影响，他在革命的实践中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又比如，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这对于他们是一次严重的锻炼，其中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得到了很

大的进步。然而长征对于个别党员的影响却是相反的，他们经过长征之后，对这样的艰苦斗争害怕起来了，有的甚至企图退却和逃跑，后来他们果然在外界的引诱下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许多党员同在一起长征，而影响和结果却是这样的不相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种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来，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就在你们学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形。你们在学校中受着同样的教育和训练，然而由于你们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因而你们就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和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或者说得更近些，在近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得到了某些成就，爬上了当权的位置以后，就腐化堕落下去。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结果总

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由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代替。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然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它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经过这样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分子（不管这种分子是作了多大的“官”），而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特点，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这一特点，是历代革命和历代革命党所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

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上面讲的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的缘故。下面我再讲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

二 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按照党章的规定，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内担负一定工作的人，就可成为党员。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但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只是做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党员，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

恩格斯在论到马克思的时候说：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又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

斯大林在论到我们应该学习列宁的榜样的时候，曾经说：

“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在工作中决不要拒绝做小事情，因为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这是伊里奇的

重要遗训之一。”

斯大林又说：“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像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像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这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的简要描述。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去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品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天才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那样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看成是天生的神秘的人物。这种说法和看法对不对呢？我想是不对的。

我们普通的同志，今天诚然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那样渊博的科学知识，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深和渊博。但是，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那末，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

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

《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当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否则，是学习不好的，是学习不到的。事实上，在我们的队伍中，对于这种学习，是有几种不同的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态度的。

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

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是不不少的。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

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蠹贼。这种人在党内，终归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和抛弃，是无疑问的。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就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

另一种人就完全和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他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他们仰望这些创始人的伟大人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而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是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都是为着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民族的和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成功，而没有其他。

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才能使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真正刻苦修养，忠实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除此以外，他绝不计较自己在党内地位和声誉的高低，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人家或幻想人家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然而，正因为他这样做，正因为他他在革命斗争中始终是正直忠诚，英勇坚定，并且表现了卓越的能力，他就能够受到党员群众自觉的尊重和拥护。

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作为我们的模范来学习，要做他们一个最忠实的最好的学生，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伟大群众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总结经验，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是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的。

三 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

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大家都无例外地需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修养。但是，由于我们党员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工作岗位、文化程度、社会活动的条件，都各不相同，所以，各

个同志需要特别注意修养或者着重注意修养的方面，也就会各有差别。

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但是，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要使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坚持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在旧社会中，有许多人在受教育和学习的时候，认为他们所学的是并不需要照着去做的，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照着去做的，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国民党反动派尽管熟读“三民主义”，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然而实际上却横征暴敛，贪污杀戮，压迫民众，反对“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甚至去和民族的敌人妥协，投降敌人。有一个老秀才亲自对我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余的他都做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既然这样，他们还要去办教育，还要去学习那些所谓“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这就是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所“崇拜”的圣贤的态度。当然，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旧社会的这种遗毒，难道就完全不会影响我们吗？会有影响的！在你们同学中，固然没有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去升官发财，去压迫被剥削者。然而在你们中难道就没有这样想的人了吗？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言论、行动和生活不一定

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他们所学到的原则也不打算全部加以运用。在你们中又难道就没有这样想的人了吗？就是说：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高深一些的理论，是为了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于人，使自己成为有名的人物。我不能担保，在你们中完全没有这种想法的人。这种想法是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一根本原则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理论，但是学习到的就必须做到，而且是为了用才去学习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才去学习的。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的同志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四 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

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在一些共产党员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想法：就是认为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无产阶级立场虽然不很坚定，思想意识虽然不很纯洁（即还残留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可以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认为，只靠书本学习，只靠书本知识，就可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是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的。如果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者，不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他不想革命，或者不想坚持革命到底，而想半途而废，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对他也是没有用处的，或者是用处不大的。

我们常看到某些由工人出身的最好的党员，虽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比较少，若要考试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公式，他不一定比别人记得多。但是，在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只要能用他懂得的话解释给他听，他的兴趣，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还要高得多。比如《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一段，对于某些党员来说，是不容易了解的。但是对于这些由工人出身的党员就不同。因为工人在生产中，在同资本家斗争中，深切了解资本家如何计算工资、工时，如何剥削工人取得利润，如何压迫工人等。因此，他也常常比某些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我们说，许多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党

员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由于出身关系就是天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说，一切具有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一切没有任何个人成见和其他不干净的东西的同志，只要虚心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切实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他们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会比其他同志更敏捷而正确。他们在斗争中，也能够更好地洞察真理，能够更勇敢地拥护真理，而没有任何顾虑。

我们也常看到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由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之间的关系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一般地说，这些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在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立场不很坚定和明确，思想意识也不很正确和纯洁，还有或多或少的、各种各色的、旧社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直接相冲突的。但是，由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在这种冲突中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时候，把这种理论学习同他的思想意识的修养正确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去抵制和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旧东西，这样，他就端正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纯洁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实际问题。这样的党员是很多的。另外有的人则走了相反的道路，他身上的旧东西积累得很多，有许多固习、成见和个人的物欲私念，而又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在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批判他思想意识中的这些旧东西，相反，他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武器，甚至用他原来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因而他就不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能够掌握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在他处理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因为他有旧社会的习惯和成见，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徬徨动摇，不能无阻碍地洞察事物，不能勇敢地拥护真理，不自觉地以至自觉地掩蔽和歪曲真理。这种人根本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也就不能敏捷地、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有时在党组织或别的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解决了实际问题以后，他甚至采取拒绝的态度。这种情形，也并不是怎样少见而奇怪的事情，而是可以常常见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就必须有崇高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同时，我们也应该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共产党员中，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完全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都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只靠家庭出身好，本人成分好，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有的同志，虽然一般地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工作和斗争中，却从来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想法，显然都是不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

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拿我们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来说，在“七七”事变以前，有一些同志由于不了解当时中国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降低为次要的矛盾，曾经反对党的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我们党联合一切爱国的阶

级、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一致抗日的政策，特别反对我们党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日的政策。这些同志在反对党的正确政策的时候，自以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上，但是，在实际上，他们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完全陷入一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立场。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这种错误主张去做，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就不但不能团结和领导全国一切抗日爱国的阶级、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相反地，会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孤立起来，不利于抗日救国的斗争。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有一些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国民党参加了抗日，就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采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的投降主义的政策，而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分地信任国民党，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因而不敢放手发展自己，放手发展人民的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主张这样做的同志虽然把自己标榜为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但是他们这种政策的实质是要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要使无产阶级丧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上面所说的这种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

无产阶级不能只是自己解放自己，它必须争取一切劳动人民的解放，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争取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必须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最后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必须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严格区别开

来。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占本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又必须同迁就主义、投降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清界限，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分清界限，甚至要同劳动群众有所区别；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要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时候，曾经说：“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又说：“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

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共产党人要实现列宁在这两段话里提出的要求，当然必须不间断地参加革命实践，去增加感性知识，积累实际经验。但是，必须指出，光有感性知识和实际经验，还是不够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因此，在参加革命实践的同时，必须十分用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只要我们密切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它，我们就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我们就能够有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能够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具有信心。

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这样伟大的作用，所以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极大重要性。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

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提出过，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研究本国和世界的历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行动，并且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低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

五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

现在来继续讲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

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回什么事呢？我认为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上述斗争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的斗争，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的结局，对于我们党员来说，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肃清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以至肃清其他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利益和目的的思想克服以至肃清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后者压倒前者，那末他就会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对于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

我们共产党人，在党内党外的各种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的思想，经常地总结和吸取革命实践的经验，检讨自己的思想是否完全适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完全适合于无产阶级解放斗

争的利益。在这样的学习、反省和自我检讨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

你们大家知道，人的言论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我们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方法论。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上，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著作上已经讲得很多，你们也学习过，今天我就不讲了。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讲一讲我们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

我们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经过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手，去改造自己的国家，从而一步一步地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个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以事

实上的证明。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前面还站着强大的敌人，必须彻底地、最后地在各方面战胜这些强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自然，这种斗争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偶然的”社会现象，是某些共产党人所制造出来的事件。而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是不能避免的阶级斗争。共产党的产生，共产党人的参加、组织和指导这种斗争，也是社会发展中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帝国主义，法西斯蒂，资本家和地主，总之，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剥削和压迫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非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剥削和压迫，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因此，这种斗争乃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

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去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是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因为在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中，蕴藏着极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发动、团结和组织起来，是能够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是正在产生着和正在发展着的新事物，而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目前的情势来说，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苏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国家中已经组织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战斗的共产党，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迅速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也正在不断的斗争中迅速地发动和团结起来。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全世界组织成为雄伟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共产主义事业要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以至获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还必须了解：国际反动势力和剥削阶级的力量，今天还比我们强大，它们在许多方面暂时还占着优势，我们要战胜它，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艰难的斗争过程。

在数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由于剥削阶级统治人类的结果，剥削阶级给自己造成了各方面极大的权力，霸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们的长期统治，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了长期存在着的各种落后、愚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等现象，给被剥削阶级的群众和社会中的人们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是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它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所必然造成的结果。因为没有被剥削阶级群众和殖民地民族的落后、散漫和分裂，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就不能维持。因此，我们为了要获得胜利，就不但要和剥削阶级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且要和剥削阶级在群众中长期造成的影响，要和群众中

的落后意识、落后现象进行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团结广大的群众去战胜剥削阶级。这就是我们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过程中的困难之所在。同志们！假若像某种人所设想的那样，群众都是觉悟的、团结的，在群众中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影响和落后的现象，那末革命还有什么困难呢？

这种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也是仍然存在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要最后地战胜剥削阶级及其在人民中的影响，要解放和改造全人类，要改造千百万的小商品生产者，要最终地消灭阶级，要把数千年来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受了各种旧习惯、旧传统影响的人类逐渐地改造过来，提高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聪明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这中间要经过多少曲折的过程，多么艰难的工作和斗争呵！

列宁说：

“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

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列宁又说：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也还有极困难的任務需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是不同的。比如资产阶级的革命，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在取得政权以后。

共产主义事业，真如我们所说的是“百年大业”，是决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才能逐渐地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例如在我们中国，现在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它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买办势力。必须战胜这些敌人，才能够完成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长时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逐渐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

实现共产主义，既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在

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很自然的责任。

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这样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所以至今还有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怀疑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人类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下，是能够发展和改造成为高度纯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不相信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们或者没有估计到这种困难，或者在实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悲观失望起来，甚至有的共产党员因此而从共产主义队伍中动摇出去。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最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们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实现过程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又清楚地了解这种困难是一定能够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发动中完全克服的，绝不困难所吓倒。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是人类过去历史上任何阶级的英雄豪杰所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可以自豪的。

我记得西欧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传记作家去到了苏联，曾经和斯大林同志谈过历史人物的比拟问题。斯大林同志当时说：列宁好比是大海，而彼得大帝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地主阶级、新兴商人阶级事业中的领袖，在历史地位上的比较。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了解：为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成功而奋斗的领袖，是这样的伟大；为剥削阶级事业而奋斗的领袖，是那樣的渺小。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也不是好共产党员，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而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是丑恶的。正因为它丑恶，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们才要求改造它，不能不改造它。我们改造世界，不能离开现实，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逃避现实，也不能向丑恶的现实投降。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丑恶的现实斗争，改造现实，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共产党员应该从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和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在这里，我们应该批评某些青年同志所常犯的一种毛病，就是他们总想逃避现实或者不顾现实的那种毛病。他们有高尚的理想，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常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种工作不好，那种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够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们顺利地去“改造世界”。然而，这种地方和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只是他们的空想。

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

六 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共产党员必须清楚地确定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必然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即解放全人类，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完全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利益，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同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开的。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党员个人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也就是服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利益。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

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 and 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 and 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员个人的目的只能是和党的利益相一致的。如果我们的党员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加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等，作为自己的目的，把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目的，那末，共产党员这种个人目的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正需要许多这样的党员和干部。但是除此以外，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地位、个人名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其他个人打算等等个人的独立目的，否则，就会使自己离开党的利益，以致走到在党内进行投机。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

对待人类的蠹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能够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去敏捷地观察问题，认识和改造现实。由于他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顾虑和私欲，因而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他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他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

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他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问题上善于自处，没有必要卑躬屈节地去要求人家帮助。他也能够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爱护自己，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但是，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

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这种“道德”观，从来都是唯心论的。把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上，公开地宣称我们的道德是为着保障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利益，这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做到。

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绝不能把共产党看作是图谋党员私利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凡是这样看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

党员有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在任何形式的掩盖和借口之下，企图牺牲党的利益去坚持个人利益。我们的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全心全意为党的利益和党的发展而奋斗，并且应该把党的、阶级的成功和胜利，看作自己的成功和胜利。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但是，只能在争取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中，来提高这种能力，增加这种本领，不能够离开党的事业的发展而去争取什么个人的独立发展。事实也证明，党员只有全心全意地争取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本领，否则，党员要进步、要提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党员个人的利益必须而且能够和党的利益完全取得一致。

我们的党员，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自觉的代表者。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突现出来。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人，更应该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他们的个人利益，更应该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在今天中国的

环境中，只有无产阶级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们的党员也应该是整个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在我们党内，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还要求党员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同时，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党在可能条件下顾全和保护党员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给他以教育学习的机会，解决他的疾病和家庭问题，以至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因为保障党员必要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教育条件，使他们安心地热情地工作，是完成党的任务所必需的。这是党的负责人在处理党员问题的时候所必须注意的。

总而言之，一方面，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不应该有同党的利益相违背的个人目的、私人打算。不应该什么都只顾自己，到处向党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责备党没有抬举和奖励他。而应该在一切情况下，努力学习，努力前进，勇敢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加深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以便对党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在解决党员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党员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教育情况，使党员能够更好地为党工作，使党员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对于那些真正克己奉公的同志们，要

给以更多的注意。只有这样，只有这两方面的注意和努力配合起来，才能对党有更大的利益。

七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

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拿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了解，以及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那末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有许多党员和干部是合于这些标准的，他们能够作为党员的模范；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党员和干部还不合于这些标准，还存在着各种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我在这里不妨大要地指出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以便引起我们的同志注意。

党内同志中有哪些在基本上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呢？

第一，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而且是带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当然，很多的党员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来加入共产党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党员，却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和目的来加入党的。比如，过去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得的。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来加入党的。还有些人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者只模糊地认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来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这些同志，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艰苦，没

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是很自然的。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带了各种各色的思想意识到党内来，因此，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的修养和锻炼，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某些人要来依靠共产党，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他们找共产党并没有找错。除开敌探、汉奸、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以外，我们对于这些人是欢迎的。只要他们承认和遵守党纲、党章，愿意在党的一定组织内担负一定的工作，并且缴纳党费，他们是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至于对共产主义，对党纲、党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可以在他们进了党之后再学习，并且根据他们所学习的再在革命斗争中锻炼修养，这样，他们就完全可能使自己变为很好的共产党员。本来，许多人在加入党以前就深刻理解共产主义和党纲、党章，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提出承认党纲、党章作为入党条件，而没有提出精通党纲、党章作为入党条件，也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在入党以前虽然还不精通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在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目前的革命运动中，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只要他们入党后努力地学习，就可能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此外，在我们党章上还规定党员有退出共产党的自由（入党是没有自由的）。任何党员如果对于共产主义不能深信，不能过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或其他原因，有向党声明出党的自由，党是允许党员自由出党的。只要他退出党以后不泄露党的秘密，不做破坏党的活动，党是不作任何追究的。至于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奸细，我们当然要清除他们出党。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党的纯洁。

第二，在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

自利的思想意识。

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時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讲到待遇、享受和其他个人生活问题，他总企图要超过别人，和待遇最高的人比较，“孜孜以求之”，并且以此夸耀于人。但是，讲到工作，他就要和不如他的人比较。有吃苦的事，他设法避开。在危难的时候，他企图逃走。勤务员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风头他要出，党的荣誉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图霸占，但是，一切“倒霉”的事情，总想是没有他。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他相信这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如果有，那也是蠢才和傻瓜”。他甚至用这一大套剥削阶级的话，来为他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辩护。在我们党内是有这种人的。

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常常表现在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派别斗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中；表现在对于党的纪律的不尊重和随意破坏的行动中。无原则斗争，大部分是从私人利益出发。进行派别斗争的人，闹宗派主义的人，常把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他们常常自觉地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中破坏党的组织和纪律，无原则地或是故意地打击某些人，又无原则地结识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隐瞒，互相吹嘘，等等。

至于党内存在的本位主义，主要是由于一些同志只看到部分的利益，只看到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而没有看到全局和全党的利益，没有看到别部门别地区的工作。这在政治上思想上

说来，是一种和行会主义相似的东西。犯本位主义错误的同志，固然不一定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不过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常犯本位主义的错误。

第三，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在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有这种思想的人，他首先计较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有个人的野心，“逞能干”，好居功，好表现自己，好包办，没有民主作风。他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做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企图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时”，不能“倒霉”，他受不起委屈。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装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在他这种目的不能达到的时候，在他受到委屈的时候，他就可能有动摇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这样的原因而动摇出党的人是不不少的。在这种人的思想中残存着剥削阶级的意识，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胸怀。

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就算某些同志很能干，做好了某些工作，获得了大的成绩（如我们军队的指挥员率领几万几千人的军队打了胜仗，我们各地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在工作中创造了较大的局面等），这或许是“伟大”的成绩，很可以“自骄”一下。然而，如果拿这点成绩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呢？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把工作做得对，做得好，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他应该防止自满和骄傲，力求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个人地位，又有什么得失值得计较的呢？个人地位总莫高过于皇帝了，然而拿这来和共产主义事业家比较，到底又有多大呢？还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罢了。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计较和夸耀的呢？

不错，在我们党内，在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无数的共产主义的英雄，需要很多有威信和群众领袖。目前我们有威望的革命的领袖和英雄还真是太少了，还需要在各方面培养和锻炼很多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领袖和英雄。这对于我们的事业，确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视的事情。谁要轻视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怎样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为着适应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需要，我们必须大大提高党员在革命事业中的前进心，大大发扬他们的朝气。应该说，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作还是做得不够的。比如，某些党员的学习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兴趣不高，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绝不是反对党员的前进心。为了人民，力求前进，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和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且最有效地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而后者即使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和歪曲真理。

我们的同志还必须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

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野心和虚荣心的人，来做我们的领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只有毫无个人目的、完全忠实于党的党员，他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品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相当的工作才能，能够正确地指导党的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前进，只有这样的党员，才能取得党的信任，才能取得党员群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英雄。

我们的同志还应该了解：任何党员，任何领袖和英雄，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他们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千百万人共同努力，继续努力。我们，普通的党员，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我们的这一部分，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部分，当然是小得多。然而，我们总有一部分。大小虽然不同，但都是整个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就算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当然要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然而，如果不能多，就少一点，也是有益的，也是一样光荣的。无论如何，最低限度不能妨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必须大小不一地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多少不一地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党员所应有的正确态度。那些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以为在技术工作中埋没了他，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斯达汉诺夫就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一时，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因此，使他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前进心。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技术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这些同志的工作，和其他同志的工

作一样，都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尽了一部分责任。共产党员对于工作的态度，应该是党需要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是不愿意做的，都应该愉快地努力地做好。

自然，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分配党员的工作，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到党员的个性和特长，发扬他的长处，并鼓励他前进的热忱。但是，党员不能拿个人的兴趣作为理由，来拒绝接受党分配给他的工作。

第四，少数同志有浓厚的剥削阶级的意识。他们常常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的问题，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和团结精神。

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总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他嫉妒强过他的人。别人走在他前面，他总想把别人拉下来。他不甘心居于人下，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见别的同志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他幸灾乐祸，暗中窃喜，完全没有同志的同情心。他甚至对同志有害人之心，“落井下石”，利用同志的弱点和困难去打击和损害同志。他在党内，也利用党的组织上工作上的各种弱点，在党内“钻空子”，扩大这些弱点，以取得他个人的某些好处。他在党内好播弄是非，好在同志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进行一些阴谋诡计来挑拨同志间的关系。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对各种无原则的纠纷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在党内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很明白，这完全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的反映。

一切剥削者要发展自己都必须损害别人。资本家要发展自己的财产，或者要在经济恐慌时不致破产，他就必须挤倒很多

较小的资本家，就必须使无数的工人饥饿。地主主要发展自己，他就必须剥削农民，必须使许多人失去土地。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要发展自己，它们必须损害其他国家，使奥地利、捷克、阿比西尼亚等亡国，使中国受侵略。剥削者总是以损害别人、使别人破产作为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所以剥削者相互之间不能有真正坚固的团结，不能有真正的互助，不能有真正的人类的同情心，而必然玩弄阴谋诡计，进行暗害活动，使别人倒台破产。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在大众面前假装“圣人”，装作“公道的主持者”。这是一切没落的剥削者的特点。这些东西对于剥削者来说，也许是他们的“高尚”道德的标准，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完全相反。无产阶级不剥削别人，而受别人剥削。无产阶级内部没有基本利害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之间也没有基本利害的矛盾。无产阶级要发展自己，求得自己的解放，不但不需要损害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发展，而且必须和其他劳动人民大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全人类。一个工人或一部分工人的单独解放，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必须把人类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一步一步地争取全人类的共同的解放，半途而废，中途妥协，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的这种客观地位，决定了觉悟的工人们的思想意识，同剥削者的思想意识完全相反。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自己，他们一方面要用无情的手段对付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绝不使用这种手段去对待劳动阶级的兄弟和同志。他们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同对待自己同志和朋友的态度和方法，截然分开。他们对于自己

阶级中的兄弟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和同情心，具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们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认为自己不应该有任何特权的思想，他们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他们要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就必须同时发展别人，提高整个劳动阶级的地位。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心落后，而有极高的前进心，但是他们同时又尊敬、爱护和帮助在这些方面强过他们的人，而努力向他们学习，绝无嫉妒之心。他们极关心自己阶级和世界全体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困难的境遇，关心每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及其胜利和失败，认为不论哪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而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们认为对于任何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错误的，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犯罪的。他们爱护自己的同志和兄弟，对于自己同志和兄弟的弱点和错误，进行坦白诚恳的批评（这正是真正的爱护的表示），绝不在原则上敷衍、迁就，更不去助长别人的错误（迁就以至助长别人的错误，不是真正爱护同志的表示）。他们用一切方法帮助同志去克服和改正这些弱点和错误，绝不采取那种利用和扩大同志的弱点和错误的方法，使犯错误的同志“倒霉”，以至使这些同志的错误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和兄弟能够“以德报怨”，帮助同志改过，毫无报复之心。他们能够对自己严格，对同志宽大。他们有坚定的严格的立场，光明、正直而严肃的态度，不在原则上作任何让步，不容许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也不容许别人对自己的无礼侮辱，尤其鄙视别人对自己无原则的奉承、阿谀和谄媚。他们反对一切无原则斗争，同时不使自己被牵扯到无原则的斗争中去，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

后的批评所牵动和刺激，而丧失自己原则的立场、冷静的思考和镇定的态度。无产阶级的这种思想意识，是我们每一个党员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就是这种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最集中的、模范的具体代表者。这些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共产党就是代表人类正气的。我们要发扬和提高这种无产阶级的正气，克服一切的邪气。

第五，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小气”，计较小事，不识大体等毛病。他们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和远大眼光，看不到大的方面，而对于他们鼻子下面的小事物却是津津有味。他们对于党内和革命中的大问题、大事变，不大感觉兴趣，而常常计较那一针一线、一言一语的小事，为了这些小事，他们可以郑重其事地和别人争论不休，伤感备至。这些人也容易被别人的小恩小惠所笼络。他们具有农村社会中小生产者那种狭隘性的特点。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党内生活中常常表现不清楚不确定的态度，对于他，可以这样也是，那样也是。这些人中实际上有两种，一种人是认识问题，另一种人是品质问题。后者总是喜欢投机取巧，双方讨好，到处逢迎。“看人看势说话”，“顺风转舵”，毫无原则，就是这种人的特点。有时候，他简直像寓言中的蝙蝠一样，看哪一方面行时，他就投到那一方面去。这种“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人，在我们队伍中并不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人具有旧商人的特性。此外，还有个别的人受不起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引诱，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金钱美色，他们就动摇起来，以致因此犯罪，直至叛变党和革命。

最后，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者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也常常反映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识中来，对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是代表伟大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共产

主义的思想意识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或多或少地反映着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至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有的时候在党内潜伏着，只是一些个别的日常的小问题上暴露出来，有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系统地暴露在党内各种原则问题上、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和党内斗争问题上。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当权的时候，甚至暂时地支配了党的重要领导环节。但是，在经常的时候，它又被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压服着。这样，就表现为党内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对于某些党员个人来说，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潜伏着，被克服着，但是在另外的时候，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又可能发展起来，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动。这样，也就表现为党员个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矛盾和斗争。我们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八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

共产党是代表着现今人类社会中最光明的最进步的方面，是人类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而坚持不屈地和一切黑暗势力搏斗着，为人类社会的光明和最后解放奋斗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它有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同时继承着中华民族历代进步思想

家、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它代表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方面，在它的组织内集中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它和中国社会中的黑暗势力作过了长期的斗争，经过了艰苦的锻炼，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一切，是我们共产党人足以自豪的。有一切的根据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最后的成功。然而，在我们的组织中还不是尽善尽美的，还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在我们的队伍中还不是没有不健全的人以至坏人的，这些不健全的人和坏人，也还是会干出一些乌七八糟的坏事来的。这就是说，在我们光明的党内，也还有某些不好的东西，还有黑暗的一方面。这就是我在前面所列举的那些东西。

家里既已招来了丑女婿，或者娶来了丑媳妇，总不好完全不让他们见客。对于这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我们想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把它们掩藏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经常和我们党接触联系，同情我们的人要来我们这里参观，仰慕我们的人们和青年男女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或加入我们党。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除开看到了我们一切进步的、光明的、美丽的东西和“家人”之外，还会碰到我们的丑女婿或丑媳妇，在稠人广众之中，说了些丑话，演了些丑态，做了些丑事，如是就引起了一些客人和新党员的疑问。他们这样问：共产党不是最公平的吗？共产党人不是最优秀的男女吗？为什么在共产党内还有这种丑人坏事呢？这难道不奇怪吗？有一些青年同志，当他们未入党以前，他们对现社会有极大的不满，觉得一切都不是出路，只有共产党最光明。他们想着，入党以后一切都会满意、都会有办法的。但是当他们入党以后，或者到了革命根据地以后，由于看到党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缺点，而且实际生活并不能使他们一切都满意（因为他们所满意的事，有不少是不合于党和革命的利益的），因而使他们觉得实

际的情况和原来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合，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觉得奇怪。他们问：“为什么共产党内也有这些事呢？”有些人在没有来延安、进抗大以前，以为延安和抗大是合乎他们想象的那样好，在到了延安、进了抗大以后，也不能处处都使他们满意，于是他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延安和抗大也有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呢？”某些人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解答，以至悲观失望起来。

对于这些问题，除开引起我们的警惕，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严重注意——要好好地对待和带领我们的新党员及一切倾向我们的人，不能给他们以坏的影响外，还要向我们的党内党外的同志们解释清楚。

为什么在我们光明的党的组织内还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一般说来，我们的党员是中国的优秀儿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中国旧社会的各部分，而今天中国存在着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影响——自私自利、阴谋诡计、官僚主义等各种恶浊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最好的党员不容易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也还有某些党员不免要带来一些或者反映一些旧社会中的恶浊东西，这有什么奇怪呢？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有的。共产党的队伍中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恶浊东西，倒是奇怪的，倒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可以说：只要社会中还有这些恶浊东西，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影响，那末，在共产党内也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恶浊的东西。正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这些恶浊的东西，共产党就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党员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就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我们除开进行社会斗争，反对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势力和东西以

外，还必须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党内某些动摇的不坚定的分子把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反映到党内来。这就是我们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根据。我们要在党内党外各种斗争中，去改造社会，去逐渐清除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同时去改造我们的党和党员，解决党内的矛盾，使我们的党和党员更加健康和更加坚强。

斯大林说：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绝的，是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本家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

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各种错误缺点和恶浊东西的根源。这就是党内还存在着各种矛盾的根源。

九 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 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

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由于工人阶级本身有不同的阶层，由于我们党员社会出身的不同，所以在我们党内就产生各个党员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别，在观点、习惯、情绪上的某些差别，产生党员间在世界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某些差别，而且也产生党员间对于事物、对于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是能够从事物的发展的、联系的状态去看事物的；另外一部分人，却习惯于从事物的静止的、孤立的状态去看事物。前一部分人能够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事物，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正确向导。后一部分人中有些人只看见或夸大事物的这一方面，另外有些人就只看见或夸大事物的那一方面，就是说，他们都不是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和联系的规律，全面地客观地去看问题，而是片面地主观地去看问题。所以他们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提出

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方向。

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特别在革命的转变关头，在每一次革命斗争加剧和困难增多的情况下，在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这种分歧和争论也就必然更加激烈起来。

所以问题的中心，不在于党内有无不同的思想意识，有无意见上的分歧，这是一定有的。问题的中心，是在于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分歧，如何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很明白，只有经过党内斗争，才能解决这种矛盾，解决这种分歧和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对于我们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有几种不同的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和几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人，他们没有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党内某些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而盲目地以为我们党内没有什么不好的现象，因此，也就松懈他们的警觉性，放松他们对于某些缺点、错误和一切不好东西的斗争。第二种人，就只看见或差不多只看见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而看不见党的正确和光明，因此，就悲观失望，丧失信心，或者在看见这些东西之后，大惊小怪，使自己慌乱起来。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片面的。我们的看法，和前两种看法都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党是中国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同时，我们还清楚了解这些东西的来源，清楚了解如何纠正和逐渐肃清它们的方法，不断加强自己的锻炼，努力做好工作，进行必要的斗争，推动我们的党和革命

前进。

由于各种人的立场不同和看法不同，对于我们党内这些不好的东西，也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态度，第二种是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和思想方法不正确的党员的态度，第三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态度。

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高兴我们党内有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他们幸灾乐祸，乘隙而入，并想一切方法利用和扩大我们的某些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来达到破坏我们党的目的。有时甚至采取反对某种错误、拥护党的路线的形式，把错误弄到另一个极端去。

第二种人也有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一）就是有些党员同情和接受党内某些错误的思想，学习党内某些人的坏样子，以满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图和欲望。他认为党内某些缺点、错误的存在对于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助长某些缺点、错误的发展而加以利用。这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品质极不好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

（二）就是有些党员放任党内某些缺点、错误和各种坏的现象不管，而任其自流地发展。他们得过且过，而不愿和这些东西进行斗争。或者惧怕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对党有害无益的；或者对这些现象麻木不仁，不愿意看见这些现象；或者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斗争的时候，采取敷衍了事、调和折衷的态度。这是对党责任心薄弱的党员，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

（三）就是有些党员对党内这些缺点、错误，对党内某些思想不很正确的人，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他们随便地宣告和犯错误的同志绝交，企图一下子就把这些同志从党内肃清，驱逐他们出党。但是如果一下不能肃清，或者还碰了钉子

的时候，就表示没有办法，悲观失望，感伤起来；或者就“洁身自好”，不管了，甚至自己远远地离开了党。这种绝对的态度，还表现在有些人对于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机械的了解。抱这种绝对态度的人，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他们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他们不按照客观需要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地具体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机械地、主观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争”。这是不了解党内矛盾的根源的党员、缺少办法对付党内分歧的党员和机械地了解党内斗争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这种对党内斗争的绝对态度，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被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党内的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发展到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依靠这种所谓斗争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

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无产阶级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上述各种错误的态度相反，我们主张：

（一）首先认识和辨别党内各种现象、各种思想意识、各种意见和主张，哪些是正确的，对党和革命的利益是有益的，而哪些又是不正确的，对党和革命的利益是有害的，或者争论的两方面都是不对的，对的应该是另一种意见和主张。经过冷静的辨识和思考之后，决定自己明确的态度，站在正确的方面。不盲从，不随波逐流。

（二）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积极赞助一切正确的主张和意见，不学一切坏样子，不受一切错误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三）不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畏惧必要的党内斗争。对党内各种原则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进行

不调和的斗争，以便不断克服这些错误现象，绝不放任这些错误现象的发展，不使它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

（四）不抱机械的绝对的态度。把原则上的不调和和明确性，同斗争方法上的灵活性和耐心的说服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长期斗争中去教育、批评、锻炼和改造那些犯了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具体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各个时期各种原则问题上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的嗜好。

（五）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对于党内某些已经不可救药的分子，给以组织上的制裁，直至驱逐出党。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是自己最高的责任。

这就是党内一切好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敌人要利用我们的每一个缺点和错误来破坏我们的党，是不奇怪的。我们除了要经常提高警觉性之外，应该在党内每一次缺点和错误发生的时候，尽可能减少给敌人利用的机会，这是每一个爱护我们党的同志所应有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顾到这一点，如果他只图一时的痛快，甚至不拒绝坏分子的援助，而和坏分子结合，或者还假借党外的某种力量和援助来达到他在党内的某种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党的纪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们的党员，在党内应该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和坏的样子，就不应该学习，而应该反对。但是，党内的实际情况是，某些同志除了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外，也还反映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学一些坏的样子。对于某些同志来说，似乎是学坏容易而学好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这些同志在党内有某种错误发生的时

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助长和扩大这些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常常站在错误的一方面，或者不分别正确和错误，只看哪一方面行时，就站在那一方面。对于这些同志，如果不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锻炼，他们是很难进步的。

至于那些对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抱自由主义、官僚主义态度的同志，当然也是错误的。我想，这对于你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应该是很明白的。因为在你们学过的“党的建设”里面就讲到党内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很深刻，你们可以去研究，我在这里用不着多讲。现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们党内抱这种自由主义态度的同志的确还是不少。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常常是做得不够，特别是由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大大加以发扬。然而，在党内，对于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对于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批评，以及背地里的议论和闲话，却是不少。这是党内自由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这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发展、革命斗争中的勇气还不够，也反映党内民主的正确发扬还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别人，怕引起别人的抱怨和对于自己的反批评，而宁愿放任各种缺点、错误在党内存在，采取“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态度，然而却又在背地里去议论人家，这对于党是无益有害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和议论，可以引起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和不团结的现象，而党的缺点和错误却不会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和非组织的议论而得到改正。我们提倡党内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内既有各种缺点和错误存在，既有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存在，而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的每一种都

可能在某种时期发展成为党内某种倾向，引起党内某些原则上的分歧，妨碍党的行动的一致。因此，如果不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经常地揭发和纠正各种缺点和错误，不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不进行党内斗争来克服党内的分歧，而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折衷的态度和“中间”路线，或者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那末，就不能正确地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

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还表现在另外一种现象上。这就是当着党内某种争论已经发生的时候，许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整天整月地进行空洞的争辩，或者任意地放纵起来，在这种争辩中使党内的团结松懈，使党的纪律削弱，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把我们战斗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关变为争辩的俱乐部。这种现象，过去在我们党的某些组织中是不只一次地发生过的。这同我们所主张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毫无相同之点。我们之所以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的损害党的威信，败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的提高党的威信，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对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克服党内的分歧。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巩固、发展和前进。

在党内斗争中抱绝对态度的同志，也是不对的。

这种态度，是自由主义态度的反面。因为他们不了解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绝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党内的许多同志在各种不同的时候，都可能多少不一地反映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而在工作中会犯一些错误，这是任何一个同志都不能完全避免的。如果说，所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非无产阶级思想

意识的同志，所有犯了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都一律不要，都一概不能容纳，都绝对地拒绝他们，或者把他们从党内驱逐出去，那末，我们党内也就没有什么教育同志和巩固组织的任务了。如果我们党采取了这样极端的政策，那末，这种抱绝对态度的同志自己，最后也就不能不从党内被驱逐出去。抱这种绝对态度的同志，特别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把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民，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把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懂得，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

自然，教育和改造这些党员，要作长期的、耐心的努力，是很艰苦的工作。但是，如果这样的艰苦工作都不愿做，都畏难，那还说得上什么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类呢？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类这样的空前艰巨的工作，我们都下决心做，都不畏难，那末，现今世界上还有什么艰苦工作可以使我们畏难的呢？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共产党员，是大无畏的，是不怕一切艰难和困苦的，是了解世界事物发展的曲折进程的。那些抱绝对态度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所以，他们畏难，想走直路，想一下子就肃清一切不愉快的东西，一下子就跳到他们理想的世界去。他们这样想这样做，是一定要碰壁的。在他们碰得头破血流以后，又往往悲观失望，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丧失信心。他们就是这样从左的极端走到右的极端，把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在人们的面前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尽管抱着这种态度去对待党内的缺点和错误，对党、对同志、对自己都很不利，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党内还是有不少同志在不同程度上抱着这种错误的绝对态度。

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我们主观地嗜好斗争，欢喜争辩，而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在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任何妥协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说，当着问题的争论已经发展成为原则上的争论，非用斗争来解决不可的时候，我们应该毫不躲避地进行党内斗争，来解决这些争论。而不是说，我们在一切日常事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都要小题大作、板着面孔来进行党内斗争，都要绝不妥协。“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协。”

当着党内产生机会主义思想，存在原则分歧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进行斗争，来克服机会主义思想和各种原则错误。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党内不存在原则分歧、没有产生机会主义的时候，硬要把同志间在某些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扩大成为“原则分歧”。

毛泽东同志说：“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

对于党内某些犯了原则错误或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当着他听不说服，不顾党的批评，而坚持错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抵抗党的方针，或者采取两面派态度的时候，给以严格批评，以至给以组织上的处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并不坚持错误，经过平心静气的讨论、说服和批评之后，愿意改正错误，放弃他们原来的观点，或者正在冷静地考虑他们的错误，并且和其他同志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就应该对他们的每个微小进步表示欢迎，不应该一律给以处分。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并不是面孔板得愈凶就愈好，也

不是处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应该以真正能够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纠正错误、教育党和巩固党为最高目的。

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他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些似乎疯癫的人看来，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不得的。他们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争对象，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内斗争中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依靠这种错误的斗争，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内斗争，才算是“布尔什维克”。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真正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对党开玩笑，把极严肃性质的党内斗争当作儿戏来进行。主张这样做的人，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来投机的人。

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的问题。我们在反对党内党外各种黑暗东西的斗争中来改造世界和人类，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党和我们自己。党内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在党外的阶级斗争中——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来锻炼、发展和巩固自己，同时，党又在党内斗争中达到自己的巩固和统一，而更有计划地、正确地、有力地去领导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所以，对于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抹煞党内原则的分歧，掩盖党内矛盾，躲避党内斗争，敷衍了事，是根本不对的，是对敌人有利的，是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是和我们在斗争中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基本观点不相容的。同样，脱离党外的阶级斗

争，脱离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使党内斗争变为空洞的清谈，也是不对的。因为离开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去锻炼、发展和巩固党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而对一切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采取敌我不分的态度，或者抱着绝对的态度，都机械地过火地去进行党内斗争，主观地去制造党内斗争，也是根本不对的，是和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忠实的同志，不应该和他们决绝，而应该抱着爱护和同情的态度，去说服、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如果他们不是坚持错误，不可救药，就不要打击他们，驱逐他们。

虽然在我们的党内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还有某些个别的部分的坏现象，但是我们完全相信，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是能够而且一定要肃清这一切坏东西的。中国共产党以往十余年来斗争的历史和伟大进步，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都使我们对于这一点深信无疑。

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同志不但应该有党外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而且应该有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和修养。但是，在我们党内的不少同志中，对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还没有真正深刻的体会，还缺乏应有的锻炼和修养。这不但表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常常进行许多无原则的斗争中，而且表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甚至斗争历史较长的某些同志，常常在党内经不起批评，受不得委屈。这些同志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论斗争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艰难困苦，受到反革命如何严重的打击，他们都是绝不动摇、毫不抱怨、从不伤心的。但是，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却丝毫也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也受不起。或者是多心多疑，以为别人的某些

话是有意隐射他的，为了这些话，他可以抱怨、伤心到极点。这种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

我们应该说，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们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们把自己的党当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们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来，是应该受到各种鼓励、安慰和抚爱，而不应该受到任何打击和委屈的。他们的这种希望，也是应该有的。然而，有一点他们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这就是我们党内还有各种缺点、错误，还有党内斗争，每一个同志也必须经过这种斗争。在我们党内对各种缺点错误要进行批评，要进行斗争，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党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现象。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各种正确的批评是必要的，对自己对同志、对党都是有益的。同时，有些同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这也是难免的。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一遇到这些情况，就觉得奇怪，就出乎意外地难过和伤心。

在这里，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的同志团结，要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同志，不要随便地用言语去伤害其他的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别人的背后不负责任地去批评同志。对一切同志的错误，应该站在帮助和爱护同志的立场，诚恳地当面地进行劝告和批评。这是我们，尤其是比较负责的同志应该注意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同志应该经常有党内斗争的准备，应该虚心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同时也应该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除开同志间组织上正式的相互批评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正确，行为正大，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和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和解释一下，如果解

释不了，只好让别人去说。中国有两句谚语：“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人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都是可以弄清楚的。我们应该受得起误会，在任何时候都不牵人无原则的斗争，同时也应该经常警惕，检点自己的思想行动。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自己不用言语去伤害别的同志，但是，当别人用言语来伤害自己的时候，也应该受得起。

党内无原则的纠纷，我们是在根本上反对的。因为它“无原则”，对党有害无益。因为它“无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多大的“是、非、善、恶”可分。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无原则的斗争，不要去评判谁是谁非，去计较谁好谁歹，这是弄不清楚的。我们只有在根本上反对这种斗争，要求进行这种斗争的同志，无条件地停止这种斗争，回到原则问题上来。这是我们对无原则纠纷和无原则斗争所应该采取的方针。但是，党内如果发生某些无原则纠纷，在某些原则斗争中如果夹杂着许多无原则纠纷的时候，又怎样办呢？或者这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要来光顾我，把我牵扯在内，又怎样办呢？那末，我们还只有着重原则问题，而不要去着重无原则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上述的方针，严正对待这些无原则纠纷，始终站稳自己的原则立场，不被牵扯到无原则纠纷中去。不要人家来一个“不对”，我也还他一个“不对”。我应该始终站在“对”的方面，去反对人家的“不对”。这件事对于我们某些同志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的同志必须特别注意锻炼和修养。

现在，我把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这就要求：

（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的

坚定立场。

（二）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

（三）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

（四）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

党员的思想意识的修养，照我讲来，基本上就是这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朱德等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 给贺龙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贺、关、吕、孙并聂、彭、关、程^[1]、萧克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军委会：

目前战争形势处在新时期。敌后战争益见严重与艰苦，必须准备长期的与不断的粉碎敌之围攻“扫荡”，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敌我消耗也就一次比一次大。敌经无数次的“扫荡”而失败，将被迫而停止全国战略进攻，相持阶段才能确切的到来。战争重心转入敌之后方，在长期艰苦的血战中成为考验华北抗日军的优劣与鉴定政策与政党的尺度。我们必须克服困难，以一切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提出以下意见，请考虑执行：

(一) 用一切努力确切深入群众工作；(二) 建立群众武装(村乡游击小组、区县基干队)由群众游击队发展为正规军，同时繁殖游击队，这些武装党须确切掌握；(三) 五台、盂县、代县、崞县、繁峙、灵丘、广灵等县原无地方群众武装(山西均无地方武装)，必须深切注意建立地方游击队，如无枪支，应在河北平原设法抽调适当数目枪支发给群众。要认识巩固山岳地带的根据地与坚持平原游击战是不可分离的任务；(四) 估计在青纱帐时，同时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晋东南(六个师团以上，四条铁道防守部队在外)及山东时，冀中形势不会有特殊

严重，目前应将一二〇师主力移至路西适当地区加紧训练。第三纵队主力暂留路东，到十月中青纱帐过去后，敌“扫荡”平原更可能严重，那时一二〇师应换出第三纵队训练。目前一二〇师训练地区请聂、彭、关、程同志商决，如何？望复；（五）给贺、甘、周^{〔2〕}电建立与巩固北平西山根据地与萧克部向北发展，究竟如何执行，至今未见电告。

朱、彭、杨^{〔3〕}

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关向应、吕正操、孙志远，聂荣臻、彭真、关（不详）、程子华。

〔2〕指甘泗淇、周士第。

〔3〕指彭德怀、杨尚昆。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 敌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的政策，即以引诱中国投降为主，而以其军事行动配合其政治阴谋。因此，敌在中国正面的进攻比较沉静，而集中大力“扫荡”敌后，强调反共，加紧攻打八路军新四军。

(二) 因为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静，而得出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不仅中国的进步和力量的增加还不足以抵御和停止敌人的前进，不仅敌人还有力量向中国进攻，并且在敌企图诱降企图组织一支政治上的别动队，迂回到中国后方瓦解抗日阵线停止全国抗战的阴谋之下，中国还要大力方能打破它的政治进攻。在中国继续坚持抗战克服投降危险，即打破了敌人政治进攻的条件下，日寇继续用军事进攻中国正面（西南西北）与敌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三) 认为敌后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主张，同样是没有根据的。现在敌正大举“扫荡”敌后，无论在正面抗战能够坚持或不能坚持的条件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会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华北首当其冲。虽然在某一个抗日根据地上，在粉碎敌人围攻之后，在敌人进攻的目标暂时不在这个根据地的时候，局部的、暂时的，即战役上的相持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这仅仅是暂时的局部的，即战役的相持，而不是全般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也不是全般敌后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四）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但敌之诱降阴谋与“扫荡”敌后，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全党同志应该深刻认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敌后抗战尤其是艰苦，只有用一切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反共危险，推动中国进步，增加抗战力量，坚决奋斗，才能争取相持阶段与最后胜利的到来。应该反对无根据的认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但同时要坚决反对因为抗战困难、投降危险与反共危险的增加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因为这都是妨碍抗战动员妨碍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不正确倾向。

（各地接此电报用各种适当方式传达到全党）

中 央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游击战线上目前的军事问题^{*}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叶 剑 英

当前的敌人正以大力回向后方，进行积极的“扫荡”，企图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略。依敌人自己吹的“牛皮”看来，似乎在山西和山东，打得特别热闹。这就证明敌之“扫荡”，在战略上，首先是要集中兵力肃清华北，而肃清华北的步骤是先打山东，次打山西，然后“扫荡”河北。

华北地势，右泰山而左太行，中间拥抱着河北平原，交通四达，人民殷富。两年抗战，华北各地坚持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依托广大群众积极的拥护，颇为发展。其发展形势是把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与太行、五台、泰山、雾灵、大青各山地游击战相配合，深入敌后，威胁平津。

因此，华北作战形势，从战略观点看来，要保障西北必先巩固山西，欲保障山西必须坚决的进军河北，而河北平原游击战的支持，必须得到太行与泰山两条山脉的游击战相呼应。

也就是说，华北局面是整个的。山西、山东、河北的斗争，是互相配合，不能分割的。以太行及泰山两山，作为华北“螃蟹”的“双螯”，护卫着河北平原，形成整个的巩固的态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华北与当前“扫荡”之敌坚持抗战。

从敌军最近行动上看来，敌在山西正以主力围攻晋东南，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群众》第三卷第十期。

企图进出晋西南三角区域，渡河西向。其力量配置似是：

一、以第二十师团为主力的军队，集结博爱，自南而北指向晋城；

二、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力的军队，在安泽、浮山一带，由西向东指向屯留；

三、以一〇九师团为主力的军队，在白晋公路北段，由北而南沿公路南下；

四、以独立第四旅团为主力的军队，集结辽县，由东北指向西南；

五、另以一部经东阳关，由东向西。

在上述情况下，我晋东南抗日部队，依太行山地，得民众协同，无疑的将给敌以有效的反击。但晋境之敌，分五路进攻晋东南，企图肃清太行山抗日游击队。从时间上看，是在敌军“扫荡”鲁南山地游击队，自告结束以后（敌自六月三日起便开始“扫荡”鲁南）。事实更加证明了，敌对华北作战，正是把华北形势作为一个“螃蟹”来决策的。其进攻步骤是先剪除“螃蟹”左右两螯——右泰山而左太行，同时也是先泰山而后太行，然后肃清河北。

这就是说，敌在华北作战，虽然已经尽可能的集中使用其兵力，可是对山东、山西、河北三省抗日军队的作战，是不能同时并举的，因为敌寇永远是兵力不足。

这就是说，假使要在策略上不犯错误，就必须发动并领导整个华北的抗日力量，配合着全国的抗日力量，给敌寇“扫荡”企图以打击，首先争取晋东南的伟大的胜利，以保卫山西，保卫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来保障西北。

在今天这样一个艰苦的游击战线上，我们要粉碎敌人“扫荡”的进攻，只有给游击队以各种合理的自由的条件才有可能。

给游击队以动员群众的自由，使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成为抗战建国纲领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不要怕民众有权，只有到了民众有权的时候，政府才会是有能的。

给游击队以建立根据地的自由，例如建立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同时必须要建立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要知道在敌人后方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则不能达到驱逐与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任务。仅有一个根据地，无周旋余地，也不能支持长期的斗争，完成政治的任务。

给游击队以收复失地的自由。敌人以小国少兵侵占我们广大的领土，许多战略要点、要地、要线固然要努力收复，就是许多间隙成为虚空，许多点线残敌极少，然而我正规军队早已远离，乡村秩序无人负责，一任匪盗纵横，群情惶惑，游击队也应机动地深入敌后，迅速收复，在那里组织民众，恢复政权，以充实敌后抗日力量，开展全面战争。

给游击队以向正规军发展的自由。只有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创造正规军，才能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

只有游击队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普遍地发展起来，正确地执行游击队所担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务，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

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游击战争中的战术问题，要注意到敌寇对我游击队的进攻，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敌寇在不断的进攻中，是不放过每一次失败的教训来改进其进攻的方式。试研究游击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作战方面的战斗技术，双方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现在把敌寇对我游击战研究和对策介绍几点，就可以警惕地知道敌人是怎样的努力来改进其反游击战术。

第一，敌寇对我游击战的对策，用敌人的话说：

一、化整为零，是华军被包围时一种脱出危险的手段。此时华军已走，民众尚未全跑，应即进行宣抚工作，其工作方法

应是：

（一）选出中国通之工作人员随同应急要员中之搜查队，择要进行搜索。

（二）在部队中应附属宣抚班，或从军先导员、从军僧侣、从军记者，以协助进行宣抚工作，恩威并济，使游击队员不能潜伏民间进行扰乱。

二、化零为整，是华军集结兵力袭击我军之弱点所采用之手段。其袭击目标，常常选择分散之我军、各种军需品屯集地、飞机场、各级指挥机关等。但华军游击队常与正规军相配合，成为正规军有力助手。

因此，我军应用装备完善、配备适当之快速部队，乘华军集合未整之际，选择良好目标而猛击之，但应注意勿为华军正规军所袭击。

三、旋磨打圈。华军游击活动，常在攻击我军正面之际，忽然转到我军背后或侧面突然袭击，以协助其正规军作战。当华军旋回攻袭之时，应派应急要员，运用高度机动力，勇敢进行截击，予以歼灭。

四、小群游击。小群游击为华军普遍采用的战术，系以最多十人为一群，除步枪外，并配有轻机关枪，潜伏于要地，我军通过时袭击之，若被我军发觉则分散退却。对付此小群游击，须强化应急要员的组织，使之质量优良、装备精良、小心精细、镇静从事，一旦遇警，即予歼灭。

五、掠夺粮械。华军常派游击队或便衣游击队掠取粮秣、强夺兵器，不能夺取时，常破坏之、毁弃之。因此，我兵站辎重输送部队，须特别注意与各大小部队、警备部队以及各种特种编制之歼灭突击队取得联络。输送队出发前，应将护送距离、到达时间、经过道路等预为规定之。遭遇顽强之敌时，可用毒粉瓦斯等掺于粮秣中，伪弃于敌，实施毒攻歼灭之。

第二，敌寇在“扫荡”时所采用的战术：

一、敌寇进行“扫荡”时，常常修复与新筑许多公路网，增筑并强化其据点群，使之星罗棋布、蛛网纵横，依据其公路与据点之进展，逐步缩小我军活动范围，并实行分区“扫荡”。

二、在交通线上组织流动巡查队，人数约等于一中队，昼夜不息的梭巡各据点，若发现我军游击队袭击时，各据点则分途应援，合围合击。

三、进“剿”时，多采用分进合击、夜行晓袭，在时间上颇能协同。在分途进“剿”时，其主力常不止一路，倾巢而出，后路空虚。进击中若某路发现我军时，则其他各路均向此目标转进，以收合击之效。

四、敌寇常轻装掩袭，有时伪装撤退，诱我追击，以伏兵打击我军。其运动部队常避开大道，走小路，采取曲线前进，以行包围或迂回。

五、敌军常在树上或屋顶放哨，公路上的桥梁常有伏兵，防我破坏。宿营时，常在夜间变换宿营地，避免我军夜袭。

六、敌之通信联络，夜间用红绿信号枪，战斗时用旗语，排长对各班长则用记号指挥。每据点内设有袖珍无线电机，其通信联络颇为迅速。

七、沿江之敌则以兵舰、装甲汽船上下来往，巡查颇周。内河水浅，则以小划子加装摩托，行驶便捷。

第三，敌人据点的构成：

敌常利用巩固之独立民房，加以改造，构成据点。在墙根地平面上设枪眼，并在屋内墙根挖成狭小散兵壕，上有掩盖，另开地道与屋外交通，地道出口有数道散兵壕相贯通，并设掩盖；散兵壕外，遍布铁丝网或洋油箱，以便报警。据点侧防之散兵壕，通常距据点约五十米，途中有交通壕。房顶上面有机枪掩体，设有瞭望哨、探照灯。每据点约容四五十人乃至百

人不等，有值班的应急要员担任警备。

以上所述是关于敌人对我游击队作战的一些战斗动作，因而敌寇对游击战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

战争或战役的任务，要靠许多胜利的或不一定胜利的战斗来完成，虽然基本上是要积小胜为大胜。今天，我们把游击战术上的某些问题拿到敌人后方去，用来粉碎敌人“扫荡”的进攻，这就要求活跃在敌人后方的游击英雄们，要细心地研究两年来在敌人后方艰苦作战的经验，研究两年来敌我两军在游击战线上所发生的一些作战方式的变化，把握着正确的战略方针，灵活的指挥游击队作战，这样才能战胜敌人。

敌人正以大力“扫荡”山东、山西以至整个华北。目前形势是颇为紧张的，把正规战与游击战配合起来，把华中、华南游击战与华北游击战配合起来，争取敌人后方游击战的伟大胜利！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叶剑英军事文选》刊印。

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罗、王、张、朱、彭、杨并转何、周、聂、彭、舒并转陈、邵^①：

根据我们检查三分校及北方局检查二分校之结果，认为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青年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的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1. 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2.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抗大过去确有注意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必须严加纠正（检查三分校教育计划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3. 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一、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二、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三、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

四、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4. 因过去公开招生，特务人员混进不少，现在必须立即提高政治警惕性，三个分校立即进行全体干部的审查，洗刷有特务嫌疑的分子，学生党员应重新登记，弄清每个学生的政治面目是最重要的工作。抗大领导者应认识这不仅关系抗大，而且关系八路军，因为特务人员经过抗大打入八路军，希望你们严重注意，但此工作必须很好的领导，避免及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

5. 请北局前总领导一分校，分局与军区领导二分校，作深入的讨论与检查，定出今后具体计划电告我们。彭真所提意见我们都同意，分校必须在当地最高党及军事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宜所谓独立自由及各自为政，而党军机关亦必须对分校工作负完全责任，抗大本校在到达目的地进行深入的讨论彻底转变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罗瑞卿、王智涛、张际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何长工、周纯全、聂荣臻、彭真、舒同，陈伯钧、邵式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东方 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 根据各方材料(参考三十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严重局势。

(二) 蒋介石的谈话虽然指出了独立奋斗反对依赖与观望的决心,但对英国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特别由于金融上对英国的依赖,使英国对蒋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

(三) 我党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行动上,表示:

甲、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全世界普遍的战争的到来。

乙、坚决反对中国抗战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

丙、但对英方面,应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

丁、指出即使英国停止援助中国与日妥协，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中央书记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拥护真三民主义 反对假三民主义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张 闻 天

—

自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公开成为汉奸之后，他们仍然恬不知耻的利用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招牌，进行他们公开卖国的活动。他们把孙中山先生一切革命的主张与言论，都有意曲解为他们公开卖国的理论根据。最近汪精卫在他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上，甚至公开说，孙中山先生历来就是主张中国应该投降日本，追随日本之后以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不但这样，这些无耻的叛徒，还在利用国民党的名称，到处建立他们的伪国民党党部，还想利用青天白日旗以建立他们的傀儡的伪中央政府。总之，凡是一切足以掩盖他们卖国投降真相的各种形式，凡是足以欺骗中国人民的各种花样，凡是足以破坏分裂国民党的各种手段，凡是足以污辱曲解三民主义的各种方法，他们都是要尽量利用的，这原是早在明眼人的意料之中，尚不足怪。

党、政当局方面最近下令通缉汪精卫，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之后，又开除了周佛海、陈璧君的党籍，这是非常值得赞许的一件事。但是可惜对于他们那种用伪三民主义发挥的汉奸理论以及关于他们的各种无耻行动，还没有积极的使用所有的方法与之斗争。甚至他们的书报还未被严厉禁止，他们的党羽还

未被彻底肃清。在官办的书局里，还没有看到一本反对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汉奸的著作，然而，那位实际上同汪精卫信仰“一个主义”的、冒牌的国民党的“理论家”、挑拨离间造谣说谎的专门家叶青其人的小册子，却是一本又一本的经过这些书局发行出来，而且还用强制的方法为它推销！甚至某些人还发布“不要反对汪精卫，免为共党利用”的密令。对于我们反对汪精卫等汉奸的动员，则认为是“故意扩大”，“别有用心”！这些人对于反对日寇汉奸表示如此消极，而对于反对真正抗日的力量，反对共产党，却又使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这却是很可惊奇的！

那些天天叫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人，当他们反对三民主义的朋友马列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共产党时，表现出浑身是劲，简直有点像反共的“英雄”，然而对于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的假三民主义，假国民党，则默不作声，似乎这类假三民主义，假国民党，并不同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相冲突似的！特别那些上海的国民党党部与国民党员，在汪精卫的影响之下，已经大部分公开“转向”、“自首”，完全实行了汪精卫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了！

我们共产党人，很诚恳的希望国民党的同志们，真正使用他们的全部力量去反对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的假三民主义、假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与今天抗战的孙中山先生的真国民党，被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所污辱了，所强奸了。每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忠实的国民党员，一定也一样会对于汉奸汪精卫等的无耻卑鄙的行为表示最大的义愤，坚决起来为保卫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而战！在这里我们共产党人是始终同国民党的同志们在同一条战线上，愿意同他们共同奋斗的！

二

但是什么是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呢？可惜在抗日阵线内，今天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立场。概括的说来，今天在抗日阵线中，对于三民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是在于努力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的革命精神，使之成为全民族争取现阶段内革命之彻底胜利的战斗的政治纲领；另一种立场，是在于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为一个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的一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我们共产党人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对于三民主义的立场是属于前一种的。我们历来认为三民主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策（孙中山先生当时具体规定为联俄、联共、唤起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曾经孙中山先生亲自具体的规定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中。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全部著作也是历来从这种观点去研究的，而且我们相信也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真正保存与发展孙中山先生一切著作中的革命精神，使之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思想的武器。我们认为只有这种立场，才能正确的估计三民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意义与作用，真正把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放在适当的位置。

而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立场则是属于后一种的。为了要一时的抗日，他们必须保存三民主义中一部分革命的内容，主要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某些革命内容，但是由于他们的狭窄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到处削弱与掩

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把三民主义实际上阉割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而同时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某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使之成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这种立场，当然是无法全部把握三民主义的，当然要减低三民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与意义的，当然要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受到损失的。他们把三民主义“修正”了，他们把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装扮成为一个妥协的、不彻底的、畏缩的、狭义的民族主义者了！

正由于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这种不彻底的立场，使他们对于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的伪三民主义不敢开展坚决的斗争，而同时容忍一切公开的与隐藏的民族危害分子，把三民主义转变为可以对内反共，又可以对外妥协的工具。一切公开的与隐藏的民族危害分子，一切叶青之流的人物，现在都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于这种“转变”的工作。他们抽去三民主义中的全部革命精神，他们把三民主义同马列主义完全对立，他们甚至企图把三民主义曲解成为法西斯主义，而且企图把孙中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与荒木等这类法西斯匪徒做朋友！这真是对于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最大的污辱！

我们共产党人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不但要反对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的假造三民主义以及一切公开的与隐藏的民族危害分子曲解三民主义，而且对于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三民主义的不彻底的立场，也要采取批评与劝告的态度，使他们决然抛弃那种立场，转到真三民主义的立场上来，同汪精卫、叶青等的假三民主义开展坚决的斗争。只有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抗战建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就反对一切断章取义肢解与曲解三民主义的企图与办法，而主张把握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基本的革命精神，基本的革命主张与方法，在革命现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把它发扬光大起来。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者的态度，才不愧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的继续者。如果有意从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中找出一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作为投降妥协、反对抗战、反对团结进步及反共防共的根据，那这不但不是拥护三民主义，而正是反对三民主义！汪精卫、叶青之类正是采取这种方法的！

三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公开声明，我们是马列主义者。马列主义是现代最进步阶级的革命的科学，它正确的把握住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及其改造的方法，以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后胜利。在阶级性上，在科学性上，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它同三民主义显然是不相同的。（关于这点，将有专门的论文——著者）然而，这是否会妨碍我们去拥护真正的三民主义呢？我们的回答：不会的，不但不会，而且正是马列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这样坚决的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能坚决的为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列主义，决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我们共产党人根据于这种马列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分析得出了我们对于现阶段革命行动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虽则也有区别的地方，但是在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从以下的历史事实，即可了然。

中国共产党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表示自己拥护三民

主义以前，已经根据马列主义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基本上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一致的政治纲领。在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即提出了如下的政治纲领：

第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第二，打倒封建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第三，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第四，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一律平等；

第五，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普选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

第六，八小时工作制，减租减息，废除厘金苛杂，男女一律平等，普及教育等。

显然的，这个纲领（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只摘录了其中主要的几条）同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成立之后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纲领上所发表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也有区别的地方）。而且事实上，那时国民党的那个三民主义的纲领，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制定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公开表示自己拥护三民主义以前，已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作了具体的分析，在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有名的十大纲领，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更具体的详尽的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所提出的简单扼要的三条总纲领，也仍然是共产党过去所提出的主张。请看那宣言上是怎样写的：

“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

的目的，这就是：

第一，争取民族之独立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

第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第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之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的一切这些主张，显然同过去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手订的三民主义，大体上仍是一致的，同后来（一九三八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虽有许多不同，但大体说来也是一致的。

从上面所说的历史事实，首先可以看出，我们共产党人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历来同我们根据马列主义立场而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是不相违反的。我们共产党人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均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于一定的革命的共同政治纲领上。我们共产党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即是为这类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奋斗。这里任何的“阳奉阴违”、“模棱两可”是没有的。我们希望国民党同志以及全国人民，当他们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时，也要同我们一样的明确与具体，而不把三民主义成为又空洞、又抽象，甚至是神秘不可思议的东西。

从上面所说的历史事实，又可看出，我们共产党人之马列主义的立场，不但不妨碍我们在现阶段革命中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正是使我们所以能够拥护真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因。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他是清楚的了解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并不因为共产党人之相信马列主义而歧视他们，而且邀请他们加入国民党为了三民主义的共同事业而共同奋斗。相反的，他

在许多反共防共分子前面，再三声明了马列主义者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国共两党只应该团结，不应该反目。我想一切国民党中央中贤明之士，一切真三民主义的信徒，都应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这一遗教，诚心诚意的同共产党在一起，认真的去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抗战建国纲领》及中共所历次提出的政治纲领。

汪精卫、周佛海、叶青之流，今天一致的都要把三民主义“转变”为“反共”的工具。但从上面所说的一切更可了然，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当前问题，不是实行三民主义或是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是否实行与如何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问题。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而且要认真地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汪精卫、周佛海、叶青之流的“反共”，实际上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敌人，是全民族的公敌！这一点，是国民党的同志与全国人民必须认清的。至于那些利用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的声明，企图压迫共产党放弃马列主义立场的人们，实际上是根本不了解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与孙中山先生的基本革命精神的。这批人的结局，一定非常危险。曾经是“党国要人”的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这批人，过去也未尝不自以为信仰三民主义，利用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甚至他们的“大著”直到今天还为叶青等所背诵着，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所信仰的三民主义不是真三民主义，所以结果变成了无耻的汉奸，虽是直到今天，他们的嘴上还是满挂着“三民主义”！

四

在目前中国革命整个的历史时期内，怎样才算真正的拥护三民主义呢？

真正的拥护三民主义，必须首先严格的分别清楚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同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真三民主义是要经过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则是要经过“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建立“东亚新秩序”以灭亡中国的。必须到处公开阐发真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揭破伪三民主义反革命的实质。广泛的、深入的开展反对汉奸汪精卫及其党羽的言论与活动的斗争，肃清那些隐藏在各种政权机关中的汪精卫一类的民族危害分子。

真正的拥护三民主义，第二，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能分割的，没有全民族的与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尤其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没有民主权利的保证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设想的。彻底揭破冒充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同汪精卫、周佛海的伪三民主义属于“一个主义”的。认真的恢复三民主义的真正革命精神，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起来，坚决反对把三民主义转变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恶毒阴谋。

真正拥护三民主义，第三，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的政治纲领，首先要认真实行《抗战建国纲领》，确实做到坚持抗战，反对中途投降；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国内分裂；坚持向前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一切合乎三民主义基本革命精神的言论行动、实际办法与法律制度，应该实行，应该保护与发展，应该奖励。一切违反于此的，则应该停止实行，应该改革与取缔，应该严惩。各种政权机关民众团体中，一切真正拥护三民主义的好人，应该尽量引进，一切违反三民主义的坏人，应该尽量洗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言行不一致”，“因循敷衍”，“醉生梦死”等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彻底转变。

真正拥护三民主义，最后，必须实行与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现在最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明白中国革命不要胜利则已，如果要胜利非实行与坚持这三大政策不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及最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参加，决不能胜利。在国际上，苏联已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它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一切反共、反工农大众、反苏联的言论行动，只对于日寇与国际的反动派有利，对于汉奸及国内各种各样的民族危害分子及反动派有利。其结果，必然引导中国革命到新的失败。对于这类反动言论与行动，必须严厉取缔。

我想，只有真正能够做到以上几点，才称得上真正拥护了三民主义，才能使抗战建国真正得到最后的胜利。那满口“拥护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神秘化、教条化，而实际上所做的没有一件不违反三民主义的真精神的人，那把“三民主义”作为一切罪恶行为的护身符与招牌的人，是应该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

我们共产党人，要同国民党同志们在一起，同全国各抗日的党派在一起，同全国人民在一起，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根据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
《解放》第八十一期刊印。

贺龙在八路军冀中军区 参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三九年七月)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议是八路军第一次大的参谋会议，也是个专门人才的会议。根据八路军的诞生和历史，我们的各级参谋干部都是从血的斗争中锻炼和提拔起来的，这与其他军队不同，与欧美各国的军队也不同。

八路军从血的战争中提拔的一些参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般的说工作做的还不错，组织战斗，建设军队，教育部队，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取得伟大的胜利!

以上是八路军参谋的特点，接着我讲几个问题：

(一) 我们这个参谋会议，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意义非常重大，不仅能使各级司令部工作健全，并且对健全部队，教育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组织战斗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有飞跃的进步，使我们在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胜利的进行战斗。

(二) 司令部是首长指挥军队的机关，是军队行动的指南，司令部工作不好，首长的指挥便是盲目的。参谋长是首长第一个助手，是首长指挥军队的有力的助手，工作甚为重要，同时司令部要有科学的分工和确实的负责。假若司令部工作做的不好，首长的计划决心，也就很难实现。

(三) 抗战两年来，我们得到很多的胜利，获得宝贵的经验

教训，第三纵队创造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司令部做了很多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按我们一二〇师说，在敌后方创造了好几个抗日根据地，并指导和组织了许许多个司令部。我们工作虽然尚有弱点存在，但这些弱点都是事务上的缺点，而不是原则的错误，这个会议是要我们总结抗战以来司令部工作的经验教训。

（四）抗战两年来，冀中军区与一二〇师取得很多成绩、胜利，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两年来，我们一二〇师进行了七百多次战斗，也就是各级司令部在首长的决心下组织了七百多次的战斗，这七百多次的战斗绝大多数是胜利的。

（2）两年来，军队在不断的战斗和转移中，各级司令部对军事教育未放松。我们的部队分散于晋绥察冀各省，相隔数千余里，但对各级司令部工作，军事教育，战术训练经常进行，因而各级司令部工作能顺利的进行，部队战术素养也相当的提高了。

（3）在军事上帮助了友军，为在晋西北与友军取得很好的配合，并帮助了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等训练干部、供给军事教材等，都尽了友谊的责任。

（4）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都是艰苦的，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高度的发扬。这些无名英雄，在长期行军中没马骑、少鞋穿，然不辞劳怨，埋头苦干，担负起党与上级所给予的任务。

（5）这些成绩是从血的斗争中获得的，此次参谋会议要把这些成绩从手折里拿出来，汇集整理，刊印成册，发到兵团，作为改进司令部工作的参考，并继续把它发扬光大。

（五）各级司令部都有了很好的成绩与进步，但一般的说，各级司令部还是不健全。这次会议要找出不健全的原因，如组织上的不健全，参谋人员培养的不够。部队的同志因工作的艰

苦，有时要碰钉子以致工作不安心，甚至不愿意干等。应该找出这些不健全的原因，想出克服的办法，以后应如何使它健全，如何培养参谋人员，如何提高参谋人员政治上的威信等等。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只有健全司令部的工作，才能应付残酷的战争，争取大的胜利，所以健全司令部工作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六）现在各级司令部，仅能组织装备较低的军队战斗，就是我们的司令部现在主要是组织游击运动战，我们要进步到能组织很多兵种的联合大规模战斗，如坦克车、装甲车、骑兵、工兵、炮兵、化学兵、空军等，就是说，各级司令部要进步到能组织阵地战和现代化军队的战斗，因而我们司令部将有着更伟大的任务。

抗战第一阶段快结束了，第二阶段接近了，第三阶段很快的就要到来，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各级司令部进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七）抗战第三阶段，军队的技术兵种将大大的增多，我们过去对技术兵种使用的很不够，缴获的汽车不会驾驶，打坏敌人的坦克车、炮卸不下来，缴获的大炮不会放等，要使军队能掌握技术，首先要使各级司令部能掌握技术，我们参谋会议开过后，各级司令部来一个学习技术的运动，造成学习技术的热潮。

（八）总部为了总结两年来司令部工作的经验教训，健全各级司令部工作，担负长期残酷的战争，尤其是为迎接将来新的战斗任务，故召开八路军参谋会议。希望各同志把过去所得的成绩与进步，经验教训，个人心得，全部贡献出来。

（九）因为八路军分散在华北各地，不断的进行战斗，很难全体到总部去开会。故分区开会，如晋东南、晋察冀、冀南、鲁西、豫北和冀中等地区分别举行，收集各地区的经验教

训，健全司令部。我们这个会议，要把我们两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汇集整理，报告总部，供给我们自己与友军。

（十）此会本定前月二十一日开幕，因为敌人的进攻，各部队不断的进行战斗和转移，以致延迟到今日（七月八日）。冀中区的环境非常紧张，此会议能在此召开是我们的胜利。再者，我们的参谋会议实在开得太少，以后也应分区分部队的常开，使司令部工作进步更快。

（十一）此次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各兵团参加会议的同志不仅要多发表意见，还要将会议结果传达下去，把大会的结晶散布到各兵团各部队去。

（十二）八路军是共产党的党军，所有的参谋同志多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党员，至少也是同情民族解放事业，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党军的司令部工作一定要马克思主义化，党军的战略服从政略，政略确定了，战略也就是跟着决定了，战术跟着也决定了。我们的各级参谋人员一定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战争服务，组织战斗，为争取战争胜利而奋斗到底。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给新四军 党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项英同志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公鉴：

中央首先庆贺你们大会的开幕，庆祝同志们的健康。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绝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出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现在汪逆精卫在日寇指使下正在上海企图建立伪府，国际妥协派特别是张伯伦政府，正在出卖中国沦陷区域，国内投降派正在阴谋响应反共分子，正在到处活跃，大江南北正在不断发生惨案，而平江惨案更是最严重的一个。中央一方面正号召全国为这些惨案抗议，为死难的同志致哀，另一方面更指出目前投降与反共的重大危险正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新四军作战的大江南北更加严重。中央相信新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必能坚持党的持久抗战路

线，发展游击战争路线，发展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铁的新四军，训练和创造大批的布尔塞维克的军政干部，建立和扩大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组织沦陷区域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党的周围，新四军的周围，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反共阴谋，反对出卖中国的沦陷区域，为巩固国共合作，坚持长期抗战而奋斗到底，党的布尔塞维克路线万岁！新四军党代表大会成功万岁！

中共中央委员会

八一于延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必须制裁反动派^{*}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毛 泽 东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没有。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应该由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由法官出来过问。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

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赏什么人呢？应该赏抗日的人，赏团结的人，赏进步的人。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应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正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第三个，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

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提纲）^{*}

（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周 恩 来

一、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

二、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

三、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不是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也不是戴季陶的修正三民主义，当然也不能是我们某些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因为这只能使三民主义混乱起来，而不能还它真正的革命面目。

四、我们的态度，应该赞助真正了解和实行孙中山真正的革命之三民主义的人去发展三民主义，同时我们自己也应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策实行和发展起来，使它能与我们的民族解放政纲配合起来前进。

五、假使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不仅国民党人可以有两种看法，即一种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既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便无存在的必要。便连非国民党人也要这样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既是没有分别，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节录。

至少是现在没有分别，共产党人何不先将三民主义做好，而不必再说什么共产主义，至少是现在可以不谈。甚至共产党人也会这样想，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做的完全是三民主义的事，或者想将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共产党的东西来符合我们民族、民主的乃至社会主义的纲领。这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 和守则（提纲）*

（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

周 恩 来

统一战线的策略

一、开展反对汪^[1]逆汉奸及其党羽的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化，以巩固统一战线。

二、帮助友党、友军进步，首先要给以适时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并帮助其进步分子的发展。

三、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友军。

四、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宁、晋冀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

五、坚持全民的动员，首先在敌后游击区域及边区做出各种动员的成绩，以影响全国。

六、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

七、坚决进行反顽固分子的斗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不过，对这种人仍是自卫的性质。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节录。

八、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

九、对国际关系，要联合各国朝野的同情人士，扩大国际影响，以集中火力反对国际法西斯及民主国家中的妥协派。

十、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并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反对复古的反动的向后倒退的思想。

统一战线的方法

一、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

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

三、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

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

统一战线的守则

一、坚定的立场。

二、谦诚的态度。

三、学习的精神。

四、勤勉的工作。

五、刻苦的生活。

六、高度的警觉性。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汪精卫。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局部 武装冲突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

(一) 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应当估计到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

(二) 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磨擦者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

(三) 在武装冲突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必须占取上风，有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必须提高警觉性，免受袭击，布置必须严密，不宜给我中下级干部以随便进行武装冲突之权，以免弄坏事情，影响统战并免吃亏。

(四) 必须收集对方的各种材料，人证，物证，以便在必要时把反共分子及分裂者的阴谋向全国公布。

1939. 8. 19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张 闻 天

恩来、博古^{〔1〕}同志的报告与上次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基本上是相同的。恩来同志更充实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关于反共是妥协投降的准备等估计是正确的。

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

我们要看到这种危险性。

英日谈判达成了协议，英国还将继续让步。欧洲最近又要开四强会议，有形成第二个慕尼黑的危险。

日本的诱降政策仍在加紧推行。汪精卫在广州发表了广播讲话。这些将增加妥协投降的危险。

资产阶级仍在继续动摇与变化中。

从目前时局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危险性在增长。我们要严重的指出这种危险性，同时要准备应付突变。前次政治局会议指出这种危险性，是必要的。

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

在武汉、广州失守前，敌人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进攻为

* 这是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辅。现在却正相反。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方面，在前期以进攻正面主力为主，现在却以“扫荡”敌后为主。

在中国的军事抗战方面，前期以正规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现在却正相反。在国际方面，一些民主国家，如英国，前期主要以援助中国抗战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权利，与日本妥协不是主要的。现在英国企图以对日妥协来保持自己的特权。以援助中国来保持它的特权，变成了辅助的方面。

武汉、广州失守前后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期是过渡时期，它持续已将一年了。

我们了解当前形势，是为了把它作为规定当前任务的出发点。

过去是军事抗战推动了各方面的进步，军事进步带动了政治的进步。战争改变一切。战争促使中国进步，促进了中国的团结，使国民党也进步，民运也进步了。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比较突出。

现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减弱：正面的战争减少，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就国民党而言，现在抗战的旗帜还存在，但正面战争却减弱了，外来的压力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疲倦与悲观失望情绪增加。敌人军事进攻减少而政治诱降加强，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增加了。内部磨擦增加，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性突出了。这种局势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当前党的任务

因此，当前的问题，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

来打开局势，支持长期抗战。前次会议提出了很多任务，我对前次提出的任务加以说明。

在武汉失守前，我们要在各方面拥护抗战，以军事抗战为主。只要抗战，各方面都会进步。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客观上对中国的进步有帮助。我们利用这种形势扩大了自己的力量。这是顺水推舟的办法。这样做是对的。

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在拥护抗战时，需要确定不同的任务。我们拥护抗战，但今天正面的军事抗战很少，国际上大规模援助的希望也不大。今天的任务是要援助全国的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目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我们的方针，不是在同盟者的压迫下进行防御，不是完全采用退却、消极的防御。我们要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的积极方针，压迫蒋^{〔2〕}向前进步。目的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从斗争中来团结进步力量，分化坏的分子。

斗争的形式是政治斗争：以主战反对主和，以民主反对压制，以团结反对分裂，以进步反对退步，以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

斗争的旗帜是三民主义，是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不是强调以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对立。

推动斗争的核心是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共产党坚持的斗争才能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现在不能完全照搬过去的办法，那已经不够了，而是要采用谈判以外的更多的办法。

同时，要反对那种认为今天只要求异而不求同的倾向，不是要强调与国民党的对立。

要争取一切抗日的阶层，包括中产阶级，继续参加抗战。要在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坚决的斗争，

用这种斗争去团结进步的力量。

关于三民主义问题

我认为，过去中央对于三民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并不模糊。泽东^[3]同志在苏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有过说明。

我个人对三民主义的了解是：

一、马列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同三民主义有原则的区别。我们没有人说三民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

二、我们拥护三民主义，是拥护它作为今天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三、我们拥护三民主义，是拥护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政治纲领。

四、我们只从马列主义立场拥护三民主义。

五、我们反对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反对一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

我认为，上面的了解还是对的，不要修改。

今天的任务，是要写小册子，要具体的研究，把真、假三民主义区别开来。

我认为，有三种三民主义，即：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

我们了解，三民主义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我认为，只有把握住三民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才能有利于当前的局势。

没有马列主义的帮助，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所把握不住的。即使孙中山也要我们的帮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便是这样。但三民主义也不能发展为马列主义。

我们的任务是坚持三民主义的旗帜，以真三民主义打击

假三民主义。我们要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才能实现，只有经过民主革命阶段长期的斗争才能实现。

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们要多做工作。

文化政策

中宣部提出了一个提纲，政治局须给以原则的指示，请求各位同志发表意见。我同意这个提纲。

一、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

二、我们并不反对少数人从事“专门”的艺术，也不反对少数人有些欧化的倾向，而且还联合这些人反对共同的敌人。

三、我们的文化在内容上是民主主义的（也是三民主义的），并且提倡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

我不赞成个别同志的意见。有人认为民众剧团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认为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如果只是模仿欧美，是不会有重大成绩的。

党的工作问题

我认为，我们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组织是不巩固的。

为了巩固党的组织，需要明确几点。

一、在全国范围，主要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停止

发展。

二、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要使我党同志了解，根据过去经验，秘密工作是一个原则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只讲秘密工作不讲公开工作也是不对的。我们要培养一批秘密工作的干部，建立秘密机关。但要秘密，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社会中，这样才能达到秘密的目的。秘密工作不仅是消极的建立机关、缩小组织等，而且要积极进行群众工作，打到合法的组织中去。遵守秘密工作条例不仅是组织纪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对于面目不清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随便相信。

三、把党的组织建立在下层政权机关，武装组织，小学校，合作社，国民党下层的党部。要参加到国民党的管、教、养、卫组织中去。要建立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党的组织要完全秘密，但要在政权、武装中进行公开工作，有计划的发展我们的工作。要布置支点与工作网。要告诉我们的同志去注意进行政权中的工作。

四、培养与适当的布置基本的干部，适当的分布党的老干部。同时要加紧培养新干部，加强新老干部中的团结。

对于国民党区域内党的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希望各同志发表具体意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秦邦宪。

〔2〕指蒋介石。

〔3〕即毛泽东。

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王 稼 祥

巩固党的工作问题

一、两年来党有大的发展，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发展的。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大的弱点，一般地说是不巩固的。

许多社会上层分子实际上是同情者，下层许多普通农民，都加入了党，这是一个大问题。

二、必须在思想上巩固党。

(一) 关于三民主义问题。过去虽有指示，今天有新的问题。

1.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但是并不是共产党的思想和信仰。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2. 三民主义作为在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革命中的共同纲领，有其一致性，也有其不一致性。如民族主义是亚细亚主义，我们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民权主义，相同的是在民主革命中要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政治，其异点便是说老百姓是“阿斗”，在民主革命中有其局限性。在民生问

* 这是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题上，相同的是要改善民生，但他们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是改良主义的。

3.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等的三民主义其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叶青、戴季陶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情马列主义，同情工农群众，同情苏联，是主观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但资产阶级化了的三民主义则全相反。

4. 因此，三民主义不是我们的信仰和思想体系。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又不是我们的。

5. 我们的工作：

在党内外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区别。大革命时，我们拥护三民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便大骂其为杀民主义。我们要把三民主义放在适当的位置。

反对叶青等人的资产阶级化了的三民主义，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他们对立起来。我们要帮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思想上帮助他们。我们也反对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混同起来。有的同志用意虽好，但结果对内对外都不好，对内影响思想的混同，对外认为三民主义没有位置。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要只求其同不求其异，或者相反，都是不好的。反对利用三民主义、不认为三民主义是目前共同纲领的错误观点。反对资产阶级化了的三民主义，反对叶青等人企图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主义。我们要宣传马列主义，反对各种错误观点。

(二) 关于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问题。

抗大学生测验时，许多人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

我们要在各学校中进行教育。三五八旅有一学生说，发生磨擦时国民党、共产党都不好；有一老战士却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他说是国民党要来磨擦的。

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问题

在半殖民地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民族统一战线，但组织路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在党的建设上，要解释一个原则问题，即党员与同情者的区别。华北有些地方还不知道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相配合，同时又要区别开来，通俗的说，便是党外要多兵，党内要精兵。

中国要建立一个大而精的党。联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七百人中有一个党员。现在我国八百人中有一个党员，现在我们党以全国来说五十万党员不算多，而个别区域（如晋东南等）党员数量大得多。

巩固工作的具体问题

一、改变用突击的方式发展组织。只能用个别吸收的方式发展，不能用突击的方式发展。许多同志没有了解党与民众组织的区别。

二、对知识分子问题。中国党需要一批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比农民还好，要培养他们成为党的骨干。现在华北有些地方允许商人入党，而怕知识分子入党。许多抗日的同情者也加入了党。知识分子中贫苦的知识分子是好的，八路军干部中贫苦知识分子占多数。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入党后须进行下列教育：（1）教育其有阶级立场，清洗其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立场。（2）教育他们有组织性与纪律性，反对他们的散漫性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纠正他们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3）教育青年学生党员要重视民众中的实际工作，纠正他们轻视下层工作的倾向。（4）教育

他们尊重工农，反对轻视工农的倾向。

关于同情者问题

一、什么是同情者？第一种，同情马列主义，但不能过组织生活者；第二种，一般的抗日同情者，即政策的同情者。

二、怎样争取与建立同情者中的工作。

1. 建立同情者工作的传统。中国党没有这个习惯，不能容纳非党的同情者。实际上有许多人当同情者比当党员更好些。我党没有建立同情者，只有党内跑进许多同情者。没有建立党外的同情者，便发生异己的感觉。

2. 对同情者的组织与联系的方式，要研究。

3. 党内同情者问题。现在党内实际上有许多同情者，应怎样办？我想农民中的同情者易于办理。对知识分子的同情者，一方面加紧教育，使之变为一个真正的党员；另一方面提出有脱党的自由，允许他脱离。现在有个别同情者想脱党但又不敢脱党。

关于友军中党的问题

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1. 不要使自己孤立，而要孤立投降的反共分子。

2. 党的实际利益要真正的获得，而不是临时的靠不住的。

3. 使党在全国建立真正的信仰。

二、现在友军中与我关系好的便多发展，关系坏的便不发展。

1. 一般地不发展党，而建立同情者。在友军中要活动，

这是同情者的活动，在军官中大大的活动，但不是发展党员，因为这有破坏的危险。

2. 对坏的、真正汉奸部队，要瓦解他们。对张荫梧等曲线抗日的理论，必须反对。

3. 中国统一战线先从地方军队开始。在地方军中一般不发展党为好，傅作义部队中公开了党员，被驱逐了。现在已经发展组织的，要具体的解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建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的基础。但正因为为在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这些办法都是错误的。这些现象都是党的严重弱点。同时，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是存在与发展着，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是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为此，中央政治局特有以下决定：

^{*} 这个决定是王稼祥起草的，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

（一）估计到党的组织的现状与目前环境，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只有在某些个别地方与某些个别部门根据环境与上级指示有必要时才许可进行一些发展工作，但仍须注意发展党的已有经验，进行个别的慎重的经过审查的征收新党员，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尤其在我后方地区更应注意，一切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一律停止发展，进行巩固工作。

（二）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但是这种审查，不应当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而应当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这种审查工作，必须自上而下的进行。应由各局各区党委各省委首先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党的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与忠实可靠的干部手中。对于那些实际上是同情者，但已经加入党的分子，则劝告他们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变成党外同情者。再则党的一切工作，必须深入下层党员群众。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加以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

（三）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

（四）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中央特别指出：团结新老干部，提拔和教育新干部，建

立新老干部间和协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于巩固党有一等重要的意义。老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去教育新干部，去领导与巩固新干部。新干部必须虚心的向老干部学习，重视实际经验，接近工农群众，锻炼自己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任何新老干部间的相互对立、轻视或歧视，都是有害的，应该加以纠正。对于使干部实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必须有专门的计划和经常的进行，以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准与工作能力。

（五）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同时各级党部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保卫工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成立专门部门训练保卫工作的干部。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对于反奸细斗争的麻木不仁的忽视态度和宽大为怀的姑息观念，以及可能发生的张皇失措现象，都是极端有害的，应该迅速的加以纠正。

（六）为着巩固党，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联系。一方面党的公开机关与秘密组织，必须严格的划分和清楚的分，公开党员和秘密党员必须明白的分，而不应由公开党员兼任党的秘密工作；他方面秘密党员必须有很好的群众联系与合法地位，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各种规则必须严格的遵守，任何自由行动与疏忽懈怠都是有害的，应该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七）为着巩固党，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尽一切的努力来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

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所准备来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关于国际新形势 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毛 泽 东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

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

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问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

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朱德、彭德怀关于注意开荒生产 给刘伯承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刘、蔡、黄、田、陈、许^{〔1〕}：

甲、晋东南受旱灾、水灾、敌人摧残，秋收大减少。且冀中、冀南又大水灾，五台山边区水灾亦不少。陕北受顽固分子封锁，抗大、陕公均须移迁来此，来年春夏粮食必成大问题。

乙、在不妨害战斗情况下，注意开荒，种冬麦，尤其非战斗部队。

丙、榆社到武乡之滩河，如以人工塞堤导水，能垦荒数万亩之优良土地，查早麦须在白露以前下种，迟则不生芽。

朱、彭

江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蔡树藩、黄克诚、田守尧、陈赓、许世友。

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 目前时局的意见^{*}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 等

国民参政会成立于抗战周年纪念之日，迄今已逾一年。

当我们接受聘请而加入参政会时，曾经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声明。我们指出“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

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经集会三次，总观国民参政会既往之工作，其最大之成就，就在于今日中国的最迫切的最中心的政治问题上——在坚持民族自卫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及打击各种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解放》第八十六期。

中途妥协的倾向与罪恶活动上——能够真实地反映起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第一次大会宣言中，曾经郑重地宣告：“本会兹特代表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持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之日为止。”第二次大会又一一致决议“拥护蒋^[1]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并号召全国国民“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勿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第三次大会又决议“抗战既定国策必须坚持到底”，号召国民“坚其信心，齐其步伐，一心一德，彻始彻终，以复我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而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除此以外，三次大会对于抗战建国之各种具体问题，参政会同人曾有提案达三百余件，虽容或事有缓急之分，案有精疏之别，但莫不竭其思虑，以期有益于抗战建国。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见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热切希望。

我们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参政会的一年工作中，根据着去年七月五日我们声明之立场，遵循中共中央之“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诚挚的团结精神”的指示，在全国先进人士之指教和督励之下，与参政会同人共同地为着中国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我们确信：今日人民之最高愿望意志和要求，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以及巩固和扩大为达到和保障抗战胜利所必需的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因之，在过去三次参政会中，我们曾再三提出“拥护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幸获全体同人之赞助，通过专案。此外对于抗战有关之各项基

本问题如建军，征兵，发展敌后游击战，实施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等，我们均以专案提供意见。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坚定地遵守着我们的立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而同时对于一切有害抗战及主和投降谬论，我们曾坚决地加以揭露和无情地加以抨击。在一二两次大会中，汪^{〔2〕}逆及其党羽李圣五等的卖国狂论，虽在隐秘的形式之中，就受到了我们及大多数参政员同人的打击和驳斥。一年以来，我们在国民参政会内之工作，虽自愧无多建树，但所敢自信者，乃是我们谨守着明确的团结抗战的原则立场，遵循着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而未尝稍有逾越。

现在政府已明令延长参政员之任期一年，我们愿就参政员地位将我们对目前时局之观感及今后抗战如何争取胜利之方针，向参政会同人及全国人民申述之。

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是敌人经过两年的侵略战争之后，困难日益增长，我们抗战前途日益呈现出胜利的远景。但是另一方面，日寇非但没有改变其亡华灭华的方针，而且更加阴险，更加凶残，更加恶辣地实行它的一贯的灭亡我国的既定方针，更加狡诈地实行着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在军事上，正面停顿着大举进攻而集其全力“扫荡”敌后游击区域，借以一方面麻痹我们抗战的意志，另一方面巩固其在占领区域之根基；在政治上，则努力扶助和利用汪逆，大唱其反蒋反共降日之谬论，加紧进行制造伪党伪府伪军的活动，同时更唆使汪逆余党及其他心怀二志之分子，在抗战营垒内来阴谋挑拨离间进行反蒋反共活动，企图造成迫使中国投降之局势；在经济

上，则实行掠夺榨取倾销开发，以实现以战养战用中国之资源屠杀中国人民之毒计。同时，在抗战营垒之内，又确有一部分人对于时局作不正确之认识：或以为敌寇已和缓灭华政策，或以为用某种国际会议方式即可解决中日问题，于是放弃自力更生之正确信念，不作准备反攻之实际工作，甚至有人居然忽视亡国危险，以为主要精力应用以对内，对反共及破坏国共团结阴谋，尽力策动，对一切进步力量，时加打击，对许多有为青年，横施压迫。煮豆燃萁之痛，阅墙当御侮之时。影响所及，不仅动摇举国同胞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而且降低国际舆论对中华民族之同情。而兵役困难，法币跌价等困难增加，尤使一部分人士发生抗战有心胜敌乏术之感。凡此种种，均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刻与严重。而目前国际形势之发展，对我国抗战环境发生极大之变化。由于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之签订，使防共轴心消散，使日寇在外交上更加孤立，在内政上引起震动，这一点当对我国抗战局面发生有利之影响。同时，因欧洲大战的爆发，使日寇将利用欧洲紧张局势以加紧进行全力灭亡中国的政策，使英国妥协派更加企图在牺牲中国的条件下求得英日等国妥协的可能，这一切对我国抗战局面将增加许多新的困难。因之，目前我国抗战的国内外环境，均是处在一个新的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新的国内外局面之下，全中国人民的当前严重任务，就是明确认清新的国内外情势之各种特点及其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同时，努力争取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每一有利于我的事变和因素，以增强我国的外援，以便克服一切危险，冲破一切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

为克服目前的困难与危险，为认真准备我国反攻的力量，

我们认为目前应从下列各方面努力：

甲 在政治方面

一、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阵营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

二、加强战时政府，统一军政领导，容纳各党各派人才，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

三、实行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

四、认真惩撤贪官污吏，实行地方自治；

五、成立各地方劳资与佃主纠纷仲裁机关，使贫苦工农生活得到相当改善，以增加民众抗战热忱和便利兵役动员。

乙 在军事方面

一、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要作到变敌后为前线，积小胜成大胜。为此必须：

（一）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原则及当地特殊情况，规定和实行游击根据地的施政纲领；

（二）将游击根据地的军政权统一于该地区抗战勋劳卓著经验丰富之主力部队指挥之下；

（三）由中央政府经常给游击根据地抗战部队以必要的武装补充和必需的经济帮助；

（四）派有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决心与能力且具备坚强政治工作与良好纪律的部队到敌后去扩展游击战争；

（五）一切派往敌后之人员部队，均能以团结胜敌为重，均能忠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去制造内部磨擦以害

已助敌；

(六) 派往敌后之人员部队，能实行民主政策，建立真正人民自己选举而由上级政府批准之抗战政权；同时实行改善民生政策，以团结广大人民借以摧毁伪政权，瓦解伪军，使我之人力物力不为敌用而为我用。

二、培养新的国防军——为的坚持抗战，特别是为的准备在有利形势下，真能实行反攻以驱逐敌寇出境，必须培养新的国防军，作为将来反攻的中坚。为此必须：

(一) 从前线选拔有历史有战功的部队××师，不分党派畛域，作为建军基础；

(二) 规定国防师的统一的编制；

(三) 国防师的干部应依照各该挑选部队的原有系统，给以近代化的军事训练与坚强的政治教育，同时并使之仍保存各该部队的优良传统；

(四) 国防师的一切装备待遇和补给应一律平等，而较普通部队为高；

(五) 国防师之训练，有一定的时期和一定计划，由有战功有能力之大员担任，分区实行，集团训练；

(六) 建立国防工业，加紧对外购置，期于两年内完成××个国防师的现代化装备。

丙 在经济方面

要破坏敌之建设和开发而实现我之生产和节约。为此必须：

一、破坏敌在占领区域之经济建设和物质开发，发动民众彻底抵制仇货，禁止可资敌用的土产资敌，如某些特殊军需品，必须利用仇货者由国家统制购置；

二、由国家资助并奖励私人投资以扩大工农业合作运动，广泛地发展各种实用工业，尽力提高农业生产；

三、励行军政机关和私人节约运动。

丁 在财政方面

坚决改变以前的作风，彻底实行战时财政政策。为此必须：

一、法币的发行与资本的流通必须有适当的配合，使之避免法币在沿海与内地价格不平衡的现象；

二、严格彻底统制外汇并由国民参政会成立外汇委员会按期审查财政部对于外汇批准与使用是否适当，以杜绝一切舞弊营私；

三、严格检查和禁止私人操纵金融，捣乱法币，特别是居官者之营利图私投机操纵，犯者重惩；

四、在战区，尤其是沦陷区的省份允其发行一定额数的地方纸币和流通券；

五、国家的金公债，必须在海外侨胞国内银行界中广为劝募，并给以确实基金的保障，与国内投资的便利；

六、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依照各地的环境可能分别实行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之累进率，并渐改良田赋，豁免苛杂；

七、汉奸的财产必须严格实行没收，逃亡到敌区的地主，国家应代其征收较原来为少之钱粮，暂作国家的直接收入；

八、国家预算，由中央到地方均应重新规定，与抗战有关者应按需要增加，与抗战无关者，应尽量减少，可省者应削除；

九、国家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吏之待遇，应一律减低，

并须低于同级军官的待遇，取消特费与兼薪，废除公家借款或购置中的回扣。

戊 在外交方面

要尽量孤立日寇和努力增强外援。为此必须：

一、认真联合一切援助和同情我国抗战之人民和政府，力求其对我增加物质上和精神上之援助；

二、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牺牲中国以与日寇妥协的阴谋，坚持外交独立自主之方针；

三、协助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及各界群众团体派遣各种代表团赴各国进行广大国民外交活动，以增强民主及和平力量对我之援助。

己 在党派合作方面

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实为实施上述各项办法，克服时局危险，战胜日寇汪逆的基本保证。为此必须：

一、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二、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严禁因所谓党籍及思想问题而妨害到工、农、军、学、商各界人民及青年之职业及人格之保障，以便造成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现象；

三、在抗战各种工作中，广泛地容纳各党派人才参加，不以党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才。

当此寇深祸急，世界风云急剧演变之时，坚持抗战到底，

巩固国内团结，力求全国进步，以便切实增加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作为人民代表和人民使者的国民参政员的我们，谨于四次大会之前，作此共同之声明，希望全国人民及参政员同人能给予指教鼓励督促和批评，同时作为同人等在会内外与全国同胞共同奋斗的方向。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3〕}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九月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指汪精卫。

〔3〕即林伯渠。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

毛 泽 东

一 战争的新阶段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早已开始了，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它首先占领东三省，然后又于一九三七年大规模侵略中国。意大利帝国主义则于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亚。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联合侵略西班牙。一九三八年德国占领奥捷两国。在这一时期中，东方与西方，共有五万万以上人口卷入了战争，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却没有参加。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阶段。而从现在开始，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则称之为第二阶段，因为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过去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他还没有世界规模，那末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

二 战争的原因

根据历史事实与列宁的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演的提纲，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新中华报》。

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二十年工夫，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又爆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又来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战争。这个新的战争的开始阶段，他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上一次全世界经济危机之上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接着的不是繁荣而是特种的萧条。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赃过少的国家，如像日本与意大利，或者认为自己在上次战争中是损失了赃物的国家，如像德国，就全副武装跑上了战争的舞台，企图用战争来脱离经济危机，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爆发，并形成了他的第一阶段。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德英法波等国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将直接间接地卷入战争，这是建立于新的经济危机之上的。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新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几年来是浸淫于英法美这些所谓“和平”国家之内的，并且正向德日意发展。在经济危机之上，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人民不满意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不论在早已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或现正借手于战争以实行法西斯化的国家，这种政治危机，这种人民不满，都日益尖锐化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又强大到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势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认为除了扩大战争，除了把片面性的战争扩大为全面性的战争，除了打坏他们的帝国主义朋友，不能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不能避免自己的死亡。

所有这一切，就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他临死前夜的打算。至于这种打算——用重分世界的战争来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避免自己死亡的打算，是一定要造成更大的

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一定要加速自己死亡的日子，他们就不能设想了。他们像疯狗一样，已经疯了，被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弄得完全疯了，他们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壁墙，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

三 战争的目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目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为了争夺对世界人民的统治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这种目的，过去阶段与现在阶段，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种目的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呢？还有什么善良的目的没有呢？一点也没有。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希特勒的“民族自决”，张伯伦的“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的“援助波兰”，其实都是“掠夺”二字。不过为了说得好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罢了。

四 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一切战争分为两类，照斯大林同志的说法，战争分为：（一）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二）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是属于第二类性质的战争。因为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丝毫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丝毫不利于其本国与他国的人民。这就是战争的掠夺性，非正义性与帝国主义性。现在战争的双方，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都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滑稽，一种欺骗。只有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这一次，许多人又弄糊涂了，他们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波兰则是民族自卫战争，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这种糊涂，是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的目的而来的，也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不同特点而来。

五 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于：（一）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说来，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举行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侵犯各弱小民族的利益，侵犯各民主国的利益，并在各民主国内部，策动法西斯威胁。于是全世界人民都有反对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

侵略战争，并允许人民保存一点仅剩的民主。苏联则屡次提议愿意与各个所谓民主国家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如果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在当时出来干涉侵略者，如果在当时发生了干涉侵略者的战争，例如能与苏联一道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制止德意的侵略，援助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那末这种行动，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就有进步性。可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却并不出来干涉，他们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他们的目的，在于使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双方都在战争中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来干涉，借收渔人之利。至于英法把奥捷两国奉送给德国，这是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说，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的。英法美想使苏德两国冲突起来，借刀杀人，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就好独霸世界。由于他们的这种“不干涉”政策，在战争中，就表现为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打仗，而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却“坐山观虎斗”，表现为战争的片面性，不普遍性，不干涉性。民主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的“不干涉”政策，没有能够被人民力量的逼迫而废除掉，因而出现了这种片面性，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第一个特点。（二）但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德意日帝国主义举行了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所谓民主国家却纵容这种战争这一种情况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还有民族解放战争，这就是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争，西班牙共和国的抗德意战争，与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而全世界人民与社会主义的苏联都真诚地援助了这种战争。这后一种战争，乃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存在——这就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两个特点。

六 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革命政策，毫无疑问的，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组织各民主国家内人民群众高涨着的反法西斯斗争，以保卫民主；同时还不放弃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之间制止侵略进一步发展的斗争。在这最后的一点上，在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间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这一点上，就是在慕尼黑之后，由于西班牙失败与捷克灭亡所引起的在英法两国内部广大人民中甚至资产阶级左派分子中的愤怒情绪，还有逼迫张伯伦、达拉第政府放弃不干涉政策而与苏联缔结反侵略统一战线之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总之，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因此，在当时这个统一战线，有下列四个可能的组成部分：甲、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人民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是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丙、社会主义的苏联；丁、各个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这第四个组成部分，在当时之所以还有可能性，是因为这些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所谓民主政府，同他们本国人民之间，同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间，同苏联之间，在各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之下，在各国内部法西斯势力威胁之下，以及存在着的反苏危险之下，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这些成分中主要的力量是苏联，如果苏联同各个所谓民主国政府能够组成真正有效的统一战线，配合着各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制止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延缓大战爆发的日子的；如果发生战争，是能够战胜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而如果这样做，那是真正有利于世界人民，有益于侵略者以外的世界各国，而为国际无产阶级所赞助的。因此，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缔结了苏法苏捷两个互助条约，最后还进行了英法苏三国的谈判，这种革命政策，是适合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是必要的，是正确的，是只能这样做而不能有其他做法的。

七 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

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面怕法西斯国家侵害他们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们怕苏联，怕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而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单独进行了掠夺的强盗战争。

英法苏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

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法在与苏联谈判中的毫无诚意，毫无真正制止侵略的诚意，决心破裂三国谈判，不是证明别的，只是证明张伯伦已经决心作战了。所以大战的爆发，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而且是张伯伦要打的，因为如果真要避免战争，就一定要苏联参加才行。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懂得的。可是一些傻子却至今不懂得，还以为张伯伦的作战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不懂得张伯伦之所以参加三国谈判，仅仅是为着便于动员舆论，便于向民众说：我们英法政府是仁至义尽了，三国联合既不成功，就只好向德国开火了。

在这种情形下，九月初旬，德国与英法波三国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第二阶段。

八 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

在现时，在大战爆发之后，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了，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在现时，按照性质来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现在应从新的情况作新的划分，抛弃过去的那种划分法，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地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举行掠夺战争了。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而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现在是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成分之由动摇而最后转到敌人营垒，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两个营垒中的一个营垒，乃是一大变化。因而新的统一战线之可能的组织成分，就由四个变为三个了。这种变化，第一，就使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由片面变为全面（由反动的片面变为反动的全面）；第二，就使新的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之组织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纯——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两个特点。

许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变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阶段，拿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事变，遗弃了新事变中所包藏的性质上的变化，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完全错误的境地，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境地。我希望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很快地改变过来，我也相信，只要一经提醒，就能改变过来。

九 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应该怎样呢？

我以为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甲、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穿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管是战争的甲方或乙方，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个强盗

魁首，唤醒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强盗的当，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

在各个交战国内，如果有共产党议员的地方，都要对于战争预算投反对票，如像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同志在德国议会中所做的英勇坚决的斗争那样，而决不应该投票拥护战争，决不应该使自己的面目同社会民主党混同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内的社会民主党，正在踏袭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的覆辙，在所谓“保卫祖国”（资产阶级强盗集团的祖国）的口号之下，无耻地拥护战争。日本社会民主党，即所谓社会大众党，早已叛卖了无产阶级，拥护了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英法社会民主党，现在又正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叛卖英法无产阶级，拥护英法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波兰社会民主党则拥护被张伯伦收买的走狗——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叛卖波兰的民族利益。在波兰，毫无疑问，是应当动员全民并联合苏联抵抗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保卫波兰与解放波兰民族而战。但是波兰法西斯政府则压制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拒绝了苏联的援助，甘愿带领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把波兰变成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问题，我们同情波兰人民，但我们绝不同情波兰反动政府，波兰社会民主党拥护这样的政府，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不论在德日意，不论在英法波，凡属交战国内的共产党，只有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叛卖性，才能争取群众，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准备用革命战争打倒反革命战争。

乙、在各中立国内，如像在美国，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名义上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并图在战争中大发其洋财的那种政策。

美国帝国主义在两年的中日战争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之下，已经发了一笔洋财，现在他又想在新的战争中大发其洋财。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谈话中，还以为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至于在国内放弃民主政治，与平时的经济生活，哪知它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宣布了所谓“局部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它已经在步英法的后尘，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化与战争化了。共产党必须反对这种实际上援助帝国主义战争的假中立，反对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反对这些国家卷入战争，使战争区域不至无限制的扩大。

丙、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如在中国），或者反对宗主国（如在印度），用以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要反对这些国内的民族叛徒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才能发展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在各交战国的殖民地内，必须反对民族叛徒们拥护宗主国战争的叛卖行为，反对动员殖民地人民参加宗主国的战线，要把参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痛苦经验告诉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如果不反对民族叛徒，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希望的。

十 战争的前途

这次战争是持久的战争。我很赞同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说：“现代战争，将来一定是持久的，绵延不绝的，消耗战争。”他又说：“无疑的，在必不可避免的总的军事冲突中，要来一个破天荒的与你死我活的关头”。他的估计是很对的。这种持久性，是包括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包括反革命战争与革命战

争，包括战争的继续与暂时的局部的停顿，包括参战阵线的改组变化，参战国家的灭亡与新建种种情况在内的，这样种种错综复杂曲折变化的情况，就组成了战争的持久性。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灾难，死亡、疾病、饥饿、失业、失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种悲惨现象将充满于全世界。在这种情形之下，毫无疑问的，将激起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压迫人民，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其规模将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要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除俄国外，各国都没有共产党。现在已经不同了，共产党已经在几十个国家内分布着，并且在政治上组织上强健起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不同了，苏联不但存在，而且成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坚决援助人民解放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将在这个战争中起其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现在世界上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一切直接或间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派，组成反动营垒，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大反动派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将来会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革命。如果以为他们会永远打下去，很容易地就被革命人民推翻，那是幼稚的见解。这是一方面——世界反动战线方面。另一方面，则有苏联，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这些，组成革命的战线，革命的营垒，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放出来。这是一

个伟大的斗争过程，艰难的持久作战的过程，教育人民，唤醒人民，组织人民，并领导人民向资产阶级战斗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地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是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进行了两年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是属于世界革命营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有力的组成部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定会在世界改造过程中起其伟大的作用。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世界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但是苏联的存在与发展，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中国的好朋友，都是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援助者。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这是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削弱，在这一点上说来，对于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对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苏联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这样说来，世界的黑暗是暂时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一定会死灭下去，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们的敌人也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论游击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陈 毅

(一)

同志们，现在来谈游击战争问题，我只想从历史的叙述帮助同志们能进一步了解抗日游击运动，以便加强其领导。因此，不是一般来谈游击战争。为尔后说明方便起见，我首先把几个军事用语作一番解释。

游击运动，是指从开始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直至巨大发展的斗争过程，包括广大人民的参加，包括斗争涉及到军事政治诸方面而言。

游击战争，是指一种革命和反抗的武装斗争方式，特别是农村中广大群众在反抗暴虐压迫时所通常采用的方式，可称之为农村斗争的最高方式。

游击战术，则仅仅规定关于军事斗争的部分，关于斗争的动作部分。

游击动作，则更是单个的来说明如何使用武器而着重于技术方面。

游击根据地，应该包括若干游击基点，实际是会集若干游

^{*} 这是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节录。全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抗敌》第一卷第五号。

击基点始能成为游击根据地。所谓根据地，是指该地敌人难于侵犯，已经大部或者全部结束了流动性，处于比较稳固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后方地区。

游击基点，仅是一种依托，作为游击队进攻时之跳板。

游击区域，是指该地敌我势力并存，你来我往，常不相下，完全处在敌我争夺的局面，而且常常是敌人力量大而我们力量小。假如我们力量大敌人力量小，则已经可成为收复区域或者根据地，那就不成其为游击区了！

同志们，我为什么用迂儒式的讲解来打搅你们，麻烦你们，实在因为许多刊物上关于游击战争的解释误会太多。在我们使用名词时不能不审慎，因为一个名词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这是我们做学问讲战术的人首先应该遵照的条件。

(二)

承认上面解释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说明：第一，游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游击是“来路货”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在远古时代已为被压迫群众所发明、所创造，更是屡屡采用。我们设想，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广大农民受着剥削压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自己劣势武器集合成为无组织的军队，所谓乌合之众来与压迫者搏战，这种战争要避免敌人的聚歼，必然采用流动滋扰的各种办法，而且逐渐使自己进步，走入正规。这说明游击运动一般产生于农业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人民有了更好的反抗武器，如罢课、罢市、罢工、武装暴动之类，一般也用不着游击战争，也难以掀起游击运动。明白这一点，则知道游击战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

下才能产生，其作用也受着限制，这可以纠正许多人中间那种游击万能以及诅咒游击的观点。第二，既然游击战争，其战术，其动作，其技能，其政治性质等，都受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制，则领导游击战争的人，他就要善于运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自己能抓住的各种条件来组织游击进行斗争。凡在农村的斗争环境，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大，则愈容易进行游击战争以至提高到游击运动。因此，游击运动常常是由极简单粗疏而日益走向最高的发展阶段，凡不积极去发展和扩大的，凡不积极去纠正自己的弱点、从斗争中补救自己的弱点的，必然走向失败。游击战争要求不断发展，要求走向主力，凡停顿、保守的等于自杀。第三，游击战争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离开了政治领导和动员，决然不能发动和扩大游击战争。所谓命令游击、强迫游击是决然不可能的事，煽动游击是可能的，但一定在群众愿意条件之下。他们能决然武装走向战场，没有这一政治基础，任何巧妙手腕都是无用的。第四，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诸先烈也常常采用游击手段对付清皇朝，当时统治者以“乱党”、“匪党”的名目加诸同盟会身上。这一段回忆谅必是仍存在我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当时的统治者大骂“乱党捣乱，只知破坏，不知建设”，造谣中伤说“同盟会的领袖是外国人生的，是要把中国奉送给外国人”，这一类滥调不仅说后十年已为我们所熟闻，现在在抗战中的江南，南京、上海的日寇发言人也以“游匪”、“共匪”、“游击队就是土匪”、“蒋^[1]、共投降苏俄”等称号加诸我们及一切抗日军队的头上。实际游击战争规律是在对统治者进行反抗滋扰，必然使用可以削弱对方的一切手段。这种行为，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纪律，当然与土匪行为决然不同，但统治者常抹杀此点而进行造谣中伤。另

一面更有趣的我军捉的日本俘虏，也公然义愤似地抗议说：“中日交战要堂堂正正，不应该用这种无耻的游击偷窃办法”。再有就是当去年广州陷落之际，日寇华南总司令某也致电蒋委员长，要求两军会战。他责备中国军队在不利情况下的战略的自主退却。这又说明统治者与游击者的斗争方式根本对立的倾向……。总之凡统治者和两军的强方，他们总想把弱者或对方聚而歼之，总喜欢用硬战强攻，总讨厌这种游击的办法，所以轻蔑他、诅咒他，加以“匪、匪、匪”等恶名。但是被压迫的人，力量较弱的人，总是舍不得这个避实击虚的游击办法：一面可以保存自己，一面可以逐渐来增强自己。这已经是说出了全部的秘密。历史本是前进的，本不会兜圈子的，但是五十年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中，恰恰有类似的重复事件，从统御术与革命术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找得出许多滥调的无数次的重复，虽然他们内容和实质不能尽同，这应该是最开心的事体。第五，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一年在桂林，对滇粤桂军讲演游勇战术，一般已指出游战的特点，他更主张革命军的补充与接济应该取诸前方，不应专靠后方，这点更是远见卓识，令人崇敬。孙先生这一段指示，特已印发，大家可以细看。我们回想本军的历史，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全部都经过游击战争的阶段，所以我们具备了游击的专长。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结论实与孙先生的指示暗合。我们不应该抱残守缺，我们应该继续不断来发扬自己的特长，创造更新的东西。

(三)

中国的游击运动以近十年来最为丰富，尤以现在的抗日游击运动，如果发展下去更是集今古中外之伟观。现在有把内战

游击运动与外战游击运动看成一个东西的人，比如同志中那种观点“我是老游击，现在游击不算什么，自有办法”。也有把两个东西看成毫无关联的人，譬如某些人士说“现在才是真游击，以前是土匪，不是游击”。不消说都是错误的。照我的意见，我先从我军在历史上所遭遇游击时代说起。我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井冈时期为中心，运动的特点是处于暴动的初期，其环境是零星的不联系的游击地区，游击方面力量弱小，进攻方面自然也说不到大动兵马，这是在空隙中生长起来，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显然当时的游击运动没有遇着像以后那样的大的遮栏，比较可以作自由的发展，所以进退集散能够灵活布置便可臻上乘了。此时期最容易发生盲动主义。但是游击运动发展到第二时期，强大的进攻军摆在面前，宽广的根据地的正面需要防守，于是提出建立主力的问题。显然，在江西苏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如果不集中各游击队建立主力兵团，决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游击运动发展到主力时期，游击战争就退居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一切服从主力”、“配合主力作战”，这是最可代表其精神的两大标语。这种时候其战术的战斗的诸方式采用远殖队、挺进队、破坏队诸办法，从以不脱离主力的指挥，求得与主力的战役及会战的配合为中心。这种场合容易发生一切依靠主力以及对游击战争的取消主义。这种教训想来大家还记得起吧！第三个时期，到了江西突围留在南方各省边区的游击部队，这个时候游击运动采取了新的形式，斗争环境是空前的艰苦，而没有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只有一个坚持阵地保持基干力量的任务。进攻者与我们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同时又当着—个大的根据地放弃之后，由大的斗争转到小的斗

争，由大的进攻转到小的退守。革命往前发展指导运动是比较容易的，但在革命挫折之际以及转变关头，要保持力量收容部队，则是十分困难的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方面的艰苦远超过于以前两个时期，因此其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上的创获更超出前两个时期。扼要的总结说来，他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局转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自己保存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亭子间的、搭棚子的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一起来灵活使用，所以能在大的“清剿”和严重进攻的局面下坚持到底。这里就做出实例，不仅崇山峻岭可以发展游击，就是平原地、丘陵地、沿海地带一样可以进行游击。游击战争应依靠群众作基础，游击战术应更多带群众性质，这个真理便全部被发现了！在中国社会的环境内，如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然而此时期最容易在转变关头发生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同时在尔后坚持中，由游击主义蜕化为土匪主义。第四个时期，就是当前的抗日游击运动，卢沟桥的炮声征调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走上战场。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决斗，犬牙相错的战争局面，梅花形的相持阵容，敌“扫荡”我反“扫荡”，敌包围我反包围，敌大踏步前进与我大踏步后退，敌由疯狂进攻逐渐趋于坚强防守以及最后的引退，我由国境的大规模退兵，逐渐转为艰苦相持以及最后的反攻驱逐敌人到国境以外，这样战争的伟观，必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切战争的方式，从现代的机械化兵团的战法，到原始的人民的最野蛮的战法都可以，而且已经搬演于中日战场上，游击运动以及游击战争的办法，便担任着攻击敌后方的重大任务。就全国范围说，他是担任着

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就他本身所在地区说，他又是独立坚持作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就其力量的来源，完全依靠抗日的民众为祖国战争的情绪；就其动员的深广和地区广阔包括了一切中国人的各阶层，战线在万里以外，远非内战时期能够比拟。另外，敌人是现代强大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从农村的粗劣武器使用起。战术的特点，在军事上是抓住敌人弱点避免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和补足自己的弱点，凡机械的以现代战争的条文来对付日寇的，决然要遭受失败。在政治上更是使游击运动担负着恢复政权、保护政权、组织民众、训导民众的艰巨任务。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然不能胜任于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在内战中的经验，也就不够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这新的斗争任务提出了如何去创造新的斗争办法，老游击解决不了新问题，他的悲哀正在这个地方。在此种时候，因为在主力受挫之后，容易过分扩大游击战争的作用；同时又因为四处分散，无坚强领导，容易产生土匪主义及消极保守的行为！

同志们，我这一大段话有什么意思？我是说战争的规律是变动的，历史的规律是发展的。我把十年来的游击运动分成四个时期，就是要我们能把握着变动的规律、发展的规律来作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知道有所去取，才能知道发扬光大，才能指导运动，了解其过去，把握其现在，适应其将来。本军的干部在两年来抗战中多所成就，但也有所损失，关节恐怕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一基点是难以说明的！

（四）

现在再费一点时间来说在江南的抗日游击运动，作为对上

文更进一步的说明。江南的敌寇推誉本军说“共产军的战术为十年来百战磨练的战术”。这种说法是含着痛苦、受过教训而说出来的。我又研究一个日军文件，他归纳中国游击战术为下列课程：

甲、旋磨战术，指善于回旋，打圈子往来自如而言。

乙、隐伏战术，指善于暴露目标，消灭目标而言。

丙、穿插战术，指善于在据点内远去挺进通过封锁线而言。

丁、偷袭战术，指善于偷营劫寨突然袭击而言。

戊、破坏战术，指破坏交通桥梁诸事项。

日寇归纳上面五种战术又提出了他的对策如下：

甲、以遮拦战术对付我之旋磨战术。就是着重加强封锁，补填空隙，以棋盘格式紧缩游区，压迫我军远行高飞。

乙、以“清乡”政策对付我之隐伏战术。就是着重在遮断人民与军队的联合，造成我军的孤立。日寇在这方面以威吓利诱加紧欺骗着手，是以政治手段达到其军事“扫荡”的目的。

丙、以封锁战术阻止我之穿插战术。日寇利用我国内战经验，在铁道、公路上加强点线的守备，缩短点线上的据点间的距离，以强力的巡查队日夜定期巡查和不断的预期埋伏，阻止我军的灵活转移。封锁战术与遮拦战术之不同，即前者是缩短点线上的距离，后者是填补交通网内的空隙。

丁、以堡垒战术应付我之偷袭战术。着重加强守备，加强据点的防御，采取炮楼碉堡政策，更使防守趋于地下层，“把战争装在柜子里”，趋于避免火攻并配置毒气。

戊、以平毁政策对付我之破坏战术。敌寇对付我军之破坏战术已感困难，尤其对付人民之破坏战术是更加困难，因为沿

交通线居民家门前的破坏真是防不胜防，日寇只能以烧屋、杀人、决堤作为对策，日寇在战而难胜的情势下，专向和平居民泄愤，这本是日寇的专长，我军非有充分的人民工作不能打破其万恶的企图！

上面所罗列的已可一般说明敌我之江南战术之变换和争夺，此地更可指出下列诸点：第一，日寇苦心孤诣所计划的下乡“扫荡”均告无效，不能驱逐我军，同时据点封锁政策依旧留我军以活动余地。可以指出敌寇今后一方面要更着重坚强防守，求得攻不能破；一面必然集中更大兵力进行集团“扫荡”，一般小部队下乡“扫荡”必然会减少。这说明江南战场必然趋于战斗次数减少，战斗范围扩大的前途，这不是战事的沉寂而正是战争的发展。第二，我们中国军队及游击部队一定要使自己有远见地适应这种发展的情况。我们过去在句容城、在新丰站、在太平山、在延陵、在四摆渡、在魏村、在仓头、在白兔等地，固然予日寇据点以彻底摧毁，扫除其梅花桩的政策，我们过去在珥陵、在东湾、在武进丹阳之交、在句容北方、在上下会战斗，打破了日寇之下乡的分进合击，这些战绩使日寇日益改变其战略战术，我们就应该同样的改进自己吧！要能够攻破更强固的据点，必然学习更高的攻击技术；要能够打破敌之大举“扫荡”，必须学会更高的运动战术；要能继续破坏，必须更深入动员民众，有自己的高超的工兵队；同时化学防御也不能不讲究。这中间对于干部的指挥艺术必须提高。过去是小部队行军、宿营与作战，现在应研究集团使用部队才行了；过去仅仅以口令指挥就可以抓住全部，现在提出组织战斗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参谋工作，没有良好通信交通侦查工作，没有良好而有力的政治工作，决计不能开展战局。第三，抗日就是打日本，就是讲打、讲拼，打得过、拼得过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指战员要求有臂力、有强壮的体魄，能够肉搏，

能够纠缠，拳打脚踢，能够使用长枪大戟来压倒武士道，同时又要讲究智谋，讲究战术，讲究指挥，一个人勇敢不如领导大家一齐勇敢。俄国早期有一个革命家说：“提高群众一寸比自己一个人上高楼要强”。这是政治的名言，用在军事斗争上一点也不错啊！我们的干部不少是“猛张飞”，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这是再不应容忍的现象。在部队的编制上，要力求切实精练，反对头重脚轻，反对非战斗员多于战斗员的现象！能战者留队，不能战者送其归家。许多文人学士应该要他们学习拿武器，真正来参加有血有肉的战争。第四，居民起义，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敌人进行的是反革命战争，他没有使用这种斗争武器的政治基础。我们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合乎正义，合乎人道，为了和平，为了自由，所以我们具备了使用这种瓦解敌军的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有人怀疑能够把敌人力量掉转过去对付敌人，我们应该决然相信，这是能够的；我们可以做出许多实例来看。第五，旧的战术只估计军力而忽视民力，新的战术不仅使用军力而且善于把民力加在军力上面以打倒敌人。敌人处在江南的人山人海，他屡屡企图吸收我们的人民到他们方面，我们不仅防止其阴谋的实现，而且应该从积极方面调动民力参加作战来回答他。第六，日寇在江南已构成坚固的战略后方，我们应该在京沪路两侧造成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来同他对立。一年来我们在江南所建立的若干游击基点，目前已逐渐形成根据地的雏形。我以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应包括下面四大条件：（一）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二）强有力的指挥战斗。（三）比较广泛的人民组织，人民中有相当的斗争经验。（四）能便于利用相当的地势（不一定是崇山峻岭，就是茂林修竹和湖泊河湾亦可以）。现在的江南尚没有完全具备上面的条件，我们仍须极大努力，这不仅是本军的任务，也是参加江南抗日的所有党政军民的任务，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来担负这个

任务，本军的同志应该随时记清自己在这个任务下应如何努力啊！

（五）

最后，我还要就战略来说几句。游击兵团的战略，凡处于进攻、经常保持进攻状态、经常保持主动的靡不胜，反过来说，凡专力防守、处处陷于被动的靡不败。因为，大兵团的战略，因敌我条件及我本身主、客观条件，常有决定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守退却的可能。这是变换多端的。但在游击运动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处于敌人侧近，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之下，它只有以灵活的进攻才能支配敌人保持自己。因此，也可以肯定说，游击兵团无所谓战略防御的问题。游击兵团的进攻常常是多股的分散的进攻。要经常保持主动进攻的局面，这就提出进攻的指挥问题。从这一方面可以说，指挥游击队的进攻，比指挥大兵团有他的特殊的困难的一面。因此游击队的进攻，依靠于游击指挥部多给下级部队以独立活动的可能，而下级部队首长应该具备独立作战的特长。各部队就自己单位积极行动，并力向前，便可以造成齐头并进的游击战略的进攻配合。凡是等待上级命令、等待友邻配合、自己消极的人，必然陷于防守、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大胆派遣部队，大胆鼓励所分散部队坚决动作，仔细注意部队的补给，适当计划部队的轮流休整，经常以全局敌情和各部行动结果通报分散之部队，这都是游击兵团战略指导的基本事项。指挥大兵团作战，要常以敌情、任务、友军诸事项具体指示下级，而下级则根据首长决心来定出执行的动作方针，从战斗开始到战斗终结，都是依命令行事而且了如指掌。游击兵团之作战则难以这样做，上级只能给予下级一般指示，指定其在某一个地区担任某一方向的任务，训令

指示是最好方式，命令则要审慎，不必要的要避免。下级得到上级训令后，一切依靠自己的独断专行，自己应该去找仗打，找敌人弱点，“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全靠上级指示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以今天当面的敌情、地形和本身状况来决定行动，来决定打法。这些问题处理得适当，是游击战斗胜利的决定因素。常常上级认为必需要打，而下级在其本身不可能的情况则其突击计划必需放弃；常常上级并未提出突击计划或给以任务，而下级在其当面恰有可乘之机，则应该独断专行坚决去干；常常在全局需要突击而下级并未感觉到的，常常又有下级认为可以打而上级又认为是多事的，这中间是存在着许多不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一面要求下级指挥员都能着眼全局，同时要求上级指挥员也应顾及到局部情形，才能正确解决。游击战争既然是以避免决战为原则之一，因此对于应付事机应有伸缩余地的可能。我们在江南一年来的战斗，对以上诸方面的做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的优点是埋头作战，艰苦与敌人纠缠。但一般说来，尚缺乏照顾全局，尚缺乏战略眼光，尚缺乏战术素养。同志们，我们要以英勇战斗的卓绝精神，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认识，我们决然可以战胜日本强盗！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陈毅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 三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

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

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1]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

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

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 鄂东斗争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

叶、项、张、郑、郭、雪枫、理治并致王、博、凯^{〔1〕}：

一、新四军彭雪枫、李先念支队及鄂东第五、第六大队，均系由地方党创造的抗日部队，虽经多次战斗，但至今未能取得国民党之正式承认，与军部关系亦不密切，部队给养均仰给地方。

二、最近，蒋^{〔2〕}两电叶、项，令彭、李及鄂东新四军部队迅速调至指定防区，否则，由该司令长官及政府解决。安徽廖磊已令鄂东地方团队及五路军向鄂东五、六大队进攻，并令某地顽固派武装千余向竹沟开动，企图消灭我军。

三、目前，彭、李部队及五、六大队调至皖东防区，在目前还不能依从国民党的要求。因此，各部队至少还必须坚持在原地区活动一个必要时期，并须采用一切方法使国民党承认。

四、因此，五、六大队及先念、竹沟各部在国民党武力进攻之下，必须有充分战斗准备，并须有坚持在原地活动一个必要时期之决心，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予进攻我之部队以有力的还击，以争取我军之存在，争取我军于将来不得已调动时的有利条件。同时，各部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的口号，必须广泛的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从下层分化与软化进攻我之国民党部队，打击顽固派之武装，并须在自己部队

中详细解释上述方针和策略，使指战员均能清楚了解、运用。

五、请重庆及军部相机向国民党相当机关提出要求，承认彭、李及鄂东各部队，并发给经费。声明各该部队系当地共产党员根据蒋委员长告沦陷区民众书，为保卫家乡组织成立，迭次与敌、伪作战有功，今仍在敌占区活动，且五、六大队前经安徽当局承认，不应调离本地，并要求制止武装冲突。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项英、张云逸、郑位三、郭述申、彭雪枫、朱理治，陈绍禹、秦邦宪、何克全。

〔2〕指蒋介石。

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稼祥

“共产党人鄙视把他们的立场和意见隐蔽起来。”

同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问题也毫不隐蔽自己的立场与意见。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共产主义的信徒，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信徒，他们绝不因为任何原因而一时一刻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与学说，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十九世纪所造成的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底公认的继承者”。马克思的学说——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不仅科学的解说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马克思的学说，又由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而得到新的发展。“马克思的学说，是万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马克思学说完全而严整的给了人们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与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反动，任何拥护资产阶级压迫决不相同和调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解放》第八十六期。

的理论。”

中国共产主义者承认三民主义为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什么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与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它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行民族之独立解放，这就是它的民族主义；它要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它的民权主义；它要求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这就是它的民生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早已过去，那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亚洲还有足以代表真诚战斗彻底之民主的资产阶级，还有足以为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政治家的忠诚同志。”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论孙中山纲领时说，“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真正伟大民族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孙中山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的民主主义。中国民主主义者同情劳苦群众，仇视压迫者与剥削者，看见西欧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劳苦群众的压迫，便产生了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理想，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了它的主观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是与中国民粹派的思想相结合，一方面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纲，一方面理想避免资本主义的阶段。实际上激进的土地纲领只能消灭封建剥削，不能消灭与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相反的，正促进资本主义长足的发展。这正是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主观的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本质。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是真正的真诚的同情社会主义，不过其纲领实现之结果与自己所想象的相反，不是避免资本主义，而是发展资本主义罢了。

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宣布拥护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实现而奋斗”，“三民主义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是否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不，绝不是的。

中国无产阶级为要实现其阶级解放，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肃清封建制度的残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无产阶级不仅一般的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并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积极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其他任何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比不上它。

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中即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中有其一定的纲领，其主要内容为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民族独立；推翻封建统治，实行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制度，解决土地问题。这些问题早已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有了说明，而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后，立即宣布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见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因此，共产党的全部纲领有两部分，第一，为最高限度的纲领，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求得阶级彻底解放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纲领；另一部分，为当前的纲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又称之为最低限度的纲领。

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不仅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各个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阶级，都有其纲领，虽然各个阶级的整个思想与整个纲领不相同，但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有共同的基本要求，这正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基础与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之产生的可能。

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革命中的纲领，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

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实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

我们说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并不是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纲领与主张和革命的激进的资产阶级的纲领与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承认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便是别无自己的纲领与主张了。不，两个阶级的纲领只在其主要口号上与主要要求上是一般的一致，而不是完全一样。无产阶级因为其阶级的历史的地位，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需要所订出的纲领与主张，比之激进的资产阶级的纲领与主张更要彻底更要坚决，我们现在把这两种纲领作一简略的比较。

在民族问题上，上述两个阶级都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这是相同的。但是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民族问题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有了很多的著作，有了有系统的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它在民族解放中的纲领与主张既是坚决彻底，没有民族妥协主义与民族侵略主义的任何成分，而对国内民族问题有彻底的主张和实践。

在民主政治的问题，革命的激进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均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和封建半封建的统治，而建立近代的民主政治，这是相同的。但是其不同点是在：激进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基本上是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但以其民主主义的学说中，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不着重于“平民式”扫荡封建关系，建立崭新的民主政治，而认为必须先给老百姓一个时期的训

练，然后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所以有实现民主政治时的几个时期的主张。加之其政治的民主纲领没有经济的实际的纲领作为基础，所以政治上的民主纲领很难彻底的实现。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纲领是彻底的，并且是“平民式”的革命来实现民主政治。加之，又有彻底的扫荡封建关系的经济纲领，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在经济纲领上或者说民生主义上，情形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列主义者明白分清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只有首先实行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过渡与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马列主义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并不企图实行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但坚决主张彻底的驱逐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与彻底的肃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纲领。民族民主革命愈彻底，则对于无产阶级愈有利。而激进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思想是有民粹派的色彩，幻想中国避免资本主义，认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便是社会主义，其实这仅是主观上的社会主义，而客观上正是促进资本主义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激进资产阶级代表的土地纲领，在其主张上是革命的，但其所主张的实现其激进土地纲领的方法却是改良主义的（由国家来收买土地），因而也使其土地纲领很困难实现。

由此看来，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仅仅在其主要的口号与要求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完全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与政治基础。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与主张，比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纲领与主张都要更彻底更坚决，所以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拥护与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也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

底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激进的纲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能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遭受了它的一定的历史命运。在孙中山时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仅仅开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还不发展，无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当时中国民主主义的纲领还能是激进的、战斗的与革命的，这正是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产生而发展的历史环境。

在后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进展，阶级分化也愈明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斗争也大大的激烈起来，无产阶级也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因素。于是资产阶级便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相妥协，而专门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于是便抛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这是过去十年国内战争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七七事变，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情形当然起了变化。共产主义者与进步的民主主义者都号召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与革命精神，然而，现代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的环境较之孙中山时代是不同了。一方面出现了汪精卫和汪派，他们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直接的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但还企图盗窃三民主义，以作为其投降的根据，这当是对孙中山及其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污辱。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虽然现在还拥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赞成抗战，但对孙中山的整个纲领和整个主张，却加以修正，于是便出现了资产阶级的修正的三民主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修正的三民主义之简略比较吧。

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整个纲领；而修正的三民主义便把三民主义变成一民主义（民族主

义)，取消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孙中山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修正主义者的三民主义便是独裁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一党专政主义者，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反对实行民主政治，反而与封建势力相妥协来限制人民的民主权利。

孙中山是同情工农的，当他在其著作中一提到工农群众的痛苦，便表示出他的无限的同情；而修正的三民主义便是清清楚楚的代表剥削阶级而仇视工农的斗争。

孙中山是同情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马克思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列宁是革命的圣人，而三民主义的修正派则敌视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他们提出一个主义的口号，要来消灭和溶化共产主义，要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变成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这样的修正的三民主义，不能成为统一战线与民族团结的共同纲领，而变成反共与分裂的工具。

孙中山是赞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并亲自号召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大的革命力量，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修正的三民主义则提出一个党的口号，主张一党主义，不赞成国共合作，而实行所谓溶化共产党的政策，不把共产党看作国民党的朋友，而把共产党看作敌人。

孙中山是真诚的同情社会主义，虽然他的社会主义仅仅是主观的；而修正的三民主义则完全仇视社会主义，赞成资本主义的制度，叶青之流所说“一次革命论”，“民生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等等，显然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学说而制造的歪曲的“理论”，其中只有仇视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丝毫同情社会主义的成分。孙中山带有民粹派的思想，在其主观的愿

望上是革命的；而叶青之流所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理论”，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

仅就这简单的对照便可以看到，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各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修正了三民主义。这些修正派当然不敢公开的来修正孙中山的学说与主张，相反的，总是尽力表明他是真正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诡辩赛不过事实，上述的对照已经明白的表示了：三民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确抛弃了孙中山基本革命的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最主要的问题上都是修正了和曲解了孙中山的基本立场。

不反对三民主义的修正主义，便不能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便不能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因为修正的三民主义不是引导到民族团结，而是引导到民族分裂；不是引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是引导到失败。因此，反对修正的假三民主义，复活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任务，尤其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的任务，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完全赞同与愿意尽力帮助的。

当着中国共产主义宣布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因此拥护三民主义，并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反共分子便兴高采烈的胡说：共产主义者既宣布拥护三民主义，便是放弃了、背叛了共产主义；假若共产主义者不放弃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党人之拥护三民主义便是非诚意的、假的。

我们要告诉这些反共先生们：共产党人早已申明他绝不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目的与马列主义的思想学说。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可以当作将来社会的理想，更准确的说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正是共产主义者奋斗的最后目标，这是尽人皆知

的事实；共产主义又是一种学说、思想与科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者承认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因而拥护三民主义，这不但不违背马列主义的学说，相反的，正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学说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当然，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根本不相同的，譬如说，在哲学方面，前者是唯心论，后者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学方面，前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而后者正是阶级斗争学说与唯物史观学说的创造人；在经济学方面，前者没有脱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的范围，而后者正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资本论》的作者；在将来社会的理想上，前者是主观的社会主义，后者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总之，前者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学说，而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当然其学说的范围、广博与历史地位，是不宜乎比拟的。

很明显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信徒，他们承认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拥护三民主义之彻底实现而奋斗，并不因此而接收孙中山的学说上的观点如世界观、社会观与主观的社会主义，这正是光明正大的科学态度，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态度。政纲是一件事，学说又是一件事，这应当分清楚的。至于共产主义者之拥护三民主义是否诚意，是真是假，实践是最好的证明与公证人。历史的滑稽事情恰好如此：那些高唱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最积极的分子，恰好是修正的三民主义者与假三民主义者，而实行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最彻底最坚决的分子，恰好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总上所说，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因此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共同纲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

党人的思想与信仰。三民主义的纲领与共产主义者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虽不完全一样，但在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三民主义能够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由此看来下面的问题是很清楚的了：

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因此，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必须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任何轻视三民主义——真正伟大民族的真正伟大思想——的观念，不管是存在在国民党党员中，或共产党党员中，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轻视，只能削弱民族统一战线与民族团结，影响到中国民族的命运。

二、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必须反对资产阶级修正的三民主义。这种修正，的确违背了和污辱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想把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理论。不反对这种修正的三民主义，便不能复活孙中山的真正革命精神，便不能巩固统一战线，便不能引导伟大的民族到解放的胜利。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与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反对假三民主义最好的文献。

三、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混同起来的企图，不管来自右边的叶青之流（三民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营垒（如把三民主义解说得像马克思主义差不多），都应当反对的。科学的态度是阐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间之客观上存在的关系，任何夸大其相同性与相异性都不是客观真理的态度。只有这样的科学态度，才能既不损害三民主义又不损害共产主义，才能巩固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合作。

四、任何企图证明只有三民主义适合中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反动的，任何希望以三民主

义来溶化和消灭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企图都是非科学的反革命的。中国既有了无产阶级，便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与运动——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唯物辩证法。真理是具体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具体的分析中国的历史的、经济的、阶级的环境，订出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纲领与主张。把适合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纲领与主张搬到中国来，这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幼稚的机械论者。“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在“阶级自存”上是不很大，但在其政治作用上，在“阶级自为”上，因为历史的、国际的、国内的各种条件，却非常重大。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绝不强制他人来信仰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但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以三民主义来溶化、消灭和麻痹共产主义的任何阴谋与企图。

总上所说，我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这早已在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所发表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了：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

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一二〇师：

我们听了秀峰^[1]同志的报告后，认为晋冀察各方面的工作均有伟大的成绩，堪称华北党的模范。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以供你们的研究：

(一) 敌后抗战的困难是会增多的。在相持阶段中，正面相持愈多，则敌后战斗愈艰苦，敌后“扫荡”一定加紧，敌军的伪军的数量可能增加，因敌政治阴谋之加强，敌后阶级之分化亦愈明显，因敌占区扩大，我军人员补充物质供给之困难亦愈多，因此，我党应充分的认识当前困难，用一切努力巩固党、巩固军区来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

(二) 统一战线：对阎^[2]态度已见中央电，对国民党党部之成立与发展，应采取抵制政策，希望由进步分子来组织一个进步的国民党党部，在党中央反共政策未改变，在国民党未大大分化以前，是不可能的。对一切否认和取消边区的企图，应坚决反对。要注意阎及国民党分化晋察冀政务委员会内部的阴谋，对于外来的机关或拒绝或紧握在我们手中，对地主阶级应采取中立或麻痹政策，一方面不应推动地主去降日，但应注意农民是我们的主要依靠，不应把争取地主抗日与组织农民抗日同等看待，不应迁就地主而不进行改善人民生活的正确步骤，对你处友军应有必要警惕，以防意外。

(三) 政权：应大大注意政权中干部质量之改善，要把各

级政权紧紧的握在我党手中，司法机关应当改造，派一些党员及进步分子去参加司法工作，雁北专员及各县县长应尽可能的是共产党员。

（四）群众工作：应把全体群众都组织起来，尤其应注意妇女工作，改善群众生活，应多从发展生产事业上着手动员，工作中还存在的强迫命令方式应纠正。人民的文化识字教育，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正式的进行，因为文化识字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党在小学教员中的工作必须加强。

（五）党的工作：党的工作中心是巩固，不是发展，贡献给七次大会应当是巩固党的模范，而不是十万党员。中央巩固党的决定，应详细讨论，不要认为干部和党员都已经审查，不须再注意了。在敌占区，特别是铁路线与大城中，应建立短小精干的绝对可靠的党的组织，分局与区党委应专门培养一些这样干部，派出去做此工作。

中 央

9. 27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刘秀峰。

〔2〕指阎锡山。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

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

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

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

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

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

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

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有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王稼祥

—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之建设是有完整的明确的学说与理论。最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根据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名著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关于共产党的组织原理，有下面几段很精彩的话：

“（一）马克思主义党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乃是它的一支部队。然而，工人阶级是有很多部队的，……党之所以与工人阶级其他部队不同，首先就是因为党并不是简单的部队，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部队，觉悟的部队，马克思主义的部队。这个部队是以社会生活的知识、以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的知识、以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并因此而善于引导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不可把党与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不可使每个罢工者都能宣布自己为党员，……党的任务并不在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每个罢工者’底水平，而是提高工人阶级群众、提高每个罢工者到党的水平。……”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

（二）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底先进的觉悟的部队，而且同时又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有自己的为自己的党员们所务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员一定应当参加党某一个组织为组员。如果党不是阶级底有组织的部队，不是组织的系统，而是这样一些人的简单的总和，这些人自己宣布自己为党员，可以并不参加党某一个组织，因此也是无组织的。因而也就不必服从党的决议，……于是它就会没有可能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党只有当自己一切党员都组织成为统一的整个部队——由意志之统一、行动之统一、纪律之统一所团结的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指导它走向一个共同的目的。……

（三）党并不简单是有组织的部队，而是高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使命就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党，这最高组织形式，是由阶级里那些以先进理论，以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具有一切可能去领导——而且应该去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

（四）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的联系之体现。党如果不与非党员群众发生联系，如果不增加这些联系，如果不巩固这些联系，那末，就无论它是怎样优秀的先进部队，无论它是组织得如何好，它还是不能生活和发展的。党如果闭户幽居而与群众隔绝，丧失或即令只减弱与本阶级的联系，——它就一定会丧失群众方面的信仰和赞助——于是它就会不免于灭亡。

（五）党为要正确的动作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起见，就应当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要有统一的党章，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要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即以党代表大会为首，而在各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则是以党中央为首，少数服从多数，各个

别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末，工人阶级的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政党，就不能实现其领导本阶级的任务。

（六）党在自己的实践中，如果它想保存自己的队伍之统一，就应当在实践上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这个纪律是为一切党员——无论是首领也好，无论是普通党员也好，——所同样务必遵守的。因此，在党内不应有什么不必服从纪律的‘上等人’和必须服从纪律的‘平凡人’之分。没有这个条件，则党的完整性和党队伍底统一性就不能保存。”

二

在中国，一般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之成立与发展，同样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和原理的。

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是不相同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是一件事，在这儿资产阶级是压迫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当作解放斗争的民族因素已经不存在了。在殖民地及不独立的国家中的革命是另一件事，在这些国家中，异族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的原因之一，这种压迫不能不同的涉及到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阶段上和一定的时期内能够赞助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为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因素还是革命的因素。不作这个区别，不认识这个区别，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看作一样的，那便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而变成第二国际的拥护者。”

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理论，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路线的根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民族的独立。参加这个革命的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并在一定时期中民族资产阶级也赞助这种革命。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尽可能的集合一切力量，来反对殖民地人民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如不首先取得民族解放，则无法取得阶级的解放。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必须与其他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在一定时期中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政治路线应当是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成立以后，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即实行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后来因为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又与农民进行统一战线，实行了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及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内阶级关系重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便又重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演变，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的。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之组织原理能否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而应有所改变呢？不，绝不应当的。相反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之组织与生长，更应严格的实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与原则，以保持共产党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性质，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立性。应当区别共产党之产生与生长的不同环境：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条件下所产生与生长的共产党（如俄国），是有一种环境；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统一战线的条件下所产生与生长的共产党（如中国），是有另一种环境。不同的环境所

给与共产党的生长以不同的影响；在后一种环境中，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几个阶级的合作的环境，很容易影响到与损害到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共产党之纯粹无产阶级性。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注意这个环境，必须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组织原理，不因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正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使共产党的建设原则与组织原理丝毫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及组织原理在中国之实际运用，应当是不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斗争者的水平。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解放斗争者，有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斗争者，有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斗争者，有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者。共产党员是民族解放中最积极最坚决的战士，但是他不仅仅是民族解放的战士，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因此，不是每个积极的坚决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士都可以变为共产党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及组织原理在中国之实际运用，应当是不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民主主义者的水平。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提出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口号，但共产党人不是简单的民主主义者，而且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当列宁在一九〇九年论党内错误倾向之原因的时候，曾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加入我们党的有一些分子，并不是接受了党的纯粹无产阶级的纲领，而是主要的因为党的为民主的明显而有力的斗争所吸引，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的口号，但没有把这些口号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是更容易常常发生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及组织原理在中国之实际应用，应当是不把共产党员水平降低到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的水平。在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成功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中国知识阶层中有许多分子同情共产主义，同情共产党。然而共产党员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并且是党的组织的一分子，参加党的工作，服从党的严格的铁的纪律。假若把党员的“称号”扩充到每一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允许同情者入党而降低党的组织原则与铁的纪律，那末就会把党变成一个不成形的东西，而淹没在同情者的大海里。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降低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来适应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是提高同情者到共产党员的水平。

由此看来，只有承认（不是了解）共产党的整个纲领，不仅是党在民族解放中的纲领，并且是共产主义的纲领，愿意在党的一定组织中为党工作，愿意遵守党的纪律的人才能入党。

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显然的，这些错误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组织的原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把党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战士、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水平，使党与工人阶级甚至党与人民群众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使共产党的战斗力大大减低。

为要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理，必须克服在我们队

伍中流行的几种不正确的意见：

有些人说：假若在中国严格执行马列主义的组织原理，那会缩小党的数量，使党不能成为群众性的大党，而且列宁关于党的主张是适合于沙俄时代的极端地下党，而不适合于我们在某地方某种程度可以公开的党。显然的，这种意见是不对的。不错，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创造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的大党。否则不能领导四万万人民的伟大人民的斗争，不能达到胜利。然而，假若降低党的水平，来追求党员的数目字，那会使党成为大而无战斗力的组织。同样，不能领导伟大人民的斗争，不能达到胜利。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那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而会落到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观点：“党员的称号散布的越广越好。”党中央决定上说：“纠正追求数目字与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正是反对上述的错误意见。至于公开党与地下党的问题，那我们应当认识中国目前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有我后方，有沦陷区域，并且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过程，今天环境较好，明天可能变坏，在环境好的时候，允许不够党员水平的分子入党，那便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困难，使党的堡垒在环境转坏时不仅受到外来攻击，并会受到内部的打击。而且正因为较好的环境，我们更应该注意不让一些狂热的、赶时髦的，以及投机分子混进党内来。所以我们的组织任务是建立布尔塞维克的大党，但是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组织原则，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而不是用降低党的水平，追求党员数目字的方法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苏联共产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时，只有八万党员，在八月时只有二十四万党员，然而取得了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国家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的借镜，可供深刻的研究。

又有些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党的组织原则应该依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是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许多分子，特别是社会上层分子，虽然不合党的水平与入党条件，然而他们加入党，对于党是有利的，所以不妨目前降低党的水平，争取他们入党，到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时，再来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理。显然的，这种意见同样是不正确的。“倘若党……不会超出于无产阶级的暂时利益之上，……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不仅如此，降低党的水平，允许社会上层分子或者说党的暂时同路人入党，不仅不是党的永久利益，而且也不是党的暂时利益。这些分子的入党只能松懈党的组织，妨害党的政策的实行，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与独立性的实现受到损害。马列主义的党的学说与组织原理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正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更应注意自己的独立性。只有保持共产党之纯粹无产阶级性，才能很好的实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性革命中的纲领，才能很好的过渡到实现其整个社会主义的纲领。若不如此，就是实现党的现在的民主纲领，也会遇到内部的困难。

又有些人说：组织工作不是应当随着党的政治路线而改变吗？斯大林同志不是说过：“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合于党的政治路线底要求”吗？所以党的组织原则也应当随着客观条件与党的政治路线之变化而变化。显然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没有认清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间的区别，而把它们混为一谈。党的组织工作之方式与方法，应当适应客观环境和党的政策与口号之变化，否则便无法实现党的政策与口号。然而我们绝不应当因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环境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使党的组织原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和这个学说在中国的正确应用，而使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和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受到歪曲和损害。

又有些人说：中国没有共产党同情者的传统，历史的习惯弄成：既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便要加入共产党，不管共产党的严格的组织生活与纪律是否对于自己适合，而党的同志也认为如不允许这样的同情者入党便会得罪他们，所以宁愿降低党的水平，而同意他们入党。显然的，这种办法是不妥当的。不错，在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的传统是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不发展与历史环境的结果，同时也是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全军皆党”、“全学校皆党”，甚至“全国皆党”）的影响所造成。但是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在于迁就历史事实，而在于去建立同情者的传统，党应当向同情者及党内解说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建立起对同情者的工作及应有关系。共产党没有党外广大同情者的拥护，是不能进行任何事业的。而党内应当是每个分子是在一定组织下工作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员，而不应有不参加一定组织不愿服从党的纪律的同情者。

总上所说：在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应当是马列主义原则，绝不应当因为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统一战线，而把党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战士、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水平，绝不应当丝毫离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依照马列主义组织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党，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保持其纯粹无产阶级性，周围环绕着广大的同情者，实行正确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哪怕这个党虽然在一定时期中在数量上（与全国人口比较上）并不很大，然而能够引导四万万人口的人民，能够达到民族解放与将来的社会解放的最后胜利。

“苏联共产党是经过长期的光荣的道路的，它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于俄国第一批细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发展为现时领导着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

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道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以深刻研究的。

三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这个学说在中国应有的应用，我们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组织上的具体问题。

第一个具体问题是党的成分问题。

工人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这是向来都很清楚的。可是中国工人阶级遭受了一定的历史命运，自从大革命后革命的中心不在大城市，而在农村。自抗战以来，工业中心又先后陷落于日寇之手，工人群众或者处于日寇重压之下，或者离开工厂加入游击队。革命运动的中心仍旧在农村，而不在大城市。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与宝贵党的工人成分的加强。再，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工人党员，培养他们成为党的干部，要认清普通工人与共产党人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过去立三路线时代的形式上的提拔工人干部，而不给以马列主义教育，迁就工人中某些落后意识是不对的，实际上是有害于党的工人干部之提拔。我们要把普通工人的水平提高到共产党人的水平，而不是降低共产党人的水平到普通工人的水平。

关于知识分子（教员、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等）入党问题，我们要认识这样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垂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时代，在中国原有社会制度日益腐烂的条件下，中国知识阶层中优秀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失望了，遂转而为无产阶级服务，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种特点正说明为什么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原

因。然而有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积极主张所吸引，但实际上并没有承认或不愿承认共产党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整个纲领，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此外，知识阶层是有它的特点，列宁说：“知识阶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阶层之特点，一般的是个人主义和对于纪律及组织之无能，这正是知识阶层比之无产阶级的不利地方，这正是知识分子脆弱与不坚定的原因之一。……知识阶级的这个特性是与它的生活的一般条件——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很多地方相同的条件有关系的。”“俄国的虚无主义者，特别具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厂’，部分服从全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奴隶制度’。”由此看来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应有以下的态度：

一、不仅承认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积极纲领和主张，而且承认共产党的整个纲领，无产阶级阶级解放与共产主义的纲领。

二、承认并决心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三、对于愿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之入党采取拒绝与轻视态度与对他们的弱点（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与坚强性）采取放任态度都是错误的。

四、要特别注意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一般的说，贫苦出身的知识分子更容易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到底。

关于农民入党的问题，应当认识农民虽然万分贫苦，然而其生存条件仍是小生产者的条件，他们既困难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又难于组织化和纪律化。然而有各种不同的农民，富农是剥削者，而贫农却是半无产阶级。因此应当在斗争中吸收进步的贫农分子入党，但不顾其进步程度，而追求数目字的办法

是错误的。一般的说，党在农民中的百分比，较之党在工人中的百分比（即农民党员与全体农民之对比和工人党员与全体工人对比）是应当不相同的，是应当较之在工人中的百分比大大缩小的。

关于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宗教服务者（他们自己是这些成分，这与这样出身的分子是不相同的），一概不能入党。对于参加秘密结社（如哥老会等）的分子，如不脱离原来组织或向党公开秘密结社之内幕，是不能准许入党的。自首分子不管失节的程度如何，都不应当恢复党籍的。社会上层分子，不管其地位如何高，不管其入党对党的临时利益如何大，都必须依照党章，而不应违背马列主义的原则，不应降低入党条件，更不应以党籍为礼物。

第二个具体问题是建立共产党的同情者的传统与工作的问题。

中国没有党的同情者的传统，因此，不会对同情者进行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要建立这个传统与工作。因为对共产党的纲领与主张之同情的程度不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同情者。有的是全部赞同共产党的纲领和马克思主义，这是阶级的同情者，这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党外的布尔塞维克。有的是同情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进步的积极的纲领与主张，但对共产主义的学说与阶级解放的纲领尚不赞成，这是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同情者，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的同情者。此外，对于共产党当前政策与主张或者全部同情，或者仅赞同一部分，或者同情其大部分主张，或者只同情其小部。不区别这种同情程度之不同，便不能有正确的对同情者的工作。

为要建立起共产党的同情者的传统与工作，必须纠正党内存在着的习惯的错误。我们许多同志不会分清共产党人与其同

情者之区别，时常不问同情者是否承认党的全部纲领，是否愿意遵守党的纪律，总想吸收他们入党，这样便把党的水平降低到同情者的水平。当然许多同情者也时常不明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要求入党，如不答应，则觉不如意，这须要我们进行解说工作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分清对同情者的态度与关系，比之对党员的态度与关系是不相同的，而且应当根据程度之不同，而规定对各种不同程度的同情者的不同的态度与关系。我们许多同志对同情者的要求一般的是过高，这种现象若不纠正，便不能建立起对同情者的传统与工作。

第三个具体问题，是党内教育问题。

党内教育的意义是用不着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上说：“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斯大林在联共十八次大会上说：“须把以下的一点看作是一个定理，就是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水平也愈高和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率，反之，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则在工作中也会发生延误和失败，则工作者本身也就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和堕落为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则他们也就愈为蜕化变质。”

为要很好的进行党内教育，就必须注意到党员及干部不同的政治文化水平。久经锻炼而过去缺乏机会学习的老干部，必须找出时间和机会来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来把自己经验分析和系统化，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对于知识分子与学生出身的新干部新党员之教育，则应针对着知识阶层之上述特点而注意下列几点：第一，应当教育他们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清洗头脑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认清，一个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共产主义者，其思想是要经过一个转变过程，而过程的一部分是在入党以后完成的。第二，应当教育他们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纠正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正确的解说民主集中制。第三，应当教育他们深入下层实际工作，重视实际斗争的经验，反对轻视经验，要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实践的统一。第四，应当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劳动群众，决心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服务，不接近工农，轻视工农都是错误的。至于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成分的党员之教育，则除了通俗的政治教育外，还应大大注意一般的文化识字教育，因为文化识字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党内教育的质量必须大大提高，满足党内训练班的数量是不应当的。

第四个具体问题，是党的干部问题。

“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的这句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一定数量的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这当然是党的骨干和党的财富。然而，老干部在数量上有限，是无论如何不够用的，因此提拔培养和教育大批的新干部成为党的严重任务，对于新干部之提拔与培养采取忽视的态度是错误的。

“团结新老干部——建立新老干部间和协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于巩固党有一等重要的意义。”（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老干部已经参加长期的斗争，积蓄了很多的经验，正因为如此，老干部应当以身作则去教育新干部，巩固新干部。个别老干部，以为自己是“老革命”，因而可以不求上进，而对新干部采取一种轻视的不信任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新干部必须向老干部学习，决心在长期的斗争中去考验自己，锻炼自己。个别学生出身的新干部轻视实际斗争与实际工

作，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看不起，对组织生活与纪律生活采取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同样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的。

对干部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不关心干部，不爱护干部是严重的错误；然而对干部之错误与缺点采取宽大姑息的态度，这不是爱护他们，而是害了他们，同样是不正确的。对干部随便加以打击和处罚，这是错误的干部政策；然而对干部之错误与弱点不加以批评和纠正，而采取放任纵容的态度，同样是不正确的干部政策。

第五个具体问题，是党内生活的问题。

党内生活是有布尔塞维克的原则，我们绝不能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使党内生活有所损害。个别的党部把对待其他党派人们的关系搬到党内来对待党员，“在党内讲统一战线”显然是错误的。党的铁的纪律并不因为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有所松懈，相反的，正因为统一战线的环境，党内纪律更应严格的维持。对于党纪的惩办主义是错误的，但对于党纪的放任态度同样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与思想斗争，并不因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取消，相反的，正因为统一战线的环境，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与习气更容易侵入到党内来。六中全会纠正过去党内反倾向斗争“带大帽子”的错误，绝不是为的取消党内的反倾向斗争，而是为的更正确的来进行这个斗争。把反倾向斗争庸俗化，把日常生活的细小问题之纠正成为反倾向斗争的中心，是曲解了反倾向斗争，是有害于党的团结的。反倾向斗争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工作，其中心内容应当是注意到党员的各种思想上的问题，纠正其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党的思想上一致与党的团结。

四

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历史斗争中——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及抗日战争中，已经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而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因素。然而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我们还须尽一切努力来为党的巩固坚强和布尔塞维克化而继续不断的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观点，把党变成脱离群众的小的教派的这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同样要反对把党的水平降低，把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作用降低，把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应用到共产党内的这种右的机会主义。我们时刻不应忘记列宁的话：“我们党的组织只包括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党的组织愈坚强，则党内的动摇和不坚定愈少，而党对其周围的所领导的工人群众之影响则愈大，愈广，愈丰富和愈有效果。实在的，我们总不能把工人阶级之先锋队的党与整个阶级混同起来。”实在的，我们更不能把工人阶级之先锋队的党与整个人民混同起来。

让我们把列宁的名言当作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吧：

“我们必须把党员的称号与意义提得更高，更高，再更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王稼祥选集》刊印。

研究沦陷区*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毛泽东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切政策。

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磨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

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序言。

区来准备条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

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间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一集。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则作为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二集。其余两个问题，亦将接续出书。

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总政治部关于日伪军工作的训令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

前总、四军、三个师、军区、徐、朱、吕、程、雪枫、彭、罗、王震、井泉、士桀^{〔1〕}、方强、中原：

根据检查部队对敌伪工作的结果，提出下列意见，以供参考：

甲、对敌军工作：

1. 根据日军的现状，我们对敌军工作方针与直接目的不应过高，如与日军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堡垒，希望日军大批哗变及大批投入华军等等，这是我们的远大目的，但在今天尚不可能，尚不是实际，须经过种种阶段才能达到。

2. 今天对敌军的工作方针应当是：用各种方法削弱和减低日军的战斗力，使日兵对中国军民不作盲目的仇视，从感情上的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的接近，因此宣传品的内容不应当是政治的公式教条，而应富于刺激具有感情的煽动作用，以促进日军厌战、怠战、自杀等等情绪，以减低日军战斗力。

3. 对日军俘虏加以短时间鼓动和客气招待后，一律迅速释放，不应留下作长时期的训练。

乙、对伪军工作：

在敌以华制华的政策下，伪军数量可能加多，因此应当重视对伪军的工作，其方针应当是：

1. 伪军是汉奸军队，我们应当以消灭与争取同时并进，

认为只应争取不应打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2. 反正和瓦解同时并进，能争取反正者争取之，尚不能反正者则瓦解其下层。应当估计到伪军反正的可能比过去及将来反攻阶段上要少一点。

3. 对伪军工作除联络其上层外，应在其下层进行工作。

4. 对伪军除散布宣传品外，还应培养一批专门人员打入到伪军中去建立抗日的堡垒。

总 政 治 部

十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徐向前、朱瑞、吕正操、程子华、彭雪枫、彭绍辉、罗贵波、李井泉、陈士榘。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毛泽东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

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

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

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

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

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

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

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

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的理

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团结与民主^{*}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林 伯 渠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这是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合并了七个关于巩固团结、集中人才、增强抗战力量的提案，加以审查后，在国民大会尚未召集以前要求政府明令宣布的治标办法之一。通过以前，曾经过相当剧烈的争辩，可见全国忧时之士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与关切。

谁都应该看清楚，全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团结，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强盗的有力保证。历史曾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敌人也对它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团结是和民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民主，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群众团体没有发展的基础，全国的优秀人才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那末，也就不可能形成能够震撼敌人营垒的全民的团结。只有一切抗日的人民都团结在民主精神的周围，在法律上得着应有的切实保障，在政治地位上受得同等的待遇，才能够巩固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产生真正伟大的力量。这条治标办法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

无论什么条文，它的价值要看它的实行程度怎样，否则它的作用将等于废纸。全体参政员是怀着无限的忠忱与热诚，全国人民是那样焦急地渴望着这一个足以转移我们祖国命运的办

* 这是林伯渠为《新华日报》写的代论。

法能够快些实现，过去一切足以妨碍团结与民主的设施应早日绝迹。我们的政府不应漠视广大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也只有依靠着精诚的团结与广泛的民主，政府本身才能够强大进步，完成解放全民族的伟大任务。

为了实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就应该在严重的民族压迫横加在我们身上的今天，消灭内部妨碍团结的现象。因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摆在眼前的明显的事实，虽然它军事惨败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但我们应该认清在民族自卫的革命战争中，脱离了广大的抗日的人民，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是对抗战不利的。仅是在消极方面停止对抗日的人民、团体、党派的各种限制、取缔是不够的，虽然切实做到这一步已经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努力；政府要更进一步的造成全国人民能够在法律上获得政治上平等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保证全国人民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

什么是“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的具体内容呢？

这就是说，全国抗日的人民要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出版抗日刊物的自由，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自由，召集动员民众来抗日的各种会议的自由，研究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信仰某种政治理想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自由。全国抗日人民要有参加抗战工作的权利，保持自己职业独立的权利，督促政府、帮助政府的权利。抗日人民的自由不能受限制，他们的权利不能被剥夺。除了有真实证据证实了是犯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罪的人以外，以任何借口来限制抗日的人民的自由权利，是违反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

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因此，如果组织对于任何抗日党派的阴谋破坏，暗杀、囚禁、逮捕抗日党派的人员，暗中限制取缔抗日党派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是决不应有的行为，而且应受到全国人民严厉的制裁。

这就是说，一切的抗日军队和地方政府都是我们整个抗日力量的一部分，它们应该一样的被珍视爱护，受着同样的待遇。不能够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而对一些抗日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加以歧视，或给予许多困难和牵制。这种情形今后是不应该存在的。

这些只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条件，依靠了民主的力量才能够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准备着在适当时机来到时对敌反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

根据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出版的
《新华日报》刊印。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毛 泽 东

(一)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贩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达此目的，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

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一) 目前日寇汉奸托匪正加紧奸细活动，以实行其诱降反共的阴谋。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

汪^[1]逆汉奸最近在上海等地，以特务工作及暗杀等方法，进行投降反共的活动，实行个人恐怖。

反共分子，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发布所谓防制异党的办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派遣特务人员到各地进行反共的特务工作，平江惨案即是这种有组织的罪恶行为的开始。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

(二) 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以来，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到伟大的成绩与胜利，但在不少的地方及部门中发现了反革命混入党内活动的事实，值得全党严重的注意。

(三) 自抗战以来，中央向全党严重的提出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党在六中全会中提出，如果不加强锄奸工作，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今年三月又发出开展反奸细斗争的秘密指示。但是各地党的组织及军队政权机关除了少数地方外，一般的说，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进行工作。反奸细斗争还没有被视为自己的任务；专门部门，还没有建立；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的得力

干部，还没有选出，没有培养；在全体党员中没有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在革命群众中的锄奸运动，还没有发展；有些地方对敌人奸细活动的危害性，及我们锄奸工作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估计；甚至将这一工作和党的各部门工作对立起来，认为反奸细斗争对党的政治军事组织教育等工作没有关系，对锄奸工作有着神秘的及轻视的态度，甚至让自首分子担任负责工作；有个别地方因没有经常反奸细斗争的教育和工作，一遇反革命的活动，又表示张皇失措与扩大化的现象；许多地方对坚决废止肉刑与依靠证据不依靠口供的正确方针，并没有实行。所有这些错误缺点，中央认为必须立刻纠正。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加强反奸细斗争的工作，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与党的组织的巩固，不使党与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

（四）为了执行动员全党发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各地党的组织必须采取下列的方法：

1. 各地党要将反奸细斗争，认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责成党的书记，军队的首长，对此工作首先负责，不要将此严重的任务仅仅划给少数人担任，而自己采取旁观态度，以及交与不能胜任的人员单独管理，要加强领导保卫部门的工作，把这部门工作视为党的工作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纠正个别的保卫人员留恋过去离开党的领导而形成独立系统的观点。对保卫工作的干部应经常给以工作指示和政治教育。十倍的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党与军队的负责人，要在各种干部会议中、党员会议中、军人大会中公开讲演锄奸任务的重要性，动员全党全军来担负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在有政权的地方，则要公开动员全体革命人民学校学生进行锄奸运动。

2. 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的同时是慎重的个别隔开的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

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防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同时防止惊慌失措的态度及敌人诬陷同志牵涉无辜的阴谋，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3. 从中央局到地委成立保卫委员会，由党的书记、组织部长、社会部长或专门负特别工作的人员组织之，在有政权军队的地方（如陕甘宁、晋察冀等地），由党政军及保卫部门的负责同志组织之。委员会由党的书记作主席。保卫委员会的任务是：动员和教育党的组织进行反奸细斗争，指导和审查专门部门的工作，决定保卫工作的主要问题与基本方针（军队的保卫委员会见军委在六中全会时所发之锄奸工作条例）。

4. 建立专门的工作部门（社会部），或专门工作人员负责进行日常工作，由于此种干部须慎重选择，不易寻找，可照实际情形分别采用下列几种办法解决之：

（甲）中央局、区党委、省委，如有政治上坚定忠实，能力上胜任称职的干部，必须成立专门的社会部。

（乙）如没有适当干部任部长时，可暂由书记自兼部长，另找一忠实可靠的干部作副部长或干事，在书记领导之下工作。

（丙）暂由组织部长负责，下设副部长或干事专门作此工作，同时准备和培养能独立工作的干部。

（丁）特委、县委、区委无适当干部时，暂不设立专门部门，即由常委及书记负责，但必须有一人负责注意搜集敌探奸细活动的材料。

5.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报告中及最近中央巩固组织决议中所指出反奸细斗争的任务，配合当地具体情形，在全体党员中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学校中应有反奸细斗争的科目。

6. 各地党的组织，应下大的决心，提调政治上坚定可靠、能力胜任称职的干部担负专门部门的工作，此种干部配备应慎

重选择，以宁少勿滥自力更生为原则。但每个独立区域，必须选择培养能够独立工作应付全局的得力干部一人至二人；没有这样的高级负责干部不能掌握锄奸工作的全局，进行对敌探奸细的全线战斗。同时在华北、华中、西北、华南各地应尽可能派遣特委一级以上的优秀干部到中央训练，同时在当地进行开办专门的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注 释

〔1〕指汪精卫。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

刘 少 奇

一 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产生

我们的党，是代表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历史上已失去其进步意义并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阶级和势力，就成为我们阶级和党的敌人。在这里，斗争是免不了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并联合农民及一切要求进步的集团和人们，另一方面是国内国外阻碍进步的反动势力。在斗争中最基本的条件是这样的：（1）在我们方面，因为我们是进步的阶级和政党，努力要求社会的进步，所以我们拥护、阐明与主张一切的真理，不需要在群众面前隐瞒真理，欺骗群众，群众的觉悟程度愈加提高，就对于我们的事业愈加有利。所以我们总是要将我们的真实主张最广泛的公开到群众中去。这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在政治上给予我们的优势。但是今天在力量上我们还没有优势。群众在政治上不独没有权利，而且受着种种压迫，缺乏组织，文化程度觉悟程度还不够……（2）在敌人方面，因为他们是阻碍进步的没落的势力，努力反对社会的进步，所以他们不能拥护、阐明与主张一切的真理，必须在群众面前隐瞒真理，欺骗群众。群众的觉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

悟程度愈加提高，就对于他们的生存愈加困难。所以他们总是要将他们的真实主张隐秘起来，而要拿一套假的东西去欺骗群众（在这一方面，敌人要做秘密工作）。这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在政治上给予他们的劣势。但是，他们今天在力量上还是占着优势。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还有极大的优势。

由于敌我双方的上述这种情形，对于我们有利的是采取公开的方式去进行活动，拥护、阐明与执行我们的主张。然而，敌人却能在力量上阻止我们的活动，逼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秘密的方式甚至处在地下去进行活动。如是这就产生我们党的秘密工作的必要。这是由于有敌人存在以及敌人在力量上的优势而产生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不是由于我们主观高兴秘密工作。因此，党的活动，应该是尽可能的公开，而秘密活动，只是由于有必要。

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为了最后的战胜与消灭敌人。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秘密工作，也是会存在的。因为，敌我斗争的通常规律，是敌我双方都要最大限度的损害与消灭对方，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发展自己。敌我双方都为了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情况与企图（愈多愈好），而自己的情况与企图，就要使对方不了解（愈少愈好）。如是就要慎察对方，秘密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是每次战斗胜负决定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这就产生了党的秘密工作之一般的长期性。而且也使党的工作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方式——公开工作方式与秘密工作方式。又由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都同是党的工作，都是为了要达到党的同一目的，所以就产生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与配合。只有在国内外的敌人已经或差不多不存在的条件下，党的秘密工作，也才就自然无存在

的必要了。

二 在各种不同时期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由于党与敌对势力的斗争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种不同的前进的与后退的时期，因此就使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在各种不同阶段与时期中有各种不同的联系与配合。一般的来说，我们可以分作下列三种不同的时期：

1. 党处在地底下工作的时期，即党处在非法的被压迫的时期。在这种时期中，党的存在与组织和工作，都是非法的，都需要秘密。但是也恰恰在这种时期中，党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去利用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客观上存在的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可能性，去进行活动，才能建立、保存与巩固党，并与群众联系起来；虽然，在这种时期中，对于党来说，非法斗争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主要的一方面。

2. 党处在公开合法地位的时期，即党虽然处于在野地位，但党的存在是受有合法保障的时期。在这种时期中，党的存在与组织和工作一部分是合法的，公开的；另一部分是非法的秘密的。在这种时期中，合法活动与公开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主要的一方面。

3. 党处在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时党的存在与组织和工作，都是合法的。但由于内外的敌人还存在，还有敌人的包围，党的某些部门中的工作暂时还需要秘密。但是这种秘密工作的性质，已经与前一二种时期根本不同，它是完全合法与受到政权支持的。

从我们中国党今天的特殊任务与特殊环境来说，由于各方面种种的特点，使我们中国党今天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具

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关系：

1. 在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统治的地区。在这里党是处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之下，非法活动是党的主要工作。可能利用的公开与合法的机会，虽然不多，但对于这种公开合法可能的利用，也就特别重要。

2. 在友党统治的地区。而友党中又有能与我们合作的与还不能正式与我们合作的，以及在合作的时期与在不能合作的时期等等区别。在这里，我们党今天的任务与口号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与友党今天所标榜的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党在这些任务与口号之活动，也就应该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友党对我还缺乏谅解，以及彼此都估计到在发展前途上可能的分歧，所以我党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合法地位，党的组织、机关和报纸等所有的合法范围，仍然是极有限度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构成我党在友党地区的工作方式之特殊性，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特殊关系。这里的重要特点是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合法可能给我们利用，但仍然有其一定的严格的限度。这种限度特别表现在我们常常不能以党及党员的面目去进行活动。

3. 在我党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如陕北边区等）。在这里，党的组织与工作都是合法与公开的，但由于外部反对势力的包围，以及内部暗藏敌人的存在，在党的某些工作部门中还需要秘密工作。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上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也有各种的变化。这在以后再说。

三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变

在一定历史时期，党与革命阶级的战略任务是不变的，但

是党的策略就常常变动。即是党与革命阶级达到战略任务之具体方式与具体道路，就常常由于党与革命阶级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内部的与外部的各种不同情况，不同条件，而发生变动。这就是说明党与革命阶级为达到一定战略目的，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之复杂性和变动性，要求党与革命阶级在活动方式上要“因时因地制宜”，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反对呆板与公式主义。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两种方式，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态。当着我们在决定采取公开的及秘密的工作方式之时，要求我们具体的去分析当时当地内外的各种情况与条件，才能区别党的工作何者应该而且可能公开？何者应该而且必须秘密？一般说来（只是一般说来），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方式之合法与非法，是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方式之公开与秘密的标准和尺度。即合法的活动一般是能够公开的，而非非法的活动一般是不能公开的，即是须要秘密的（注意在这里是包括成文的及不成文的法律在内）。

当我们切实去了解当时当地党与革命阶级内外的各种情况，并熟悉统治者各种法律之后，我们就有可能来决定：对于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有一些什么法律条文是可以利用的？什么工作组织和斗争方式是可以公开进行的？又什么是不能公开进行而必须秘密进行的？即是什么活动是统治者的法律所能容许的？我们可能采取合法的形式去进行，又什么是统治者的法律所不能容许的？我们必须采取非法的形式去进行。

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和党，它们的活动之合法与非法的限度，也不是不能变动的。因为（1）统治者的法律是用来压迫与束缚被统治者的，而不是束缚统治者自己的。统治者可以随

时随刻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意志来颁布或取消与改变某些法律；（2）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力量之强弱，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及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之变动，亦可以扩大或缩小党与群众活动之合法的范围。一般说来，在革命的群众斗争的力量弱小与败退之时，合法的范围就要缩小，而在革命力量强大与前进之时，合法的范围就可能扩大。因此党与革命阶级就经常注意到在可能条件下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及某些活动之合法可能性之扩大。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情形又是另外一样，即革命力量愈加强大愈加威胁它的利益与生存之时，它就愈加要来限制与压迫革命（即如目前法西斯蒂的现象，并不表示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由于敌我双方斗争形势的变动及党与革命阶级的前进或后退，使党与群众活动的合法的范围常常发生突然的变动。因此就产生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相互转变。党的活动之某些部门或各部门常常要突然间地由秘密转入公开，或由公开转入秘密。

个别的群众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也常常发生相互的转化。群众在开始时采用合法的形式去进行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常常走到非法的形式。而群众的非法斗争也可能逼使统治者承认这种斗争形式的合法化。

一般说来，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在环境顺利之时进行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在环境困难之时进行的，因此，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容易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困难的。

党应该估计阶级斗争的整个趋势，估计在最近将来党可能提出的新的任务及可能发生的环境的变动，由此而进一步的去估计：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何者会转向公开？何者会转入秘密？而预为准备与布置，使这种公开与秘密的相互转变成为有准备有组织的转变，对于党的工作是有重大关系的。这可以免

除或减少丧失时机，张慌失措及其他工作上组织上甚至生命上的损失。

四 非法的党怎样去利用合法的可能

非法的党利用客观上存在的合法的可能去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就是所说的公开工作。在反动的时期内，党的合法地位是没有的，党员也没有合法地位；但是各个党员个人在不暴露党员面目的条件下，还有可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合法的活动。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而适当的利用各种党员个人的合法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社会活动，那即使党是处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客观上给我们利用的这种合法可能仍然是很多的。在这种时候，党与党的组织是极端秘密的，但大多数的党员仍然要依照个人的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社会与政治的活动。这样，党就经过这些公开工作的党员，去深入到社会活动的各方面，去与比较广大的群众保持联系，去取得各种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刊物。这对于一个秘密的党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因为（1）每一个这样的团体机关和刊物，都可能成为党在群众中的重要支点和堡垒；（2）党只有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能与比较广泛的群众保持联系，并教育他们；（3）也只有采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更多的保存与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并且能够在群众中不断的去建立党的后备的组织。这样也就使得反动势力无法完全消灭非法的革命工人政党之存在。只有完全埋藏在亭子间中的秘密党是最容易被敌人消灭的党。

利用合法的可能，主要就是派遣党员去参加一切合法的社会团体和机关，即使这种团体和机关是怎样被反动派所把持的也不要紧。同时，还应该利用合法可能去建立各种合法的灰色

的社会团体和机关；并在这些团体和机关中采用合法的方式去进行活动——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在合法的可能的范围之内拥护群众的利益，指导群众的行动。

在合法的团体和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必须耐性的长期的保持自己合法的面目，而不能暴露自己与党的任何关系，并且要尽可能取得这些团体和机关，保持这些团体和机关的合法地位到必要的时期，因此，这些公开工作的同志必须：（1）要采用适当的方式去参加这些合法的团体和机关；（2）要采用适当的身份和面目出现，他们的工作方式，态度，言语，作风，装束，以及私人生活等都要适合他们的身份与面目。在不妨害党与革命的实际利益之限度内，以能够表示得最普通最一般为最好；（3）要采用恰合环境的公开合法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去指导群众的斗争，去执行党的组织给予他们的指示，而不要超过一定的合法的限度（如提出非法的要求，口号，散发非法的宣传品等），不能重复党内的工作方式；（4）要善于利用反动势力各派之间的矛盾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要善于采用适当的合法的方式去反对这些团体和机关中的反动领袖，同时又能善于敷衍他们；（5）要忠实于这些团体和机关的原来的任务（倘若这些任务不是根本上妨害革命的实际利益的话），尽可能保持这些团体的合法地位；（6）他们要保持与党的秘密组织之必要的联系，并受党的指导与监督，但要采用特别技能的秘密的方法。他们一般不兼任秘密组织的工作，只能使最少的人知道他们与党的关系，并减少他们与党的联系至必要的程度。

这样去利用合法，就是使党员及党的组织尽可能在合法的形式之下埋藏到各种群众中，各种团体与机关中去，并用合法的形式去进行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在情况允许的限度内掩护党的秘密组织进行工作。利用这种合法可能的公开工作应尽

可能扩大，并应尽可能是完全合法完全公开的（自然半合法的可能也应利用）去进行。因为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如有更多的合法可能利用去公开进行，就可以使得党的秘密工作部门减少和缩小到最低的必要的限度，就可以减少和缩小秘密工作的机关与人员及经费，就使秘密工作机关更易于组织。只有扩大公开工作的范围，才能缩小秘密工作范围；相反，如果缩小公开工作范围，就不可避免的要使秘密工作范围扩大，这在秘密党来说，是大大便利于敌人和侦探的。

党员参加在公开合法的团体和机关中工作，这些团体和机关有它们原来的组织系统和各种不同的职位，根据党员在这些团体和机关中的职位之不同，而有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之配合，有上层的合法斗争与下层的非法斗争之配合。一般说来，在上层负责的公开工作同志要掩护与援助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去进行工作，而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就应团结与动员群众去拥护与援助上层负责的同志（如果在有国会的国家，就有国会内的斗争与国会外的斗争之配合）。这种配合，是经过党的秘密关系和组织来达到。同时这种配合，依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要采用很技术的方法，因为如果超过环境的允许的一定限度以外，就要影响到某些同志的职位及这个团体和机关的存在。

五 秘密工作的规律

当着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都秘密的与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但是党员除开参加公开合法的团体机关及在群众中工作而外，必须还有一部分党员来专门担负党的秘密工作，组织党的秘密机关，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如秘密的刊物发

行、交通及党的领导机关等)。这些秘密工作是要有专门的人(主要是革命职业家)来作,而一般不应由担负公开工作的党员来兼任。同时党内的秘密工作方式与上述的公开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公开的群众中的工作方式绝不可重复党内的秘密工作方式。秘密工作者,他们一般不应在群众中露面,不应去直接指挥群众斗争,而应该长期埋头苦干。这些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在人员上及工作方式上划分清楚,而又经过一定的方式去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如果有人员上工作方式上的重复与混淆,对于一个地下党是有极大的危险。这不独可以破坏秘密工作与党的机关,而且也可以破坏公开工作与公开机关。

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律,秘密机关和人员彼此的联系及其与公开机关与公开人员的联系,须要遵守严格的一定的规定,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来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因为有敌人的严重存在,而且在党的组织内有奸细存在,秘密工作的任何疏忽,都可以引起党的严重损失。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一切规定的完全执行,才能使秘密工作具有妥当的确实性。

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定,大概须包括下列各项:(1)每一个党员和干部只应该知道他所必须知道的事情,而不应该知道他所能够知道的事情,随便将党内秘密告知不相干的同志及随便在党内打听秘密的事情,都是不允许的。(2)某一个党的组织或党员与上下级组织或与其他党员发生关系,须有详细规定。除规定应该发生关系者外,不许随便发生横的关系。(3)某些密码,代名词,记号,时间及其他技术上的规定。(4)各级党的组织的会议所讨论的事项,除开规定必要传达者外,不许参加会议者向任何人泄露。(5)在书面报告与文件传达中不许写人名地名及数目字,不要党员与干部名册,在必要作某些记录时以某种记号代替。(6)一般不要党的秘密文件,如必须时也

应该是不使泄露党的具体秘密工作者，而且在阅读后应即焚毁，在党的刊物与宣传品上，不要暴露党的秘密。（7）党的秘密组织以短小精悍为原则，切忌庞大杂乱，并避免同志间不必要的相互认识。（8）每个党员，要尽可能保持个人的合法地位，尽可能少使人知道他是党员，尽可能少使党内同志没有必要的知道他的家庭及履历等。（9）党内具体的秘密工作方式，不要在党内作一般的传达。

严格的划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并使二者在严格的规定之下联系起来，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并最高度的提高党内警觉性，这就使敌人的奸细在党内难于活动，即使不幸发生党内的破坏，也只会是部分的破坏，而不致牵及到全局。

秘密工作的目的，是要在反动时期保存与巩固党，并在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上，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和注意，去准备胜利的革命袭击。因此，对于秘密工作来说，切忌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的“革命的”叫喊（口头的和文字的）；因为这种叫喊，徒然刺激反动势力的警觉性，提高它们的注意力，破坏秘密工作，而没有真正的实际革命意义。我们绝不可把这种无内容与实际意义的空喊，与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传播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同等看待。前者是应该反对的，而后者则在不破坏党的具体秘密工作之限度内，是完全必要的。

党的秘密组织去指导公开工作同志之时，必须清楚估计这些同志的地位和困难。只能给他们以能够担负与完成的任务，和他们所能采用的方式，而不能给他们以环境不能允许的任务及方式。因为这些同志，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非法的内容与合法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和他们的公开的地位与秘密的党的组织之不可缺少的联系。因此，他们在合法的形式之范围内所能执行的非法党给予他们的任务，是不能不有限度的。给他们以过高的任务，是他们在合法的形式之内所不能执行与完

成的。

处在绝对秘密环境之下的党，应该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工厂作坊机关及农村中党的秘密支部中去，要尽可能把有指导能力的同志放到这些秘密支部中，尽可能减少依赖上级秘密领导机关的指导。这样，就可能使保存与巩固党的任务更易于达到，并能相当的去开辟党的工作。

六 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当着革命发展到严重的阶段，党的组织已经转入秘密状况之下，新的革命高潮暂时没有，保存与巩固党的任务被提出，如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须要执行严格的划分与规定。这时候在党内就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右的取消主义——合法主义，另一种是“左”的取消主义——非法主义。

什么是合法主义呢？合法主义认为党处在这种被压迫的时期，不应该进行非法斗争与非法活动，而只应该进行合法斗争与合法活动。他们把党的活动群众的革命斗争限制在敌对势力所允许的合法的范围内，抛弃与拒绝采用秘密方式的工作和非法斗争。他们被敌对势力的恐怖政策所吓倒，成为敌对势力的俘虏。即使他们也进行某些非法活动，但这都是为了要达到党的合法地位。然而在那种白色恐怖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之合法化，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完全的幻想。这种合法主义的思想，对于一个地下党来说，是一种取消主义，因为这时党与革命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法的，如果拒绝秘密工作与非法斗争，实际上就等于取消党的工作，等于取消党。

这种合法主义者他们不懂得在党的斗争未能使革命胜利，革命的任务未能解决，而党虽然转入长期秘密状态之下，但党原来的任务、纲领和基本的革命口号，仍不应放弃或降低，而

只应该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变达到这些任务、纲领和基本口号的方式与具体道路。但是合法主义者不愿改变党的工作方式，不肯进行秘密工作，而宁愿放弃与降低党的纲领和口号，去将就反动势力的法律，这就是放弃革命。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取消派。

什么是“左”的取消主义——非法主义呢？它与合法主义相反，是合法主义的另一极端。他们认为地下党的一切工作，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均须秘密的去进行，一切党员的活动，只应该是非法活动，认为在这种时期一切的合法斗争都是不可能的。认为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去采用合法的斗争形式，某些党员去参加与组织合法团体和刊物，是“机会主义，合法主义”，是“蒙蔽阶级意识的斗争形式”。即使他们也去参加或组织某些合法的灰色的团体，然而他们也是为了要去打倒与破坏这些合法的公开的团体，使这些团体变成非法的秘密的团体。他们在这种时期反对利用合法的可能，反对一切的公开工作和合法的斗争形式，把党与革命阶级的工作和活动限制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之内，使党脱离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机关脱离公开机关与群众组织的掩护，给敌人更容易的来破坏党。所以这种非法主义，也成为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另一形式，成为“左”的取消主义。

这种“左”的取消主义者不懂得党在被迫转入长期秘密状况之下，党的未完成的基本革命任务虽然不变更，但是党的工作方式必须变更，必须改变达到这些任务的具体方法与道路。他们不改变党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他们坚持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只用一种非法的秘密的方式去斗争，反对与破坏那些在反动时期成为党之极重要的支点和堡垒的公开合法的团体，所以他们除开破坏党的工作之外，不能达到任何的党与革命的任务。所以他们是“左”的取消派。

列宁在反动时期关于“无产者杂志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一篇文章上说：“在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完成这一巨大任务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与从右边来的及从‘左’边来的两种取消派作斗争。右的取消派说，非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要，社会民主工党的行动的中心，只应该完全是或差不多完全是合法的可能。而‘左’的取消派就把这件事情弄到另一极端去了，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在党的行动上没有存在合法的可能，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党的行动都应该是非法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党的一切工作。无论前种或后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他们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没有计划的适当的来配合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工作。不保存与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种情形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列宁全集》俄文本，十四卷，九三页）。

列宁又说：“保存与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基本的任务。一切都应该服从这个任务。只有达到了党的巩固，我们才可以为党的利益而去利用那些合法的可能”（同上，九五页）。列宁在这里为了保存与巩固党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的和“左”的取消派。右的取消派根本不要非法的党，自然就说不上在反动时期保存与巩固党。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时期只能是非法的。不要非法的党，自然就更说不上为党的利益而去利用那些合法的可能。“左”的取消派在反动时期根本就否认保存与巩固党的任务，不去保存与巩固党，因此他们不去利用那些合法的可能。在反动时期不去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巩固非法党的基本任务也不能达到。

不论是“左”的取消派或右的取消派，他们都想使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之活动方式限制在一定范围及公式之内，他们都不懂得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而必须毫无例

外的去使用一切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并且随时都准备迅速的由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右的取消派说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不要非法的秘密的活动方式，只能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之圈子内进行活动；而“左”的取消派就说，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不要合法的公开的活动方式，只能在非法的秘密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左”的取消派与右的取消派都这样把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活动自己束缚在一定方式之内，所以他们在反动时期内都到达于取消派。然而列宁却反对他们说：“第一，革命阶级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必须善于使用一切（丝毫不能除外）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须时时准备以极迅速的、突然间的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别一种形式”（《左派幼稚病》）。但是不论是“左”的取消派与右的取消派他们都不能这样去思想。

由于俄国的“左”右取消派都坚持自己的错误，列宁在当时不独是开除了右的取消派分子，而且从党内逐出了“左”的取消派——召回派分子。列宁后来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总结布尔塞维克党的经验时，认为开除这些“左”右取消派分子，是在反动时期保存与巩固布尔塞维克党及后来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列宁说：“布尔塞维克党之所以能如此（即保存与巩固党——刘），在其能够无情地揭破并逐出一般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退却的必要与怎样退却，他们不了解在最反动的议会中，最反动的职工会中，协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等组织中，学习公开工作之必要”。“假使布尔塞维克党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不能保持联结秘密的与公开的斗争形式之职责，不能负责参加最反动的国会及受反动法律所限制的各种组织（如保险储金会等），那末，他们在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间，就决不能保存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自然更说不到巩固和发展了。”（《左派幼稚病》）

七 中国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中国党除开游击战争外，也曾经过长期的地下工作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的经验。中国党也曾经一般的提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方针，反对合法主义与取消派，但在我们中国党内也同样发生右的取消主义与“左”的取消主义两种错误思想。

右的取消主义的代表者是陈独秀取消派及某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阶段已经完结，旧的革命任务已经解决，反帝反封建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在这种时期，主要的只应该作合法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只应该是参加反动的国民大会，成为国民大会中的反对派。他们反对非法的斗争形式，以至反对当时革命的游击战争。另外一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拒绝参加一切非法斗争与秘密工作，他们只在极有限度的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些文字工作。这些取消派分子曾经我党开除党籍，而现在他们中之许多人已经成为凶恶的反革命分子。

在另一方面我们党内就有一些同志犯了“左”的取消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与机械性及对于当时革命形势与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正确的估计而来的。又由于党内反对这种“左”的取消主义的思想斗争之不够，使这种错误在党内存留很久的时间，并曾给党以严重的损失。这种“左”的取消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

1. 当着党转入严重的地下的时期，不提出并且否认保存

与巩固党是基本的任务。不提出并且否认保存与聚积革命力量的必要。在每次群众的革命的行动之前，否认有严格估计斗争力量的对比及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必要。

2. 反对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及公开工作方式。认为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与公开工作都是“合法主义”，认为党只应该采取非法的斗争形式与秘密工作。认为党的一切行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只能是非法的。反对利用合法的可能。他们在党内进行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形下，所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合法主义，而是当时党所必须重视的那种合法可能的利用。

3. 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合法斗争形式是不可能的，或则只有极少合法可能机会利用，也是不值得重视的。他们不知道这种合法可能机会愈少，就愈值得秘密党重视的去利用。他们不懂得列宁这样的说法：“……现在与其说是在党的其他工作部门内合法可能性的问题，不如说是怎样去利用现有的合法可能性，对于党更为有益”（“全集”，十四卷，九五页）。

4. 他们在事实上反对利用当时政府颁布的工厂法、工会法上对于党有利的条文，否认这些有利条文是工人长期流血斗争争取得来的（虽然是微小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是很重要的）代价，而提出“反对工厂法，实行苏维埃劳动法”的口号。他们不懂得当时在大城市中实行（注意！是实行，而不是宣传）苏维埃劳动法是完全空洞的滑稽的口号。他们又反对在可能条件下去组织工人的公开团体，认为这种公开团体是“不黄不赤的中间工会或第三种工会”而抛弃。他们异常的不相信工人阶级，害怕工人群众一进行合法斗争，组织与参加合法的团体，就要蒙蔽工人的阶级意识。他们不懂得列宁这样的说法：“无产阶级参加的一切合法的机关，他们把自己阶级的

觉悟带进去，公开保护劳动的利益与民主的要求，并将走向力量的团结与整个运动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每一步的发展，教育、团结和增加掘自己坟墓者的队伍，并加强他们的愤怒”（“全集”十四卷，二五〇页）。

5. 他们非常机械与错误的把“不应将就公开而降低党的纲领和口号”的说话，应用到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与刊物上去，要这些公开合法的团体与刊物提出党一样的非法的纲领与口号，用党一样的非法的态度、言语、作风与工作方式，去进行工作，使这些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变成第二党。他们并且决议要一切公开合法的灰色群众团体，一律转变成为非法的赤色工会。他们在这里不懂得党与群众团体的区别，公开与秘密的区别。

6. 他们抹煞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性，而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完全混淆重复与等同起来。使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去兼任公开机关的职务，他们上午在公开机关办公，下午就到秘密机关办公。他们使许多可以公开组织的群众团体和工作都秘密起来，并且重复党的工作方式，这样就无限制的扩大了秘密机关，真正公开合法的机关就完全没有。又在党的刊物上登载党在群众中的各种秘密活动，这样就大大的便利了侦探和奸细，给敌人以无数的破坏党的机会。在完全取消公开工作与把群众团体也秘密起来之后，党的秘密工作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如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与群众运动，都同被破坏。

7. 他们不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对照，而与群众工作对照。他们说：“只有群众运动作好，才能使秘密工作作好”。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当时情况下，群众运动又如何才能作好的问题。他们不懂得秘密工作虽然与群众运动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到底还是两件事情。他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两

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党的秘密工作如果不好，在某种情形下是可能破坏公开的群众工作的。同时公开的群众工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可能破坏秘密工作，有时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与党在群众中的秘密的堡垒，而不能不相当的限制群众工作。

从上面看来，中国的“左”右取消派与俄国的“左”右取消派虽有各自的特点，但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就是中国党没有能够很快的克服“左”的取消主义的思想。这应该成为严重的教训。正如列宁所说，由于这种错误，“就决不能保存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这正是过去白区党绝大牺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左”的取消主义者也在形式上反对合法主义与右的取消派，但他们是（1）站在不正确的“左”的取消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合法主义；（2）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合法主义，而且主要是反对当时正确配合公开与秘密的那种行动和思想；再加上他们各种“左”的错误行动，如是他们在事实上不独不能真正反对合法主义，而且大大帮助了合法主义与右的取消派，给右的取消派以各种借口来攻击党，诬蔑党。同时，他们这种极“左”的思想在另一种情形下又转成极右的思想。后来他们甚至认为中国过去那种两个政权对立与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保存与巩固党是不可能的，白区党的组织之极大部分被破坏，以及无数同志之极大牺牲，是完全不可减少与不可避免的，是完全由于客观的困难条件所造成的。因此，他们的错误也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无疑，这当然是一种极右的思想。这种右倾的本质，又可以暴露在党员需要进行广大而残酷的武装斗争之时。在这种时候，原来极“左”的人，又表现他们没有足够的决心与胆量去确定与领导这种真正广大的群众革命斗争。这在中国抗战发生后党的工作中，也证明这一点。

八 几 句 结 语

利用合法，正确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对于一个地下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上的错误，不独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下去有效的准备革命，而且要使党的保存与巩固成为不可能。在中国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常常把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看成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中国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付了极大的血的代价，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党内还不减低它的重要性。每一个干部必须细心的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要了解过去的教训，而主要是为了要更好的去进行今后的工作。关于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文件，我们在国内国外还很少看到，因此，就更加值得我们在原则上和实际工作中去系统的研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进入新阶段的华北战争^{*}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彭 德 怀

一、华北战事形势的特点

(一) 在整个华北，敌人占领的主要的是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占领的主要是乡村和较小的城市。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包围着我们，我们的乡村和小城市又包围住了敌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犬牙交错的形势。中国的乡村同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同，一般的可以不依存于大城市而独立。过去的经验证明了这点，农村是可以持久的。

(二) 华北占有广大面积，众多人口，敌人因兵力不足，想同时“扫荡”整个华北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采取了分区“扫荡”。从去年九月敌人“扫荡”晋察冀边区开始，敌人已经用分区“扫荡”办法进行了一年多。我们利用敌人不能同时“扫荡”所有抗日根据地的弱点，当敌进攻一个区时，别的区可以起配合作用。比如当一区举行反敌人围攻时，四周各区就可以追随敌后、围攻敌人，这叫做“围攻与反围攻的合一”，使敌腹背受敌。

* 这是彭德怀在晋东南沁源县举行的决死队、牺盟会、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干部会上所作题为《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演讲的第四部分。

（三）在敌人不断“扫荡”中，我们采取不同的军事和政治的方法打击敌人。战争一天比一天严重，我们的经验也一天比一天丰富，敌人的消耗也必然一天比一天增多。等到敌人在“扫荡”中消耗到一定程度，再加上疲惫不堪，它就不得不退返交通线和据点休息，准备再一次的进攻。我们则乘此期间休养整补，增加力量，扩大占领区，准备应付下一次敌人的进攻，这叫做战役上的相持局面。今后由于战争紧张，相持地区可能缩小，相持时间可能缩短，但无论如何战役的相持局面，在今天在将来都必然有的。

（四）敌人在进攻时，如遇到大的抵抗，遭到严重的打击时，就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如果所遇到抵抗不大，那末敌人就采取跃进，甚至长驱直进，横冲直撞。敌人在战役和战术上的运用是颇为灵活的。在我主力所在的区域内，敌人的进度是很慢的，在非我主力所在区，敌人就进的快。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消灭敌人一个大队（营）为主，使敌人至少要以一个联队（团）为单位作一路进攻，倘若少于此数，比如以连为单位，那末敌人一师团就可以出几十路兵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困难。

（五）敌人在长期围攻“扫荡”中占领的据点和封锁线逐渐增多，而且联络较前严密，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敌人之兵力也因之愈分散，愈容易疲劳，增加了我们打击他们的便利，更容易接受我们的瓦解宣传。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大兵团运动将感到很大的困难，游击战、分区战和支队战的需要，就要增加。为了适应这个需要，大量培养团、营、连级干部的独立作战能力，是异常必要的。

（六）华北战争是长期艰苦的，犬牙交错的，此来彼去的，拉锯式的。这种现象要继续相当长久，不到战略反攻阶段是不会变更的。这是中国抗战创造的东西，在历史上找不到，在其

他各国今天也找不到的。

二、如何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

（一）要在华北长期坚持敌后抗战，首先必须有优良的正规军和普遍的游击队，正规军要质量上精，这其中政治质量是主要的。有些队伍不打仗，而多方扰害民众，这无异与日寇开路，这种正规军是不需要的。其次，我们为了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必须有普遍的地方武装，每个偏村要有自己的几支枪，一方面抵制敌人的别动队及经常袭扰敌人；另一方面可以镇压汉奸。这种地方武装逐渐扩大成为地方上的子弟兵，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转变为正规军，但是必须避免过早的转变，也不能是吞并。

（二）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还必须有三民主义的抗日政府。这个政府是抗日民族主义的政府，它必须坚持抗战到底；这个政府是民权主义的政府，它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个政府是民生主义的政府，它必须适当地改善人民生活。农民是敌后坚持抗日的根本力量，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政府只有充分地顾虑到这些基本人民的利益，才能算为真正的抗日政府。

（三）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还必须把一切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不论在敌占区或我占区，不论男、女、老、幼都要适当地深入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抗日军队、抗日政权和抗日民众三位一体的互相配合，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最重要因素。

（四）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还必须看到抗日民族战争前途将来可能更加困难。坚持敌后抗战，不能专门依赖外面的

接济。在军队中每个兵士不仅应当是战斗员、组织员、宣传员，同时还应当是生产员。在敌人后方不仅应当筹设小规模机器工业，同时还应当提倡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副业。只有用尽各项方法进行生产，才能在敌人后方长期与敌周旋。

（五）要加紧铲除汉奸，与敌寇阴谋作斗争。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必须提高，必须造成群众锄奸的热潮。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之间，更应当加意警惕，不令汉奸打进自己的队伍里来。汉奸混进抗日营垒中的事情已经层出不穷了。

三、军事指导机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指导原则

1. 军事指导上一个基本而普遍的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原则虽然本身非常清楚，但是用起来却不见得会。有人想保存自己，却不去想法子消灭敌人，结果连自己也保存不了。在敌人后方，想不打敌人而保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敌人打怕了，才有存在和休息的机会。有人骂八路军“游而不击”，倘若八路军真的游而不击，那末他会老早已不能在华北存在了，更不用说到发展。

2. 敌后作战指导原则，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消耗敌人为主，但不放弃一个可能消灭敌人的机会。在敌后进行长期无后方的战争，物质补充异常困难，再加上技术不如人，是不能采用以运动战为主的指导原则的。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进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恰好给了敌人以消灭我们的条件。游击战经常打击敌人，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作用是极大的。运动战则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消灭敌人，游击战帮助运动战造成有利条件。

3. 力争主动避免被动的原则，差不多人人晓得，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敌人来了，分兵把口子以拒敌，这就是被动，这就是在敌后进行战争所最忌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偏偏时常有人这样做。真正善指挥的不只能力争主动，避免被动，而且必须能指挥自己操纵敌人，善于脱离被动转入主动。要做到这步，固有赖于指挥官之英明，尤有赖于军队之良好质量。一般人看到了拿破仑打了很多胜仗，就以为这只是由于拿破仑指挥的优良，殊不知拿破仑倘若没有他那支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利益的农民队伍，他是不能如此打胜仗的。今天的军队欲求在抗日战争中永远争取主动的地位，首先就必须有指挥如意，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优良的军队，同时，指挥员必须从死背操典中解放出来，必须认真从当前的具体环境里，从中日战争的规律性里，研究出真正主动灵活的抗日战略战术来。只有这样的战略战术，才能与狡猾的日寇长期周旋。

4. 当敌人进行围攻“扫荡”时，我们采取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原则。我们虽居于内线作战地位，但不应当为这种情势所束缚。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运动防御”的办法。我们的目的是使敌人分进合击，扑一个空，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如果敌人各路已进至利害变换线，而没有暴露可乘之机，那我们就要毫不犹豫地坚决变换位置，要避免任何被迫进入战斗的情况，要用自己的积极动作，改变敌人的部署，为我们造成有利的条件。

5. 一个良好指挥员必须富于自动性，自动配合友军，自动打击敌人。指挥员不仅要顾到自己的局部，而且要顾虑到全局。在共同作战的友军陷入危险的时候，必须不待命令，自动地驰往应援，不然吃亏的也是自己。

6. 上级指挥员应当给下级以宽大机动，不要令下级事事都待命令。在敌后抗战的环境下，事事待命令就会失掉许多打击敌人的有利时机。上级对下级因机动专行去消灭敌人而吃了亏时，也不应过分责备，应当鼓励这种自动性。同时上级给下级的命令不应过分死板，要给以宽大的活动可能。一般的最好给以训令。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应当忠实，以便给上级以正确判断全局的可能。过去瞒上虚报的恶习，是应当彻底铲除的。

第二，战术指挥原则

1. 袭击为主要战斗手段

(1) 在未与敌接触时，必须秘密隐蔽使敌不发觉，一接触时要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与敌混战，使敌人的优良兵器不能发挥其特点。

(2) 火力要与运动密切配合，就是说在运动时间集中火力与攻击点，但是一般地应避免运动前的火力准备阶段。火力准备阶段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准备条件不完备的军队，去与准备优良的敌军作战，特别是袭击战，是不利的。

(3) 袭击不奏效，估计无法奏效时，应当机动灵活地适时地退出战斗。向某攻击点冲锋，亦不应超过三次，如冲锋三次而不奏效时，应另择弱点袭击。如果可能奏效，不要放走机会，要坚决消灭敌人。

(4) 袭扰不同于袭击。袭扰目的在于扰乱敌人，袭击目的在于消灭敌人。但当袭扰有机可乘时，即应变为袭击，不要放过消灭敌人的机会。

2. 进攻时选择弱点

在战术上进攻，应当先找弱点的消灭了，强的亦将变为弱的。倘若先攻强，就是攻得下，损失也必大，攻不下，则弱的也变为强的，更难攻了。

所谓弱，指的是敌人的兵力上比较弱，配备上比较弱，素质上比较弱，或者处在不利地形下的敌人，这是选择弱点应注意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为着取得消灭敌人，战术上应当保持以多胜少，就是双方兵力相等，我们也应当用小部钳制敌人的大部，而集中大部力量，消灭其一小部分。这样敌我兵力虽相等，结果亦变成比我少了。

3. 钳制与突击

(1) 钳制是以少数兵力吸引敌人多数于自己的当面，而使敌人误认为主攻。因此钳制的队伍必须积极动作，尽量吸收敌人于自己的当面，使突击方面易于奏效，而不是假攻。当钳制的队伍看到有机可乘时，可以变为真面目的突击。

(2) 在突击方面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之劣势兵力，保证以多胜少的原则。切忌平均使用兵力。战斗胜负决定于主要的方向，到处顾虑，结果没有一处打得好。

4. 火力袭击

火力袭击是在有利目标的条件下，用高度密集的火力，突然给敌人以重大损失，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大量杀伤敌人。但火力袭击必须事先有周密的充分的准备，最好的时机是敌人集合时，通过隘路时，或开始进入宿营地时等。根据当时情况，如由火力袭击造成消灭敌人可乘的机会时，就应坚决投入进攻消灭敌人。

5. 警戒与侦察的配合

警戒是消极的，侦察是积极的，但二者不可偏废，应配合使用。单是驻军的连哨、排哨、班哨是不够的，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部队应当经常派出侦察队，接近敌人，袭扰敌人，以积极方式侦察敌情，出没无常，使敌人一举一动都在我洞悉之中。我们要以侦察队消灭敌之别动队、游击队。

6. 疲惫敌人

在敌人驻止时，应当派出小部队，经常不论昼夜，不论风雨在四面袭扰敌人。我们只用少数人便使得敌人多数疲惫，这是异常值得的。当敌人退走时，我们则经常在敌人侧翼扰击，这样使得敌人行止都不得安宁，就造成了集中主力消灭敌人的机会。

7. 麻痹敌人

麻痹敌人就是使敌人对我们的情形捉摸不定，疑神疑鬼。主要的办法是：“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昼伏夜动，声东击西”用不着解释了。“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就是要有时故意采用许多方法，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兵力、驻地或企图，但又要适时地隐蔽起来，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神经错乱，而造成我主动消灭敌人的条件与机会。

8. 伏击

关于伏击，因为时间关系，不预备多讲，请参看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出版的《前线》复刊第一期，那上面有篇文章，我曾对伏击作过一个简要说明。我在这里只检出几点重要的来谈一谈：第一，伏击事先必须有严密而周详的计划，必须有详尽的布置；其次，侦察哨有关整个的伏击的成功与失败，最好由最高指挥官亲自担任；最后，在选择伏击地的时候，最好不要有房子及其他建筑物可为敌利用来做支点（因为我炮兵弱，敌人倘若据房子顽抗，常至不易迅速解决战斗）。居民多的地方也不好，就是消息封锁得好，也容易泄露秘密。

同志们，我的话就此结束。同志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都在讲话中试着解答了。对不对，还希望批评指教。

最后，我在结束这篇讲话时，还要着重地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新的抗战形势下，是丝毫不变的。无论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

坚持驱逐日寇至鸭绿江边，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坚持进步，坚持三民主义，为建立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到底。在过去我们是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在今天还是如此，在将来还是要如此的。我们的事业就是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事业。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事业，在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是一定会胜利的。

根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
刊印。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罗 荣 桓

一、欧洲大战

德、波、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与中日战争、西班牙、阿比西尼亚的战争都是不相同的，不管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没有和平的因素。现在的战争形势，是由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转变为帝国主义的大战。

苏、德协定：苏联的和平政策是真正的为了和平，本身方面为保护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弱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全世界人类的安全。而英法的“和平”是企图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准备战争力量，企图引起反对苏联的战争。苏联主张集体安全制度，不仅反对公开的军事侵略，而且反对以政治手段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反对一切的侵略政策。苏德协定的签订，虽影响英、法、美、苏条约的订立，而另一方面使侵略的德国放弃了对苏的侵略行为，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强大，德国不得不屈服。苏德协定的订立，并非放弃和平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建设，而且可帮助、团聚周围各小国、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推动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德波战

^{*} 这是罗荣桓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直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

争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发展必然的结果，并非苏德协定而推动的。

A. 由于苏德协定，拆散了德意日的防共阵线，给了英法以很大的打击。

B. 显示了苏联的伟大与帝国主义自取灭亡。苏德协定不仅是德国对苏联的屈服，而且使日本也不得不屈服被迫签订《苏日停战协定》。

C. 苏联在国防上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疆域扩大了，引起巴尔干半岛许多小的国家与苏联订立各种协定，许多小的国家倾向于苏联。

D. 在帝国主义大战的前面，对世界人类及被压迫民族解放以很大地援助。共产党人应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二、欧洲大战与中国抗战

1. 日本内阁的改组。

A. 平沼内阁是更加法西斯化，在国际上完全依靠反共阵线，对中国问题拒绝任何第三国的干涉。武汉沦陷后，引起英、法、美一致的反对，提出维护《九国公约》，特别是德苏协定后，给日本以很大的打击，使日本不得不改组内阁，以稳健派组阁。

B. 新内阁的外交方针，基本不变，某些虽然改变了，主要是调整国际关系。

(1) 调整国际关系，对苏联的屈服。

(2) 独占中国，以一切手段达到此目的（军事的政治的）。

(3) 在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本让步，威胁中国，对美国取和缓的外交政策。日本以野村任外相，独霸中国是基本的。

2. 英、美、苏的态度。

英国对中国问题：最近举行英、日谈判，对日本妥协，如法币在华南跌落，香港抗日分子被监视，上海事件，借款三千万元给日本，日本要求各国驻华军队退出中国，停止运中国货，或接济中国（安南河流、及滇越铁路停运）。美国宣布与日条约作废，给日本以打击，但在日本可能妥协的情况下，使美国不能继续干涉中日问题，在国防外交变更的条件下，甚至有可能使中国走上慕尼黑协定的危险，妥协投降分子更加动摇，亡国的危险仍然存在。但苏联对中国是可靠的帮助者，中苏关系更加亲密了，更进一步的改善了。

3. 日本对中国的政策。

独占中国是一贯的政策，所以它不顾牺牲一切的力量，企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好在国际上进行更大的冒险行动。日本对中国主要政策：

A. 巩固占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战争，开发经济，建立伪政权。

B. 对大后方以政治诱降为主（分裂国共合作，引诱中国投降），以军事打击为辅。由于它军力的不足，及其困难加多，对中国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可能少了，现已进入第二阶段，战役进攻仍然是可能的。但由于敌之政治阴谋及中国方面（指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亡国危险仍然存在。

4. 中国抗战的困难与危机。

A. 日本利用欧洲大战及英、日谈判，在某种条件下，压迫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在陆地上的接济可能完全被割断。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可能以大规模的战役进攻西南、西北，以军事威胁达到其政治阴谋，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妥协的实现。

B. 日本现强化伪政权、伪军队的组织，“以战养战”，达到巩固占领区，开发经济。

C. 这主要是由于国际上的变化，国内进步团结不够，敌人利用国民党防共、限共的政策来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

D. 倒退思想的增长，磨擦问题的普遍发生。

如果以上这些严重困难与危机不克服，将可能断送现在的相持，这是亡国的前途。我们应用一切力量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争取复兴的前途。

5. 克服困难与危机的方法。

A. 全国人民都不愿当亡国奴。抗战已二年多，这种民族意识更加深刻了。

B. 我们在敌人后方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并广泛的普遍的发展，给了敌人的“扫荡”以严重的打击。

C. 敌人在战役进攻中，不断的遭受了很严重的惨败，给了敌之政治阴谋以很大的打击。给了动摇者打了兴奋剂。

D. 蒋^{〔1〕}的态度和言论表示坚决抗战，“不参加防共战线”。

E. 苏联对中国援助的积极可靠。在抗战中的作用加强了。

F. 英、日、美在华的利益冲突，基本上是不能调解的，妥协是暂时的、局部的。

G. 敌人的困难，内阁三次的改组，国际地位的孤立，国内不稳定，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起来反战，反抗法西斯统治。

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并且在发展着，依靠我们各方努力，是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和危机的。

三、目前任务

1. 总的方针是中央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中央指出当前

时局最大的危险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下列之三大政治口号：

- A.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 B.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 C.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2. 为了实现三大政治口号我们应当：

A.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改革政治机构，改革经济，统一财政来源，抵制日货、毒品的流行。

B. 在正面战场上，应用一切的努力击溃敌人战役的进攻，实行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国民大会（真正代表民意有权力的）。

C. 对任何的动摇、怠工及对三大政治口号不坚决执行的现象作严厉的斗争。

D. 动员广大群众执行三大政治口号，改善宣传方式，深入广泛的宣传。

E. 坚持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F. 整顿党的组织工作，提高阶级警觉性，尤其是反映在军事行动方面，克服政治的麻痹现象及苟且偷安、惊惶失措的现象，加强政治教育。

四、部队工作

半年来的政治工作：

A. 依靠原有的政治工作基础，在分散工作中获得了部分的成绩。如扩大游击区，创造根据地。

B. 部队由于分散、新成分的吸收，形成了政治工作的薄

弱。表现：

甲、逃亡现象严重，除环境外，主要是政治工作薄弱，特别是对新部队的巩固工作。

乙、战场纪律松懈。

丙、教育制度废弛，完全忘记了检查报告制度，经济制度差。

丁、部队战斗情绪低落，特别是陆房突围的影响，我们大家应在头脑上武装起来。

戊、在战术指挥上的某些错误。我们应避免先被打了后再走，应实行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未行动前应有进攻的政治口号。

己、个别干部不能以身作则，自己张皇失措，不沉着。

庚、党的工作薄弱，政治敏感性差。

C. 实行由上而下的检查，健全政治组织，保持各种制度的建立，保证相当的集体领导，反对本位主义，对新部队的工作应很好地检讨。

D. 争取新部队充实主力：

甲、在八路军胜利影响下，在保持地方武装的前提下，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成八路军。

乙、军事上统一指挥，经济上统一筹募。

丙、不要抹杀地方武装的独立性，干部不应统统撤换，争取并推动他们按我们的做，反对过急的办法，同时也反对听之任之的办法。

丁、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他们实行改造，反对消极的态度，最好动员党员进去生根，建立党的工作基础。

戊、争取地主武装，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枪不离乡，但人走后，枪也不离乡，要麻痹地主。

己、反对硬拉硬编的办法。

庚、要让这些部队从战斗中去锻炼，去淘汰那些不健康的

东西；反对不游不击。

E. 党的工作：

两年来的发展，使党吸收了大批新成分，我们应：

甲、使党成为全国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乙、党的发展不免混入了一些异己分子。

丙、进行很好的清理，健全党的生活，严密党的组织，对于坏分子或同情者应很好的解释，让其自动退党。对发展党的工作应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反对拉夫的方式（支委决定“分配发展”〔分配数量到时完成任务的观点〕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发展组织。

发展组织应注意吸收同情者参加会议，对他们加强党的教育；同时提高党的警觉性，防止异己分子混进党内，制造党内不团结、分裂的现象。军队中党应改进与地方党的关系，帮助地方党。

F. 团结问题：

本位主义的结果造成部队的不团结。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罗荣桓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我们听了冀中口头报告和读了书面报告之后，认为有很大成绩，创造了很大的党和军队，发展了民运，建立了政权，使冀中平原成为了抗日根据地之一，所有这些都是冀中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中央路线与冀中全体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同时我们指出下列各点，以供你们的研究：

甲、必须正确估计到平原游击区的特点和今后困难的加多，假如对冀中抗战困难的加多，估计不足，忽视敌之政治军事进攻的加紧，那只会减弱党与群众的战斗准备。今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应当是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因此在军队方面，除三纵队整理一定数量的非地方化的正规化的主力团外，其它部队应当是与本地群众血肉不可分离的很多的小股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要有坚强的本地的领导者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成为坚持平原的广大力量，在地方工作中，除巩固我们乡村外，应该打入敌之城市与据点，建立短小精干绝对可靠的党的和抗日的堡垒。

乙、必须正确的把握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过去争取联庄会，对地主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是正确的，然而假如不认识地主阶级对抗战态度之变化和敌后阶级分化的过程，便不能实行正确的中立与麻痹地主的政策，反而可能把地主看成与工农同样

的抗日力量，在政策中可能不是基于工农力量出发，反而偏重照顾地主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不是麻痹和分散地主的团结，反而帮助地主组织起来，这样便使统一战线政策，失去了正确的阶级内容，使地主混入党政军民的组织，甚至偷得某些下层地位，阻碍群众运动之发展，歪曲革命政策之实行，今后应特别注意对工农群众采取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在救济水灾改善民生等工作中，把工农劳苦群众真正团结在我党周围，日寇正在加紧政治进攻，企图分化和瓦解抗战营垒，对已投降的地主，应加以法律制裁，对动摇的地主分子，应以农民群众的力量来孤立和稳定他们，而对工农群众则必须发挥其政治积极性，加强其组织，生活上给以更大的改善，以农救会为主要中心的群众组织，这样才能使党与游击队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对当地国民党，不应采取帮助其发展的政策，而采取抵制和孤立它的政策。

丙、必须整顿内部，在三纵队主力方面，应减少单位，紧缩机关，在清查干部中，应注意洗刷混入的敌探托派国民党及阶级异己分子。而对军人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犯有某些错误缺点者，则应加以教育，不可与上述分子混为一谈。在政治方面，应坚决不犹豫的改造区乡政权，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工农及可靠的分子手中，在巩固党的工作中，要尽最大努力来执行中央八月决定，应当停止党的发展而专心于党的巩固工作，反敌探奸细及托派的斗争，必须大大加强，要注意到冀中党的发展速度是很大的，党的组织极端的不巩固，不要认为干部已经审查过，不要再审查了，领导方式应适合战争情况，力求深入下层和了解下层。

丁、为帮助冀中起见，提议由分局从晋察冀方面抽调一些中下级军政干部及党的干部到冀中去工作。总之，在冀中党政

军民工作都有很大成绩和基础，如能改正个别错误与弱点，对于坚持冀中抗战与华北抗战，是有光明前途的。中央相信冀中同志定能完成这一任务。

中央书记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月)

中央：

关于四军工作问题有如下意见，请给项^{〔1〕}以答复：

一、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

二、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同时须多注意发展方式和方法，勿与廖磊增加磨擦（自然不能因避免磨擦而停止发展）。

三、在江南或在江北，应经常有坚决的自卫的准备，如部队遇到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

四、叶挺到渝情绪颇好，政治有进步。他坚决主张在斗争中求发展。

五、请中央及新四军设法给彭雪枫等以若干接济，以免引起地方民众对军队的反感。

六、关于新四军与友军磨擦，在目前只宜着重地方交涉，就地解决，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在重庆交涉不易解决。

南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项英。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

(一) 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否则也是不可能的。抗战以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有了相当广大的发展，因此扩大了党的武装力量，创造了游击根据地，生长了全国的进步因素，坚持了两年多的抗日战争。但同时严重的存在着几种错误倾向，这就是：(甲)注重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或者根本不把群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内，不去指导下级如何做群众工作，或者讨论与指示的很少。许多支部，许多党员，脱离群众，有根本不做或不知如何做群众工作的。(乙)在初步发展了群众工作的地方，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深入群众工作的讨论与指导，使群众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央责成各级党部，立刻纠正这些错误现象，使全体党员懂得，共产党只有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当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在可能发生的不利于党与抗战的突然事变中，不使党与抗战遭受意外的损失。

(二)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用全力研究并指导下级直至支部如何在当地进行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

级的群众工作，利用政府已经颁布的纲领法令及当地习惯许可的方式，尽其可能的使党的支部与当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接近起来，把他们一步一步的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同时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生活改善运动，哪怕是从极微小的改善开始，也是好的。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机关（保甲与联保）地方文化机关（小学及教育会）地方经济机关（合作社等）地方武装力量（自卫队及民团）应尽其可能使之掌握在共产党员，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的手中。这一切，必须在同当地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当地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在估计到可以长期保存党的力量积蓄党的力量而不破坏的条件下进行之。在国民党区域，必须使党的群众工作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才能进行，才有效果；而党的组织工作则须使之极端秘密起来，才能保存，才能巩固，必须使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严格区别而又适当联系，极力避免过去内战时期白区工作失败经验的重复。因此，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必须有步骤的，有深远计划的，既不懈怠又不冒进的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而不使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相混同的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以群众工作之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一切不了解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党部与党员，都不是好的党部与党员。关于沦陷区域工作，除应依照沦陷区特殊环境之外，原则上适用上述规定。

（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在政治改革方面，必须实行民选制度，凡一切阻碍民众运

动发展的人首先是地主阶级，必须在群众拥护的基础上，有步骤的排除于各级政府机关之外，而采取孤立他们的政策。只有工人农民抗日知识分子，及不阻碍群众运动的人才能加入政府办事。尤须注意区、乡、村三级政府的整理，因为地主及坏分子，最易冒称抗日，躲藏于区、乡、村三级政府机关之中。这样使政权民众化，并不妨碍我们与一切公正士绅及还能帮助抗日的地主商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例如鼓励他们捐钱捐粮捐枪帮助抗日及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连络等。所有各级政府的组织成分及其政治经济设施，各级党部必须认真加以检查。至于地方民众团体必须由党员领导深入群众内面去发动为着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依照自动自愿原则，将最大多数群众一步一步的组织于工会，农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及民众武装团体（自卫军少先队）之中，为参加抗日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而斗争。这些民众团体，负有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积极性的重大责任。当地党部，必须认真检查民众团体的工作。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委员与政治部，有积极帮助上述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责任，并须教育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不得有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不得有不尊重地方党政机关不尊重地方民众团体的行为，必须纠正把党政机关与群众团体看成军队办差机关的错误观念。地方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必须在一定时期之中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以其结果指导下级的群众工作。

（四）在目前时期中，共产党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根据上述方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克服投降反共危

险具有最后决定的意义。对于巩固共产党，对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深入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有可能。中央希望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对此加以严重注意。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在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邓 小 平

一、抗战形势与华北抗战。

(一) 区代后基本形势未变化，但投降妥协宣传公开了，如王宠惠、胡适之公开谈“荣誉的和平”。“荣誉的和平”即面子过得去之和平也。英美活动积极，英日谈判开始，美日也准备谈判。日外相野村是美国系外交家。国内反共活动未减轻，但同时反投降运动之增长抵制了王宠惠之广播及公布的新法令。投降妥协运动在发展，如不努力反之则前途危险。

(二) 投降妥协必首先牺牲华北，故反妥协投降即是坚持华北抗战之一面，必须把“反投降”、“坚持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两种口号联系起来，把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联系起来。

(三) 必须认识坚持华北抗战是非常困难与持久之斗争。华北敌后无相持阶段，而是时时连续的进攻与退守。困难还要加上顽固派的活动和我工作之弱点。敌军事“划格子”束缚我活动，加上政治进攻，如会门之被运用，及组织其他封建团体，利用汉奸托派挑拨国共关系。敌人又烧杀又怀柔，如计口授盐，经济上倾销日货，有计划地高价收买粮食，限制、缩小、削弱我根据地及抗日力量。华北顽固派遭到我反击并未放弃反共，反而采取更多巧妙方法，决心与我进行政治斗争。不要以为他们光是剥削人民，不懂政治斗争，他们也可能以一时

之让步，取得人民之拥护。这些是更厉害，更严重，更值得警惕的。他们的活动给我以鞭策，使我进步，弥补弱点，坚持抗战。

二、冀西环境与工作估计。

(一) 冀西工作已两年了。第一时期是我单独来搞。由于我政军党的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故第二时期是顽力量大于我。五月以来我又占优势，但为时不久，张荫梧之疯狂又打击了我们。八月半后我应大量开展工作，但尚未能很好利用机会。今日之局面严重并不亚于张荫梧在时。过去民众痛苦怨顽固派之搅乱，而今日则民众怨我们了。今日是我力量削弱，敌顽力量发展，民众逐渐离开我们。

(二) 形成如此现象之原因有五：

1. 从政策上说，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未站稳阶级立场，注意民生痛苦，并以此为中心。我未行“善政”，故未改善民众生活，反致民力枯竭，民生凋敝。

2. 我武装未积极打击敌人，加之纪律坏，故民众看不出我与顽军之区别，降低我威信，且纵敌活跃。

3. 党政军民机关干部中存在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及汉奸敌探，破坏抗日政策，造成失败空气，违反政治路线，损害我党工作的威信。

4. 党政军民指导机关缺乏应有的警觉性，工作多限于事务活动，不能研究问题，及早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武装工作之不合理关系影响了工作，一般各方隔离，工作不深入。

5. 党政军民配合不好，影响了工作。

三、今后的方针。

(一) 从各方面与友党友军比进步。友党友军之阻碍只是客观环境条件，我仍是优势，我能胜利，应从政策及设施上争取民众，这是主要的，不要光靠力量打击人，而忘掉检查自己

缺点。

（二）一切为着战争，发挥民力，巩固根据地。

（三）所有地方部队全部出动打仗，就是比进步，争取民众。

（四）一切重要部门要把握在可靠分子手中，党的机关要放在经过审查、考验、锻炼的干部手中。

四、政权与政策。

（一）迅速改造各级政权。村长民选是主要的，先从有保障的地方做起，树立榜样。原则是保障我提之候选人能通过。充分准备，集中力量，学习总部民众工作之精神。选举要与民生问题联系起来，使民众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知所鉴别。政府用各种方法，给予候选人以便利，培养其威信。清洗政权干部中坏分子，吸收士绅参加。注意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村子，不平板地做。要真正做，决不马虎。

（二）重新公布主任公署八大施政方针及朱彭七大纲领。要发动群众、各团体机关讨论。只有能坚决执行这些方针及纲领者才能当选。发动斗争，解决村长贪污、压迫人民诸问题。

（三）政府人员经常下乡，召集群众讲演、士绅谈话、座谈会，慰问抗属，解答群众各种问题，反对机关主义，加里宁每日以一点钟接见农民，力求“与民更始”。

（四）举善政，兴利革弊：

1. 低利借贷。使贷款真正落到受灾抗属身上，及落到生产者身上。依靠工会、农会，免被富农、中农利用去。

2. 提倡生产事业、工商业。纺织，解决棉花来源之困难，养猪羊，运销山货。根据军队及民众需要发展生产，鼓励民众过路买原料、盐等向山西卖。

3. 开荒。今年开荒，明年春耕下种。荒地属地主，农民不敢耕。应颁垦荒法令，规定土地必须耕种，不耕之田可归他

人借耕。借耕权首归抗属，次归贫苦者，借耕一年不纳租，以后荒地归原主。荒山，原主可归耕，否则他人垦荒三年不纳租不纳税。政府各机关自己耕种、开荒。防水治水等要召集老农会议。

4. 办学校，增加教育经费。训练教员，编教本，教员训练出来设法录用。教育机关要掌握在纯洁分子手中。

5. 节省开支。政府严格预算、裁员，村政府开支多些，小学教员优待些。地方武装经费经指挥部批准，党审查。补充连经费归主力负责。

6. 严禁游击队向民众索粮索款，敌区可筹，但须向政府报销。游击队不准在抗日现有区吃粮。

(五) 几件事情：

1. 政府设公安局。须由党决定、检查、批准公安局干部。其警察专司锄奸、保卫政权和党。县专署设警卫队司警卫，归公安局长指挥，其余武装俱归武装部门。

2. 改变派差办法。主力买骡子自己运输。所有合作社一律禁要民差。要差必经军队及政府开条子。要差不给钱，准予群众告发。

3. 募集公粮。募富有的存粮，到敌区筹粮，过路东运粮，同时赈济贫困，用上面政策舒息民生。努力完成筹粮计划。

五、武装问题。

(一) 编制原则。目前最基本的原则是着重统一。每县编一个大队，三四个连，每区一个中队，一个或半个连，每村成立游击小组，接敌区可有二三十人的精干游击队。游击队按人枪对半来编制。

(二) 干部重新审查，重新配备。审查干部的标准是政治第一，其次是敢打。

(三) 武装编制及改编。防止急性病，方法力求合适。地

方注意补充教育训练，主力帮助动员教育，同时反对放任主义。加强游击队的管理及纪律。

（四）整理武装，全部出动，应下决心不怕死人，不怕打垮。过去最大的毛病是不打仗，破坏纪律。群众最憎恨的游击队宁肯解散、缴械，甚至杀一儆百，以回答民众。

（五）各县指挥部成为二大队的系统建制。主力部队组织的游击队归所在县指挥，委派能力强的干部参加指挥。

（六）各县各级政府干部兼八路军游击队首长，这是巩固政府的办法之一。反对用武装来看门。

（七）保卫根据地，发展民众斗争必须要民众有枪，一县至少一二百条枪，保证村有二三条枪及其他武器。应逐渐设法解决民枪问题。

六、民众组织。

（一）重新审定干部，加强干部，原则上提拔与民众有联系的干部。

（二）各方尊重民众团体，提高其威信。

（三）政府依靠民众团体进行工作，培养民众团体。

（四）目前民运工作要注重自下而上地建立。干部到下边去，到民众中倾听民众呼声，协助政府解决民众问题。

（五）研究讨论民运工作。

七、统一战线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争取落后知识分子，如小学教员及可能抗日反妥协的分子。利用座谈会等“比进步”的方式争取之。

（二）采取各种方法争取士绅。由政府军队负责，可组参政会，使之参加，相当尊重及考虑其意见。

（三）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及民众知我之帮助及态度，以争取及孤立顽固分子。中心放在比进步，不放在消极抵制。

(四) 报纸应替老百姓说许多话，批评一些现象。

八、党。

(一) 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军政民的政治领导，真正做党的工作。

(二) 审查干部。

(三) 党政军民要有充分的战斗性，雷厉风行地干起来。党和政府环绕战争，保证军队之一切。党政军民上下掀动，造成热潮，彻底讨论，彻底转变冀西工作，创造、巩固根据地。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邓小平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秦邦宪等关于江南新四军主力宜向 江北发展给毛泽东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毛主席并转项^[1]：

甲、依目前国内政治情况看来，国民党内落后和顽固势力仍占上风，对我党我军关系估计只有日益变坏，虽然我们仍然在坚持着团结。

乙、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

丙、只有坚决而秘密的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

丁、建议新四军依此目的：

1. 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
2. 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
3. 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
4. 主要地区放到津浦路以东。
5. 指挥机关秘密江北去。

如何，请考虑。

博、凯、董、叶、叶^[2]

七日

注 释

〔1〕指项英。

〔2〕指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叶挺。

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张 闻 天

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马列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

为了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提出下列几个原则或一个基本原则的几个方面来说一说。

第一，党是群众（这里主要指工人群众，同时也指非工人的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它必须保持它的特性，不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或者把党看做是“超群众”的，因此不去巩固与增强它同群众的联系，使党成为与群众隔绝的、硬化的、宗派的小团体。或者把党看做同群众“没有分别”的，因此使党成为群众的尾巴，成为群众自发性的崇拜者，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这两种倾向，都是会使党趋于灭亡、趋于瓦解的危险倾向。

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是群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共产党人》第二期。

众的政治领袖：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二，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照顾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包括思想、习惯、传统、情绪等），把这个政治水平当做出发点，以接近群众，而同时党必须提高这个政治水平到更高的阶段，以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

党的工作对象是群众。因此，党必须从群众今天所有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决不能凭自己的主观的空想。群众今天同党所要求的比较起来是落后的，这就使党不能不去迁就群众。但这种迁就，不是为了崇拜群众的落后，而正是为了发扬群众的革命性，克服群众的保守性，提高群众到党所要求的更高的政治水平。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或者只顾空喊党的纲领、口号、马列主义原则，而不去了解群众今天的政治水平。结果纲领、口号、原则虽好，同群众却不发生关系。这是党内教条主义、清谈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倾向。或者只顾迁就群众今天的政治水平，而忘记从此出发去提高群众。虽是有人把这种倾向美其名曰“实际主义”，但这是一种庸俗的尾巴主义，同马列主义的实际主义是完全不相同的。

迁就群众，从群众今天所有的实际出发，是为了提高群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一个方面。

第三，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要求，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任，而同时党必须使群众从这种切身的、局部的要求的满足中去为了远大的理想（即全体的要求）而奋斗。

党要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任，不为他们今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利益而奋斗，是不可能的。群众决不拥护与信任同他们今天的切身问题没有关系的人。但党绝不能以群众生

活的局部改善为满足。党必须向群众解释：在现社会下面，不论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或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下面，群众生活的彻底改善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改造现社会，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由于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只顾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利益的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经济主义。另一种是只谈崇高的理想，而对于目前群众的要求采取消极态度的空谈主义。

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利益，而又领导他们去为了他们的最后解放的远大理想奋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四，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善于等待与帮助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了解党的指示的正确，以便能够同群众一同前进，使党在前进中取得群众的直接拥护。

对于群众，仅仅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只有当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党的路线正确时，他们才会赴汤蹈火为党的路线而牺牲奋斗。不把党的路线变为群众的行动方针，取得群众的直接拥护，任何历史上的重大任务都是解决不了的。但要使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党的路线的正确，就必须给群众以必要的实践的时间。这种时间由于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不同，有时可能很长，有时可能很短。党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善于等待与帮助群众的这种实践。这种等待与帮助不是要使群众停留在现状之下，而正是为了要同群众一道前进，以实现党的路线。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不愿意等待群众一同

前进，而只想由少数先进分子冒险冲锋的急性病与盲动主义。另一种是为了要等待群众一同前进，而消极怠工的自流论。

在群众前面，而又不脱离群众；等待群众，而又不做群众的尾巴：这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又一方面。

第五，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参加到一切有群众的群众团体中去，而又经过这些团体去实现党的统一的领导，同时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群众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党如果要组织最大多数的群众，它决不能拿一种形式，而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同时社会上现有的群众团体也很多，不论是公开合法的，或半公开半合法的，或完全秘密的。党如果要同那里的群众接近，它必须积极参加到那些群众团体中去。在一切这些群众团体的多样性中，党必须以自己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及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党必须力争对于一切这些群众团体的领导，反对群众团体离开党的政治领导而“中立”的观点。但这种领导的实现，必须经过每一群众团体的特殊性，建立在尊重它们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及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基础之上。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有些同志把群众单纯化，理想化，公式化，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组织他们，放弃到各种各样有群众的团体中去工作，而满足于只包含少数先进分子的、非常狭窄的少数群众团体。他们不懂得党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去实现对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领导。但在那些党已经取得领导的群众团体中，他们却又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

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他们不懂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

经过群众组织的多样性，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中，又能尊重群众团体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又能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又一方面。

第六，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的一切新的经验，以便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

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不断的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的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使党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同时，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党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党的决定；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党必须抛弃过去的决定，根据群众实践的新的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党是群众的教师，而又 是群众的学生。只有愿意做群众的学生党，才能领导群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但群众的实践，没有马列主义党的总结，只能成为一大堆混乱的原料。这种原料，虽是很可宝贵的，但不能帮助群众达到革命的胜利。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自高自大，藐视群众

的实际经验，不愿去向群众学习的高慢的宗派主义。一种是崇拜群众的实际经验，而在这种经验前面束手无策的狭隘经验主义。

向群众学习，而又能在学习中更好的领导群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又一方面。

* * *

为了正确的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的同志必须真正时刻的去了解上述的几个原则或一个基本原则的几个方面。是的，这些原则，看去好像是很简单的，然而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原来也是为矛盾统一律所支配着。党是群众的一部分，而又不是群众。它要迁就群众，而又不要迁就群众（提高）。它为了群众的今天奋斗，而又不是为了今天（明天）。它要等待群众，而又不要等待群众（前进）。是群众的领袖，而又不是群众的公仆。是群众的教师，而又不是群众的学生。多种多样的组织，然而又是统一的领导。何等生动的矛盾呵！矛盾的任何一方面，如果把它孤立起来，夸大起来，都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而党内成分的复杂，具体环境的影响，可能造成这种倾向发展的条件。所以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克服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正确的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能够解决完的，它要在不断的斗争中去解决。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不能放松的。但上述原则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指导这种斗争，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刘少奇关于彭雪枫部情况 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处并朱彭云逸转项^{〔1〕}：

来此连日听取报告，阅读文件，并在十月革命节大会上检查雪枫部之大部，所得情况印象如下。

一、雪枫基干部队七个团、一个总队、直属队，共有七千三百六十九人，枪支共四千三百九十五支，内轻重机枪七十挺，马一六五匹。

二、由地方党组织及收编之地方游击部队，用新四军番号者有两个独立大队（独立营），约二千人，枪支够用。

三、基干部队已开始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各种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服装整齐，情绪很好，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已具有老部队的各种优点，而弱点则更少些。雪枫及此间同志对部队中进行了极艰苦的教育改造与组织工作，他们有很好的改造土匪部队的经验。

四、部队纪律好，统一战线工作好，与民众关系好，且常能作战，已获得许多胜利，但相当大规模的战斗尚未经受过。部队还是新素养，连以下干部缺少战斗经验。

五、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年内扩大雪枫部二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作到。

六、请王谭滕^{〔2〕}从抗大学生中从速派二百人，参谋训练班学生三十人，通讯、卫生学校若干人来此，以便加强并扩大部队。团营连级之老干部，务请设法派些来。

七、你们有何意见，望指示。干部能派来若干，望复。

胡 服

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张云逸，项英。

〔2〕指王稼祥、谭政、滕代远。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西 反投降斗争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北方局、晋冀察分局，各区党委：

关于山西反投降斗争，有如下意见，请你们考虑实行：

甲、坚决不让步的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斗争之号召，已获得全党及新派的拥护，干部已觉得有出路，并已使旧派的反动气焰开始为之稍杀，证明克服投降危险是有希望的，以抗战压倒投降，以团结压倒分裂，以进步压倒退步，是可能的。此种胜利信心应在全党与新派中普遍建立起来，以理直气壮的姿势，坚决的有步骤的准备争取更大的胜利。

乙、但有下列缺点：

- (一) 一部分党员与新派人员尚无胜利信心；
- (二) 一部分党员与新派人员愤气不得发泄，想痛快干一下；
- (三) 若干地方党的领导，只是零碎应付，没有一定方向，没有通盘计划，没有适当步骤；
- (四) 若干地方若干同志忘记了拥护阎⁽¹⁾长官这个口号；
- (五) 新派还没有很好的团结；
- (六) 许多地方许多同志把旧派看作一模一样，不知道利

用旧派矛盾和未设法争取旧派中个别较开明分子及其中下层干部。这些都是这一期间表现的缺点。

丙、以后全党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 建立胜利信心，使全党及新派懂得只要方针与步骤无错误，克服投降分裂倒退是可能的；

(二) 使党员及新派懂得：不得其时不得其地的幻想的痛快干法是有害的，一定要坚决的有步骤的去干；

(三) 一定要有准确方向，要有通盘计划，要有适当步骤，晋西北尤应注意此点；

(四) 应把拥护阎司令长官这个口号与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口号联系起来，并使新派在每一具体斗争上的口号的措词，不要与党的口号在文字上完全一致，只求口号的性质一致；

(五) 仿照晋西南的例子，各地可以试行下述办法，即把每一地区内新派各种力量中间的主要党员干部组织一个五人至七人的小委员会，作为团结新派领导新派行动的核心。区党委应密切注意该区斗争的发展，并适当指导这个核心；

(六) 十分注意分别旧派中间各种程度不同的分子，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依照旧派分子表现的实况，集中火力，打击其最坏者，中立其动摇者，争取其尚有希望者，决不可把它们看成一丘之貉，尤不可把旧派的领袖与旧派的群众混同起来，不应该说某师某旅某团体不好，只应该说某人或某些分子不好；

(七) 对于最坏分子最坏行为，须毫不犹豫的坚决的但是有步骤的有胜利把握的打击之，如同晋冀察区坚决打击白志沂那样，决不可对这一类坏人坏事作丝毫的让步。

以上各项作为我们的建议，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形考虑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 向东发展给刘少奇等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胡服、德怀^{〔1〕}、项英、北方局：

甲、胡服同志十一日电悉，完全同意。

乙、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注意争取一切国民党与地方绅士之同情者与之建立合作关系，正确掌握统一战线原则，注意地方党的建立，注意新发展部队的巩固。

丙、为此目的，新四军军部应指导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罗如可留，以留他不走为宜）、周骏鸣诸同志，使他们明确了解上述任务。张徐罗周各该指挥机关应广泛招收地方上忠实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扩大教导队，同时军部应输送大批已训练好的青年及尽可能抽一批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去加强江北。

丁、为此目的，中原局应动员豫西、鄂北的大批忠实青年去彭雪枫部开办千人左右之学校，雪枫在当地应注意招收半知识分子。

戊、为此目的，北方局应立刻准备从抗大本校及一二两分校拨出学生七百人妥慎的送往彭雪枫处。

己、为此目的，延安亦准备供给一部分干部。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彭德怀。

中共中央电悼白求恩大夫^{*}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聂荣臻同志转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因医治伤员中毒，不幸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晋察冀边区逝世。我全党同志，全国同胞，须知白求恩大夫实伟大的英国民族之光荣的代表。英国民族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少数人；英国民族之光荣的代表者，实是英国无产阶级与加拿大无产阶级及其领袖，英国共产党与加拿大共产党。而白求恩同志，正是加拿大共产党派遣来华参加抗战的第一人。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的尊敬。今闻逝世，谨致哀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三期。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毛 泽 东

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三、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 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 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争，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军事上占领南宁，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分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

(二) 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的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

(甲) 在这些力量中，争取国民党中的进步领袖，保有革命传统的老同盟会员，愿意坚持抗战与团结的很多国民党军官很多中下级干部及很多党员群众，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第一个对象。必须使国民党中反动分子较有组织，而进步分子没有组织的现象来一个重大的改变。为此目的，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各个集团之间的各种冲突矛盾，发展国民党内部抗战派进步分子与投降派反动分子之间的斗争，而我们则

帮助抗战派进步分子打击投降派反动分子，打击最反动的少数人，以便逐渐组成国民党的左派力量，并使他们能在国民党中起决定政策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真能与国民党员大多数在一起去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

（乙）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中间力量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第二个对象。

（丙）组织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与组织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任务，是与我们用极大努力去组织下层工农劳苦群众的任务互相配合起来的，是与我们用极大努力去加强军事力量的任务互相配合起来的。

（丁）各级党部应该懂得，只有把上述各种抗战和民主的力量组织起来，达到必要的程度，并使他们互相配合起来，才能争取时局的好转，才能把时局好转的可能变为时局好转的实现。这一严重组织任务的完成是使时局好转的唯一步骤。

（三）为了完成这一严重的组织任务，以达到争取时局好转的政治目的起见，各级党部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甲）组织这些力量的基本政治口号，应该是拥护蒋^{〔1〕}委员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现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而目前尤须特别着重于促成宪政，将促成宪政的口号与团结抗战等口号密切联系起来。

（乙）组织方式，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而采用多样性与合法性，以能真正团结各部分力量于各种不同的组织中，而不致遭受反动力量的破坏为原则。

(丙) 在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必须帮助其中进步分子形成核心力量，必须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

(丁) 为了实现这一组织任务，各级党部必须用极大努力动员和说服那些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和同情我党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去认真亲近国民党干部及党员，使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影响和接近国民党嫡系非嫡系以及非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党政军领导人，使他们诚意地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在这里，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认清，不但接近国民党的各级干部及社会上的上层与中层分子，必须发动大批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即组织工农劳动群众与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也必须吸收大批的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使之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各级党部必须懂得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要性。

(戊) 为此目的，各级党部必须在同志中及同情分子中，尽量找出与国民党及社会各方面有较多关系的人，主要是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说服和打破他们不愿与国民党干部及党员群众接近的习惯，使他们深入国民党员及社会各方面去进行活动，以便认真地进行党的这一严重的组织工作。

(四) 各级党部必须认清，如果共产党不能克服党内党外严重存在着的那种骄傲的清高态度，那种同国民党员及社会各界人士格格不入的态度，因而不能认真地去亲近和影响国民党员与社会各界人士，不能更进一步地去组织全国各种抗战与民主力量，则我们党的经过统一战线经过国共合作以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我们党关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大多数及一切进步分子共同一起去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的政策，便将成

为空谈而无法实现，争取时局好转就将成为不可能。中央盼望各级党部严重的考虑这一指示，并采取具体办法切实执行。

（五）此指示系秘密文件只发到省委与师政治部为止，以下口头传达。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项英关于叶飞、张道庸部 过江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

一、已命令江抗主力一个团（老六团）及四团与管^{〔1〕}部各一营由叶飞、张道庸^{〔2〕}率领由扬中过江，向天长挺进，与五支队会合，本日正在运动中。

二、老六团东征后，战斗力很强，武器最好，每连有六挺机枪。必要时还可由一、二支抽队北渡，目前主要打通联系，以后无问题。

三、军部附近仅有三个团，但友军在附近有六个师（前川军三师，现加俞济时三师），不便抽调和减弱。

四、司令部及政治部仅我与周、袁^{〔3〕}三大头，余为新的，能力不强，并只有一套资本，走一缺一。冯达飞已到江北。下级干部可派一批，得力者甚少。

五、胡服^{〔4〕}同志应速到指挥部主持，徐海东快到四支指挥，罗^{〔5〕}仍留五支为好。江北缺乏领导中心，在政治上把握不住。

六、子弹已陆续送去四十万发，如交通便利还可陆续送。

七、江北政治人员少而弱，江南也是同样，中央与八路请设法抽几个好的主任去。

项 英

二日酉

注 释

〔1〕指管文蔚。

〔2〕即陶勇。

〔3〕指周子昆、袁国平。

〔4〕即刘少奇。

〔5〕指罗炳辉。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及 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发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胡服^①、雪枫及项英同志：

我们根据山东人的口头报告及书面文件，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提出以下意见望讨论执行：

1. 山东及苏鲁战区的党单独的创造了八路军及游击队，扩大了党，相当的组织了群众获得了几县政权，坚持了游击战争，建立了我党在山东在苏鲁的局面，这是党及军队各级同志努力的结果，这是伟大的成绩。

2. 但我们觉得有三个严重的弱点，即是：第一，我们过去没有利用良机大量的普遍的争取政权；第二，对反动分子的武装磨擦决心不足，最近已有原则纠正，但仍有些不足；第三，没有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使群众运动的基础直到今日还薄弱得很。

3. 估计山东及苏鲁的形势应当注意以下的特点：（1）敌人的军事“扫荡”及政治阴谋定会加紧。（2）友方的磨擦定会加多，国民党方面有增兵山东的可能。（3）山东及苏鲁全部差不多都是游击区，没有大块根据地，而且，我们与友军驻地相互交叉犬牙交错。（4）一般的说，我方与友方的军事力量是均势，在政权方面，我们尚是极大劣势。

4. 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

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山东与苏鲁战区的抗战，创造我们的伟大力量。

5. 为此目的，我们认为必须实行下列各项：

（一）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应当注意：（1）坚决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根据当地具体情形，发布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宣言，以政治优势压倒反共分子。对反共分子的正当磨擦与有理有利的武装斗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必要条件。（2）在敌后反共倒退的力量走向削弱，我们力量与进步力量走向发展，确是一般趋势，因此，应纠正下级同志间，因为国民党增兵而可能发生的恐慌失望或失掉我们严正立场的现象。（3）在反磨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分彼此间的各种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及其他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毫不犹豫的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绝不可让步。对中间分子如老同盟会及公正士绅等，应联合之，并发动其积极性。（4）对友军如东北军等应确定只帮助其政治上的进步，不帮助其力量的发展为原则。

（二）在政权方面应当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山东与苏鲁斗争胜利或失败的关键，我们向你们建议以下几点：

（1）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跑了，我军立即委任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然后再行民选，以树立新立政权。（2）在武装磨擦中，要注意夺取县印等物，以便委任新政权。但无县印，则立即自刻县印。（3）在民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中，直到反对汉奸与反动分子的武装抗日起义中，改造反动政权，建立

新政权。(4) 在群众拥护及我们有足够武装力量的条件下，即使旧政权还存在，我们应寻求机会委任新县长新专员，对抗日政权，不怕双政权现象。(5) 在还能用灰色面目，求得沈鸿烈、韩德勤、李品仙委任的地方，仍求其委任。(6) 在敌后下方级政权的独立作用已大大增长，因此，我们除自上而下的争取政权外，还应自下而上争取政权，决不应该放松争取县区乡政权的一切机会。过去是放松过许多机会的。(7) 在我们领导下的某处政权（如胶东三县），应该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区，极力扩大其影响于全省全国，多写生动小册子向国内散播。

(三) 在军队方面：(1) 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彭雪枫部，应当大大扩大，应当收徒手兵，在山东及整个苏鲁战区应当发展八路军新四军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应当毫不犹豫的执行这一计划。(2) 加紧主力的整训工作，使部队正规化。(3) 建立供给财政制度。(4) 游击队亦应使之逐渐多带组织性。(5) 由一一五师的正规部队内抽调二千五百人枪连同干部在内，组成三个单位，以一千人枪拨到鲁南支队去；以一千人枪拨到胶东去；以五百人枪拨到鲁北去，使之成为山东各支队的骨干。一一五师应有拨出这种部队的决心。出发时应伪装地方游击队，到达后，即编为各支队的一部分。

(四) 在群众工作方面，应当最坚决的执行中央十一月一日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并注意：(1) 在我们统治区域，应以党政军民的力量，真正改善群众生活，切切实实的执行减租减息，未实行者坚决纠正之。(2) 在反动分子统治区域内，应当坚决发动群众的改善生活的斗争，在这区域内，在有理有利及能胜利的条件下，发动群众武装的抗日起义是必要的。我们军队对于群众的这种抗日起义，应当坚决加以支持。(3) 在各种群众团体中，应把自卫团当作中心组织，把一切民间枪支

集中于自卫团，加上原始武器，在整个苏鲁战区中，至少应有武装自卫团三百万人至五百万人。

（五）在党的工作方面：（1）山东及苏鲁战区的党，还应扩大，但应依照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精选先进分子入党，防止投机分子混入。（2）据来人报告，党员中地主富农商人占了一个相当数量，应该加以审查，很适当的有分别的将坏分子洗刷出去。（3）纠正县委直到支部，除了发展党及党内教育外，便无工作可做的现象，应该经常讨论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游击队与游击战争的问题。（4）党的组织对地方武装，必须大大注意，要尽可能做到地委有独立团，县委有独立营，区委有游击队，支部则应建立游击小组或基干自卫队。党与武装斗争是一天也不可分离的。

（六）在战略部署方面，必须极力注意我们在鲁西南、在豫东、在皖北、在苏北地区这几个方面猛烈广大的发展。一一五师彭雪枫部及鲁南苏北支队应在这些方面共计发展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五百万以上的有组织的民众。一切有敌人而尚无友军的地方，乃至一乡一村都应发展进去，除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引起不应有的冲突外，应不顾一切猛烈发展，极力深入这一地区的工作。一方面造成武装与民众的长城，用以隔断山东顽固分子与国民党大后方的联系，以孤立这些顽固分子，一方面与江北新四军真正联系起来，迅速打成一片。

（七）极力扩大你们的学校，除朱徐陈罗^[2]雪枫及胶东各办大规模的军政学校外，各支队都应办教导营，广招青年学生及半知识分子。特委以上应办党校。最广大的训练干部，是你们的极重要的任务。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

〔2〕指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

军委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 方针给朱德等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朱左彭，陈林，彭罗，赵并告刘邓，聂，彭^{〔1〕}：

甲、晋西南阎^{〔2〕}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其详情如下：

1. 日寇占领隰县、大宁、蒲县后忽自动退出。
2. 正于此时，旧军六十一军、十九军、七十三军突然联合，由午城、蒲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六区新军一九六旅部。旅部三日在永和城附近被解决。在其他区域，旧军亦在积极调动，准备消灭新军及进步政权与进步群众团体。
3. 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

乙、我们方针：

1. 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2. 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
3. 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

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

4. 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
5. 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军委 毛 王^{〔3〕}

十二月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

〔2〕指阎锡山。

〔3〕指毛泽东、王稼祥。

毛泽东等关于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给徐向前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徐朱，黎江并告陈罗，黄，朱彭，杨，左，傅陆^{〔1〕}：

关于山东工作，除中央电示外，特提供下列意见：

（1）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2）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地正规化。用军队掩护、协同地方党，广泛地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钳制敌人。逐步补充主力，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以便应付较大战斗。

（3）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临时食之于民的办法不能持久，而且影响部队的作战及正规化。胶东银行可发纸币，兑成其他的纸币供给鲁南及其他地区之用。在取得政权后发行流通券及收粮、收税，以便有解决军队给养的长远计划。

（4）健全政治机关的工作，加强其与各支队的联系，明确军队的组织原则（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的又是中国人民的武装，不是统一战线的武装），一切最重要的干部，应当由党员充当。纠正军队中不正当的民主作风及地方党工作作风。

（5）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

员的学校，而尤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

(6) 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地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

(7) 与一一五师靠近的部队，可与一一五师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一一五师对于拨二千五百人给山东纵队，应当郑重其事地组织。对所拨干部与战士，应当给以很好的教育与解说工作。

(8) 对于已编入八路军的过去佛教会的武装之工作，应加以研究。一般地说，应当同化它，把宗教的武装变成进步的武装，建立这些武装中的党的组织，但应慎重和有步骤，以免引起反叛。

毛王滕谭^{〔2〕}

十二月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瑞，黎玉、江华，陈光、罗荣桓，黄克诚，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

〔2〕指王稼祥、滕代远、谭政。

朱德、彭德怀关于 击毙阿部规秀的战斗经过给秦邦宪、 叶剑英转蒋介石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博、叶转蒋：

号令二次电奉悉。

据贺师长龙、聂司令荣臻微辰电报称：谨将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中将战斗经过及出战官兵汇报如下：

一、当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辻村大佐）并附辎、炮各一中队共七百余，上月廿日进到三岔口（涞源南），被我杨成武支队歼灭之际，随即该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独立步兵第二、第三大队及炮兵二中队共一千六百余人由涞源来援，是晚占三岔口，其时辻村大队已被歼灭殆尽。是晚我杨成武部第二、第三团以有力部队监视和袭扰该敌外，以大部截断敌之归路，微日敌继续东窜占黄土岭。我为歼灭深入之敌计，贺师特务团由阜平附近在冰天雪地中星援，微晚该团赶到黄土岭附近，鱼日敌图东窜，数度向我猛攻，在我猛烈合击下均未得逞，反陷我包围中。是晚我向该敌猛攻，敌凭民房顽抗，激战彻夜。虞晨该敌以全力，在飞机七架轮番掩护下向东猛烈突围，企图绕五回岭回窜。正午该敌复被包围于上庄子，我在敌飞机猛烈炮火下向敌猛攻，敌死伤极重，阿部旅团长当被我击毙，以下伤亡约八百余人，敌已失掌握难立足。正我歼敌之时，复由涞源增援来敌七百余，合股激战竟日未能解决战

斗。同时，我已苦战多日，部队颇受疲劳，尤以弹药消耗甚重。齐日残敌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突围，经五回岭窜回涑源。

二、计是役敌伤亡旅团长以下千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五挺，迫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一部。

三、我伤亡官兵共八百余人，除杨成武支队伤亡官兵待查补报外，贺师特务团计阵亡第一营长马其寿，负伤四连长胡居元、六连长刘志德、二连政治指导员刘文云、副连长汪胡亮等五员。

四、查此次战斗中杨成武支队长、第一团长陈正湘、该团第一营长林必之、第三营长杨上堃、第二团长纪亭榭、该团第二营长熊尚琳、贺师特务团长杨家瑞等七员均表现极大英勇，指挥有方，迭挫顽寇，取得涑南战斗胜利。

祈予照章颁奖和抚恤，俾资鼓励为祷。

职 朱 德

彭德怀 叩

齐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南事件与 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为补充我们六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A、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1) 阎^[1]乘德怀^[2]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 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濬、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的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 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 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 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 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

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 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B、我们方针：

(1) 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2) 各有关方面，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拢杨赵。

(3) 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 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 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 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 口号应该是：

(一) 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

(二) 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

(三) 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

(四) 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

（五）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

（六）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

（七）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

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靖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八）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九）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3〕}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十）为巩固晋西北阵地，一二〇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王

十二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即彭德怀。

〔3〕指陈士榘。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紀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办了。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

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

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 X 加 Y 等于 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

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

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

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地区形势和工作部署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的电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处并项^[1]并致雪枫：

一、皖东情况已电告。在武汉失守前后，大约有好几月的时间，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我们是失去了历史发展这种特殊的窘迫，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

二、苏北情形我们尚不完全明了，大约韩德勤的基本地区是在淮阴、盐城以南，苏北部队主要者有：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一一七师共六个团，前驻盐城、兴化（省府驻）、阜宁一带，现大部到盱眙；税警总队两个团、渠上警察队一个团及几个常备旅，各县警备团，还有一些收编的游击支队，战斗力均不强。内中有少数对我们尚同情，在淮阴以北，韩德勤之部队似不多，而在直贯苏北的两条公路上又有敌人。

三、春圃^[2]率山东纵队已到皖东北，张爱萍亦在。我们在灵璧、泗县、宿县及洪泽湖边，已建立相当的基础。

四、目前在整个华中，我们有大发展希望地区如下：甲、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我们已令他在半年内发展至二万人枪。乙、豫东即彭雪枫活动地区，尚有发展三四万人枪可能。丙、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

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五、目前依靠皖东四、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以下的困难：甲、韩德勤已有六个团在盱眙、天长一带堵滞我们。如我们东进，他们亦可向东跟随。乙、安徽当局在皖东限制压迫我们，我在皖东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与后方，重要机关及数百人至千人的学校、教导队又有不能好办，给养亦困难。丙、如四、五支队扫敌东进至苏北，则后方难联络，皖东即会失去。且在苏北地区不熟，不一定能立足，太冒险。

六、因此以依靠豫东、皖东北雪枫、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并可与山东联系。

七、因此，我对工作布置的意见如下：甲、留四支七团及五支八团与无为游击队（均合法的）在皖东津浦路两侧活动。江南六团只到扬州、六合活动。目前皖东游击队统归七、八两团收编，每团约可扩大至三千人枪上下。我们任务是准备与加强皖东原来基础，与江南、淮北建立联系，吸引国民党的注意及韩德勤的部队，向南主要任务，不再向东大发展。乙、其余第九团、第十团、十四团、十五团来渡过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即配合雪枫部向苏北大发展，并云逸、季英、骏鸣^[3]诸同志留皖东，我与海东、罗、郭^[4]、谭希林、邓子恢诸同志并中原局及指挥部下一部干部均去淮北。在淮北办理大的学校，筹给养。再有可能，雪枫亦须人帮助，山东工作亦可多少帮助。（由于皖东的不稳固，中原局与东南局联系以至打成一片恐不可能。）丙、我们在淮阴以北发展，立定脚跟后，即可向南发展，又可吸引韩德勤部，向北即可配合七、八两团及江南部队向东北发展。

八、为了上述布置，已派谭希林率一个团去凤阳、津浦路东西侧侦察淮河沿岸情况，渡河技术及建立根据地。如我们确

定北游时，并可要雪枫南下××。

九、上述意见，我只和子恢、云逸商量过，他们同意，尚未正式提出讨论。如中央及项同志同意，请速电复，以便布置，并请秘密。

胡 服
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项英。
- 〔2〕即黄春圃（江华）。
- 〔3〕即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
- 〔4〕指徐海东、罗炳辉、郭述申。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

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纪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

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时局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 国际国内矛盾发展到今日，国民党正处在极大的动摇中，即动摇于亲英反共降日与亲苏联共抗日之间。现在日本急于想结束战争，国民党中的大资产阶级成分也急于想结束抗战。但国民党中与社会上的一般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成分则仍然不愿缔结屈辱的和平，还愿抗战下去，双方是在斗争中。

(乙) 大资产阶级为准备投降，已把限共政策推进进一步了。在今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的限共政策，表现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其实际执行中的，是以政治限共为主，以军事限共为辅，而在十一月国民党六中全会时，则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在这个军事限共政策下，国民党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发布了《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并用中央军直接对付八路军与新四军。以中央军九十七师攻取边区的宁县、镇原两城，以朱怀冰入河北，以顾祝同与韩德勤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在河南攻击新四军留守处，阎锡山为执行这个政策，已在晋西南公开发动讨伐新军的战争，并积极准备在晋西北发动这个战争。所有这些，均带着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准备投降的性质。

(丙) 在此种情况下各地的任务是：

第一、必须依照中央过去的指示，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

第二、深入群众工作，尤其在战区与敌后，要进一步依靠

群众。

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

第四、极力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

第五、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

第六、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丁）用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时局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

（戊）此指示只发到省委与师部，阅后即毁掉，下面由你们设法传达。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 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重庆 八路军办事处转蒋^[1]委员长，林^[2]主席，国民政府各院部长，中央党部，国民参政会，战区党政委员会，中央社，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转天水行营程^[3]主任，第十战区蒋长官，陕西省政府蒋^[4]主席，胡总司令宗南

兰州 朱^[5]长官

各战区各省司令长官、总司令、省政府、省党部、省参议会、抗敌后援会、新闻学会及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公鉴：

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尚是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之区域，其中包括陇东之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镇原，陕西之淳化、枸邑、郿县、洛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靖边、定边及宁夏之盐池，三年以来，均属八路军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事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

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被围两月，枸邑则杀人夺城，酈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已，安定则两次袭击，而绥米河防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所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然自七月蒋委员长令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磨擦从此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城略地之消息，又不绝于耳矣。蒸日九十七师千余人及保安队袭攻宁县，我驻军罗营长受伤，兵士死伤过半；寒日九十七师二千余人袭攻镇原，我驻军王营死伤百余，两城均被九十七师夺据。现复集中大军准备向庆、合进攻。陕西方面，则闻正在计划夺取淳化酈县，准备进攻延安。而其欺骗群众动员士兵之口号，则为共产党捣乱后方。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以边区论，共产党几曾越过二十三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枸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区区二十三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所望我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维护法纪于上，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于下，痛国亡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语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国事至此，唯有精诚团结，消弭内争之一法，否则影响前线之军心，动摇抗战之国本。敌攻于外，而自坏其长城，国脉虚危，而自伐其腑脏，我四亿黄帝子孙，真不知其死所矣！迫切陈词，敬候明教。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第一一五师师长	林彪
第一二〇师师长	贺龙
第一二九师师长	刘伯承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林伯渠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高岗
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叩
有

根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新中华报》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林森。
- 〔3〕指程潜。
- 〔4〕指蒋鼎文。
- 〔5〕指朱绍良。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在 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华中及江南工作，我们有以下意见：

一、形势估计见中央电示。

二、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从四五支队酌抽部队过淮河是很对的。中原局宜靠近彭雪枫部。在淮河以南地区则在巩固原有武装及阵地外，绝不放松一切机会去求发展。因此应从江南酌派部队及干部去增强之，以便胡服⁽¹⁾能从四、五支队抽四个团过淮河。但在江南部队未到达以前，胡服处似不宜抽得太多，由华北过陇海路以南的部队及陇海以南之地方党似宜由中原局指挥，以免不统一之弊，请北局具体考虑通知山东方面。

三、在江南方面处境是困难的，我们有以下意见：

甲、立即在部队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提高警惕性，以防局部的突然事变。

乙、军部各机关减缩非战斗员的成分，加强其防御能力。

丙、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及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

丁、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

戊、东南局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

己、这样才能使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江北及皖浙赣三

省边界的两条退路。你们应坚决执行这一计划。

四、应付磨擦方针，已见中央过去各种电报，但在华中及江南应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磨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磨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绝不轻言退让，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比较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不应向战区多作报告，不应向他们经常请示，许多问题应相应不理，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击之，不利时则应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再讲对付，同时大事宣传以争取中立分子之同情，以孤立反共最积极的分子。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刊印。

注 释

〔1〕即刘少奇。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陈 云

在党的六中全会上，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把学习作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一项任务。大家都接受了这个任务。一年多来，虽然进度不同，但大体上都在学习。交换一下学习的经验，对于今后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我们过去对于学习的意义了解得不够切实。比如大家读过列宁那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以为懂得了学习理论的重要。但是，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读了那篇结束语以后，实在使人感觉到列宁那句话又有新的意义，认识比过去切实得多了。

在实际上，我们过去还不曾把学习理论作为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虽然大家知道了学习是党员的一种任务，可是许多同志了解得还不深刻。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 这是陈云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章。

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高级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下列两种情形，哪一种对党更有利？一种是，一天到晚地埋头工作，不去找时间读书；另外一种，就是一天抽两小时来读书。我认为，后一种无疑对党更有利。因为你是老干部，有斗争经验，学习理论更容易把书本上的东西消化成为自己的，这样，领导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时，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级干部的身上，老干部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大家认识清楚学习的重要性，就应该想法挤时间来读书。

我们这些老干部如果要学习，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十年内战时代，在白区，虽有教材、教员，但因为白色恐怖，没有读书的环境。在苏维埃区域，虽然没有白色恐怖的不安，教员也有，教材也可设法找到，但由于战争频繁，读书的机会也不多。在今天，延安和某些根据地的读书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趁此机会读些书，增加一点知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来就悔之晚矣。现在无论怎样忙，为了把握伟大而又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增加一点革命的理论，增加一点历史的知识。

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

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过去我们许多干部，书拿到手上，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曾想法一句一句地弄通。

这样，没有益处，而且不能坚持，必然半途而废。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种力求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的办法，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对于初学的人，不要企图每门功课读很多参考书，那样读完一本书要延长几倍的时间，倒不如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

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

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读书最好有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

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 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徐 向 前

首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说粉碎敌人的新“扫荡”？这是在说明敌人曾经“扫荡”过我们，将来还要“扫荡”我们，过去是旧的，将来的便是新的。敌人是要一次、二次、三次的连续“扫荡”下去的。我们必须接受过去敌人“扫荡”中的经验教训，以准备粉碎敌人的新的“扫荡”。同时更要了解，敌人的新的“扫荡”，将有其新的特点。我们要估计到这些特点，使我们在进行反“扫荡”工作中，能获得最大的胜利。

(一) 新“扫荡”是必然会来到的

为能有效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必须知道“扫荡”的必然性，就是说敌人的“扫荡”是必然要来到的。只有肯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会敌人“扫荡”的严重性，才能切实地去进行反“扫荡”工作，我们一切粉碎敌人“扫荡”的工作才能有根据、有计划与有效果的确实准备起来。

第一，对中国进行侵略，要灭亡中国，是日寇早已确定好了的既定国策。无论田中义一的计划也好，广田三原则也好，共同防共维持东亚新秩序、中日经济提携共存共荣也好，以及

* 这是徐向前在鲁南一次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纲要，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四日山东《大众日报》。

“九一八”、“一二八”等一直到卢沟桥事件也好，都是为了要实行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而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手段。因为日本早在梦想成为东亚大陆帝国，成为独霸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其既定目的，敌寇就要征服中国，灭亡中国。今天日寇的侵华战争，并不是偶然的，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必然步骤。但日寇灭亡中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很明显的未能达到。我们不仅有大量的正规军在同敌人作战，而且在敌后方到处发动了成千成万的游击队，来打击、消耗、消灭敌人，所以敌人为了贯彻其既定目的，也就必然要进行“扫荡”，以肃清敌后的游击战争。这并非像一些顽固分子所说的“八路军希望敌人‘扫荡’”。我们比谁都不希望敌人“扫荡”，但敌人的“扫荡”却并不因谁的希望与否来决定，而是按着中日战争的持久性的逻辑发展的。它曾经来了多次，将来还要来。那么，敌人的“扫荡”既然是一定要来的，我们就得粉碎它！

第二，中国抗战，现在正进入到相持阶段。敌人在正面对我大规模的战略上的进攻，可能减少了。但在敌后方的进攻，对游击队的“扫荡”，却要相对的增加，而且日益严重起来。敌人过去在其占领区内，主要的只是点线的占领，现在敌人却正要求得全面的占领，确保其占领地。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内，大量的成立伪政权，大量的组织伪军，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以达其“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所占领地区内，尽量地抢掠中国的资源，尽量地搜刮民财，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但敌人要达此目的，确有其严重的困难，即敌寇的兵力不够分配，不能以少数兵力完成其统治的企图，甚至敌人已经占领的交通线及据点，有时都要被游击队破坏。因此，敌人为确保其后方的占领地，巩固敌后方的统治，对于“扫荡”敌后方的游击队是下了极大决心的。我们必须正确地估计到，敌人的“扫荡”与我们的反“扫荡”，在今天已成了敌我战争的主要形式，

而有着极重大的战略意义了。

第三，日寇的政治进攻日益激化，以防共统一战线来代替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敌寇因进攻中国的困难与日俱增，军事上无法速决，而战争愈延长对其愈加不利，所以必然要加紧对中国的政治进攻。敌人现在利用中国的旧政权的代表者、落后分子及国际顽固势力，来制造中国内部分裂，进行妥协投降活动，以求政治上的速决，变相地灭亡中国。敌人对中国的进攻既已变成了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为求其政治进攻的胜利，就必然要加强对敌后方的“扫荡”。敌人企图在确保其占领地，树立强化的伪组织与伪军，来构成对中国的政治进攻的有利条件。敌人加强其对后方的“扫荡”，是随着其政治阴谋的推进日益严重起来的。我们愈能坚持抗战到底，敌人的“扫荡”也愈会加紧。未到我之反攻时期，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停止的。

（二）新“扫荡”的特点

第一，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此阶段中，敌后方的“扫荡”更加严重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相持阶段中，正面相持的可能性增加，敌后方相持的可能性，反而减少了。在事实上已表现出敌人对敌后方的“扫荡”，日见严重与残酷。敌后方已变成了前线。过去在敌后方敌我的战斗还不是全面性的，在某些地区内，还存有太平现象，甚至连日寇都没有看到过。最近，敌我到处都在战斗中，敌人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差不多已成了正面的战斗。

第二，敌人的“扫荡”是连续性的，不平衡性的，间断性的，残酷性的。在反攻阶段未来到以前，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是要一次、二次、三次的连续“扫荡”下去的。不管我们能否粉碎敌人的某次“扫荡”，敌人的“扫荡”是要一再进行的。但因为我们的地区之广大，敌人兵力之不够分配，故

敌人只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集中较大的兵力，实行分区“扫荡”。敌人的“扫荡”是不平衡的，对于各个地区来说，同时又是有间断性的。敌人力求达到确保敌占区的目的，今后的“扫荡”也一定是更加残酷的。

第三，许多主要的城市交通要道及大的村镇，都被敌占领，将来还会日益增多。尤其是政治、经济、人口、物产、文化的中心地区多为敌占，敌人可用碉堡政策形成较巩固的据点与封锁线。但据点多，敌人兵力相对分散，也是于我们有利的，可择其弱点打击之。

第四，我们的游击区逐渐缩小了，被分割了。过去我们可以有相当大的整块活动区域，现在却被分割成许多的小块。我们的活动区域缩小了，困难也增加了，相反的敌人的活动区域在扩大。

第五，汉奸政权、伪军及敌人的特务机关更加活跃。现在到处可看到汉奸维持会的存在与活动，伪军虽有局部的反正，但伪军的数目，比较说是日为增加。敌人现正在积极扩大伪军，强化汉奸政权，及加紧敌寇特务机关的活动，这对于我们是一个严重的困难。

第六，一般地说来，敌人在分区“扫荡”下“扫荡”次数加多，时间短促，规模较小。敌人将多利用各据点的兵力，实行分路合击与袭击。但这并不是说，敌人不再有大规模的“扫荡”了。因为小规模“扫荡”时常得不到好结果，所以大规模的“扫荡”在相当的时间内还是要来的。

第七，敌人在将来的“扫荡”中，将多采取以游击战对我游击战的袭击战术。过去的“扫荡”因我活动区大，敌人合击距离长，不易达其目的。此后，敌人将在各重要据点上屯集兵力，进行短距离的袭击；同时敌人会更加强化交通联络工具，组织特种部队。这些都是敌人的新战术，须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八，我们估计，今后敌人将更多采取经济破坏、封锁、掠夺及毒攻政策。当敌人无法实现其“扫荡”、肃清我之目的时，就会把最毒辣的手段拿出来，实行大烧大杀的烧杀政策与封锁政策，在经济上困住我们。敌人更能收买大批汉奸，放送毒品、病菌，放射毒瓦斯等。这些办法，在各地区都在实行，以后还会加剧。

第九，我们的力量无论是正规军与游击队、地方武装，在质量上及其他条件上，同敌人对比起来，还处于劣势。在敌人“扫荡”时，尤其是在相持阶段的初期，不可能顺利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只能予敌人一些打击、消灭；而战役上的“扫荡”，大部分或全过程是敌人自行结束，而不是我们粉碎了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动员准备粉碎新“扫荡”的工作，只靠军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把政权、人民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才行。

第十，鲁南并不是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严格地说，目前还只是一个游击区。所谓抗日根据地，必须具备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在相持阶段中，敌后的相持可能减少，创造根据地的困难将日渐增多，但根据地依然是可创造的。目前在我们这边的游击区中，所有的游击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够，正规军只能起核心作用；政权还没有民主化，不能配合军队迎击敌人的进攻；民运也只是有一些发展，根本还是死气沉沉的（如好多村庄都不肯拆去围子墙），民众的生活还没有改善，不能实行合理负担；在顽固分子的镇压摧残屠杀之下，民众还未大量的组织起来，普遍化更谈不上。一切有生力量，还未动员起来，这是粉碎敌寇新“扫荡”的基本困难因素。

第十一，现在鲁南的磨擦，不仅严重，且日趋全面化。不是下降的，而是上升的。秦启荣打我们的三支队、四支队；共

产党与共产党员非但不能享受应有的合法权利，而且被杀害者时有所闻；我们的交通站、盘查站，被其破坏，并且造谣污蔑我们。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磨擦事件，未能合理解决，还在上升发展。这些磨擦阻止了民主政权的开展、民众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发展，对于应付敌人的新“扫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克服困难，准备力量，粉碎敌人的新“扫荡”，迎接新的胜利。

第十二，汉奸托匪到处活动，敌人特务机关更加活跃。敌人在用大量的侦探、奸细，混入我们军队中或地方上，从事刺探军情、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分化收买等活动。这种十分阴险毒辣的手段，敌人是会更加多多运用的。

（三）粉碎敌人新“扫荡”我们做些什么工作

（1）在动员上

第一，要首先肯定敌人的“扫荡”是必定会来的，没有一点含混，也不必打问号。现在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毛病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动员不普遍，不深入。我们一定要做到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晓得我们的具体口号。如：“动员一切力量迎击敌人新‘扫荡’”，“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只有粉碎敌人的‘扫荡’，才能巩固抗日根据地”等。

第二，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和平妥协。山东在一次“扫荡”中，有人说：“等三个月就有办法。”这不是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克服太平观念，以粉碎敌人“扫荡”的办法，而是助长太平观念，不晓得“扫荡”必然会来到，也不晓得怎样克服，以至放弃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至于妥协投降的人，根本就准备着做日本天皇的顺民了，还谈什么积极准备粉碎“扫荡”的工作呢？即有时谈一下，也不过是把它作为掩护投降的旗帜罢了。

第三，反对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在敌后相持性可能减少的形势下，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一定会增加，这实际上是“恐日病”的另一表现。事先不作积极的具体的准备工作，一旦“扫荡”临头，那便只有失败逃跑一途，甚至可能有少数人还会向敌人投降。同时我们更要指出，在前一次的“扫荡”中，太平观念最会阻碍工作，那么，在新“扫荡”中，失败逃跑主义恐怕要变成最大的危险了。

第四，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反八路，不仅在全国范围来说是这样，并且在苏鲁地区更为严重。我们要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因为这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叛贼行为，是毛延寿、秦桧、汪精卫的化身。我们坚决反对反共反八路的罪恶行径，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最坚决的，这是日寇也不否认的。反共反八路与妥协投降是不能分开的，反共反八路的行动就是企图实现妥协投降的准备。

（2）在军事上

第一，要在战略战术上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因为确定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原则，对坚持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是有决定的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指导原则，基本上是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在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的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第二，正规军和游击兵团，要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敌人的数路围攻下，单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集中机动的主力击灭敌人一路，或机动的来打击敌人。这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争取胜利的基本方针。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暗算，但要反对逃跑避战。敌人的据点加多，我们的活动地域便相对缩小

了。因此，我们要善于避免敌人大的合击，乘机打击敌人，保存力量，发展力量。避免敌人的合击并不是逃跑，倘若敌人一来便跑，就成了逃跑路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打击消灭敌人也不是硬拼，把自己拼完就算。我们要辩证地了解这个问题，要灵活地应用。利用有利时机与创造有利时机来打击敌人，不利时必须转移。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消极防御。只有机动地把握了这一原则，才能战胜敌人。在战略上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是进攻的。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寻战机，也是争取主动。像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自处防御地位，是不了解争取主动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作战等准备工作。要充实旧的力量，扩充新的力量，加强整训工作，否则，便粉碎不了敌人的“扫荡”。如果这些工作有保证，便有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有利条件。这些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对游击队的整理、训练与发展，主力兵团须要经常的有计划的去帮助，并使他们的干部得以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游击队，我们也要尽力帮助其走上抗日的道路，否则他们便要扰民害民，破坏抗日力量，甚至被敌人汉奸利用，走上汉奸的道路。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用政治保障军事的胜利，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无论主力兵团或地方游击队，都要加强政治工作制度，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准，加强其政治上的坚决性与积极性，使其在与敌人血战中，成为击不破冲不散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力量。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要注意到供给制的健全，以便在平日或战时都能应付有余，不至因供给上的困难，而妨害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其他关于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也须有充分的准备。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所到之处应有计划地帮助与指导地方游击队。游击队要帮助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抗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因此，便要大家密切合作，集中力量，打击敌寇，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相互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磨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这样，粉碎敌人的“扫荡”，才能确有把握。

（3）在政治上

甲、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政权。鲁南地区，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主要表现在政权还没有民主化，是落后的不合于抗战要求的，所以形成民众运动不能开展，军政工作不能一致。因此：

第一，我们应当动员民众来帮助政府，恢复、建立与巩固抗日的民主政权，帮助实行进步的法令与方针。只有巩固民主政权，才能动员人民的力量，保卫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不仅要在口号上、决议案上、大会演讲上帮助民主政权，而且要在具体工作上帮助民主政权。拥护三民主义与建国纲领，不应该只是在口头上空喊，应该在具体工作上来拥护。

第二，要进行团结各阶层的工作。抗日政权只有得到广大

民众拥护，才会有力量。要有力地发挥民主政权的作用，必须进行团结各阶层的工作。

第三，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一般工作制度。发扬民主作风，倾听人民的意见，调剂各阶层的利益，替人民作些善政，联系人民群众，反对高高在上的衙门制度。要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建立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合乎抗战需要并在人民中有威信政府。

第四，抗日政权的活动与工作，不仅应从山内扩大到山外，不仅在我游击区，而且应扩大到敌之占领区及敌之巩固区和敌占中心城市中去，以秘密方式来领导人民抗战工作。实行公平负担，免除苛捐杂税，调剂各阶层利益，制定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抗日教育文化运动等等，都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工作。

乙、动员民众参战。

第一，各种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应普遍地组织起来。军队、政府不应摧残它，只要它是抗日的，应尽一切可能给以帮助。在敌寇的经常军事“扫荡”与政治欺骗下，动员我国过去素无训练组织、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各抗日党派、军队以及热心爱国人士合衷共济，破除成见，一致努力才行。

第二，须积极动员民众参战，破坏一切铁路、汽车路、大车路，围寨碉堡要彻底拆除。这些围寨碉堡，敌据之我不能攻，我据之又不能守，在反“扫荡”运动战中，会成为我们的很大障碍。这些东西对敌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我们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说民众怕匪的问题，只要各地都组织自卫团起来站岗放哨，政权巩固地建立，民主民生不断改善，土匪自易绝迹。不过这种工作，因民众旧习尚未除尽，必须经过说服教育，万勿强迫。

第三，进行空舍清野、藏粮，加紧耕种收割，增加生产。将敌寇据点、铁路、公路附近多种高苗，敌寇据点附近粮食运藏远方，不卖粮食、棉花及一切资财给日寇，以打破日寇“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

第四，加强民众的抗日民族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不当汉奸，不当伪军，不给日寇作侦探。加强民众除奸教育，不让一个汉奸敌探混进我们的区域，也不准随便把汉奸帽子给人戴。

第五，调剂各阶层利益，改善民生，实行公平负担，发动优待抗属，反对对抗日家属的危害行为，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正规军与游击队。

第六，普遍成立自卫团，盘查汉奸，帮助与配合军队。

（4）统战工作

第一，要与各友党友军密切联络，共同工作，共同作战。

第二，要与友党友军积极协调，做好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三，要在困难中帮助友军，学习友军的长处，反对自高自大。

第四，加强对社会的统战工作，须以教育、说服、劝导的方式取得人民的帮助。

第五，对那些抗日第二、反共第一，违犯国策，专门制造磨擦，捣乱、破坏、杀戮八路军人员的顽固分子，必须向广大人民揭露其阴谋，使大家来认识其罪恶，在抗战洪流中把这一股逆流卷没下去。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徐向前军事文选》刊印。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节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毛 泽 东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

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

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

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

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

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

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們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

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

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小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 产 阶 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

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 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

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

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那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

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未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印。

国民党的防共办法与我们的对策

(一九三九年)

在抗战中，由于我国内部阶级矛盾之依然存在，就反映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战的认识、目标、方法、限度等的不同，形成在抗战中对立的两条路线。

资产阶级从它的阶级立场出发虽然不得不抗战，但它的目标，不是为真正求得全民族的彻底解放，而仅止于保持旧有的统治地位，它抗战的程度，也只限于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而不是收复一切失地。因此，它害怕广大的人民起来，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害怕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因此，它不敢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主要的依靠“自力更生”来驱逐日寇出中国，而幻想以外力来压迫日本帝国主义“知难而退”。

中国无产阶级是要在抗战中求得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因此须要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发动广大的人民起来，主要的依靠“自力更生”再争取外援，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便集中的表现为国共两党的磨擦。

国民党在抗战中为要利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不得不联共抗日；但又怕民众，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因此又不得不采取防止限止的办法，这便是国民党防共的来源。它防共的总方针是：在联共抗日的原则之下，实行防共、限共，以至溶共的政策。但为了抗战与统一，联共是主要的，其他是从属的。在此总方针下，更采取下列一般的防共

政策：

1. 加强与健全本身力量，所谓“以组织对组织”。
2. 加紧思想进攻，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主义，所谓“以宣传对宣传”（今后将更利用精神总动员为工具）。
3. 限止共产党（以整理民众团体办法及战事图书杂志更以审查办法为主要工具）。
4. 孤立共产党。打击与争取中立者。
5. 破坏共产党（利用特务暗杀、绑劫、造谣、公开的秘密的）。
6. 不承认边区，包围边区破坏边区，以达到取消边区的目的。
7. 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地区、饷械给养、人员补充，以达到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目的。

8. 不承认国共合作及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坚持一党专政。

针对着国民党的防共办法，我们的对策的一般原则是：

1.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反对和平妥协。
2. 用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进行思想上的反攻，争取舆论。
4. 坚持我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巩固和扩大党。
5. 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
6. 巩固边区，巩固和扩大并建立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7. 争取群众，争取友军。
8. 爱护与争取同盟者及同情者。
9. 争取民权主义、民主主义的实现，反对一民主义。

但国民党的防共政策，根据地区环境的不同，其实施的情形也不一样。因此我们应就国民党在各种不同地区的防共办法，更具体的规定我们的对策。以下分述之。

1 国民党在山西阎锡山统治区域的 防共办法及我们的对策

一、山西统一战线的环境。

1. 军政民各方面主要的统治者是阎，阎的下面有新旧两派力量大略相等，而新派发展前途较大，新派有新军，有牺盟领导下的一切民众抗日团体的支持，有三个专员区的政权。旧派有旧军，有大部分地区的政权，而无抗日党派的支持，但有豪绅地主的基础。阎的统治是建筑在利用新旧的矛盾上，利用两个力量的互相制约上以便于自己的操纵，在抗日国防的利益上，他需要新派，在防共与准备万一妥协的利益上他需要旧派，两派都是他不可缺少的。

2. 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是从来就遭到阎的抵制的，所以除晋南很少一角有中央军势力外，下部地区皆限制国民党的活动，国民党没有什么基础。

3. 我党在晋阎统治区域有不少的八路军并且是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我们与阎的合作是经过帮助新派的形式，去推动山西军政民各方面的进步，去巩固我与阎合作的基础。

4. 农村中农民群众与地主富农的对立，在很多地区相当严重，原因是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打汉奸有过左的地方（地主负担平均比战前增加五倍到十倍，减租有达百分之五十的）。同时敌人的分化利诱欺骗宣传影响，发生地主向敌区逃亡，或缩小生产，农民借不到手，政府财政收入日见减少现象。

5. 总起来说晋阎统治下的山西内部有以下几种矛盾：

A、阎与国民党的矛盾。

B、阎与共产党的矛盾。

C、国共之间的矛盾。

D、阎部下新旧派的矛盾。

E、农民群众与地主富农的矛盾。

这五种矛盾中，目前表现得最尖锐的是新旧派的矛盾。因为其他四种矛盾都透过新旧派斗争的形式而出现。

二、国民党的策略。

1. 阎与共的势力，均是他所反对的，他采取了瓦解阎以孤立共产党和拉阎反共，使山西力量中央化两个办法，他很清楚的看到晋阎统治区域的防共，首先是要弄掉阎的力量中央化。

2. 在瓦解阎的力量上，国民党正用各种方法分化利诱收买阎部下旧派军政干部，挖阎墙脚（傅作义部已完全离开了阎，王靖国、陈长捷部也有不稳现象）。

3. 在实行拉阎反共的策略上国民党一面用自己五中全会后溶共的精神及设施去影响阎，并尽力设法搜集共产党在阎下面发展的事实，以耸动阎反共。一面又令山西省党部的工作在拥护阎的形式下求得立足。积极向旧军旧派社会上层阶级中活动，掩蔽在旧派的活动下，去打击与消灭新派力量，来孤立共产党，这一策略也已经发生相当影响。

三、我们的对策。

1. 一定要看到晋阎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之进步性与重要性，看到阎被国民党力量挤掉后，磨擦更多，看到新旧斗争中在后面的阴谋。看到简单反对阎与反对旧派，是帮助国民党来弄溃自己的同盟者。所以一定要坚持巩固对阎的合作，坚持山西内部新旧力量的团结，来抵抗国民党弄掉阎以孤立我的企图。

2. 一定要减少阎与我的磨擦，减少新旧派间的磨擦，勿给国民党以挑拨利用机会。首先是我们在晋阎统治区域的工作，要遵守阎的领导，遵守阎的形式，要善于掩护自己的力

量，不要暴露，引起阎的恐惧。其次，是要帮助新派善于去亲近阎拥护阎，取得阎的信赖，善于去接近旧派不要把旧派看做国民党一样去反对，勿造成新旧尖锐的对立。其三，是要说服旧派不要离开阎，要在拥护阎团结山西内部抗战力量，坚持山西抗战口号之下去反对外来破坏、分裂山西内部团结的活动。其四，是要正确的执行团结社会各阶层抗战的政策，纠正在合理负担改善民生等问题中过左现象，以减少国民党依靠来反对我们的基础。

3. 国民党在山西成立党部，开展工作，应采取抵制方针，如抵制不了，当尽力争取变成山西式的国民党，把牺盟民先分子均大批加入，排斥中央蓝衣、CC分子的活动（因为他们是破坏抗战团结利益的）。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应使他是晋阎与国民党斗争的形式下去进行，我在后面推动，极力避免用国共直接冲突形式出现。

2 国民党在河北的防共办法及我们的对策 （主要在冀南区域）

一、河北统一战线的环境。

1. 一九三七年，平津、保定、济南相继陷落后，国民党党部政权军队，除直南丁专员一区外，完全退出河北，我八路军挺进华北驱走日军推翻汉奸伪组织，首先建立了冀察晋边区政府，继之建立了冀中专员公署，最后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并发动了冀东的伟大起义，这样就造成了我党在河北的军队政权，民运各方面均占着绝对优势，并继续向山东、河南新老黄河之间伸张。

2. 国民党从我在敌后抗战的经验，改变了过去对敌后完全放弃逃避的政策，积极来和我争取河北政权，于是委任鹿钟

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调石友三、高树勋部队到河北与我磨擦，明令取消未经中央任命所谓“不合法”的冀南主任公署，甚至过去已经中央承认之冀察晋边区政府，冀中专员公署亦有令取消，各县另委县长，强迫接收县政税收，各县恢复国民党部，企图统治民众运动。在八路军属二战区战斗序列理由之下，企图排挤八路军出河北，限止八路军自由行动，夺取八路军所发动起来的民众武装，极力争取当地士绅、地主、一切不满意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与共产党八路军的人（因此有许多汉奸也乘机混在里面，如张允荣），收编会门土匪来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工作。目前斗争最中心的问题是“冀南主任公署”问题，国民党中央坚持取消，而我坚持继续存在，这一内部斗争相当尖锐，不仅发生武装接收县政，一县两县长现象，到处屠杀共产党八路军分子现象，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现象，使得在最近敌人“扫荡”冀南的战斗中不能很好协调动作，遭到许多不必要的损失。鹿钟麟现虽狼狈的外退路西，而上述防共活动一点也没有放弃，国民党又增调庞炳勋部到晋城，有以庞代鹿的传说。

3. 在友军中也有矛盾，如鹿、张的矛盾，鹿、庞的矛盾（如争夺河北省府主席），石、高与中央间的矛盾（石非中央嫡系部队）。所以他们反共的态度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如鹿、张是想借反共来取得国民党的帮助发展的，所以特别顽固，庞还未得到省主席，对我态度也还好，石、高在过去曾经极力亲近我，求我帮助，今天受国民党及鹿策动和我争夺河北军政权力，态度又变得很坏。

4. “冀南的士绅大部分是商人，与我们接近总怕公平负担”，冀南的会门势力很强大，在地主豪绅领导之下，过去各村均有组织，公言保家不保国，不出捐不纳税，经过一年来的分化与争取，表面减弱了些，但基础仍存在，仍成为日

寇与国民党积极争取利用来反对我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某些地区实行公平负担，减租减息，禁止棉粮出口等有过左的地方和对地主士绅的排斥，不理态度也使地主士绅易为敌人及国民党争取来反对我，鹿钟麟更到处造谣宣传我在华北实行赤化共产。

5. 鹿钟麟的部下潜伏着大批的汉奸分子，所以他们的顽固行为不仅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指示，而且有着敌人的挑拨阴谋在内。

6. 河北内部的矛盾有以下几种：

A、国共的矛盾（表现在鹿钟麟与八路军的矛盾）。

B、国民党与其他非中央嫡系友军的矛盾。

C、八路军与其他友军（石、高等部）的矛盾。

D、各个友军之间之矛盾。

E、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

国共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是次要的附属的。

二、国民党的策略。

1. 他的方针是要先从八路军手中收回政权，以限制八路军在华北势力的发展，他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夺取了八路军所依靠的政权，便很容易来限止八路军给养，限止八路军扩大，限止八路军去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很容易削弱以至消灭八路军在河北的力量，所以一开始便是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来对抗与否定我在河北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政权。

2. 在这一防共活动中，国民党依靠来同我磨擦的力量，首先是全国中央政权的地位与名义，他抓住了“合法”、“统一”的理由，从上面来否认我从敌人手中夺回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说此种政权为“不合法”为破坏“统一”。其次是争取一切士绅地主阶级利用一切落后迷信势力，作他当地的

社会基础（会门土匪武装），从下面来反对抗日民主政权。其三是利用非中央嫡系的友军来和我“争地盘”，使二者互相对立互相削弱。

3. 鹿钟麟在河北执行这一防共政策的过程是：第一时期用“统一政权”名义和我谈判，企图一切都拿在他手中去。第二时期因我坚持不取消冀南主任公署，鹿遂在所谓“不合法”的理由下实行硬压，下令取消主任公署武装接收县政，一县发生两县长现象。第三时期因硬压命令不发生多大作用，遂采取打烂“大家干不成”办法，不仅许多地方发生双色案的县长，并且在民运武装各方面，也采取弄乱办法，如主任公署出布告收救国公粮，省政府出布告取消救国公粮。最近因敌人“扫荡”冀南影响鹿力量大削，乃另提愿与我再开谈判，河北政权成立“共同委员会”，名额分配他三人我三人，中央再派一人，实际仍是想要他占多数好来阻止我。

4. 可注意的是在敌人这次“扫荡”冀南中，鹿在中央严令之下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企图坚持留在冀南，直到最后没办法才过冀西，而河北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韩德勤现在仍留冀南，国民党又增调庞炳勋部准备到河北，可见国民党对河北政权是要继续与我斗争下去。

三、我们的对策。

1. 我们所创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退让反与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害的，结果只是有利于敌人。

2. 我们要用很大的政治理由来驳倒他所谓“不合法”与“破坏统一”的论据，在全国人民中广泛的说明违反抗战建国纲领，违反三民主义基本大略，破坏团结统一的不是我而是鹿钟麟，说明鹿在河北作了些什么？八路军在河北作了些什么，说明八路军应该“干政”，应该在敌后抗战有“机动自由”，说

明冀南主任公署应该存在，说明冀察晋边区应该存在，说明敌后抗战的两条路线，一条是我们的，巩固统一战线，军、政、民团结一致，实现三民主义纲领，一条是顽固分子的，完全背道而驰。要用这样充分的政治理由来抵制国民党中央政权的优势，来打击顽固分子的活动，来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来达到最后改变中央政府的命令，统一河北的军政指挥，争取由朱、彭^①来主持，这是我们的工作方向。

3. 在实际斗争中我们不把斗争简单只有八路军与之对抗，主要采取动员民众力量，来反对他，主任公署是民选的，普遍发动群众来对主任公署拥护与对省政府抗议。华北一切磨擦目前很难解决，只有仍拖下去，用一切努力，深入各方面工作，巩固我在各方面的基础，主任公署边区政府更要多给民众作些好事，取得民众热烈拥护，只有实际把民众把握在手里，才能最后解决问题。对顽固分子的继续磨擦，决采自卫手段，并进行某些必要的反磨擦，在磨擦中使我的力量更发展，顽固分子力量更削弱。

4. 关于共同委员会问题一定要坚持我实际占多数，一定坚持在主任公署存在原则下谈判，庞、鹿矛盾可以利用，但二者均是一丘之貉，不需要助庞去鹿，我们是要争取将来河北能由朱、彭主持。

5. 对石、高友军仍尽力争取合作，推动其进步，改善军民关系，至少能在我与鹿（国民党）磨擦中中立，若彼等仍随鹿走，只有正当防卫，只有听其在抗战中削弱消灭。

6. 团结各阶层，争取更多的同情者，使地主绅士不被顽固分子拉去反对我，不受日寇挑拨利用，这一问题极重要，因此对于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商业流通……等等行政经济政策要注意能巩固团结，要纠正某些地区过左的办法，对地主绅士不理与排挤态度以及乱打汉奸现象。

3 国民党在山东的防共办法及我们的对策

一、山东统一战线的环境。

1. 山东有我散布全省相当强大的山东纵队，但公开在我支持下的政权只蓬莱、黄县、掖县三县，秘密参加者有八九县，我在政权上的力量极薄弱。过去曾就胶东蓬莱、黄县、掖县三县成立北海专员公署，以后在沈鸿烈“统一政权”的劝说之下，自动取消，党及群众团体的组织也还很薄弱，因为过去整个党集中注意组织部队工作，未能更多注意发展党与巩固党组织。

2. 山东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中，主席沈鸿烈是积极靠近中央以求发展的。八个行政专员都是国民党员，只厉文礼、张里元两专员对我较好，其余均很坏，特别是秦启荣、蔡晋康两专员不断与我武装冲突，企图想消灭我部队，至于解散民众抗日组织，捕杀抗日干部，更是习见的事。山东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反八路军活动，很多是与亲日派配合一致的，不仅在他们后面有日寇的阴谋策动，就是这些人可能有很多是掩藏的汉奸分子。沈鸿烈及各区专员新组织之地方武装不少，惟战斗力弱，纪律极坏，在敌人进攻中不断削弱，正规军主要为东北军于学忠与缪征流部，于、缪的态度是不满蒋^[2]，畏惧共，想联沈以求在山东立足，而沈积极拉拢东北军来对付我，这样便形成了今天在山东东北军的办法，完全执行了沈的路线，也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山东国民党的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利益派别冲突，但在反共一点上除个别进步分子外均是一致的。

3. 一般民众对八路军信仰极高，而地主士绅在筹给养、减租减息商业流通，“打汉奸”反对贪污，清查账目，改选区村长，改编乡村武装等问题上有很多站在敌人或国民党方面来

反对我们的，这里一方面属于他们阶级基础的顽固性，一方面是我们政策有不慎重的地方和对于他们的争取不够。

4. 山东内部的矛盾有以下几种：

A、国共的矛盾。

B、国民党内各派各军的矛盾。

C、国民党与东北军的矛盾。

D、东北军与我们的矛盾。

E、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

国民党与我的矛盾是主要的，表现于沈与八路军的磨擦问题上。

二、国民党的策略。

1. 国民党以沈鸿烈作代表，在山东防共的办法是紧紧抓住省政府“合法”的地位，利用中央与省府的“合法”权力，来否认我之一切活动，说此种活动为“不合法”，所以北海专员公署应该取消，部队应该归他改编或解散，应该服从他的指挥，群众抗日团体可以用“不合法”来解散，抗日分子及我党党员可以任加罪名屠杀。他最近正标“统筹给养整理军队划分防区发动抗战”的计划下把我部队的防区划在沿铁路的邹、滕、曲、泗等汉奸区域，以便易为敌人消灭，于学忠也赞同此决定，沈派兵队压迫包围我某部离开原来住地，禁止我自筹给养，禁止我进行民运，想在这样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封锁中，使我在山东的部队走向消灭，同时拒绝山东以外的八路军再开入山东。

2. 山东国民党政军内部虽包含有很多矛盾，而沈现在的策略是努力缩小内部的矛盾，以便一致防共，他不仅尽力拉拢东北军，并且对于我接近之张、厉二专员最近也实行某些让步，以孤立我。

3. 山东国民党顽固分子，认为他们今天在敌后的主要工

作，不是抗日，不是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是肃清共党在敌后的努力，以等待将来全国实行总反攻时，再行抗日，便不致使山东为共产党拿去，这一工作方针，不仅客观上是帮助日寇的，而且从许多事实证明，顽固分子确实是与日寇有密切勾结的。

三、我们的对策。

1. 过去北海专员公署自动取消，以及在许多地区混乱无政府时不成立抗日民主政权是一大失策，以后应利用时机恢复山东专员公署，及争取其他地区政权（在战争混乱时），否则军队的给养扩大民运等问题，均将受到很大束缚。对于目前秘密打入政权的干部应善于掩护，蓄积力量，勿轻暴露。

2. 我已经取得的阵地，不能轻易退让，特别是在武装与政权问题上，更不能轻让，因此不能接受沈的整军划防办法，要按照实际抗战利益主动的决定发展方向。

3. 对山东顽固分子，磨擦活动应看清他后面有敌人的策动，或客观上完全是在帮助敌人，必须给以反磨擦，必须在反磨擦中抓住机会削弱以至消灭这些准汉奸的政权武装力量（如秦启荣、蔡晋康）。特别是在他用武装向我包围袭击时要将他彻底解决，因为我若不消灭他，他时时都在待机消灭我。

4. 巩固下层民众基础与争取同情者的工作十分重要，要加强群众团体的组织与工作。（现在许多组织是抄名册的工作方式，是强迫命令的，在敌人进攻时便瓦解了。）要争取区村政权的改选，要用群众的压迫来反对顽固分子的活动，要把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密切同抗战联系起来（胶东报告说农民只对改善生活问题积极，对抗战动员不热烈，另一方面又同地主绅士严重对立），要注意我们的财政政策与改善民生要求，能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争取士绅参加救亡工作，不使他站在敌人与顽固分子方面来反对我，要注意争取会门工作，这些工作又

与党的巩固与扩大又是密切相联的。

5. 对东北军应尽力利用原来历史关系去争取他脱离顽固分子影响，去推动他进步，要让他认识坚持山东抗战与打回东北去，必须与八路军亲密合作才有出路，若随走与我磨擦只有消灭。党在该军的组织内工作，力求短小精干，勿过暴露，引起疑惧是可能争取其转变的。

4 国民党在华中的防共办法及我们的对策

（主要是河南并包括湖北、安徽）

一、华中统一战线的环境。

1. 那里一部分已成敌后方（如安徽、苏北），湖北一部分是战区，一部分是接近战区，敌人新的进攻就要到来，可能都变成敌后方（如郑州、洛阳、南阳）。

2. 国民党在鄂豫皖苏有长期统治的历史，有强大的基础，所以在战区及接近战区的政权、武装、民运，全统治在国民党手中。并由于华中游击战的发展是在华北游击战广大发展之后，国民党知道如何准备敌后方的工作，如何预先布置，阻止共产党，甚至敌人也知道如何利用汉奸掩蔽在抗日名义下，更容易进行破坏抗日力量的工作（如汉奸组织以抗日名义出现）。

3. 那里一部分过去是苏区，但党在华中的力量，远不如华北，分布不平衡，敌后方的党更弱，虽有一部分我们队伍，力量也不大，名义太小。

4. 国民党在华中有好几个派别，主要是CC、复兴社，过去内部有斗争，现在共同对付CP，一般表现顽固，但也有个别同情CP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开始组织吸收所谓好的KMJ加入，有把他成为KMJ核心的企图。

5. 河南在过去程潜统治的某一个时期，尚有一部分进步

势力（李此章等），尚有些活跃现象，由于顽固分子势力伸张，由于蒋溶共政策的影响，由于我们对于同情者的使用与爱护不够（未从长期工作上着眼布置），由于我们的工作方式不适合，不知掩蔽力量与蓄积力量，只图一时干个痛快，所以逆流一来，便抵抗不住，所有进步的团体学校均被解散，各机关进步的分子大多被撤职警告，甚至扣留，大部分中间分子跟着逆流倒退，或者是出于投机，或者是出于不得已。一切民众活动全被统制（经过保甲与党部去统制），强迫一切公务人员均须加入 KMJ，均须填具保证书声明未加入任何党派，才能就职。设立各种训练班，强迫公务人员及学生受反共训练。到处压迫捕杀我方干部，企图吞并我所组织的武装。在豫北甚至发生围缴我修武游击队现象。所以河南现时的空气非常反动。卫立煌继程潜职后，对反动现象，无所改变。卫的行为，全看蒋态度转移。河南的中央军队，一般还进步，而县长专员则尽是 CC 分子。湖北是国民党原有基础的地方，反动情形略同河南。

6. 安徽方面，政权军队都是在桂系李宗仁、廖磊领导之下，一般表现进步。军官在抗战中生活思想有很大改变（平民化，想当民族英雄），政治设施也较开明，能用章乃器等进步分子。国民党顽固分子以方治为首，正积极向安徽伸张势力，设立党部，争取民运领导，组织别动队，在军队中成立政治部，进行特务工作，反对一切进步势力，不直接反对李、廖，而反对李、廖所倚靠的进步力量（现在与章乃器冲突甚烈），军队中军官与政治部冲突也极利害。由于党在安徽的力量很弱，所以暂时不成为安徽国民党顽固分子主要进攻的目标，李、廖公开对 CP 与新四军八路军态度还好。但坚决反对我党力量在安徽的发展，尤其不允许在他军队中发展（青年军团千余人，不许有 CP 分子），廖磊最近受蒋防共政策影响，曾发表演说，要各地尊重党部，制裁我三民主义倾向。

7. 华中统一战线内部有以下几种矛盾：

A. 国共的矛盾。

B. 国民党与其中央嫡系军队的矛盾，特别是和桂系的矛盾。

C. 桂系与我们的矛盾。

D. 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

E. 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力量与顽固分子的矛盾。

在河南国共矛盾是主要的，在安徽顽固分子与桂系的矛盾是主要的。

二、国民党的策略。

1. 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华北游击战争发展经验，预先就准备在敌占后县长不走，他的任务不是在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是“专打所谓游击队”，阻止我在战争情况下发展当地抗日力量。

2. 在他今天完全统治的区域，是要绝对禁止我活动，只要发现是 CP 分子便逮捕或屠杀。强迫发展国民党员。利用政治部监视与分化收买非中央嫡系军队。组织别动队，利用保甲来统制民运，凡受我影响之民众组织，一定要取消。在他今天不能完全统治的区域，则进行阴谋挑拨破坏活动（如在安徽）。

3. 他们公开说，要在目前镇压共产党员是不能生效的，但打击共产党的同情者是容易的，所以他尽力打击我的同情者以孤立我。

4. 对桂系在安徽的势力，不直接提出反李、廖，而是打击李、廖所倚靠的进步势力（章乃器）以削弱桂系力量。

三、我们的对策。

1. 顽固分子在华中的活动，是由整个国民党防共方针的影响。整个国民党今天在抗战中的政策，一般包含有进步的与保守的两方面，顽固分子专发挥他保守的一方面。但我们还应

看到他进步的一方面。我们的策略是要在长期合作，长期磨擦中，发展他进步的一方面。坚持巩固统一战线的方针，争取国民党成为民族革命联盟的前途。不因为目前顽固分子之磨擦而冲动破裂或无原则的退让妥协。我们力量的发展，只有在巩固合作中，与进行必要磨擦中，才能达到。二者缺一不可。

2. 对于顽固分子的策略应该确定，只有我在各种情况之下，能采用各种方式和他斗争，能将他打败，才有统战可讲，才能争取更多的中立与同情分子。而且今天同个别顽固分子的决裂是不会破坏整个统一战线的。尤其要认清今天顽固分子在华中的一切防共布置，他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想要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完全是妨碍抗日力量的发展，替敌人扫清道路，即令他主观不是如此而客观结果确是如此的，所以更应该坚决抵抗不可。

3. 争取同情者的工作十分重要，还要善于帮助同情者巩固同情者地位，抵抗逆流。善于爱护同情者，给他保守秘密。使用他勿超过一定的尺度，才能保持他的地位。同顽固分子的斗争，有时必须避免用党与八路军正面冲突，而表现为民众力量或进步力量与顽固分子的冲突。但有时也必要由党及八路军打先锋，才能振起同情者抵抗的勇气。

4. 对于那些站在利用观点与我合作的力量（如李宗仁），我也应提高警觉性，站在利用观点与之合作，对于他们的帮助应该小心，对于今天安徽进步势力与顽固分子的斗争，我们应该支持进步的一方面。

5. 华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工作布置，要从长期合作，长期磨擦出发。要看到工作的发展是曲线的，有前进时候也有后退时候。在环境顺利时，不要只图一时痛快放弃一切秘密工作，在环境逆转时，不要悲观失望，失掉坚持巩固阵地的信心。在今天华中工作一般的方针，是要多注意掩蔽力量，蓄积

力量埋头苦干，以待战争情况之变化。

6. 过去在某些地区战争混乱时，国民党政权军队都走了，我们没有乘机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武装，是很大失策。今后当先有准备，在敌军进攻某地时，一定有一两星期乃至一月的战争混乱状态。我应抓住这时机，迅速建立抗日政权与抗日武装，这一抗日政权与武装成立起来后，尽可能的取得合法名义保持我的领导，如合法名义得不到，也要坚持巩固发展下去，不能退让。顽固分子硬来消灭时，看力量情形或给以严重打击，或游击转移，暂时避开原来住地，免得被其吞并。

7. 许多友军中自动的反对政治部的现象是对的，因为今天政治部的工作，不是巩固部队，而是弄烂部队。

8. 在许多反对顽固分子斗争的问题上，形式上是反对中央的，这是应该的，因为统一不是与落后看齐。

5 国民党在游击战区的防共办法 及我们的对策（总结）

一、国民党在游击战区的防共办法。

1. 根据华北华中一切磨擦材料，很明显的看到今天国民党在敌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偏重防共，而不是偏重抗日。因此只有破坏与打烂我在敌后坚持抗战，创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2. 国民党为了破坏与打烂我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采取了以下各种办法：

A、凭借中央政府权力，来否认我各种工作，说此种工作为“不合法”与“破坏统一”，来取消我所建立与支持的抗日民主政权，来限制八路军，不得自由移动，不得自筹

给养。

B、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

C、争取地主士绅，落后迷信势力（如会门土匪武装）及一切不满意抗日进步势力的分子为他的社会基础。

D、打击一切进步势力和对我同情者以孤立我。

E、故意造成军政的不一致，指挥的不统一，以妨碍非国民党嫡系抗战力量在敌后的发展。

F、政治上造谣诬蔑，并采用特务工作方法来破坏削弱我在敌后的党、政、军、民各种抗日组织力量。

G、对某些可能变为敌后方的战区，也预作严密布置，不让我在战争局面上得到扩大力量机会。

二、我们的对策。

1. 首先是要在政治上广泛深入的宣传敌后抗战两个政策的斗争，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证明违反三民主义大法与破坏统一的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

2. 更清楚的抓紧政权工作，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已经建立者，要坚决保持并加紧各种巩固工作；未经建立者，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建立。

3. 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当更求巩固与扩大，才能坚持华北的抗战，坚决反对一切损害削弱八路军力量的企图。要绝对保持党的领导，保持机动自由，保持给养不缺，对不惜武装冲突者，以严厉的打击。

4. 加紧进行争取友军（非中央嫡系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阴谋。

5. 要尽力争取同情者，避免孤立，并且要在和顽固分子斗争中善于帮助同情者，善于使用同情者，善于保护同情者。

6. 要慎施政策，团结社会各阶层，争取敌后地主士绅不被日寇及国民党顽固分子利用来反对我们。

7. 斗争的力量与形式，主要倚靠群众，而不单纯表现为共产党八路军与国民党的磨擦，真正把握住群众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所以要用各种努力加紧巩固我党所领导的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群众基础。

8. 在不同地区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内部主要矛盾的不同，应有不同的斗争方式：

A、在我力量占主要领导地区，是坚持已得阵地，从各方面深入巩固工作，严正的打击顽固分子的磨擦，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最后逼使国民党改变其对这些区域的破坏政策。

B、对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统治地区，应深入下层，埋头苦干，掩蔽力量，蓄积力量，以待战争情况变动，抓紧机会发展的工作方针。

C、在进步的友军势力占主要统治地区，我们的力量与工作也要注意，善于掩护。要赞助这些友军内部团结，来抵抗国民党分化削弱的政策。这些地区与国民党斗争的形式应该表现为进步力量和顽固力量的斗争，而不是我直接与国民党冲突。

9. 要从长期抗战，长期合作，长期磨擦的观点，去布置各方面的工作，才能在环境顺利时准备下环境逆转时的基础，不致弄昏头脑，一切暴露；才能在环境逆转时，把持得住，不致悲观失望，冲动决裂。

10. 对顽固分子在敌后对我所进行的磨擦，只有采取坚决和他斗争的方针，将他打破，使他的势力削弱以至消灭，才能

坚持敌后抗战，才能在敌后创立抗日根据地，才能真正去巩固全国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朱德、彭德怀。

〔2〕指蒋介石。

论军事思想的原理^{*}

(一九三九年)

左 权

关于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许多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为了要说明我们军事思想的基础，为了要指明我们一切军事工作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的指导原理，我不能不把关于军事思想的问题提出来。

我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一切军事思想，当然也是马列主义的，我们把战争理解为社会生活的一种现象，虽然战争有它自己的特征，但是它却和其他的各种社会生活一样，是依存于社会矛盾的法则发展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关于战争的军事问题也和别的事物一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向前运动的。

这就是说，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非创造无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战争之绝灭即无由实现”。这是一切马列主义者的看法。

恩格斯曾经说：“世界上没有能像海陆军这样密切地依存于经济条件的东西了，武器，成员，组织，用兵，一切都直接依存于生产和交通机关之发展的各阶段。”

观察一切军事发展的规律，没有不是根据这个原理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组织各不相同，到了资本主义的

* 这是左权的一篇遗著，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帝国主义的阶段，高度发达了的社会生产，构成了现代机械化的战争，而未给战争本质以变更。由于中日二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这两国的军事组织和斗争方法也不一样。

这样是说，一切军事思想都是随着各阶段经济的条件而变化，同时，一切军事思想当然要受到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这便是我们对于战争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今天，当我们观察中国的军事学术思想时，虽然我们能够很高兴地指出来，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痛感到中国军事学的贫乏。我们中国的军事理论一方面是建筑在传统的，主要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则建筑在外来的，主要是机械论的基础之上。这就妨碍了我们的军事思想的进步，这就形成了中国对于战争的一切错误观点的来源。

直到今天，在我们中国的军队中还存在着一些传统的、陈旧的、不正确的观点。例如有人放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单纯地认为精神重于物质，企图用精神来战胜一切。这种理论发展的结果，必然会走到忽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的道路上去，因为它只给民众以精神上的空洞的安慰、鼓励，而要求人民做一切，却不回答人民所要求的一切，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古旧的孙子兵法与曾胡^[1]治兵语录毫不更变地捧此来，当做教条。这种理论如果发展下去必然会减弱战争的群众性，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所谓速胜论与二阶段论，都由此而生。同时由于中国社会本质还带着封建性，因而还有许多封建社会的军事理论，反映到我国的军事思想中来。例如现在还有人请军师，信神兵；现在还有人在宿营的时候，要按八卦摆好方位，看过风水，方择吉利的地方住下；现在还有人在军事行动之前，要扶乩、要

卜课。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中国的军事思想应当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必须指出，这些错误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基础建筑在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甚至于是建筑在唯神论之上。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军事理论之中，机械地接受了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的就有很多种类，这首先表现在唯武器论，它机械地把外国关于近代武器的理论搬到中国来，而且把它夸大，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便得到了亡国的结论。相反地，又有一些人学会了欧战西部阵线的经验的皮毛，主张单纯的防御主义，因而发生了唯工事论、唯壕沟论。我们必须指出，这些错误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基础建筑在机械唯物论之上。

这些错误发生的基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家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不能掌握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规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由于这种种错误思想的存在，使得我们在二年余以来，已经受了不少的损失。如果这些错误不能克服，那么，不但会在抗战过程中难免产生出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战走向胜利以更大的困难，而且在将来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军事思想的建设上，以及在新中国的建军问题之上，都会发生严重的危害。

要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要规正我们在进步的、正义的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要建立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思想的基础，那么，上述的一切理论都是不能为我们解决问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新的方法、新的观点，才属可能。

列宁在论法国革命时曾经说过：“革命的创造，变革了所有的用兵制度，改正了所有的陈旧的战争法与废习惯，则弃了旧式的军队而创造了崭新的革命国民军，和崭新的战争方法。”

列宁同志的这句至理名言，就昭示了我们，在正义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军事组织和战斗方法，必须创造新的军事思想。我们需要建立新的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以代替旧的思想，而把中国的军事学向前推进。我们今天有责任来做这桩工作，因为这个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了，我们有可能而且一定有可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因为我们是处在正义的、革命的、自卫的战争中。

我们曾经在多年的斗争中，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军事，来服务于战争，虽然这方面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差，但我们曾经从自己的实际斗争中，已应用他。这是什么？

第一，依照马列主义的看法，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

因此，在今天，我们把中日战争的全部过程了解为基于政治斗争而产生的现象。敌人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工农劳动者和一切小资产者及资产者的残酷的掠夺和榨取，而且是对于日本的工农劳动者的非人道剥削。因此它是日本少数人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反革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本质就决定了它是退步的、寡助的。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为了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劳动者的自由解放，而且是为了把全民族——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亡国奴的沉重的锁链之下解放出来，只有求得全民族的自由解放，才能求得中国工农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今天我们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有了这个一致，所以我们全民族能够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争取自由解放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本质，就决定了它是进步的、多助的。

这就是说，正因为中国战争的特性，所以我们不但要

动员中国广大民众，而且我们要争取作为敌人的牺牲品的敌、伪军，甚至于要争取敌人压迫下的一切弱小民族和日本国内的劳苦大众，战争的本质便是我们这一切工作的根据。

这就是说，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国内诸阶级的合作，以增强我们的力量，才能取得民族的自由解放，才能取得阶级的自由解放。

第二，一切斗争的方法，一切战略战术，都是依存于各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依存于各阶段的生产力，而向前运动的。恩格斯在论到这个问题时候说：“在这方面遂行了变革的，不是天才的联队长之‘智力的自由的创造’，而是比较更好的武器之发明，关于军队组成的变化，天才的联队长的影响最多不过使战争的方法适应于新的武器与新的战士。”这几句话，对于把战略战术的发达单纯地了解为英雄的创造的结果的某些理论家，正是一个当头的棒喝。

我们今天便是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根据这一切在经济基础之上层建筑的反映，而规定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武器的量、质和人力决定全部战争的过程，没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是不能把敌人赶到鸭绿江边的。同时，没有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把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从民众中发掘出来，也一样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然而武器和人力之中，究竟谁起着决定的作用呢？我们认为，没有进步的政治素质的军队，它的人员和武器的结合是不稳的，而有着优良的政治素质的军队则有最大的机动去掌握技术，去使用从最原始的到最近代的武器。而且它还有广大人民无穷潜力为其后盾，因此，决定战争最主要的是靠人，人是起主导作用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兵民为胜利之本”的意义。不但世界各国如此，中国尤其

如此；不但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战争中，曾经证明了这个真理，而且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也必然将要证实这个真理。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提高战斗员的政治素质，必须动员全国一切生动的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就必须有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战争对于民众有巨大的要求，我们民众已经接受了，因此我们也必须回答民众的民主和民生的要求。我们有条件动员全国一切生动的力量，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而正因为我们在进行着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我们就不能不作进步的措置，就不能不解决民主和民生的问题。这是战争的本质的要求。同时，我们还需要掌握技术，向技术发展。

第三，提高战斗员和全体干部的质量，不但加强其肉体的质，尤其着重于加强其政治的质，承认“政治在战争中继续着”，是我们军事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政治的质量由军队的阶级的素质和战斗员对于战争目的之态度而产生的，战争的目的和战士的阶级利益愈近，则他们的精神的安定性、牺牲性和创意性亦因之愈高，结果军队的战斗力愈高。这就是说，军队的政治的质，在战争的进行上保有决定的意义。今天，我们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大大的提高民族意识，同时要加强阶级教育。由于今天我们进行的战争，完全是为了民族利益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条件保障我们提高部队的政治的质，而达到战斗团结，政治坚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目的。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意义，在这里便奠定了它最主要的基础。

肉体的质是决定于战斗员与全体干部对于军事技术的领会程度，以及他们学习军事的努力与能力的。肉体的质是决定战斗员和干部直接的战斗力的，而肉体的质又直接依存于战斗员

和干部的文化技术水准，加强战斗教练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这就是说，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我们不能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态度，它保证了部队的政治的质的优良，保证了党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保障了部队的团结和巩固，发扬了战斗员和干部的牺牲性和创造性，也就是发扬了部队的顽强性和机动性。

这就是说，同时，我们不能不加强我们的战斗教练，不能不反对游击主义的作风，我们要掌握技术，向技术发展，这在今天还是一个严重困难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把它解决。

第四，最后我要说到关于战略和战术的辩证观点的问题。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的，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与战术。我们认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的发展过程，而任何一个战术的原则都有它的两方面，都是对立的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

防御战与进攻战的本身过程，就实现了防御与进攻的统一性。防御战是以积极的行动进行的，本身就包含反冲锋，进而变为进攻的性能。而进攻战的本身，则包含有退而变为在相当的阵地上作防御的可能，甚至于包含退却的可能。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向敌人进攻，然而为了要进攻，也就必须有必要的退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曾说过这样的最通俗的名言：“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

直打到鸭绿江边，这是战争问题的机械论与形式逻辑，人间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几句名言，是战术的辩证法的最好的例子。

我们在现阶段的敌后作战方针，便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配合，只有进行运动战，才能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也只有开展广大的游击战，才能够造成运动战的有利条件。不但如此，我们的游击队正在向正规军发展，而且几个游击队联合起来，还可以打运动战，正规军也可以分散打游击。这又表现了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统一性。

歼灭战与消耗战也并非机械地对立的。由于作战环境、客观条件不断转换，由于双方的力的增强或减弱，歼灭战可以转变为消耗战，而消耗战也可以转变为歼灭战。在持续性的战争当中，歼灭战和消耗战的互相转换更加频繁。不但如此，我们的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便是战略上的消耗战，要达到战略消耗的目的，便必须用战术歼灭的手段，这一切，又表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统一性。

在中日战争中，我们有防御中的进攻，有持久中的速决，有外线中的内线的各种斗争方法，这一切都是辩证法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便是把辩证法应用到中日战争中的成熟的天才作品。

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思想的特点。

我们的军事思想，不是从外国搬来的，也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我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现在的客观环境内，逐渐从斗争中产生起来的。我们的军事思想不但是承继了中国革命的传统，不但是吸收了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而且还用了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军事思想来增益了我们自己。

我必须重复的指出来，在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创造与发挥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以后我们

还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左权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指曾国藩、胡林翼。